



---

# 中共党史人物传

---

## 第六卷

---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

# 中共党史人物传

## 第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www.mzdbl.cn](http://www.mzdbl.cn)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六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主编 胡 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850x1168 1/32 印张10.75 插页8 字数240,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4次印刷

印数 1- (平) 40,000

统一书号: 11094·88 定价: (平)1.00元

毛泽东博览 网站编辑  
[www.mzdbl.cn](http://www.mzdbl.cn)

副 主 编：陈志凌 杨世兰

参加本卷审稿编委： 胡 华 陈志凌 彭 明 曹木清  
范寅铮 方大铭 郭洛夫 李育安

责 任 编 辑：郭洛夫



蔡 和 森



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



向 警 予



林 伟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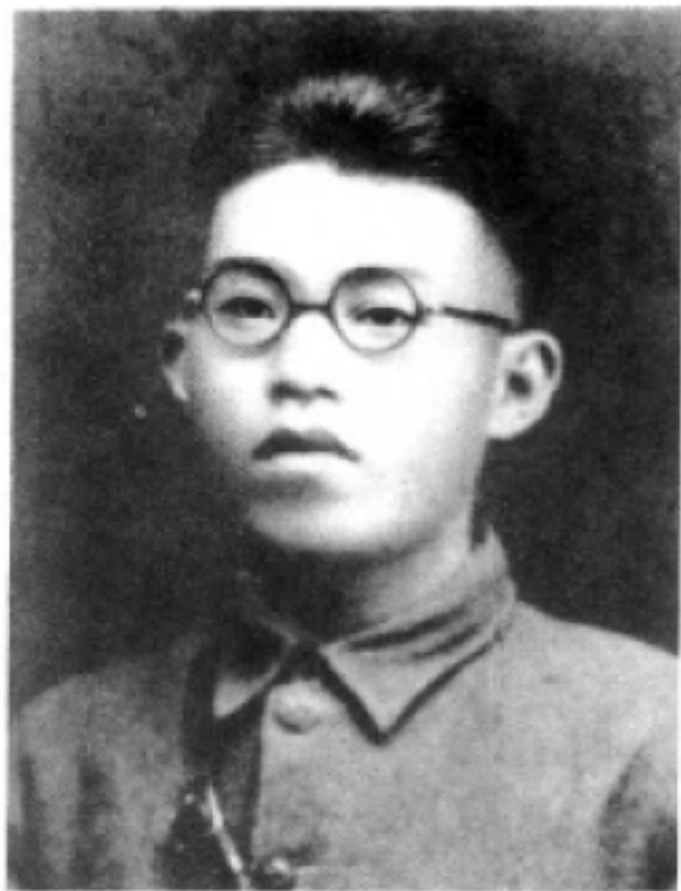
李 鸣 珂



穆 青



赵 醒 侬



陈 毅 安





毛 简 青



李 明 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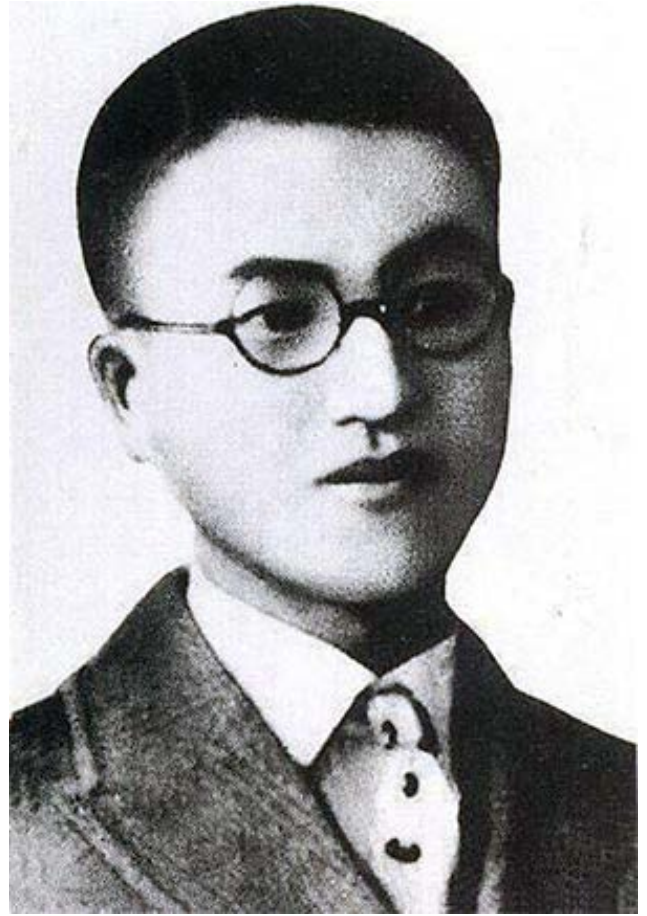
周 维 炯



赵 博 生



董振堂



童长荣

## 目 录

蔡和森 .....	罗绍志 何鹤志	李沛诚 宁丹阳	( 1 )
蔡母葛健豪 .....		罗绍志	( 47 )
向警予 .....		谷 茨	( 58 )
林伟民 .....	榻倩红	卢 叔	( 91 )
李鸣珂 .....	王 斌	周秀芳	(120)
穆 青 .....	王 斌	苏温泽	(150)
赵醒侏 .....	曾志巩	文耀奎	(165)
陈毅安 .....		陈志凌	(183)
毛简青 .....	吴定邦	林 霁	(204)
李明瑞 .....		罗永平	(221)
周维炯 .....		台运行	(234)
赵博生 .....		曾庆圭	(250)
董振堂 .....		董汉河	(271)
童长荣 .....	宋世章	蒋晓钟	(319)

# 蔡和森

罗绍志 李沛诚

何鹤志 宁丹阳

## (一)

蔡和森，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原双姓蔡林<sup>①</sup>，名稣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出生于上海。蔡家世代以经营“永丰辣酱”出名。祖父蔡寿菘，早年考过秀才未中，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中任职<sup>②</sup>，后被遣散回家，仍以经营“永丰辣酱”为业，生活颇为富裕。父亲蔡蓉峰承业后，因不善经营，家业逐渐衰落。一八九〇年，他把铺面租给别人，自己带着妻子前往上海，凭借岳家与曾国藩女婿聂缉槩的亲戚关系<sup>③</sup>，在聂当总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谋得了一个小职位。蔡和森就诞生在这里。

---

①据《湘乡永丰蔡林氏族谱》载：蔡和森的九世祖姓林，福建省莆田县人，康熙10年过继给姓蔡的舅父为子后，迁居永丰，改姓氏为蔡林。

②见〔美〕尼姆·韦尔斯：《埃西行漫记》。

③据《葛氏四修族谱》和《大界曾氏五修族谱》载：曾国藩之第六女嫁给蔡和森外祖父之四弟为妻，因而与聂缉槩有瓜葛之亲。

蔡和森的母亲葛兰英，后改名健豪，对蔡和森的一生影响很大。她出身名门，父亲葛葆吾，做过清朝的盐运使、按察使。但葛兰英在不到一周岁时，父亲便亡故了，由母亲陈氏抚养成人。她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仰慕女革命家秋瑾之所为<sup>①</sup>，经常以秋瑾勇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激励自己和教育儿女。她生有三男三女，蔡和森是她的第五个孩子，第六个是蔡畅。

一八九九年，蔡和森四岁时，随母从上海回到了湖南的老家。不久，父亲也离职返乡，全家在永丰定居。因父亲不事生产，家庭又连遭变故<sup>②</sup>，生活日益窘迫，蔡和森十三岁时，便被送到永丰他堂兄开的“蔡广祥”店当学徒。蔡和森从小患有哮喘病，体质很弱。进店以后，堂兄对他并无照顾，照样是“徒弟徒弟，三年奴婢”，店中的重活都叫他干。“每天早晚开铺关店，背不动沉重的铺板，东摇西歪，有时摔倒在地，常常遭到店主的呵斥怒骂。当学徒还要替老板娘干家务事，有时因疲劳过度，略一打盹，便遭鞭打。”<sup>③</sup>这种苦难的学徒生涯，使蔡和森在内心产生了对旧社会的憎恨，埋下了强烈的反抗种子。当三年学徒期满时，他一刻也不愿再呆下去，把铺盖一卷，对店主说了一声：“我再也不上你们这里来了！”便离开了“蔡广祥”店<sup>④</sup>。

在学徒期间，蔡和森为了探求真正的生活道路，曾偷着自学，打下了一些文化知识基础。离开“蔡广祥”店后，他迫切要求上学，认为只有读书才能不受人欺压。可是，家庭经济困

---

①葛健豪与秋瑾的婆家是同乡，见本书《蔡母葛健豪》。

②1904年二姐顺熙夭折，1907年长兄摩仙病逝。

③④见刘昂：《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载《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61页。

难，供不起他的学费。后来得到母亲的支持，把一些家产变卖，才进了永丰国民初等小学读书。这时，蔡和森已经十六岁。有的同学讥笑他为“太学生”。他毫不介意，一笑置之。由于他读书刻苦用功，一个学期后就跳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在高等小学读书时，蔡和森的各科成绩优异，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他这时就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从不人云亦云；涉猎也比较广泛，经常关心时政。他平时沉默寡言，一旦和同学讨论时事问题，便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发表的见解常使同学深为折服。

辛亥革命后，蔡和森从老师那里了解到一些革命党人的活动，心里非常激动。尤其是对孙中山为救国救民历尽艰险，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十分敬佩，认为是自己效法的楷模。不久，南京临时政府颁布限期剪辫子的通告，他在学校里第一个把自己头上的辫子剪掉。在他的带动下，母亲也毅然剪成了“巴巴头”，妹妹也不再裹脚。他家的这种行动，对于推动当时永丰镇群众冲破封建习惯势力的樊篱，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蔡和森开始懂得只有革命才有出路，为革命追求真理的欲望也随之迫切了。一九一三年初，他在高等小学读过一年书后，就离开家乡，进省城考入了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同年秋，改名蔡林彬，转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与毛泽东相识，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在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进步老师的引导下，他们以极浓厚的兴趣钻研文学、哲学、历史；同时，深切关注着社会问题，思考着如何挽救危难的中国。因此，“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

率”①。

一九一五年夏，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增设专修科文学部，杨昌济和徐特立都被聘去兼课。这时，蔡和森已在一师求学两年。由于他深感一师的课程太杂、太浅，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便于同年秋离开一师，转入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乙班，与邓中夏同学。

在高等师范里，蔡和森读书用功之勤、精力之专，可说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除认真钻研学校规定的功课外，还经常到图书室博览群书。有时研读入神，心不外驰，竟忘记了上课的时间。他妹妹蔡畅曾回忆说：“我这哥哥非常聪明好学，他可以关在房间里，一点饭也不吃的念一两天的书。”②因为他在校经常“缺课”，年终甄别时，学校要给他以“除名”处分。只是由于杨昌济的据理力争，学校才收回成命。

蔡和森从忧国爱民、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出发，对墨翟、屈原的著作研读颇深，并且喜爱谭嗣同的《仁学》，许多精采的段落，能琅琅背诵。他十分赞赏谭嗣同探索宇宙之真和救国之道的精神，拥护谭嗣同提出的“冲决罗网”的主张。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出版后，他又成了热心的读者。对每一期都要反复阅读，深入钻研。在《新青年》宣传的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影响下，他曾经多方探求，编出一部《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痛诉中华民族的这段屈辱历史，在学校引起过师生的强烈反响。

---

①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1935年），载《红旗飘飘》第5集。

②〔美〕尼姆·韦尔斯：《绥西行漫记》。



一九一七年六月，蔡和森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这时，他想到“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sup>①</sup>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sup>②</sup>，便决意去当教员。他曾托同乡同学王光霞邀一乡馆，以培育救国救民的人才。但当时邀馆一般是春季始业，秋月无从着手。想当教员的愿望落空以后，为了继续同在省城求学的毛泽东等探讨人生、救国的道路，他把全家包括蔡母葛健豪及蔡庆熙、蔡咸熙、刘千昂等都搬进省城，先居岳麓山下的饮马堂，不久迁居溁湾镇的刘家台子。

蔡和森一家五人居住在省城，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妹妹蔡畅在周南女校任教每月的八元收入，大姐蔡庆熙有时也补贴一点。尽管生活艰苦，但并不因此影响蔡和森对知识的追求。他发奋自学，于一九一七年八月，读了二十四史的重要部分和《资治通鉴》等书，痛感“中国无一部完全之史书”。他在和张昆弟的一次谈话中曾说：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他认为历史应“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因而准备“先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然后写一部反映“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的史书<sup>③</sup>。当时，在学界流行着两种读书倾向：一些倡导新文化的人，往往抛弃旧书不读；而墨守旧文化的人，则又拒看新书。蔡和森却说：“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

---

①曾涤生，即曾国藩。

②见《蔡林彬给陈绍休、肖子璋、肖子昇、毛泽东》（1918年8月27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③见《张昆弟日记》（1917年8月23日），未刊稿，藏湖南省博物馆。

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此吾辈读新书、读旧书所应知之事也。”<sup>①</sup>正是由于蔡和森采用这种批判地继承的读书方法，不断地吸取了新思想，摒弃了旧思想，为他后来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基础。

蔡和森在饮马堂和刘家台子时，除刻苦自学外，还积极进行身体和意志方面的锻炼。他曾对张昆弟谈及自己的生活时说：“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自四时半起至天马山顶，静坐运动，至九时始下山；十时早餐，早饭后看书约二小时；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不以为正课焉；四时半午餐，食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每日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时一次。又于雷雨风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意。”并说：“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sup>②</sup>张昆弟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还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下山，山风大发，空气清新，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毛泽东曾回忆这种生活时说：“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这个名字下进行的。这件事情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有不少的帮助。”<sup>③</sup>

蔡和森与毛泽东一样，还特别重视接触社会，接触实际。在租居刘家台子期间，他经常同毛泽东、张昆弟等利用假日漫游农村，了解民情。一九一八年春，因张敬汤在一师驻扎了一

---

<sup>①②</sup>见《张昆弟日记》（1917年8月23日）。

<sup>③</sup>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

个旅的兵力，学生不能上课。趁学校停课的机会，毛泽东、蔡和森两人一道从刘家台子出发，徒步在洞庭湖附近的农村，作了一次为时半月的“游学”，先后到过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了解社会风俗，特别是农民的政治、经济状况。解放以后，据肖三说，浏阳陈绍休家门还活着的一颗大树，“就是当年毛泽东、蔡和森游历时栽下的”<sup>①</sup>。

蔡和森自进省城求学后，结识了毛泽东、陈昌、张昆弟、罗学瓚等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后来，蔡和森的家便成了这班青年聚会的场所。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讨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感觉：国家要改造，自己要进步，非集合同志、组织一个团体不可。于是，一个“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sup>②</sup>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从一九一七年冬开始酝酿，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在蔡和森家居住的刘家台子诞生了。

新民学会成立后，如何发挥团体的作用，创造新的环境，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经常考虑的问题。这一年的六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蔡和森与毛泽东、张昆弟便搬进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自修，进行“新村生活”的尝试。他们走遍了岳麓山下的小镇和村落，想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盘作为“新村”的试验场所，以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睦、互助友爱的自由天地。然而，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打算。

---

①肖三：《月夜常思君》，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载《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页。

这时，已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来信，转告了北京正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毛泽东、蔡和森得到消息后，与肖子昇等立即在湖南着手这一工作。六月下旬，新民学会在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召开会议，讨论了“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会上，蔡和森与肖子昇等积极提议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会者一致认为应尽力进行。“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和森赴京。”<sup>①</sup>为了实践学会“向外发展”的方针，蔡和森是最早走出湖南的会员之一。

## (二)

蔡和森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从长沙乘轮起程，至汉口搭火车，二十五日晚到达北京<sup>②</sup>。当轮船驰入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时，遇上狂风骤雨，他眺望湖面上汹涌的波涛，联想到久为军阀铁蹄蹂躏的乡国，怀念着立志改革社会的新民学会的同志，心潮澎湃，思绪万端，即兴吟咏了一首题为《少年行》的五言诗：

大陆龙蛇起，乾坤一少年。  
乡国骚扰尽，风雨送征船。  
世乱吾自治，为学志转坚。  
从师万里外，访友入文渊。  
□□□□□，□□□□□。

<sup>①</sup>见《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

<sup>②</sup>见《蔡林彬给毛泽东》（1918年6月30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  
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  
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渊。  
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  
潭州蔚人望，洞庭证源泉。①

这首诗，正气磅礴，慷慨激越，充分展现了青年时代的蔡和森的崇高精神境界。

蔡和森初到北京时，寄住在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家里。为了在“三年之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②，经杨昌济的引荐，在七、八两个月里，他先后拜访了华法教育会的主持人蔡元培、李石曾等，向他们陈述了湖南青年加入赴法勤工俭学行列的要求，请求予以安排。蔡元培也将自己“正谋网罗海内人才”的计划告诉了蔡和森，鼓励他多联络青年到北京来，以开创“可大可久之基”③。他还拜访了李大钊，读了李大钊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接着又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由于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尚处在创始阶段，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最要紧的是经费问题，赴法旅费每人要几百元；出国前还必须举办补习班，使学生打好一定的法文基础。这些问题，经过蔡和森积极求助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虽然很快得到了解决，但名额限定在二十五人之内。为使湖南更多的有志青年留法，蔡和森认为“盖

---

①载《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4月版，第108—109页。

②③见《蔡林彬给陈绍休、肖子暉、肖子昇、毛泽东》（1918年8月27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此事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sup>①</sup>。于是，他将在京联络的情况写信告诉毛泽东等学友，要求他们把众多的青年都发动起来，甚至可“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sup>②</sup>，以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他还迫切要求毛泽东来京主持这一工作。毛泽东接到信后，偕同新民学会会友罗学瓚、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四人，于八月十五日从长沙启程赴京。不久，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其他会员分别入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今属高阳县）的留法预备班（校）补习法文。蔡和森既是布里村预备班的学生，又是该校的负责人。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他与毛泽东付出极大的精力。他俩的这种革命热忱，深为杨昌济所赞赏。一九二〇年一月，杨昌济在病逝前夕曾写信给友人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者毛泽东蔡和森也。”<sup>③</sup>

蔡和森在北京期间，不仅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奔忙不息，还如饥似渴地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想和新学说，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他曾对毛泽东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罗网，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sup>④</sup>。他还说：“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

---

①②见《蔡林彬给陈绍休、肖子璋、肖子昇、毛泽东》。

③见章士钊：《杨怀中别传》（1936年3月18日），未刊稿，藏杨开智老人家。

④见《蔡林彬给毛泽东》（1918年7月24日），载《新民学会资料》第56—57页。

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sup>①</sup>。在这里，蔡和森虽然还不明瞭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学者茅原华三及其倡导的“贤人政治”是根本对立的，而且，他把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与古代墨翟的功利主义相提并论，也是不妥的；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他毕竟是新民学会会员中提出“仿效列宁”的第一人。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爆发。蔡和森在北京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积极组织在京的湖南青年投入这一运动。六月下旬的一天，当他听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将在巴黎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消息时，立即带领湖南青年陈绍休、贺果、唐铎等与北京法文专修馆的同学一起，参加示威请愿活动。据唐铎回忆：那天他们在新华门前的院子里坚持了一天一晚，晚上就露宿在那里<sup>②</sup>。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蔡和森的爱国热情，促使他加快了留法勤工俭学准备工作的步伐。一九一九年六月底，他从北京回到长沙，一面热情宣传“五四”运动后北京的政治形势，鼓舞湖南青年的斗志；一面介绍在京的联络情况，发动湖南青年赴法。为了实现“使女界同时进化”的愿望，他特别注意动员和组织女界青年赴法。他要妹妹蔡畅写信给当时在溆浦任教的周南女校学友向警予，邀她来省城组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向警予接到信后，立即赶到省城蔡家，与

---

<sup>①</sup>见《蔡林彬给毛泽东》（1918年7月21日），载《新民学会资料》第58页。

<sup>②</sup>见唐铎，《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100页。

蔡畅、陶毅等人发起成立“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学会”。在他兄妹的发动下，年过半百的蔡母葛健豪也决心跟儿女们一道去当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学生”。他一家两代人准备赴法的这一行动，对推动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湖南先后出国的“人数为各省之冠”<sup>①</sup>。

蔡和森与母亲、妹妹及向警予等三十多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乘“法国邮船公司‘央脱来蓬’船，于下午一时在上海杨树浦码头起碇”赴法<sup>②</sup>。在起程前，华法教育会在法文协会举行欢送会。毛泽东从湖南赶到上海送别，但未待他们起程，又为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第二次去了北京。

经过三十五天的航海旅行，蔡和森等于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日抵法国马赛，二月二日到达巴黎，七日与母亲、妹妹及向警予等分别入蒙达尼男、女中学<sup>③</sup>。在漫长的旅程中，蔡和森与向警予天天一起研究政治和学术问题，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后来发展为真挚的爱情。他们在船上还合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向上同盟》，表示要在革命的征途中，互相勉励，共同向上。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已经建立，马列主义的各种法文版的小册子也大量印行，社会思潮十分活跃。蔡和森入蒙达尼男子中学后，起初计划“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

---

①舒新成：《近代中国留学史》。

②见1919年12月26日上海《时报》。

③据《蔡君和森寄自法国的家信》，载1920年5月13—16日湖南《大公报》。



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sup>①</sup>。后因觉得“校中功课太浅，及求知欲切，决不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以为常”<sup>②</sup>。由于他的刻苦用功，三个月后，“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sup>③</sup>。半年之内，他就“思想门路大开，以世界大势律中国，对于改造计划略具规模”<sup>④</sup>。他还收集马列主义和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小册子约百种，准备编译一部传播革命运动的丛书，向国内广泛介绍。

一九二〇年七月，新民学会留法的十三个会友，在蒙达尼男子中学举行了为期五天的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新民学会方针，与会者均表赞同。在讨论改造方法和道路时，发生严重分歧，出现了革命和改良两种主张：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sup>⑤</sup>；一派以肖子昇为代表，声明“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sup>⑥</sup>。两派在会上展开了一场论战。蔡和森雄辩的发言，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会员的拥护，并使得一部分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会友改变观点，逐步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这件事情说明，蔡和森在留法会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最早，不愧为“留法会员中的先驱者”<sup>⑦</sup>。

---

①②③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5月28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④ <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⑤⑥ <肖旭东给毛泽东>（1920年8月），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⑦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新民学会资料>第478页。

蒙达尼会议结束后，蔡和森还帮助“勤工俭学励进会”进行了改组。这个组织是一九二〇年二月由李维汉、罗学瓚、张昆弟、李富春等人发起成立的。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成员信仰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蔡和森对这个组织十分关切，主动与“勤工俭学励进会”的成员联系谈话，帮助他们克服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据李维汉回忆说：“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作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sup>①</sup>。

在蔡和森的积极帮助和影响下，“勤工俭学励进会”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改名为“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三十多人。鉴于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中带普遍性的倾向，约在九十月间，蔡和森帮助“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尼开了三天会。会前，蔡和森把自己“猛看猛译”的《共产党宣言》用纸抄好，一张一张地贴在会议室周围的墙上，供大家阅读。经过蔡和森与他们的热烈讨论，大多数社员很快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工学世界社”的宗旨也与“新民学会”的宗旨趋向一致，成为勤工俭学学生中的领导力量之一。此时，蔡和森与

---

<sup>①</sup>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

向警予已结婚。向警予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今天晚上九点，新从世界工学社旁听回来”，“和森是九儿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我同他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二十世纪的小孩子。”<sup>①</sup>

在这期间，蔡和森不仅把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励进会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引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而且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sup>②</sup>。尤其是在建党理论上，蔡和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建党思想，集中反映在八月十三日和九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两封长信，以及次年二月十一日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sup>③</sup>。他的这三封信，比较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及组织原则。这是他由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他自己所认定的“极端马克思派”的显著标志。他在信中所阐明的基本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还从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入手，驳斥了张东荪等人的所谓中国不存在阶级区分，不能进行社会革命的谬论，论证了中国爆发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我

---

①载《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4页。

②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3页。

③见《蔡和森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2版第22—36页，第51—56页。

敢说一句话，现在中国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五千万不能生活了。到了这个地步，……我们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到了这个时候，革命之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也如自然力的雷电之爆发一样，行所必然。什么成败利钝都不会顾，什么改造的思想家、大学问家也都把持不下地。”他深情地告诉毛泽东：“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个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蔡和森这样旗帜鲜明地坚持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对于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正在酝酿中的建党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唯一制胜的方法，就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他还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否定阶级专政的谬论，尖锐地指出：“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解放。”因为“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他说：“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

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特尔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的必然的结果”，“其实这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任你如何反抗，历史的过程定要如此经过的。”

（三）必须首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指出：要发展中国革命，“我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及建党的步骤等，都作了比较系统、深刻的论述。他认为：首先，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他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称这个无产阶级政党为“中国共产党”，并且认为只有首先组织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其次，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学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第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的革命手段，反对改良主义。他说：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农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第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党员应分布于工厂、农村、学校，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五，这个党必须是高度集中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委员会”。他还明确指出：“党的方略为多方面的，无论报纸、议院、团体，以及各种运动，绝对受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绝不能

单独自由行动。”

蔡和森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得到了国内毛泽东等人的“深切赞同”。他九月十六日写的信，毛泽东于年底才收到。一九二一年元月十一日，毛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同时，毛泽东还与何叔衡等召集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开“新年大会”，对蔡和森提出的诸问题，进行了三天的热烈讨论，从而直接推动了湖南及全国建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工作。

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不仅是革命真理的刻苦探索者，而且是勇于斗争的无畏战士。一九二一年，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生三次重大的斗争：一次是二月二十八日的“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斗争，即反对北洋政府拒绝资助勤工俭学生并指使驻法使馆企图把找不到工作、读不上书的学生“遣送回国”的斗争；第二次是七八月间的“拒款”斗争，即反对北洋政府卖国借款的斗争；第三次是九月抗议里昂中法大学吴稚晖等拒绝招收勤工俭学生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蔡和森都发挥了卓越的领导作用。在第一、二次斗争中，他与“世界工学社”的成员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商讨，提出了正确的斗争口号和策略，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第三次斗争中，蔡和森与赵世炎、陈毅、罗学瓚等一起率领一百二十五名勤工俭学生代表勇敢地冲进了里昂中法大学，以入校队的名义占领一座楼房，准备与校方谈判。不料吴稚晖等和驻法公使陈篆竟串通法国当局，派出警察二百余名，将蔡和森等一百零五人予以拘捕，经过二十多天的囚禁，除赵世炎机智逃出外，其余的均于十月十八日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扰乱治安”的罪名，被强行遣送回国。蔡

和森也就被迫结束了将近两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开始投入了在国内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 (三)

一九二一年底，蔡和森归国后不久，即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并被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随后，向警予也归国。他们刚到上海时，住在一个弄堂的楼上，生活艰苦，主要依靠先期到达上海的陈毅等人把争得的安置费分给他们一份度日<sup>②</sup>。

当时，党中央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在上海开办了“平民女校”，由李达担任校长，向警予等任教员。蔡和森也在这所学校兼课。“他的名著《社会进化史》就是在这里讲课开始酝酿成的。”<sup>③</sup>但是，这时他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在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他特别注意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在建党初期，党内和社会思想界有一种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正如后来蔡和森所指出的：这些人虽然“读过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真正了解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怀疑的”<sup>④</sup>。他们主张党只专门向学

---

①见《陈公培先生谈话纪录》，未刊稿。

②陈毅：《一九六三年和儿子的谈话》，载1981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③徐梅坤：《与蔡和森同志交往的片断回忆》，载《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生宣传，反对做工人运动，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纪律，企图使党成为一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把党建设成为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蔡和森与合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理论上给予了彻底的批判。“这一斗争在树立党的基础上是有异常重大的意义的”<sup>①</sup>。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蔡和森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宣传工作，并为此专门撰写了《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指出：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只有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都归社会公有”。这就是劳动运动的根本的目的。为达此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行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sup>②</sup>。

同年五月五日至十日，蔡和森受中央的委派，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后，他一面做团的组织发展工作，陈毅就是这时经他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sup>③</sup>；一面协助编辑了团刊《先驱》第八、九、十期。在他负责编辑的《先驱》第九期上，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蔡和森在刊载这个重要文件的版面上端冠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自从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就一直进行反抗斗争，

---

①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1935年）。

②HS（和森）：《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载《先驱》第7期。

③陈毅：《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的谈话》，载《陈毅早年回忆与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但在报刊上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还是第一次。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上海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等十二人。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党的“二大”发表了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蔡和森是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对党的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蔡和森被会议选举为中央委员。从党的“二大”至“六大”，他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党的“二大”还决定将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停刊，新出一种报纸为中央机关报，并指定蔡和森负责筹备。

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来的愿望。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他就深感“国内言论沉寂，有主义有系统的出版物几未之见，至于各国社会运动的真情，尤其隔膜得很”，因此他打算将自己“读书阅报之所得，做一种有系统有主张极其鲜明强固的文化运动”<sup>①</sup>。他在同毛泽东的通信中谈到建党的部署时，还特别强调要“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sup>②</sup>。党的“二大”决定由他筹办党的机关报后，他满腔热忱地接受了任务。开始他拟办《远东日报》，但根据当时政治

---

①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1921年2月11日），载《新青年》第9卷第4号。

②《蔡林彬给毛泽东》（1921年9月16日），载《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斗争的形势和环境，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只办一种周报，不同意办日报。于是蔡和森再拟定为《向导》周报，得到了党中央的一致通过。

《向导》周报是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的。它一问世，正如广大读者所称颂的那样，说它是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民众政治生活中的“寒暑表”，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四万万苦难同胞的“先锋队”、“救命符”。《向导》从创刊至一九二七年七月终刊，蔡和森除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驻共产国际工作外，始终担任主编。由于当时的撰稿人较少，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既是《向导》的编委，又是主要撰稿人。作为主编的蔡和森写的文章更多。他除用“和森”署名发表了一百三十篇文章外，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字发表了不少文章。他的文章和所主编的《向导》，观点鲜明，文笔流畅，及时分析国内外形势，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向人民传播马列主义方面，真正发挥了革命的向导作用。

蔡和森以《向导》为阵地，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反复阐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他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他说：“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战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夷为半殖民地。”<sup>①</sup>他指出：“中国国民运动的真意义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因为国际帝国主义既是压迫中国的

---

<sup>①</sup> 《中国国际地位与承认苏维埃俄罗斯》，载《向导》第3期。

仇敌，又是军阀存亡，国家分裂，内乱永续的原动力。”<sup>①</sup>他还藐视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指出“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sup>②</sup>。当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著文诬蔑《向导》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很象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sup>③</sup>。蔡和森在《向导》周报上用大量的事实驳斥胡适的谬论，揭露他充当帝国主义辩护士的面目。蔡和森指出，就以华盛顿会议来说，虽然它标榜尊重中国独立主权，实际上不过是帝国主义协同宰割中国罢了。中国的军阀、土匪、内战，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无不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操纵。蔡和森还发表许多文章，抨击新四国银行团、金佛郎案以及各国借口山东临城劫车案而主张对中国“共管”的主张等等。他在《向导》上辟有“外患日志”专栏，将帝国主义的暴行逐日揭载，以令人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从而使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日益深入人心。正如两年后蔡和森回忆这一事实时所说：“本报初揭载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理论事实时，北京大学教授胡适之目为海外奇谈，现在这种海外奇谈竟成为普遍全中国的政治常识”<sup>④</sup>。

打倒封建军阀，实现中国的民主统一，是党的“二大”提出的另一个基本任务。蔡和森利用《向导》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他主张彻底打倒军阀统治，指出中国的政治问题，断

---

① 《外方，中流阶级与国民党》，载《向导》第16期。

② 《革命中的希腊》，载《向导》第13期。

③ 《国际的中国》，载《努力》周刊第22期。

④ 《孙中山逝世与国民革命》，载《向导》第107期。

不是创法改制或废督裁兵所能解决，换句话说，“就是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sup>①</sup>，希望封建军阀废督裁兵是根本不可能的。蔡和森还尖锐揭露各地大小军阀，都以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等为幌子，而暗中却实行争权夺利的卑鄙伎俩。他指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既非势必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又非北洋正统所能处置，唯一的出路，只有实行彻底的民主革命。当时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大胆”肯定，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蔡和森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胡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革命。”<sup>②</sup>

在宣传以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政策方面，蔡和森也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向导》创刊之前，即一九二二年八月党召开的西湖会议，就确定了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方针；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蔡和森参加了西湖会议，并对这个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开始，他认为因阶级性使然，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主张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不应与资产阶级联合。他赞成与国民党合作，赞成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但不赞成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产业工人是无产阶级的基本力量，如果产业工人也加入了国民党，共产党就失掉了基础。经过西湖会议的讨论，蔡和森基本上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赞成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国民革命；并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一道，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首批

---

①② 《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载《向导》第2期。

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sup>①</sup>。同时，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和陈独秀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右倾观点，他一直是反对的。他在后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中强调指出：“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sup>②</sup>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围绕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形式问题，进一步开展了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蔡和森出席了“三大”，拥护“三大”所有的决议案，并被继续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为争取和改造国民党，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方面肯定国民党是民主革命派，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领袖；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国民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批评孙中山想依靠某派军阀和某一“友邦”来实现中国统一的观念。蔡和森说：“革命党要靠继续革命才能存在的，靠旧的军阀势力之均衡，是不能存在的”<sup>③</sup>；至于幻想所谓“友邦”即一派帝国主义的援助，也无异“认他为干与中国内政的合法主宰。”<sup>④</sup>他还向国民党人指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任务是，一面打倒国内封建势力，一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否则其方略与趋势必至大错而特错。“我们诚恳的希望孙中山先生们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针，朝着国民革命的

---

①托玛斯·科普：《陈独秀年表》，载《陈独秀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香港出版（英文版）。

②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③《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

④《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第19期。

正轨走去。”<sup>①</sup>

一九二四年底，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国共合作。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国民党右派仍然极力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蔡和森继续以《向导》为阵地，与国民党右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发表了许多揭露右派的文章，指出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中派的动摇性，要求共产党人提高革命警惕性。他还提出：“我们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准备帮助国民党左派的。”<sup>②</sup>

这一时期，蔡和森还在《向导》发表文章，极力主张发展工农运动，以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坚”。他指出：工农阶级的发动，是“中国革命之新动力”<sup>③</sup>，要发展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就必须发动和依靠广大工农阶级；而广大工农阶级要获得自己的解放，也必须参加国民革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天然的负有两重责任：一面应为民族独立的共同利益奋斗，同时应为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奋斗。”<sup>④</sup>他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实际状况，明确指出：“只有工农阶级是忠于反帝国主义和民族革命的台柱子”，“我们工农阶级唯有增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有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亦唯有成功独立的阶级的组织，才更能增强反帝国主义的势力，而完成我们工农阶级的历史使命。”<sup>⑤</sup>蔡和森还根据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和农民帮助革命军

---

① 《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向导》第23期。

② 《何谓国民党左派》，《向导》第113期。

③④⑤《今年五一之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见《蔡和森文集》（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385—388页。

打败陈炯明的实际情况，在一九二五年四月，明确地指出了建立“农民运动之武装”<sup>①</sup>的重要性。他同时指出：“谁要忠于革命，谁便更应求明白帮助工农阶级发展的意义。只有这个是一切国民党分子决定其自己对于左派之争，应取如何态度的最好方法：你们或者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真正革命阶级（工农阶级）方面，或是站在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反革命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方面。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sup>②</sup>

当时，蔡和森不仅以极大的革命热忱主编《向导》周报，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著作发表在党的其他刊物上，阐述党的政策，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一九二四年三月，中共北京区委会改组时，蔡和森被选为区委委员。从此，他在主编《向导》的同时，还与李大钊创办了北方党的刊物《政治周报》，并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在这年四月《政治周报》的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三篇重要文章，其中《何以救济智识阶级》一文，议论极为精辟，是我党早期分析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知识分子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也是受苦的劳动者，他们中的“最大多数是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流离失所的穷困无告的可怜品”，是反帝反封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一九二三年党所领导的上海大学开办以后，蔡和森在这里兼任社会学系教授，编写了长篇的《社会进化史》讲义，连续三次出版发行。他还对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认真考察，撰写了《俄国社会革命史》。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曾写过多次信给“世界丛书”

---

<sup>①②</sup>《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第112期。

主编胡适，推荐这部书的出版<sup>①</sup>。李大钊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给胡适的信中说：“蔡和森君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世界丛书’内可否纳入？和森很穷，专待此以为糊口，务望吾兄玉成之。”但是，这本《俄国社会革命史》却一直被压而未能出版。

随着反帝反封建宣传的日益深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到来了。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杀害，广大工人奋起反抗。为了把这一斗争引向深入，党中央于五月二十八日召开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他还提出了五月三十日要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游行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却被陈独秀指责为“空泛而不切实际”之谈，并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蔡和森予以反驳，他严正地指出：“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眼病的观点”，“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假如我们估计到了这些方面的话，则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蔡和森的预见。“五卅”那天参加反帝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市民，竟有将近十万之众。

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等出

---

<sup>①</sup>李大钊给胡适的二封信（1923年9月），见上海《书林》1980年第3期；陈独秀给胡适的六封信（1923年12月——1924年2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席了这次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说：

“现在总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以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切力量促成总罢市的实现，以造成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会议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五月三十一日，又组织了一次大示威，并召集了产业工会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李立三为委员长的上海市总工会。总工会当即发出了第一号通令，宣布六月一日实行全市工人总罢工。

在党的正确策略指引下，六月一日，上海二十万工人为抗议“五卅”惨案，首先举行政治大罢工，继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当晚，中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蔡和森在会上分析了正在发展中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策略主张：“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这一反帝运动的总的领导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成为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这就是我们最近几日的任务。”<sup>①</sup>

六月四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运动有了公开的总的领导机关。《向导》也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因而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打击。蔡和森在“五卅”运动中提出的策略主张，生动地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以及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才能。

---

<sup>①</sup>以上引文均见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1935年），载《红旗飘飘》第5集。

#### (四)

“五卅”运动后，一九二五年九月，蔡和森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全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决定对国民党右派日益嚣张的反动行径，在思想上、组织上采取进攻的政策，以及大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会后，蔡和森与陈独秀、张国焘一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代表孙科、叶楚傖、邵元冲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商讨国共合作关系问题，揭露了“西山会议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给予国民党老右派以沉重打击。

十月，根据党的指示，蔡和森与李立三、向警予等一道从上海赴莫斯科。向警予进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蔡和森则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共产国际。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发表了《抗议英国封锁广州的决议》，声援省港罢工斗争。蔡和森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会上致贺词，博得了与会成员的热烈鼓掌。

蔡和森在驻共产国际期间，一面继续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一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他应中共中山大学旅俄支部的邀请，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这个报告长达五万余字，保留了丰富的珍贵史料。它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和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产生到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之间的革命斗争历史，可

以说这是中共党史方面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蔡和森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即“五四”以前的“旧的阶段”和“五四”以后的“新阶段的革命运动”。蔡和森认真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它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胜利。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过去“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蔡和森这部著作表明他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已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在莫斯科期间，蔡和森还利用一切机会做争取、帮助冯玉祥的工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显著成果。自从一九二三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后，即负责做北方军阀政府和冯玉祥的工作。经过苏俄代表和中共北方党的工作，冯玉祥在政治上更进一步。一九二六年三月到九月，冯玉祥曾在莫斯科参观访问，蔡和森和刘伯坚等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冯玉祥在莫斯科“进步甚大，颇可乐观”<sup>①</sup>，回国时还请求苏联与中共派人与他同行，帮助他改造国民军。对此，蔡和森非常高兴。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写信给北方党的负责人李大钊，提出了继续做好冯玉祥工作的建议。冯玉祥回国后不久，即在绥远五原誓师，投身国民革命；以后进军宁夏、甘肃、陕西，对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曾起过作用。

---

<sup>①</sup>蔡和森：《自莫斯科给守常同志信》（1926年9月26日），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从一九二七年初开始，国内形势急剧发展。一方面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北伐军胜利前进；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制造分裂，国共两党的联合面临危机。为了加强党中央的领导力量，共产国际决定蔡和森立即回国工作。四月一日，他途经长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教育会坪召开万人欢迎大会。蔡和森应邀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现在革命的发展，第一当注重的是农民问题，“农运是整个革命的根本问题”。第二当注重的是革命的社会基础，“惟有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军队”。第三当注重的是同盟军。他针对有些人为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谰言，尖锐地指出：“工人方是真正的同盟一军，资产阶级是压迫工农的，不能领导革命。”第四当注重的是革命武装问题，“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基础方面不致动摇”。第五当注重发展经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即可以得天下<sup>①</sup>。这种重视农民问题的卓越见解，是蔡和森的一贯思想，也是他后来在如何对待武汉国民党“左派”问题上，与陈独秀争论的一个焦点。

蔡和森在长沙稍事停留后，即前往武汉。当时的武汉是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机关在这里，国民政府也设在这里。蔡和森到达武汉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面对着反动派的猖狂进攻，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鲁易等人，却顽固地坚持妥协退让的右倾投降方针，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惜一切代价搞好同

---

<sup>①</sup> 《在湖南省国民党省党部欢迎会上的讲话》，载1924年4月2日湖南《大公报》。见《蔡和森文集》（下卷），第324—326页。

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的“五大”于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蔡和森和瞿秋白、毛泽东等代表一道，在会议上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这次会上，蔡和森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央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还决定周恩来担任中央秘书长，在周恩来未到职前，由蔡和森代理。

党的“五大”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反革命镇压，而陈独秀仍然顽固坚持错误，继续推行和发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和二十一日，夏斗寅、许克祥相继于湖北的宜昌和湖南的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消息非正式的传到武汉后，蔡和森与李立三向中央提议，由叶挺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夏斗寅，若唐生智全部叛乱，则直由粤汉路取湖南为根据地，再进军湖北与广东，同时，广泛发展工农武装，“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sup>①</sup>由于陈独秀顽固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蔡和森与李立三的意见只被采纳一半，即决定由叶挺部及中央军校武力迎击夏斗寅，而迅速发展工农武装的提议被搁置一边，致使两湖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继湖南长沙“马日事变”后，朱培德在江西叛变，冯玉祥在河南进行反动活动，武汉这个革命中心正在被反革命势力四面包围。在这种紧急形势下，中央曾多次开会讨论党的工作方针。但在讨论中，共产国际两位代表却争论不休。鲍罗廷强调和国民党的关系是当时的中心问题，指责工农运动“过火”，

---

<sup>①</sup>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认为当时只能减租减息，不能搞土地革命；鲁易在“马日事变”后虽然主张反击，但是提不出有效办法。陈独秀倾向鲍罗廷。蔡和森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主张把工作中心放在发展工农运动，扩大工农武装，解决农民土地等问题上，对反动派坚决进行反击。

六月初，当时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首领汪精卫到郑州和冯玉祥举行会议，武汉国民党反共倾向愈来愈明。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陈独秀、鲍罗廷提出“东征”蒋介石；鲁易、谭平山提出要“南伐”广东；蔡和森则主张解决两湖问题。他认为，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sup>①</sup>。他主张坚定地、自觉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建立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sup>②</sup>。他还具体拟定了解决两湖问题的决议案。在湖南，坚决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许克祥，对长沙围攻封锁之势；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建立乡村政权，实行赤色恐怖；在反许克祥的斗争中，应发展农民军五万以上等等。在湖北，号召全省农民群众抵抗白色恐怖，向地主、土劣、军阀猛烈反攻；利用省政府（当时在共产党掌握中）扩大省防军及工农武力，尽力打击敌人；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土地；迅速发展群众势力，准备改组国民党中央等。当时恰好共产国际来电，指责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指令迅速反攻，解决许克祥的叛乱，发动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等。因此，党中央同意蔡和森的“两湖议案”，共产国际代表鲁易也表示同意。于是，中

---

<sup>①②</sup>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央和国际代表之间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指导湖南暴动，派遣了一批军事干部赴湘。但是，后来鲁易又借口形势改变，推翻了原来的决议。虽经周恩来与鲁易力争，还是无济于事。

六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召开会议，蔡和森被撤销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因此，他即告假，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毛泽东处养病。六月二十五日，他在毛泽东住所给中央常委写信，指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然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sup>①</sup>他提议：“中央机关应移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即应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sup>②</sup>这是在革命紧急关头应采取的正确方针。但当时中央常委讨论此问题时，竟遭到陈独秀等人的无理拒绝。

他在毛泽东住处，接触了不少从湖南来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农民代表，他们要求对反动派的屠杀进行反击。这种要求使蔡和森更加相信自己提出的“以暴动对付暴动”的主张是正确的。不久，蔡和森由于病情严重，经中央常委决定去住院疗养。在医院里，他不顾自己病情恶化，仍然坚持与国民党右派和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斗争。七月八日，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一文，对国民党右派借口“国家统一”，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反动舆论，给予了严厉的驳斥。他指出：“革命势力的联合便是国家统一的动力”，“凡是不愿意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的人们，他们必定首先反对或破坏革命势力的联合。从冯自由、戴季陶以至蒋介石便证明了这个真理。”<sup>③</sup>他号召一切受帝国主义和军

---

<sup>①②</sup>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sup>③</sup>见《向导》第200期。

阉宰割蹂躏的人民，誓同“反联合战线”的敌人斗争到底。

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了政治局。鲍罗廷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五人临时政治局兼常委。从此，陈独秀停职，鲁易和鲍罗廷亦相继被召回共产国际。十三日，党中央发表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退参加政府的中共党员。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实行宁、汉合流，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

这时，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他时刻在关注着革命局势的发展。当“七·一五”事件发生后，他第二天就从医院出来，一连写了七封信给中央常委，提出了几项建议：（一）中央开一正式全体会议决定新方针；（二）在武汉举行一次大示威运动，反抗叙述“分共经过”的国民党宣言；（三）重新号召土地革命，一切政策及号召以此为中心，揭破国民党减租之假面具；（四）中央仍应留在两湖奋斗，反对迁去九江或上海的计议；（五）反对类似上述“散伙政策”，并自请仍留两湖工作，不愿去苏联海参崴办党校；（六）主张在张发奎军队中准备独立动作，并公开做反汪派之鼓动<sup>①</sup>。蔡和森的这些意见，同共产国际来电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与新的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意见也不谋而合。但是，当时的领导人不但拒绝采纳蔡和森的意见，反而攻击他是“天天写信唱高调”和从事“左”的宣传。后来，蔡和森在回顾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我们从三月廿日事变以致北伐以后的错误，不在不立

---

<sup>①</sup>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即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在不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反而抛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帮助资产阶级领导权之实现。这便是机会主义的错误”<sup>①</sup>。历史事实表明，蔡和森当时就是坚决反对这一错误的。他在危机和混乱之中，沉着勇敢，一心为党，多方筹划，寻找出路，这既说明他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又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比坚定。

### (五)

为了挽救革命和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临时常委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方针。蔡和森在这次会议上，和毛泽东、瞿秋白、任弼时、邓中夏等一起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蔡和森指出：五次大会以后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原因是中央不执行“五次大会的中心集中到土地革命”的决议，政治局“完全受了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反对一切‘过火’的运动”。他认为，“过去的家长制（领导）现在已经不适用了，非打倒不可，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力量”。他提出，要执行新的指导方针，“必换新的指导人不可”<sup>②</sup>。他竭力推荐毛泽东进政治局，因为毛泽东过去一直反对中央错误的农运政策，“完全代表湖南的革命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sup>③</sup>他自己则要求不进政治局。

---

<sup>①③</sup>见《党的机会主义史》。

<sup>②</sup>《在‘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

会议选举苏兆征、瞿秋白、罗亦农、彭湃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蔡和森是秋收暴动的提议人之一，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诚恳地申请到湖南去组织湘赣秋收起义。可是，没有被中央领导批准，而派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去北方局指导工作。

党的“八七”会议刚结束，蔡和森即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不久，迁驻天津，与王荷波等一起恢复北方局领导机构。随后，又与北方局领导成员分赴天津、山东等地调查，改组了顺直省委和所属市委。九月十日，他为北方局写了题为《关于“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各决议展开党内讨论》的通告。二十二日，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及活动分子会议。蔡和森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这个报告于一九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在《顺直通讯》第二期上全文发表。一九二九年他驻共产国际时，又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出版的《中国问题》第一期上。这篇重要的理论著作，全面总结了“五大”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整顿全国党组织的主张。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

一九二七年十月，奉直军阀之间发生了战争，蔡和森为北方局作出暴动计划，决定在直隶省（今河北省）玉田地区发动农民起义，并派于方舟为党的特派员，会同解学海、杨春林前往玉田发动农民。可是，由于具体指挥上犯有“攻城主义”的错误，玉田起义连续两次遭到失败，于方舟、杨春林英勇牺牲。为此，北方局不得不停止执行顺直大暴动计划。

这年十一月，蔡和森参加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举行的

扩大会议。当决定撤销北方局时，他向中央汇报了北方局的情况，并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北方工作决议案》，总结了北方局三个月的工作。会后，他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暂居天津。一九二八年初，他召集顺直省委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再次改组了顺直省委。这次会议反对了机会主义，反对了家长式统治和命令主义，精神是好的；但对过去的工作予以否定，并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是不妥当的；同时在反对家长式统治和命令主义时，没有着力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制订纠正的措施，以致使党内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小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和自由化。

在这段时间里，蔡和森在彭真的协助下，还多次赴唐山深入煤矿，领导工人运动。为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作用，一九二八年一月下旬，他在唐山举办工人党员短期训练班，着手培训基层支部骨干，目的是“使他们知道做支部的经常工作及怎样组织部分的日常斗争。”<sup>①</sup>他还将这一工作经验推广到天津各地，对发展北方党的基层组织起了很大作用。

这年二月，蔡和森结束北方巡视工作，离津到沪。不久，向警予在武汉被捕。蔡和森得到这一消息后，曾多方营救无效。五月一日，向警予壮烈牺牲。这个事件给蔡和森带来了极大悲痛，也促使他在以后的艰难岁月里，把革命的重担更好地担当起来。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蔡和森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大会讨论政

---

<sup>①</sup>和森：《致中央的信》（1928年1月28日），载《中央通讯》第30期。

治报告、农民土地问题、职工运动问题时，作了多次重要发言<sup>①</sup>。他在发言中，继续总结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经验，着重批评了党内“左”的盲动主义，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

在讨论形势估计中，蔡和森指出：瞿秋白在政治报告中说革命形势仍在“一直高涨”，“我觉得不妥”，并说这种分析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在“八七”以来党所采用的分析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偏于否认敌人的力量和作用，只看见敌人的弱点，没有看见敌人的强点，只估计了自己的强点，没有估计到自己的弱点。”<sup>②</sup>“我们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在与敌人斗争时，一定要能够估计敌人的强点和弱点，也应该估计到自己的强点和弱点。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就不啻帮助敌人来消灭自己”<sup>③</sup>。同时，蔡和森也反对张国焘发言中“完全否认一切直接革命形势”的看法。他说：“我想要决定这个问题，首先应该问到，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到底有不有一定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包括整个全国而言，或是仅仅指部分地方而言？”“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还有它发展的特性，这就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估量革命形势上，当然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和极右的道路上去。的确，我们看到了有些地方的革命发展是向高涨的，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斗争及情绪的高涨，……可是这是不是说，全国范围内有直接革命形势呢？事

---

<sup>①</sup>蔡和森在“六大”讨论政治报告、农民土地问题、职工运动问题的三次发言，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材料》，署名“二十九号”。

<sup>②③</sup>见《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实告诉我们是没的。”<sup>①</sup>由此，蔡和森作出结论：“大会固然不应放松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尤不应放松‘左’的盲动主义”；“我提议大会要铲除过去一切不好的遗传，尤其要打倒不间断革命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sup>②</sup>

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中，蔡和森进而得出结论：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建立割据局面是可能的。他说：“游击斗争方面，这个问题在策略上的主要问题首先要问，游击斗争是不是农民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主要方式。不但在南方，北方亦如此。以事实看，无论哪个地方，农民运动起来，很快的就转到武装斗争方面。阶级斗争一激烈，一定向这方面走。现在分几方面来看：（1）游击斗争与过去零碎斗争方式已改变，零碎斗争易被敌人分段击破；（2）游击斗争得到的是什么？从前说大一点游击斗争得到割据局面，现在切实说得到建立红军，得到使敌人军队瓦解，这不仅在组织农民武装和建立红军而已，现在的问题在游击斗争的出路怎样？”“这里讲到分配土地和政权问题，我不同意国焘的意见，土地分配不一定要有全国形式。农民打倒劣绅，夺取乡村政权，可没收土地。部分的建立政权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有可能，而且是必须的。”<sup>③</sup>这样，由于认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实际经验，蔡和森已经极其接近于得出同毛泽东一样的“工农武装割据”的结论了。

---

①②见《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8年6月22日）。

③《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农民土地问题时的发言》（1928年7月2日）。

蔡和森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中央全会选为政治局委员，同时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长。会后，他与李立三等随即回国，参与领导全党的工作。这年十月，国民党政府借辛亥革命纪念日制造舆论，歪曲说辛亥革命开始的事业已经完成，中国已经“统一”，现在的任务是搞五权宪法、阶级合作等等。蔡和森立即撰写了《国民党反革命统治下的辛亥革命纪念》<sup>①</sup>一文，及时揭露和驳斥了国民党的上述欺骗宣传。同时，他还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革命的转变，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革命是处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期，显然是这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到底，就不可避免地要开始社会主义的转变。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政权，便要成为这一转变的起重机，也就是这一转变的基本条件。”实践证明蔡和森的这个论点是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久，由于受到联共（布）党内发动反对布哈林的斗争的波及，蔡和森在中共党内遭到了错误的打击。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反对布哈林右倾错误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当时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工作的李立三，在党内也发起反对“右倾”。蔡和森维护党的“六大”决议，反对冒险进攻城市的正确主张，被错误地攻击为“右倾”，因而，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历史证明，当时对蔡和森的这种批评和处分是错误的。

---

<sup>①</sup>见《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1期。

蔡和森在受到严重打击以后，毫不悲观失望，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坚持革命，坚持斗争。这时，他的哮喘病发作，不能不离开中央机关，暂居上海，一面养病，一面继续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一九二八年底，蔡和森的病情严重，被党送至莫斯科疗养，并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他到达莫斯科后，仍然不顾重病，坚持为党工作。一九二九年五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一科学院开展对陈独秀主义的讨论，他在会上先后作过多次发言，详细地分析了陈独秀主义的产生过程及其社会根源，揭露、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后来，他把这些发言整理成《论陈独秀主义》一文，发表在党刊《布尔什维克》第四卷第五期上。这对当时全党认识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但是，在当时错误思想的影响下，他的这篇文章也夸大了路线斗争，认为“各种不正确的倾向”，“都可变成陈独秀主义的支流”；并不顾当时党内的问题是“左”倾错误的客观现实，一再强调“中国革命和我们党的危险，现在主要的是右倾危险”。当然，这些缺点错误在蔡和森的遗文中只占次要地位，他留给党和人民的理论遗产是极其宝贵的。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中共党内发生了李立三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蔡和森是“坚决拥护正确路线而反对立三路线的”<sup>①</sup>，因而被共产国际派回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九月二十四日，他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党内同志一道纠正了李立三的严重错误。接着，共产国际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专题讨论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与邓中夏等被邀出

---

<sup>①</sup>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1935年），载《红旗飘飘》第5期。

席了这次讨论会。蔡和森在会上不但满腔热情地批评了李立三的严重错误，而且作了自我批评，因而使李立三感动极深，沉痛地检讨了以前自己“不正确的开除和森同志的政治局委员”的错误<sup>①</sup>。

一九三一年初，蔡和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莫斯科回国开展新的斗争。他刚到上海，又遭到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错误的排斥和打击。他们既没有恢复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又不批准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的请求，而派他去主持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广东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广东笼罩着白色恐怖，省委暂时设在香港。蔡和森以党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三月，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临行前，刚从香港回来的外甥女刘昂对他说，那里的情况很不好，实在危险，劝他暂时不要去。蔡和森回答：“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sup>②</sup>

到达香港后，蔡和森同他的再婚夫人李一纯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到秘书那里去听取汇报，批阅文件，研究工作，各种活动是十分繁忙的。

香港这个地方情况本来就很复杂，蔡和森到达香港不久，党内叛徒顾顺章也到了这里。顾顺章因为过去职务的关系，对

---

①见《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1930年10月），载《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3期。

②刘昂：《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90页。



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是熟识的。但是蔡和森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每天照样离开寓所外出工作。

这年六月十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去参加。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

“我不去不放心”<sup>①</sup>。会议从上午开始，地点距蔡和森的寓所不远。快到中午时分，他决定赴会。临走时，他对李一纯说：

“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就是被捕了。”<sup>②</sup>果然，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带着四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混等四人。

蔡和森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采取了营救措施。党员李少石，通过一个社会团体与香港英国当局联系，答应付给一笔巨款，将蔡和森保释。但是，当李少石筹足这笔款时，蔡和森已在两小时前被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了。在广州监狱中，他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蔡和森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情况。他被打得血肉模糊，拖回监狱，躺在地上动弹不得。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哭泣。他却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并说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敌人的残酷折磨丝毫无损于蔡和森的坚强意志。他们终于使出了灭绝人性的一手，将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把几颗长铁钉摆在他面前，进行最后一次威胁、恐吓。蔡和森无私无畏，宁死不屈。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壁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为了党的事业，蔡和森就这样壮

---

<sup>①②</sup>李一纯：《回忆和森同志》，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

烈牺牲了，时年三十六岁。

蔡和森牺牲后，党和人民始终深切地怀念着他。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sup>①</sup>周恩来也说过：“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sup>②</sup>。一九七九年纪念蔡和森诞生八十五周年时，邓小平题词：“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陈云题词：“向为革命而牺牲的蔡和森同志致敬。”聂荣臻题词：“我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sup>③</sup>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和题词，对蔡和森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蔡和森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民前进！

---

<sup>①②</sup>见刘昂：《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载《回忆蔡和森》第91、92页。

<sup>③</sup>见《回忆蔡和森》一书的题词。

## 蔡母葛健豪

罗绍志

葛健豪，原名兰英，湖南双峰县（原属湘乡县）人。一八六五年八月十七日（同治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生于荷叶一户大姓人家桂林堂。父亲葛葆吾，曾在曾国藩的湘军任哨官，后提升为按察使，一八六八年二月阵亡于湖北蕲水县兰溪镇潭坳，年仅二十七岁。葛健豪还有一位哥哥。父亲死后，他们兄妹二人，由母亲陈氏抚养。健豪十岁就跟着哥哥伴读私塾，十六岁出嫁到七十里外的永丰镇，同蔡蓉峰结婚。

蔡家在永丰镇开设了一家很有名气的蔡广益辣酱店，每年还有上百石地租收入，生活富裕，夫妻感情也好，结婚十年内生有两男两女。一八九三年左右，蔡蓉峰到上海投靠曾国藩的女婿聂缉燊，在聂开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当了一名小官员。葛健豪也来到上海，于一八九五年三月三十日，生了第五个孩子蔡和森。

在上海，葛健豪经常到工人家里去走走，乐意帮助工人，劝丈夫不要苛克工人。一次，蔡蓉峰把一个前来求情的同乡工人从家里推出去，她看了很生气，同丈夫发生了争吵，愤而离开上海，带着刚满四岁的蔡和森回到了娘家荷叶。

葛健豪母子的回来，给葛家增添了欢乐，哥哥喜欢，年老的母亲更是高兴。这期间，她每天跟着孩子到私塾读书。过了几年，她居然能诗会文，成了乡下一名女中文士。

一八八九年，蔡蓉峰也回到了家乡永丰，变卖了家里的财产，在荷叶岳母家不远的地方，买了“光甲堂”一栋房子，全家就在这里定居下来。第二年，即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四日，她又生下第六个孩子蔡咸熙（蔡畅）。

葛健豪并不只满足于做贤妻良母，而是更关心怎样做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后代的人。她曾为秋瑾烈士的牺牲而悲痛，十分敬佩秋瑾是一位“智仁勇兼备的女子”，经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做人就要做秋瑾那样的人。

一九〇八年，葛健豪夫妇搬回了永丰镇老家。在这以前，她的母亲去世了；年仅十一岁的二女蔡顺熙，从吊楼上跌下来夭折了；年已二十二岁的大儿蔡麴仙也患白喉死去了。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她们夫妇认为是“光甲堂”这个屋场的风水不好，在大女蔡庆熙（蔡棘）出嫁后，便将这栋房子卖掉了。

这时，葛健豪身边只有三个孩子了：十九岁的蔡麓仙，十三岁的蔡和森和八岁的蔡咸熙。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儿女们都没有继续上学。蔡麓仙在家门前摆个摊子，做小买卖；蔡和森进蔡广祥店当学徒；蔡咸熙则帮助母亲做点家务。这样安排儿女的生活，并不是母亲的心愿，当蔡和森三年学徒期满，不愿去做生意，而要上学读书时，她支持了儿子的要求。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她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剪辫子的号召，带头把自己头上的“巴巴头”剪掉了。后来，蔡畅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母亲在那时候，真是一个可惊的妇人，当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岁了（实际为四十六岁——笔者），但她很受革命的影响”①。

---

①（美）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葛健豪越来越感到儿女读书的重要，决计先送蔡和森进省城去读书，并把私藏几十年的一包首饰拿出来卖掉，作为蔡和森去省城的学费。她反对封建习惯势力，从不把女孩关在屋内，也不要女孩裹脚。一九一三年夏，蔡蓉峰为得五百块银元的“聘礼”，要把年仅十三岁的蔡咸熙卖给一个地主做小媳妇，她气愤万分，要女儿躲到长沙一个亲戚家去，使得年幼的蔡咸熙避免了买卖婚姻的迫害，并在长沙考入了周南女校体育专科，与向警予同学（不同班），成长为革命的女青年。

不久，蔡蓉峰离家外出，葛健豪并不为此难过。她考虑的是自己也应该走自己的路。正在这时，蔡和森回到家里，鼓励母亲去长沙投考女子教员养成所。这是一所专为女子教育培养师资的速成学校，只要有高小文化基础就可以报考，学校免收学膳费，经过两年的学习，就能担任女校教师，很合她的心愿。她要蔡和森到衡山把出嫁的姐姐蔡庆熙接回来，一道进省城读书。

一九一四年春，年近半百的葛健豪，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三岁的外孙女刘千昂（刘昂），一同进了省城。当她来到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报名时，学校老师见她年纪这么大了，还带着孙子，不肯让她报名，她很气愤，要儿子帮她写张状纸，到县衙门去评理。县官默默地读了她的呈文，又听她申述了一番为什么要读书的理由，觉得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就在呈文上批了“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被免试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蔡庆熙先入自治女校，后转衡粹学校学缝纫、刺绣；外孙女则进了幼稚园。她们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一时传为佳话。

葛健豪勤奋好学，就寝钟声响过以后，还要阅读一阵书才睡觉。她是个小脚女人，却坚持和青年女生上体操课。她思想开朗，平易近人，大家都乐意接近她。年纪大的称她“大姐”，年纪小的称她“伯母”。一九一四年春，毛泽东与蔡和森相识后，对她也很敬佩，亲切地尊称她“蔡伯母”。她自己也很快地成了毛泽东这班有志青年革命行动的热情支持者和参与者。

一九一五年，葛健豪在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她回到永丰，想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蔡和森到湘乡县政府为母亲联系办学之事，得到了县政府的同意，并明确县城办的一所女校为“湘乡县立第一女子简易职业学校”，简称“一女校”；在永丰镇办的这所女校为“二女校”，由葛健豪任校长。她任职后，立即着手征聘教员和筹备开学等工作。

第二女校校址设在永丰镇观音阁。辛亥革命前夕，这里曾办过女学堂，但每期学生只有二三十人，难以为继。第二女校决定筹办以后，葛健豪与各方面协商，以原女学堂为基础，按照女子职业学校的要求，改变学科，重组教学。如第一个学期只办一个综合班，第二个学期扩大为文科、缝纫、织业三个班。学生一百多人，绝大多数是中、青年劳动妇女。

第二女校的办学情况是这样：文科班以国文为主，兼学缝纫、织布、刺绣，学生大都是有文化基础的青少年；缝纫、织业班则以缝纫、织布、绣花为主，兼学国文，学生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基础较差的中年劳动妇女。凡入校学生，免收学费；对学缝纫、织业的学生，还发给一定的生活费津贴。在当时，很多妇女把二女校当成“妇女之家”，说“进了二女校，就好象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天地。”

葛健豪既是校长，又是教员。她最注重国文教学，要女子

取得同男子同等的地位，首先就要同男子一样，掌握文化科学知识，受男子同等的社会教育。她还经常讲时势、论国事，把从儿子书信中学到的新思想，传播给学生，使学校充满讲民主、讲科学的热烈气氛。她还倡导学生参加唱歌、跳舞、跳高、跳远等活动。她的女儿蔡畅，就是学校的音体教员。在学校的女生中，放脚和留短发，曾一时蔚为风气。

葛健豪这些“越轨”的办学行动，遭到一些顽固分子的咒骂，说她们母女“文不文、武不武”，“男不男、女不女”，败坏了社会的风气。由于这些顽固分子的阻挠和破坏，使得这所新型女子职业学校，不得不因停发教育经费而停办。

一九一七年夏，葛健豪为支持儿子同毛泽东等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带着一家人第二次来到了长沙。她先在岳麓山下的饮马堂租居一间房子；因人多挤不下，不久又搬到溁湾镇附近的刘家台子。刘家台子是一座基庐式的青砖瓦屋，房子又多，一家人住的宽敞，还可留客歇宿。因此，这里很快就成了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瓚等同学经常聚会的地方。

为了解决家里生活的困难，葛健豪向屋主租了半亩菜地。这时，蔡畅在周南女校教书，她就带着长女蔡庆熙在家种菜。粮食不足，就用蔬菜、蚕豆添补。但招待毛泽东等青年，她从不吝惜。例如，毛泽东同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在她家开成立会时，她特地为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当年曾在她家吃过这顿午餐的肖三、罗章龙，每当提及这件事时，总要将她的热情夸奖一番。一九一九年春，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来长沙治病，也得到她十分周到的照顾。

一九一九年夏，蔡和森从北京回湘，动员母亲、妹妹以及向警予等一起赴法勤工俭学。葛健豪赞同儿子的主张，乐意将

自己的刺绣工艺带到法国去。她要长女蔡庆熙回衡山婆家要来了四百银元；向衡粹学校校长黄振坤又借了二百银元作为旅费。同年冬，她同女儿蔡畅以及向警予等一道离开长沙，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葛健豪担心自己年纪大了，怕出国后再回不来，思想曾一度动摇。不过，当她听到蔡和森说象她这样一位中国老太太，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求学，这是别人做不到和最值得人们尊敬的事时，她爽朗地笑了，表示坚决跟儿女们一道走。她还向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槩的儿子聂云台借来六百银元，为一些湖南学生解决旅费不足的问题。

葛健豪跟儿女们一道赴法勤工俭学，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乘法国邮船“央脱来蓬”号起程的。她的这一行动，对当时的青年有过一定的影响。一九二〇年五月十四日的湖南《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近来吾湘学界向外发展的势力很大。法国、南洋两方面去的人颇多。这是吾湘一点生机。”“就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即徐特立），一是蔡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去受中等女子教育，真是难得哩！”“我们做青年的应当如何勇猛精进，莫为那两位窃笑道：你们到底不行吧！”

葛健豪到达法国蒙达尼后，和蔡畅、向警予等六名女生，入了蒙达尼女子中学，蔡和森等则入男子中学。这两所学校相距很近，她与儿子天天可以见面，尽管身处异邦，同在家里差不多，大家学习都很努力。

葛健豪在法国勤工俭学四年，是她一生富有经历的四年。她刻苦攻读法文。虽然年纪大，记忆差，又没有外语基础，但



她象小学生那样，从一个个单词学起。每天数她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终于取得能说法语和阅读法文报纸的好成绩。她支持儿女自由结婚。如蔡和森同向警予的“向蔡同盟”，蔡畅的自由结婚，都得到她的赞同，认为这是“向封建婚姻制度的宣战”。她还参加过勤工俭学学生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同大家一起冲进公使馆，迫使公使馆续发了三个月的维持费。特别是一九二二年，蔡和森与向警予已先后回国，蔡畅身怀有孕，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在法国生下特特，她既要勤于做工，又要俭以求学，还要为女儿当保姆，真是忙个不赢，但她坚持下来了。直到同年秋，党派蔡畅去苏联后，她才带着外孙女归国。途经新加坡时，遇上两位在这里办教育的湘籍熟人张良权、胡意民，曾想托她们在新加坡找工作。但张、胡劝她，说她年纪大，儿女们又不在身边，不如回国去从事教育为好。她接受了这个建议，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就又登程回上海了。

这时，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儿媳都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工作，蔡和森与向警予还是党中央的领导人物。由于儿、媳们革命工作繁重，斗争又十分激烈，她认为自己不能留居上海，成为他们的赘累，而应该帮助他们解决照顾孩子的负担。出于这种考虑，她在上海只作了短暂的逗留，便带着小外孙女特特回到了长沙。她的家已由刘家台子迁居天茂花园一号，丈夫、长女、大外孙女都住在这里。向警予的长女妮妮，也从上海送回长沙由蔡庆熙带养。她归家后，来访者接连不断。特别是一九二四年五月，蔡和森和向警予回湖南探亲时，这里曾一度成为湖南党组织的联络点，也是她们母子同老学友的聚会场所。

这年五月二十五日，向警予在长沙生下男孩博博。她高兴

地对儿媳说：“我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你们事业的成功。”此后，她除细心照料着孙子孙女外，还积极参加湖南的妇女解放工作。当时的湖南《大公报》，就有关于她在一九二四年六月九日参加妇女界联合会在复陶女校开“恢复成立大会”及六月二十五日讨论女界联合会的简章和宗旨的报道。

一九二五年夏，长沙颜子庙平民女子职业学校搬到中山西路的新建校址，颜子庙的地方就空置起来了。葛建豪同没有随校迁去的旧教职员彭慕陶等人商定，利用原校址，再办一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大家公推她为校长。蔡庆熙也被聘为缝纫教员。由于她的影响，省总工会介绍眷属来入学的颇多。学校办到第二个学期，学生便由两个班增至四个班。据蔡畅回忆：她母亲开办的这所学校，“是专教贫穷女子以手工和针黹等技艺的学校，再把工艺换来的钱帮助这些贫穷的女子们。”<sup>①</sup>同时，学校还成为革命同志活动的场所。据她的外孙女刘昂回忆：“一九二五年冬，学校放了寒假，湖南省委曾借用校舍办过短期党校。我家的住所也曾为党传递信件，担负过接头的任务；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的林蔚同志（秋收起义后牺牲），曾把许多宣传品寄放在我们家里，还有党内的一些同志也在我们家里寄住过。”<sup>②</sup>

一九二七年一月，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汉口。蔡畅从南昌转移武汉时，曾专程回到长沙，在天茂花园住了几天。这时，葛健豪的第二个儿子蔡麓仙已在省港罢工中壮烈牺牲，组织上发给了她六百元抚恤金。但蔡畅回家时，为不使母亲伤

---

①〔美〕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

②刘昂：《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

心，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只把抚恤金交给了家里。葛健豪得到这笔钱后，不顾自己家庭生活的困难，除将钱为学校添置了两部缝纫机外，还拿出一部分，救济了一些生活困难的学生。

“马日事变”后，葛健豪在长沙的家被搜查，她办的这所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也遭到破坏，不能再在长沙住下去了。她要丈夫带着长女、孙儿回老家永丰去，自己则领着外孙女前往武汉找蔡和森、向警予。她来到武汉后，党组织把她安排住在武昌一条小巷子里。这时蔡和森、向警予虽已脱离夫妻关系，工作又十分繁忙，但都隔不了几天就要抽时间去看她。不久，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她又带着外孙女回到了老家永丰。

党的“八七”会议后，蔡和森被派去北方局工作，一九二二年春，再从北方局来到上海党中央机关。这时，蔡畅和李富春也到了上海。为了掩护革命，蔡和森兄妹把母亲、小孩都接到了上海。那一年，她已六十三岁，又不是共产党员，但她忠于党的事业，一面带小孩，一面做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她得知向警予在武汉壮烈牺牲，为党失去一个好女儿而十分痛惜。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蔡和森被派驻共产国际。为不加重母亲的负担，他与妹妹商定，又劝母亲回老家去。就这样，葛健豪于一九二八年底从上海回到了老家永丰。她这次回家后，再也没有外出，也再没有见到儿子蔡和森。一九三一年蔡和森在广州牺牲，党组织和她家里的人，都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她。

她的晚年生活是十分困难的。她在永丰老家一点财产也没有了，只好和丈夫带着长女庆熙、孙子博博以及两个外孙女，

寄居别人家里。她先后在永丰附近佃居过的地方有毛家塘、茶亭子、杨梅子嘴等处。一九三二年丈夫蔡蓉峰去世后，长女蔡庆熙把婆家的财产全部卖掉，将所得的钱交给母亲，在离永丰十多华里的石板冲买了几间破旧房子定居下来，在这里度过了她清贫的晚年生活。

葛健豪从小在娘家跟母亲、哥哥一起，十分爱好养鱼、种花、栽树。她每住一处，都要布置一个养鱼和种花、种菜的园地。定居石板冲后，屋侧有个小菜园，既是她种菜的园地，也是一个小花果园。每天下午和早晨，她都要携着孙辈们在这里劳动或散步。在石板冲的大门口，至今还保留一棵大杨梅树，这就是她当年亲手栽植的。

从一些老人的回忆中，还传颂着这样一件事：当葛健豪刚搬来石板冲居住的时候，有个李家的小媳妇，因触犯“族规”，族长要拉到祠堂去惩办。她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出面为那个小媳妇打抱不平，制止了这场对妇女的迫害。

抗日战争前后，党曾派人把她的孙辈们先后从石板冲接出送往苏联学习。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叶剑英来到长沙时，还派人到石板冲，想把她母女接出来。但这位革命老妈妈为不加重党的负担，坚持要和长女住在乡村。后来，党组织就按月汇给她一部分生活费。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葛健豪去世，享年七十八岁。临终时，她还一直不知道两个儿子都已经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麓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並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她的最后遗言，使我们看到了这颗一生为革命而跳动的母亲的心。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笔者多次访问蔡畅、李维汉、罗章龙、肖三、刘昂、蔡博、李特、葛和娣、蔡季眉、江汴等人的谈话记录和他们所写的回忆文章。
2. 《回忆蔡和森》、《怀念蔡和森同志》、《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湖南《大公报》、《葛氏四修族谱》、《大界曾氏五修族谱》、《永丰蔡林氏族谱》等。

# 向警予

谷 茨

向警予是我党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的蔡特金”。“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杨，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sup>①</sup>这是著名诗人柳亚子对向警予壮丽一生的赞扬。

## (一)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sup>②</sup>。一八九五年九月四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省溆浦县城关镇西街向宅（今解放街八十号），土家族人<sup>③</sup>。

向警予的父亲向瑞龄，幼时赤贫，卖过豆腐，做过零工，后受雇于溆浦县最大商店“鼎盛昌”商号，由厨工、帮工升为该店派驻常德的“座庄”先生和全店的管事，与日本人联系尤

① <柳亚子诗选>。

②据郑超麟等回忆：振宇即警予的谐音。向警予写的稿子曾用振宇笔名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也可能振宇有时是蔡和森、向警予两人合用的笔名。蔡博说：“向警予在莫斯科东大时，也曾用过振宇的名字。”

③溆浦向姓，原以为是汉族，现查明是土家族。

多。后来，他自己在溆浦县开设“大道生”南货店，生意兴隆。晚年曾任溆浦县商会会长，是当地最大的商人<sup>①</sup>。母亲邓玉贵，是个勤劳节俭的家庭妇女，不幸早逝。向警予的父母共生十二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八个。长子向仙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七子向仙钟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商科，五子向仙良、十子向仙鏗先后毕业于日本京都千叶医科学校<sup>②</sup>。

向警予六七岁时，上私塾读书，喜欢听“木兰从军”的故事。一九〇三年，向警予的大哥和地方开明人士，在城西文昌阁创办了一所小学，兼收男女学生。向警予在大哥的支持下，带头入小学就读。在学校里，她的各科成绩优秀。尤其是体操一项更为出色，曾代表学校出席过县运动会体操表演。

这时，溆浦附近的沅陵发生了“辰州教案”，三百多无辜群众被捕，有十人竟被大炮轰死。向警予听到这些消息，极端痛恨洋人和清政府，想和花木兰一样，去抗击侵略者。

一九〇七年，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铖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教书。向警予跟随母亲从溆浦来到常德读书。向仙铖在日本留学时曾参加过同盟会，回国后是湘西同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大哥和他的同事们的指导和影响下，她经常阅读《民报》、《新民丛报》和《天义报》等报章杂志<sup>③</sup>。特别是她大哥讲的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使他神往，非常羡慕法国女革命家马尼兰的为人。从而使得她由幻想做花木兰式的英雄，跃进到崇尚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

①②（美）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向氏通谱·铜公房》，卷五；《向瑞龄诌文》。

③向仙良：《向警予烈士青少年时代的事迹》（1963年元月）。

两年后，向警予进入新创办的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念书。学校经费不多，学生也多非富豪子弟，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使向警予受到了比较艰苦的锻炼。由于她非常用功，学问道德为全校之冠<sup>①</sup>。教员爱她，同学敬她，丁玲的母亲余曼贞与她同级，关系至为亲密，受她的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春，湖南省设立了三个女子师范学校。向警予于一九一二年秋天，以优秀的成绩录取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编入本科第一班。

向警予在一女师求学两年多。她博闻强记，对于墨翟“博爱”的哲学非常倾心，因此同学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墨子”。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她在一女师第二学年的一本“心理学笔记”和第三学年第一学期的一本“博物”笔记，不仅书写工整，而且字里行间标着各种着重符号，并写有眉批。这些笔记中记载着她对我国古代哲学和近代欧洲资产阶级伦理学、教育学一类书籍的学习摘要与心得，显示着她新颖的思想和刻苦精神。她的活动能力很强，晨操、大扫除之类的活动大多由她领队，并协助工务员关灯和老师查铺。她能团结同学，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组织乐群会时，大家选她为道德部长。据杨昌济《达化斋日记》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三日记载：“昨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赴其成绩展览会。见本班（科）二年生向俊贤之日记颇有抱负；时痛亡母，性情亦厚。且时及王阳明之绪论，亦曾研究蒙特琐里之训练谈，可谓女教育界中之人才。”正象毛泽东、蔡和森是杨昌济最得意的男学生一样，向警予、陶毅是他最得意的学生。

---

<sup>①</sup>余曼贞遗稿，转引自丁玲：《我母亲的生平》。



一九一四年秋，一女师校长朱剑凡，被顽固派免职，新任校长是个七十多岁的前清翰林，老朽腐败。向警予和陶毅等十几个进步同学愤然退学，转入周南女校，在该校第四班读书，并将原名向俊贤改为向警予，表示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和反抗。

周南女校被人称为“女革命家的摇篮”。朱剑凡曾留学日本，是个进步的教育家。他常说：中国四万万人口，有二万万妇女。中国要富强起来，就要使二万万妇女识字、就业。于是，便毁家办学，一心走教育救国的道路<sup>①</sup>。当时，徐特立亦在周南女校任教，对向警予帮助也很大。

在周南女校的两年中，向警予每天黎明即起，除了参加体育活动外，还和二十几位同学一道，练习拳术，坚持不懈。她的刻苦学习精神更是惊人。有时头晕腹饥，稍事休息，又继续苦读。假期中仍然坚持学习，就是在回家的车船上，也抓紧学习，从不稍息。在学习中，她独立思考，善于钻研问题。她曾倾服王阳明的学说。一次，在书柜中发现陆桴亭的《思辨录》和张烈的《王学质疑》，她贪婪地读了一遍，感到这两本书对“王学”反驳得有道理，正是自己深入钻研这门学问的良师。于是由浅及深，经常研究，渐渐地对“王学”有所批判。

向警予十分关心政治。当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消息传到湖南后，全省学生无比愤怒，奋起反对。她也丢开书本，走出课堂，和同学四处宣传，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罪行，唤起群众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

向警予一九一五年下学期在周南女校的十篇作文，和这年

---

<sup>①</sup>见《湘乡县乡土教材》和朱超的回忆（1978年7月31日）。

十月一日至二十日的二十天日记，还有一本六 七千字的法制笔记本，被保存了下来。老师对作文的批语有“华实并茂”、“言简意赅”、“大处落墨”、“横空发议”、“析理入微”、“精透无匹”等赞美之辞。这些作文、日记和笔记，都充分反映了她当时的文采和思想面貌，其主要思想有如下几点：

一、爱国主义思想。当时正是袁世凯疯狂地卖国复辟的时候，她在作文中反复强调“毋忘国耻”；痛心指出今日中国已处于“国家陵夷，学绝道丧之际”；深刻揭露这时“有力者又倡于上曰：专制善，则群响臻于专制，而专制之论又千篇一律”的丑态，悲愤地写道：“风景不殊，山河犹昔，叹桃源之幽邃，渔父不逢，悼湘流之呜咽，灵均已渺。今日何日，能不悲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但是，她相信“物极必返”，人们将会自强起来，中国将会象普鲁士那样振兴。

二、热爱人民的思想。她认为国权应在“国会”或“全体人民”。“立君”只是为了“生民”，而不是“使其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淫凶。”象项羽那样囊括天下，以人民为刍狗的人，把他的传列入本纪是不恰当的。只有“力反前弊，重申生民立君之大义”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才会受到人民的尊敬。她看到“官”与“民”的对立，尖锐地指出：“国之危，由官邪也，官之失政，饥寒迫焉。”批判那些不爱惜民力，压榨人民，不为人民办事的官吏，认为他们“唯取焉而不生焉，饥寒交迫窃盗相攘，几何而不困民病国”。她热情歌颂了笃诚好学、由工徒到工程师、工厂主，设计制造的产品超过外国的成宏业；高度赞扬了带领子侄精研农学、不牟荣利、不拘成规的田状元，认为他们的事迹“足傲时者”，应该为他们立传。

三、革新自强的思想。她认为“方今时势，急于越国”，“欲图生存于念世纪竞争剧烈之舞台，无貽神农黄帝羞”，必须“痛念国危”，“自强不息”。她主张要大伸民气，克服那种“慑力于外而饮痛于内，人存必亡之观，销尽兴奋之志”的悲观丧气情绪，反对“守旧则反乎茹毛饮血”和“醉新期化为黄发碧眼”这两种各走极端的偏向，制止“乘时而微利”的乘庾风，从而象赛跑运动员那样殚心竭力去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革除积习”，“厥进不已”。同时她还强调指出：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分子所不可不由之道”，宪法应“杀元首之威权”，“免权臣之弄权”，“定人民之权义”，“奠国家于苞髻”。号召人们共同肩负起救国的重任。

四、教育救国的思想。她认为学校是“熔铸国民之炉”，改造社会非以学校为“铸造炉”不可。教育非徒铸造适应于现时社会的人，尤必铸造“创未来之社会，以左右现世之社会之人”。深感处在“学道丧绝，沧海横流”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培育人才，发扬“茂其德材而植之”的精神，这样才能“生于斯”，“光于斯”。她对于中外教育家的教育学说和教育方法作过许多研究，尤其重视当时学校编制、校园布局、课堂教学和体育活动的情况以及成绩展览等的考察。为了发展溆浦的教育，她常为之奔走呼号。找过武澹溪先生，动员他投资办学；又会晤过搞矿业的人，要他设法解决溆浦的水患。她希望古义陵（即溆浦县）教育能够发达起来，在我国和我省有一定的地位。在她参加和考察长沙县城区国民学校时，就深为教师热情办学，因受经济条件限制，而感到遗憾；认为我们兴办教育事业应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能以心力勉之，为着璀璨光明的前途，要用自己的心力去创造之。

向警予上述思想与实践活动，虽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在这段时间里，向警予因与蔡畅在周南女校同学的关系，认识了蔡和森、毛泽东和其他革命青年。他们时常一道讨论各种问题。有时与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到船山学社听讲；有时去“板仓杨寓”，向杨怀中老师求教。一九一五年冬，向警予毕业于周南女校。这时她不仅是全校称赞的优秀学生，而且在湖南学生运动中有了声望。

## (二)

一九一六年春，向警予怀抱着“教育救国”理想，响应校长关于每人至少要在学校服务两年，然后再考虑升学或从事其它工作的号召，回到了故乡。这时，溆浦县从一九〇六年开始创办的一所女校，因常年经费没有着落，几度停办。一九一三年再次办了起来，第二年又遭洪水冲击，校舍、教具均被破坏<sup>①</sup>，教师学生也先后离去。面对这种情况，向警予不避艰辛，在县里一些开明人士的鼓励、支持下，毅然担任了县立女校校长的职务。为了克服学校经费困难，她除了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增拨款项外，还奔走呼号，多方筹措；自己却“枵腹从公”，不从学校领取工资；她的父亲和六哥为学校工作，也完全尽义务；还把家里一块柑桔园捐献出来，供扩建校舍之用。然而，由于溆浦“僻在荒陬，文化难入”，家长不愿把女孩子送到学校来读书，开学之后，入校女生寥寥无几。于是，她便拿着一把油纸伞，背着一个粗布包袱，顶风冒雨，跋山涉水，

<sup>①</sup>见《溆浦县志》（民国10年11月修）。

步行到一百多里远的山区，一家一户地挨门劝学。溆浦县立女校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正式开学。向警予在开学典礼上高声宣布：“为读书而读书，为嫁一个如意的丈夫而读书，不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我们读书的目的是要做个新国民。”她还与学校老师一起谱写了溆浦县立女校校歌：“美哉！卢峰之下溆水滨，我校巍巍矗立当其前。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天然淘汰，触目惊心！愿同学作好准备，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为女界大放光明，这就是她办学的宗旨和目的。具体来说，她是想通过办学使“合邑妇女因入学补习科，而为良妻，为贤母，为爱国之民，合邑童男女入国民科，而得健康，而具有国民道德及生活能力之初基；又有高等小学以补国民教育之不足，以为晋升研究之阶梯”。从而实现她的“教育救国”的理想。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向警予以身作则，一心扑在办学上。清晨，她起在别人之先，亲自摇起床铃。学生起床后，便主持朝会，给同学们讲述国家大事，宣传救国思想。在教学上，她不仅担负了一份教课任务，有时还要给别的老师代课。对于学生的生活更是关心，不仅住在学校，与学生吃一锅饭，同甘共苦，并且夜里还要巡视宿舍，看看学生的被子盖好了没有，蚊帐掖好了没有。她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认为“个别为之，较为亲切恳挚，收效自易”<sup>①</sup>。当时的溆浦，封建礼教相当严重，女孩子多缠足穿耳，遵循《女儿经》作人。在办学过程中，向警予反对封建礼教，鼓励女学生放脚，亲自为女学生解裹脚布。有的女学生放脚后怕父母打骂，不敢回家，她和教师一个一个地把学生们送回家去，做她们父母的思

---

<sup>①</sup>见《向警予给陶毅的信》（1916年秋），原件存蔡博处。

想工作。

她深知要教好学生就要有一批思想进步的好教员。为此，她从长沙聘请了一些志同道合、热爱教育事业，而又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到溆浦女校任教。后后来校的有：任培道、任培智、易焕秋、蒋竹如、易克勋、杨德群、黄振翼、缪明辉、游若愚、吴家瑛等，对办好学校，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学校里，她积极提倡体育运动，经过体育教师杨德群（在“三·一八”事件中牺牲）的努力，女校体育活动就搞得很出色。同学们唱着向警予与老师们一起谱写的《运动歌》：“运动，运动，运动乐！不怕天寒和地冻，各把精神来振作。肌肉强，血脉活，运动，运动，运动乐！”每天坚持课间操，积极参加学校定期举行的运动会。运动项目有体操，拉杆，爬山，赛跑，跳高，跳远，真是龙腾虎跃，热火朝天。

在教学上，向警予力求改革，不断向学生介绍新知识，灌输新思想。她取消了徒耗学生光阴的《经学》课，增设了实用的裁缝和家政课；注意直观教学，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废除考试，以平日成绩为成绩；尊重个性，反对把学生“驰骋之若牛马”；以自治心、公共心为校制，尽心竭力指导其实践，实行半工半读，以解决工农和贫民无力供给子女读书的困难。

她认为要改变“国势日弱”的现状，必须挽救“人心陷溺”，便决心从组织“清街团”入手，亲自率领学生，利用星期天打扫卫生，希望以此感化和教育人们。

向警予的上述努力，一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溆浦女校越办越好，成为湘西的一所新型学校，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学生由原来的十几人增加到三百多人，除小学班外，还设有缝纫班、刺绣班、高小科、补习科等。

为了用事实说服那些封建思想严重的家长，向警予精心举办了一个学生成绩展览会，包括学科、图画、缝纫、刺绣等四五个展室。展览会的会址，就选定在县衙门旁边临街的仓库里。向警予亲自撰写了一幅对联：“细雨来苏柳，轻寒不触帘。”并用黑丝绒把它绣在白色缎子上，以表示她和教师们一道，要象细雨滋润杨柳那样，耐心教育学生，使他们能茁壮地成长起来。展览会很快地轰动了全城，几十里外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连一些官员也前来参观，有的还捐了钱给学校添置设备。在办展览会的同时，她还组织学生们排演了新剧《皇帝梦》，讽刺袁世凯称帝。

但是，在黑暗的旧社会，教育救国的路是走不通的。腐败无能的反动官吏，那能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学校经费的困难，向警予虽然一再申请，筹款募捐，办法想尽，然而仍然“常款无着”，困难日甚一日。“虽有巧妇，无米奚炊？”因此，她只得“惨怛戚痛”地表示：“明年定让贤能”、“退而自修”。他带领学生打扫街巷，可是人们依然无动于衷，仍然“果皮滔物，随扫随弃”。上午扫干净了，“下午往视又如故矣”。而且人们还讽言冷语，公开反对此事。至于学校所进行的改革，更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县教育部门派了视学潘封礼来校视察，提出了许多质问和责难。她虽然逐条驳答了，但也使她感到了阻力之大，改革之难，不得不愤然自认才学肤浅，“办理无方”。尤其是社会风气不良，好容易教育出一个好端端的学生，进入社会后，“耳濡目染，旧习辄萌”，使她沉痛地感到“学校教育十年而不足，社会破坏一朝而有余。言念前途，良深慄恐”。“教育救国”的幻梦开始破灭。

一九一九年五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湖南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罢工、罢市的热潮。向警予在溆浦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响应。她带领学校师生上街游行，走到商店门口，向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并当众把一个日本制造的瓷脸盆摔烂在地上，以表示爱国的决心。走到县城寺坪里，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一连讲了几个小时，号召大家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她的讲演有力地激起溆浦人民的爱国热情。接着，她又组织了反日救国的“十人团”，开展抵制洋货的斗争。

事实的教育，斗争的洗礼，使得向警予的思想有了新的提高。五月二十八日她在给七哥的信中写道：“平常人之所视为荣辱得失者，自吾辈视之真不值一笑！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可见，她已把个人荣辱得失置诸度外。然而到底什么是真心得、真事业，这时她仍在探索之中。

两个月后，又一事件接踵而至。驻扎在溆浦的湘西镇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竟派人来向家说媒，要娶向警予为妻！向警予的后娘傅氏，慑于周则范的权势，硬逼着她去做“将军夫人”。家里的人对于这件事也有些惊惶失措。为了断绝周则范求婚的念头，又不连累家庭，一天中午，她只身闯进周公馆，当面断然拒绝了这件婚事，斩钉截铁地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婚。”

恰在这时，向警予接到了蔡畅约她来长沙筹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信，使得她喜出望外。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毅然离开溆浦女校，前往长沙。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向警予在长沙参加了新民学会。十月，向警予发起成立“周南女学留法勤工俭学会”。随后，又



在长沙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湖南妇女界的首倡人。

### (三)

一九一九年冬，向警予、蔡畅与蔡母葛健豪等人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准备赴法。

到上海后，她们借了一间空房，作为临时安身之处。然后，由葛健豪找到她的亲戚聂云台（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槩的儿子），借了六百块银洋作旅费。这期间，向警予等曾就怎样救中国、如何开展留法勤工俭学诸问题，专门拜访和请教了孙中山先生。

出国前夕，向警予给陶毅写了一封信，着重谈了女子发展的计划。信中说：“当这‘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非是那艰苦卓绝精粹人才不可。艰苦卓绝的精粹人才愈多，则成绩愈好。”“我们的学识能力不足，但是我们自信我们的脑筋是纯洁的，我们的思想是彻底的，将来根本改造的大任，我们〔是〕应当担负的。作大事业，须大准备，我们这时候要准备起。”这封信表现了她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强调了“根本改造”的思想，但却把“女子解放”和社会改造，归结为“仍离不脱教育”，并把大学开放女禁看成是“为女界造光明路，替人类造福桥”。这种主张仍然是“教育救国论”，也说明如果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要彻底摆脱“教育救国论”的思想，是不可能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晨，向警予、蔡和森等三十多人，乘法国邮船“央脱莱蓬”号，前往法国。在赴法的海轮上，向警予与

蔡和森常在一起看日出，交谈政治和学术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他们很快互相倾爱起来。

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日，向警予、蔡和森等抵达法国。在巴黎逗留五天，游览和参观了巴黎的名胜古迹，到华法教育会交涉了勤工俭学的有关事项。二月七日，抵达距巴黎约二百里外的一个县城——蒙达尼。向警予、蔡畅、葛健豪等去蒙达尼女子中学补习法文，蔡和森则去蒙达尼男子中学念书。两校相隔仅二三百步。向警予决计在法俭学数年，将语言学好，情况熟悉，设法开辟国内女子外出之路。她在学习上非常勤奋，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初步掌握了法语，因而在短期内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五月二十六日，向警予在巴黎撰写了《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一文，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第二卷第二期上。这是她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的早期著作。虽然文章有些观点尚不够成熟，然而它却把妇女解放与社会改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文章首先指出，女子解放的问题是改造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女子的解放与改造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呢？决不能要求在中国现在的猪仔代议制和寄生的遗产制中占个位置；而应当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做个目标。明确指出：“将来社会的经济能否实行共产，固当有待研究，然而，总是朝着这方面走，是可以相信的。”文章还对当时国内女界要求参政权与分家权的运动和改良主义思想给予了批判，指出：“无论何事，谈得上改良，总还有几分可取，现在的政治，你取他哪一点来改良呢？”接着，又尖锐地指出：代议制是中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无产阶级的障碍；财产私有制是“万恶之

源”，“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家庭制度不完全打破，女子是终不会解放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很切中时弊的，非常彻底的。比起她在出国前夕写给陶毅的信，显然是一个跃进！

这年五月，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蒙达尼一间木板平房里举行了婚礼。由于他们在恋爱过程中交换诗作，后来在法国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在婚礼上他们又朗诵了这个诗册中的诗篇，所以日后大家都把他们两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他们的结婚照片是并肩坐着阅读《资本论》，说明他们共同生活的思想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向警予婚后把这张照片寄回了湖南，毛泽东等非常赞成“向蔡同盟”，立即去信祝贺，并表示要奉他们做领袖。可是，向警予的继母则不然，说什么“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sup>①</sup>，真没出息！”

婚后，向警予主动帮助蔡和森搜集资料，一起研讨当时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积极参加新民学会在法的各项活动，筹备蒙达尼会议。

不久，向警予即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广泛接触了华工和法国工人，还同他们一起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参观学习。

七月六日至十日，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教室召开会议，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上，一部分人以肖子昇为代表，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一部分人以蔡和森为代表，则“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

---

<sup>①</sup>当时传说蔡和森在巴黎一家豆腐公司磨豆腐。

为：“社会主义实为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将来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并主张立即建立俄国式的共产党。向警予完全赞成蔡和森的主张。

九十月间，向警予等人在蒙达尼参加了工学世界社的会议。会上，蔡和森作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讲，驳斥了各种错误的论调。向警予也作了发言。他们和社内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社会民主派思想、工团主义思想等，进行了斗争。向警予和蔡畅还把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抄出来贴在墙上，让大家阅读，积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sup>①</sup>。会后，向警予在给父母亲写的信中说：“你的九儿在这里，努力做人，努力向上……要在世界上放一个特别光明。”表现了她对自己所进行的斗争的自信心情。

然而，当时的环境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安心学习。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华法教育会发出了与留法勤工俭学生脱卸经济关系的通告，各地勤工俭学生面临着无工做、无饭吃、无书读的严重威胁。一月三十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留法女子勤工俭学情形》一文，着重指出“女子勤工俭学实较男子为困难”，并列表介绍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等十八人是非勤工就不能俭学的，呼吁各方设法解决。但北洋军阀政府与华法教育会在法主持者吴稚晖，对于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困难置若罔闻，经过各地代表多次交涉，毫无效果，吴稚晖把持的华法教育会甚至还诬蔑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要将他们“遣送回国”。这样便引起了留法学生之大波澜。二月二十七日，向警予与蔡和森等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各地勤工

---

<sup>①</sup>见蔡畅的《永恒的回忆——哀悼王若飞同志》和李明的《悼向警予同志》。

俭学生代表大会，会上一致通过了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决定直接向中国驻法公使请愿。二十八日早晨，勤工俭学生四百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派代表向驻法公使陈篆提出要读书、要劳动、要吃饭的要求。向警予带领几个女同学作先锋队，坚强勇敢的站在最前列。请愿相持大半天，后被警察驱散，向警予和十多个代表被捕，囚禁于警察局的拘留所。这次请愿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公使馆延长三个月的救济费，华法教育会也答应继续为失工学生找工作。

“二八运动”后，向警予并未放松斗志。五月三十日，她与蔡畅、熊季光、熊叔彬、魏璧、劳君展等新民学会女会员，联络其他女学生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女界公开信，要求里昂大学招收女生。并鲜明地指出：女子问题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女子运动为社会重要运动之一。对孕育中的海外大学（即里昂大学）居然规定十分之一的女生名额提出了批评，要求名额不加限制，免除考试，津贴学费。信中在叙述社会上大多数女子实力不足在历史上、社会上、教育上的种种原因时，主张力辟贤母良妻之谬妄教育，否认苟简的女校教课。这实质上也是对她曾在溆浦办学时提倡贤母良妻教育的清算。

这年夏、秋，留法勤工俭学生与巴黎旅法侨胞多次召开大会，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以救灾为名向法国政府借款打内战，向警予到处奔走呼吁。经过留法学生和侨工的反复斗争和国内人民的支援，终于使这次中法秘密借款被取消了。然而因此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和法国当局的更加仇视。九月十五日，停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勤工俭学生感到“途穷”“势单”，决定联合起来开展一场“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斗

争，也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所称的小小的“十月革命”。当即分别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派代表组成一百一十六人的先遣队，赶赴里昂集合。向警予和李维汉、肖子璋等同学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九月二十一日，蔡和森、陈毅等先遣队员占领了里昂大学校舍。向警予曾去找章士钊联络过一次，又到里昂大学报告过一次情况。二十二日，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勾结法国政府派来警察，把先遣队员全部囚禁。向警予与十人团一起分头寻求支援，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十月十日，先遣队员在兵营里进行绝食斗争，以抗议法国当局的暴行。十月十四日下午四时，蔡和森、陈毅等一百零四名勤工俭学生，被解押到波儿加邮船的五等舱，遣送回国。向警予因已怀孕，没有同归。留下来的勤工俭学女生，境遇特别窘困。向警予在巴黎和蒙达尼，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女生的经费问题而奔走。正如蔡畅所说：“警予在任何时间地点总是自然而然地是最先行动和处于领导地位的人物。”<sup>①</sup>

#### （四）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向警予启程回国。途中经过南洋时，曾致书南洋华侨父老，备述在法国勤工俭学女生的困难情形，登在各报上，吁请援助，得到了各界侨民的同情，且有人愿效运动奔走之劳。船过新加坡，在这里教书的新民学会会员张国基和周敦祥，都到船上去看她，并想留她在吉隆坡教书。她坚决不肯。一九二二年初抵达上海后，同蔡和森住在香

---

①（美）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

山路的一个小阁楼上。当时，她身怀有孕，兼受病磨，因而“庵卧沪上，半筹莫展”，曾先后给熊希龄和他的夫人朱淑雅以及中法协会写信，请他们设法解决蒙达尼女校同学的经费困难。

回国后不久，向警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机关做妇女工作。她热情接待各地来上海、立志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女知识青年，耐心解答她们提出的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种问题，向她们介绍《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国妇女运动的情况，反复阐明：我们妇女只有同劳动阶级携起手来，推翻剥削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向警予在上海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为妮妮。产后不久，她即去上海平民女校教课。她为女校编写了许多深入浅出、生动易懂的教材，还用上海话编写了一些反映女工悲惨境遇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女工中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她还在女工中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南洋烟厂女工唐景、陈倩如等人，都是向警予亲自培养入党的。不少平民女校的学员后来成了妇女运动的骨干。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向警予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有关妇女运动的决议》。会后，党中央成立了妇女部，向警予任第一任部长。在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赞成毛泽东、瞿秋白等关于国共合作的正确意见。同时，耐心地向那些思想不通的同志做工作。向警予为大会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明确提出了在妇女运动中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会议确定设立妇女运动委员会，并创办一种出版物。“三大”闭幕后，向警予回到上海，同蔡和森与毛泽东夫妇等，住在闸北区中兴路三曾里的党

中央机关里。“三大”和“四大”，她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书记，主编《妇女周报》。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共合作。在这次大会之前，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派了毛泽东、向警予、邓中夏、恽代英等四十多人到上海执行部工作，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这次大会后，向警予和毛泽东等一道，协助国民党左派领袖，改组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并以上海执行部工作人员的身份，负责与上海各区妇女代表洽谈，筹组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在向警予的具体指导下，大力加强了妇女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北上，发表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途经上海时，向警予和杨之华等代表上海执行部妇女部起草面呈孙中山的公函，并出席欢迎大会，发表妇女部的意见。同月，我党中央发表声明，号召在全国发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的运动。向警予积极投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动、组织和筹备工作，再三阐明该会的宗旨是“促成国民会议，一方解决国事，一方解放女子。”并先后担任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委员会的书记和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委员，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精彩的讲演，被誉为“激昂动听，使人奋起”，“发挥尽致，听者动容”。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以后，向警予担任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长，曾在广州负责筹建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并任该会第一届会长。这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于北京。十五日，中共中央致唁国民党，并发表告民众书。全国各地群众纷纷召开大会追悼孙中山先生。向警予与恽代英都在上海公共体育场的一个讲坛上发展讲演。柳亚子后来在哭恽



代英的一诗中，曾高度赞颂向警予的这次演讲，诗曰：“世方怖河汉，我独识鸾龙。安石衣冠敝，臧洪意气雄。同时向女士，咄咄赌词锋。”可见她词锋犀利，深入人心。

五卅运动爆发后，向警予发动妇女积极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亲自带领女同志到南京路宣传、募捐。租界巡捕用棍棒、水龙，驱赶群众。向警予身穿雨衣，头戴雨帽，坚持进行宣传。这个地方的群众被水龙头冲散了，她换一个地方继续讲演。

向警予还紧密配合政治斗争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她先后在《向导》、《前锋》、《妇女周报》、《妇女日报》、《妇女杂志》和《妇女年鉴》等报刊上，发表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今后中国妇女之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妇女宣传运动之新纪元》、《妇女运动的基础》等一系列论述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她还为党中央妇女部起草了许多重要指导文件。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理论。

首先，她正确揭示了妇女运动同社会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指出：“中国妇女运动，全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变化为转移”，“我们讨论中国妇女运动，绝对不能凭主观空想，而必须讨论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她深刻批判了当时少数上层妇女热衷于女权运动和妇女参政的错误方向，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没有半点“人权、民权的滋味”。“在这种立场中的中国妇女，如果死板板地刻定十八世纪欧美各国女权运动的旧程式，闭着眼睛依样画葫芦的喊男女平权，以为只要取得和本国男子同等的地位，便算目的已达。那么，结果便会是：参政运动成了功，一班笨黯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

猪圈，伙同一班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到头来不过是无聊的议员队里增加了无聊的女议员，可耻的官僚群中添多些可耻的女官僚，可以说毫无意义。她指出几个妇女加入了政权机关，并不等于广大妇女得到了翻身。她说：“唐朝武则天，以一个女子的身份，居然南面称孤，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她的威权是何等重大，她的地位是何等高贵！但是她统治底下的成千成万的妇女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还不是一样地做奴隶做玩物！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武则天做皇帝的事，看做女权运动！”她深刻地阐述道：“二十世纪的时代是被压迫阶级从压迫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大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人类到全体平等自由之路的过渡时代。我们女子也是被压迫的一部，我们所处的是被压迫的地位。欲免除压迫，老实说来只有联合同阶级努力作战改造社会一法。”否则，“政治问题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所以我说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必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而“世界革命实现之时，即是劳动解放成功之日。”她在这里为中国妇女运动指出了正确方向；把妇女运动同全国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成为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力量。

其次，她最早提出劳动妇女是我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并在实践中最先开始组织女工和农妇。她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劳动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出了科学的分析，认为最多数最下层最痛苦的工农妇女群众，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军。明确宣告：“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我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这就不仅解决了我党领导的妇女运动究竟依靠谁的大问题，而且也涉及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

她亲自领导了一九二三年上海浦东、杨树浦和小沙渡的丝厂、纱厂、烟厂的女工运动和罢工斗争。在斗争中，她坚决依靠广大女工群众，经常到女工家里访问，到工厂去调查和进行实际斗争，启发女工们的思想觉悟，发动她们积极参加罢工。“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向警予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迅速地把妇女运动扩展到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和河北的京津，以迎接新的工人运动高潮的到来。一九二四年上海十四家丝厂一万五千多名女工举行大罢工时，丝厂资本家曾采用各种手段，妄图破坏这次罢工运动，向警予直接领导女工们坚持斗争。她们提出的口号是：“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的姐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罢工坚持了十多天，终于迫使资本家答应了工人的部分要求。九月，她参与领导了南洋烟厂七千多名工人的大罢工，并与张琴秋一起出席烟厂职工代表会，讨论怎样坚持罢工的问题，指导她们如何增强团结，坚持斗争。随后，又直接指导和帮助上海各民众团体组织失业救济会，救济被厂方无理开除的工人，以声援罢工斗争。与此同时，她在《向导》周报上写了《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的文章，揭露资本家勾结官方破坏罢工的卑劣手段，鼓励坚持罢工的工友，“不要灰心，好好团结，组织更有力的雄军，机会到来，和资本家再拚个你死我活，最后胜利终是你们的。”一九二五年，向警予以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领导成员的身份，与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一道，参与发动和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同盟罢工。

再次，她最早提出并实践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相结合。早在一九二二年，她就对上海小沙渡平民女校负责人王会悟说：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都要很好地锻炼，都要懂得工人和劳苦大众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为他们服务。”<sup>①</sup> 她认为：我国女子平民“依旧保留着大多数不识字，无人生和共和国民常识”，“为民主政治之梗”。如果平民教育能普遍于中国女子平民大多数，“不独因此稳固了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且因此并稳固了妇女解放的基础。”所以在她的领导下，上海党的组织在几十个大中学校里附设了工人夜校，许多女工通过夜校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积极参加了罢工运动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她经常深入上海大学女生中进行工作，运用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向女生们论证劳动妇女的特点和长处，分析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区别，告诉她们：劳动妇女的坚强和勇敢都是知识妇女所不能比拟的，有觉悟的知识妇女应该到她们中去工作，去锻炼。在她的直接带动和影响下，一批批知识妇女和学生，深入工厂帮助开展妇女运动。一九二五年四月，向警予在《妇女运动的基础》一文中写道：劳动妇女的“作战能力，反抗精神，以知识妇女自命的到反远不相如！”号召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相结合，明确指出：“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第四，她反复阐明和坚持了妇女运动中党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策略。党的“三大”时，她在由她负责起草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鲜明地提出：在一般妇女运动中，“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

---

<sup>①</sup>据王会悟的回忆。

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对于女权及参政运动，她虽在理论和实践上给予了深刻地批判，然而却一直热忱帮助和争取从事女权运动的知识妇女，明确指出：“女权运动应从联合无产阶级女工做起”，凡热心于女权运动的知识妇女必须切切实实地为劳苦姐妹多做工作。对于上海女权同盟会等七个妇女团体联合援助丝厂女工表示高度的称赞。指出：女工如果没有社会后援，资本家越发得尺进丈，连皮带肉地对她们进行剥削。能否团结奋斗，是女权运动真伪的测量器。而对于基督教妇女运动，她在肯定其长处和取得的成绩的同时，又指出：“终恐成为外国资本的机械”的危险，精辟地阐明如果耶稣复生今日的中国，也要率领被压迫民众反抗外力和军阀。因此她对于女青年全国大会不关心政治，对政治问题不表态，提出了批评，希望她们对于关系中国全面的政治问题也提出研究，保持耶稣原有的精神，慷慨激昂地加入国民革命战线。

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妇女普遍存在的小家庭派、职业派和浪漫派，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各自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人生价值的大小是以人们对于社会贡献的大小而判定的”。要求三派的知识妇女能够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作贡献。

为了实现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团结一致，也为了巩固和扩大妇女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推动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运动相结合，经向警予提议并得到党中央的同意，组织一个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团结各界妇女在一起的革命妇女组织，以代替过去单纯上层知识妇女的狭隘的改良主义团体。这种革命妇女组织萌芽于一九二四年全国城乡纷纷开展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群

众运动。当时向警予除了大力组织发动各地成立女界国民促成会外，还撰写大量文章论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这一组织的意义，认为它是广大妇女群众“自己努力奋斗的组织和武器”，

“不独是国民会议运动的长城，而且必然形成一个将来专为妇女解放奋斗的全国集中统一的机关”。不久，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基础上，各大城市即建立新兴的妇女团体——妇女解放协会。五卅运动后，在全国革命高潮中，妇女解放协会会员曾达到三十万人。正如蔡畅所说：“在向警予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只有几个小规模、非政治性的资产团体：如‘女青年会’、‘妇女参政同盟’和‘节制生育会’。”<sup>①</sup>在党的领导下，向警予创造性地指导各地建立起来的这种以工农群众为骨干的革命妇女组织，发动和组织了亿万妇女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组织上保证妇女运动循着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轨道不断前进。

一九二五年六月，蔡和森因哮喘病发作，离沪去北京疗养，九月返沪。此前，向警予也由广州返沪。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两人的感情，开始发生裂缝。十月，蔡和森、李立三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向警予、李一纯等同赴莫斯科，进东方大学学习。

## （五）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向警予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中国班共有学生百余人，分中文听讲班和法文听讲班。向警予

---

<sup>①</sup>〔美〕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

被分配在中文听讲班，同班同学有罗世文、赵毅敏、施益生、李一纯等。学习课程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党史、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建设，职工运动、社会形式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俄文等。每门课程的老师都是用俄语讲课，由一位翻译马上译成中文。担任中国班翻译的工作人员有曾涌泉、王人达等。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通过了“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发表了“抗议英国封锁广州的决议”，声援省港罢工的斗争。蔡和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致贺词。三月十三日，向警予在会议上代表中国上海女工，接受苏联伏罗涅史州妇女的献旗，并在受旗后致词说：“上海纺织女工是最早起来与中国工人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女工将加入中国无产阶级的行列，消灭外国和中国刽子手的压迫和剥削。苏联工农劳动妇女的光辉斗争是我们的榜样，它鼓舞我们奋斗。”<sup>①</sup>这次会后，蔡和森常来东方大学，看望向警予、李一纯以及在这里学习的中国党员、团员和群众。不久，蔡和森应中共东大旅莫支部刘伯坚的邀请，在东方大学作了“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重要报告，向警予等曾将听报告的笔记加以整理，油印出来，装订成册，供大家阅读<sup>②</sup>。但是，一九二六年底，向警予与蔡和森感情破裂。蔡和森与李一纯在莫斯科结婚。这时，为了适应中国国内革命高潮的需要，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大部分被调回国内工

---

①见《共产国际执委扩大六次全会》，苏联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第508页。

②据施益生的《回忆蔡和森、向警予同志的片断情况》和1980年7月18日访问施益生的记录。

作，向警予也随即离莫斯科回国。

一九二七年初，向警予回到广州。初夏，又离广州去武汉。经长沙时，与蔡母葛健豪、孩子妮妮、博博和甥女特特，愉快团聚，摄影留念。后来，还给两个孩子写了几首儿歌和新诗，殷切期望孩子们“象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将来在没有剥削的社会中成长。”

向警予到武汉以后，党中央派她担任武汉总工会宣传部的工作。她做事格外热情有劲，常常是开完会便去写东西，写完东西又去找工人谈心或研究工作，很少休息。她为工会写的许多宣传品，通俗易懂，生动有力，对教育妇女和发展工人运动，起了很大作用。

同年四月，向警予出席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敢于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斗争。会后不久，被调往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她特别注意党内教育，经常出席各工人支部的会议，组织各种训练班，编辑许多训练材料，朝夕奔忙，废寝忘餐。

马日事变后，蔡母葛健豪带着刘昂等人来到武汉。这时，武汉的形势已很紧张了。葛健豪决定仍回湖南，向警予赶来送行，对外甥女刘昂非常亲切地说：“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敌人。昂昂，你要注意呀！”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府背叛革命，武汉三镇一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派向警予留在武汉，曾负责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她领导党和工会的有关组织迅速转入地下进行活动，想尽一切办法经常到各工厂去工作，同工人一起研究怎样保全组织，如何组织群众进行反抗等。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后，苏兆征



来传达会议精神。向警予精心组织二十几个代表挤在一只狭小的船舱里听传达报告。代表们来自武汉三镇和洪湖、黄安、麻城等地。苏兆征传达后，向警予宣读了党中央制定的关于湘、鄂、粤、赣秋收暴动大纲，极大地鼓舞了到会的同志。

“八七”会议后，向警予在武汉会见了原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卢德铭、辛焕文、韩浚三位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第二天，向警予代表湖北省委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的精神和秋收暴动的计划，坚决否定了原先夏曦要他们丢掉队伍只身追赶南昌起义部队的意见。要他们立即回部队去，参加秋收暴动，以警卫团作基础，把湖南、湖北的武装农民集合起来，进行训练，建立指挥机构，还拨给他们三千元现金，六、七个干部，解决他们在干部和经费方面的困难。后来这支部队到江西铜鼓，毛泽东找到了他们，成为秋收暴动的主力部队。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的精神，向警予在武汉先后派了不少优秀工人并运送了枪枝弹药到各暴动地区去。她参加了湖北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参与制订了年关暴动计划，又亲自撰写了《宣传大纲》、《告士兵歌》和《鄂省通讯》等宣传品。她经常在汉口余记里、石码头的店员工会会址和工人住宅区工作，也时常到硚口区的邮电工人与码头工人住区进行革命活动。她向大家讲述各地举行暴动的大好形势，以及江西、汉川、黄麻地区的情况，鼓动工人们武装起来，和反动派展开斗争。她建立了暴动队的组织，并进行了训练，准备发动武汉市的年关暴动。后来由于暴动计划暴露，未能实现。

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向警予临危不惧，千方百计组织同志转移，营救被捕的同志。她领导工人，以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反对黄色工会，坚决同陈公博派出的接收各级工会

的改组派作斗争。一些厂主和店主开始向工人进攻，取消工人在大革命期间所争得的一些权利，解雇工会负责人。她率领工人进行反抗和斗争，曾领导过震环纱厂工人进行罢工，亲自布置了在绣花街打资本家的行动，发动过年关斗争，惩办那些疯狂向工人进攻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有过盲动主义的行为，比如放火烧电厂和芦村等。但正象“瑕不掩瑜”一样，它无损于向警予在这期间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她主编的党内秘密刊物，在武汉三镇影响很大，成为当时这个城市工人阶级的主要的精神食粮。该刊原名《长江》。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由黄松龄负责。约两个月后，由向警予接办，刊物即比原先办得好多了。它对现实反映及时，对敌人揭露深刻，对问题分析透彻，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与此同时，还出版过一种没有一定名称的八开油印报。报刊上许多短小精悍的时评，文笔犀利，一针见血，使人读后热血沸腾，就是向警予的手笔。她还利用通俗的“三字经”、“四字经”的形式，在报刊上揭露敌人，教育群众。比如揭露国民党欺骗的有“党化教育，欺骗百出”，“忠实党员，只要洋钱”等。有力地教育和激励了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向警予是我党著名的妇女领袖，她过去曾暴露过身份，要在武汉很好地坚持地下斗争是不容易的。加之这一时期身体也很瘦弱，因此有同志劝她转移外地。可她却安然若素，满怀信心地说：“别看我瘦，身体还好，又没有病，能够坚持斗争。”

“斗争越是困难，越需要我留在这里。我有决心贡献自己的一切，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她经常出席基层党组织的会议，直接和党员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她化名为易夏氏，白天活动于群众中，晚上在法租界三德里九十六号的一间小楼

房里，为编写和刻印党的秘密报刊而通宵达旦地工作着。她不断地耐心教育党员、干部说：“共产党员是群众的核心，要说话有人相信，就要联系群众，带动群众，不摆一点架子。周围没有群众，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蒋介石说我们是共匪，就是因为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光明正大。”后来，她的助手看到，不少党的重要机关被破坏，省委的负责人相继牺牲，工作环境一天比一天困难，向她提议：“你的处境太困难了，不如离开武汉，到上海要求党中央另派同志来此工作，这里的机关暂由我看守。”她沉默了一下，回答说：“确实，我的处境有困难。可是，唯其这样，我更不能离开。”接着她加重语气，坚定地说：“大风大浪的时刻，一定要沉着、镇定！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一离开，一时无无人支撑，‘长江’一停刊，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那会叫许多工人怎样失望！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可是，当时的环境的确太困难了。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清晨，在叛徒宋岳林的指认下，向警予与其助手同时被捕，被押在法国巡捕房拘留所里。敌人对她百般诱感和严刑拷打，逼她交口供，均为她严词拒绝。在捕房，她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就背诵唐诗、古文和唱歌。接着，乐观地给牢房的难友讲故事，做思想工作。她曾对她的助手说：“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人迟早总是要死的，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慷慷慨慨。”有时她沉默地坐着，常常把藏在内衣口袋中她父亲和两个孩子的两幅照片拿了出来，或贴在脸上，或放在唇边亲吻。她对着父亲的照片说：“我的父亲是最爱我的，我拿什么报答他呢？”对着孩子的合影

说：“妮妮、博博，妈叫你呢，听见吗？”说着眼眶都红了。法租界法庭开审时，向警予质问法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来干涉中国革命？她叙述自己所进行的事业是为中国全体人民争取自由、平等、独立与解放，而这种斗争目标正与法国大革命时代所争取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旨相符合；并历数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正义与公道。把那个法帝国主义的法官说得哑口无言，不得不对她表示十分钦佩。后来法领事曾一度不肯把向警予交给国民党，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反动派报纸几乎每天都把向警予被捕当作头条新闻，并千方百计强迫法领事馆引渡。四月十二日，向警予由法租界“引渡”到武汉卫戍区司令部军法处监狱。那天，沿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军警把守，并断绝交通，如临大敌。四月十四日，军法处对向警予进行第一次审讯。她坚贞不屈，对于党的秘密一字不供。

敌人三番五次对她审讯和毒打，她从未向敌人吐露过真情，并积极组织狱中斗争，领导大家进行绝食，要求改善狱中生活。

四月下旬，叛徒宋岳林当面质证。宋岳林狂吠乱叫，“历历如绘”；向警予怒火中烧，骂道：“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根本不认识你。我为党的事业而死，虽死犹生！你这败类，活着是条狗，死了要遗臭万年！”四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敌军法处对向警予进行最后会审。法官说已查明向警予的身份是共产党重要领袖，威胁她招供。向警予投下鄙夷的目光，昂然地说：“要杀就杀！至于我是不是向警予，没有多大关系，横竖你们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革命者不会在你

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

五月一日，国民党反动派决定在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武汉工人和中国妇女的领袖向警予。凌晨，向警予梳洗完毕，身着绿油色旗袍，头扎羊角小辫，站在窗口，轻轻地对一个同伴说：“五一，记得吧！”同伴点点头。于是，她默默地望着天空。”突然，牢门打开了。一个暴徒手中拿着纸条，大叫：“易夏氏！”向警予昂然迎上去，同时回过头来，向牢房难友望了一下，表示告别，随后走向刑场。向警予视死如归，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讲演。她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中国独立解放万岁！苏维埃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sup>①</sup>敌人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凶殴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她仍然滔滔地讲下去，因此他们在她嘴里塞着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sup>②</sup>

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英勇牺牲。

当晚，海员工人、共产党员陈春和冒着生命危险，摇着小船，把向警予烈士的尸体运葬在龟山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边。

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向警予烈士的追悼大会。第二年，国际赤色互济会《牺牲》杂志上专门撰文纪念烈士牺牲一周年。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纪念三八节大会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向警予革命的一生，他说：“要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放、为劳

---

<sup>①</sup>李明：《悼向警予同志》。

<sup>②</sup>见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的《纪念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同志》和武汉市公安局档案材料。

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同年七月，周恩来在庆祝延安女子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向警予是我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第一任妇女部长，英勇牺牲了，我们不要忘记她。号召大家学习我国历史上花木兰、秦良玉、蔡文姬等女英雄，学习宋庆龄、何香凝、向警予。在向警予烈士英勇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邓小平亲笔为纪念向警予烈士专集和烈士墓碑题了字，表示党和人民对她的深切怀念。

# 林伟民

福倩红 卢 权

## 悲惨的海员生涯

一八八七年农历九月，林伟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今属珠海市三灶公社鱼月大队鱼堂生产队）。他原名林兴，年纪稍长时，立志要为国为民干一番伟大的事业，遂改名为伟民。

林伟民的父亲林祝友，是一个勤劳忠厚的贫苦农民，一向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高额的地租，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他虽终年辛勤劳动，依然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林伟民有二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从小就参加劳动，跟父亲一道，开垦了一些荒地，种点旱地作物，亦时常与姐姐一起去海边捕捞鱼虾和蚝蚌，以帮补家庭不足。全家人都起早摸黑地辛勤劳动，但仍入不敷出，经常断炊挨饿，只好向富豪人家借债，受高利贷的盘剥。繁重的劳动，贫困的生活，使林伟民自幼就养成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品德。

林伟民的童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使我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侵略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靠近香港、澳门的香山县，是我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最早、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再加上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〇六年，林伟民十九岁的时候，曾到三灶岛牛顿墟（现三灶街）一家酿酒的店铺里当杂工。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累死累活地干活，每月只拿到半两银子的工钱。一次，因为劳累过度，右手不慎坠入正在沸腾的蒸酒锅里，伤势很重。狠心的老板，竟不管他的死活，乘机把他辞退了。他回家后，无钱医治，右手溃烂。后来，多亏邻舍的帮忙，母亲天天到外面采摘草药回来给他敷治，几个月后，才渐渐好转。

当时，三灶岛不少破产农民在家乡无以为生，跑到香港、澳门以至海外谋生。林伟民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当自己的手部伤势刚刚痊愈时，在乡亲的帮忙下，也离开家乡，跑到香港一艘外国轮船当“侍仔”，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员生涯。

“侍仔”是船上最劳累、下贱的一项工种。他的具体工作是在厨房里洗碗刷碟、端菜送饭、洗擦地板等等，每天连续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每月工资却不到十元，还要被包工头从中克扣。海员工人既在经济方面遭受种种残酷剥削，又在政治方面饱受压迫和欺凌。正如海员工人的领袖苏兆征所回忆的：

“中国海员人数不下十万人，普遍于全球五大洲”，“在香港、上海等处，生活特别昂贵，即房租一项，每月至少也要十余元，而月薪又有包工头克扣，日常生活当然万分艰难”，

“因而卖妻鬻子者往往有之，这是我们海员的生活和受经济压迫的痛苦！此外还有政治上的压迫，譬如到美国不许上岸，在船上受帝国主义之虐待而无路诉冤。”<sup>①</sup>悲惨的生活现实，严

---

<sup>①</sup>苏兆征在中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载《中国海员》第4期，1926年3月1日出版。



酷的民族歧视，日渐激起了林伟民对于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仇恨，滋长了反抗情绪。

当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正从事于以推翻清朝统治为主要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理想，他经常奔跑于香港、日本、南洋以及欧美各地，不懈地宣传他的革命主张，联络会党，筹措经费，策划和组织反清的武装起义。孙中山在来往海内外的旅途中，常有机会与中国海员接触，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大家组织起来，参加他所致力革命的事业。林伟民、苏兆征都是香山人，与孙中山同乡，因此互相间的交往也就更为密切。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林伟民、苏兆征等人积极投入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他们不畏艰难，冒着生命危险，为革命党人秘密传递消息，筹集经费，掩护革命党人逃避密探的追捕，以及为革命党人运送军火物资，策应武装起义，等等。

辛亥革命后，一些海员自恃对建立民国有“功”，离船上岸钻营一官半职去了。但是“兆征和伟民不仅鄙视这种钻营，甚至……政府知道他们是海员中的健将，欲罗致之，予以官职，他们却掉头不顾，一心不离海员工作。”<sup>①</sup>正因为林伟民为人性格豪爽，正直无私，光明磊落，乐于为大众谋利益，因而赢得了海员们的信任与爱戴。

一九一四年，长期外出谋生的林伟民回乡探亲，恰巧碰上了一帮海盗登岸抢劫财物。全村仅有二十多户人家，壮丁不多，又没有防范的武装，大家焦虑万分。林伟民临危不惧，向群众分析了本村的有利条件，认为本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

<sup>①</sup>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是能够抵御强盗的。在林伟民的带领下，大家拿起了棍棒、大刀等粗劣武器，抗击来犯强盗，一直坚持了两三天，打死了几名强盗，最后安全撤退到别的地方去。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纪元，也给中国人民展现出求解放的新道路。林伟民与其他中国海员一样，由于经常随船航行于世界各港口，有机会与外国海员接触，因而较快地了解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虽然他们初时对十月革命的详细情况及其伟大意义还不大理解，但当听说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打倒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自己起来当家作主，都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天公地道的大好事情”<sup>①</sup>，并且从中受到了鼓舞。林伟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所接触到的一些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日渐打开了眼界。

一九二〇年，苏兆征在一艘英国轮船上领导海员进行了一次反虐待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斗争使得海员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深感只有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于是，“苏兆征便纠合海员中的觉悟分子如林伟民等，在海员中从事宣传与组织，不到数月，成绩大著。”<sup>②</sup>在具体筹备海员工会成立过程中，林伟民被推为筹备委员<sup>③</sup>。一九二一年三月，香港海员工人自己的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香港海员工会）宣告成立，成为我国最早的现代化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林伟民当选为海员工会第一届干事，负

---

①据老海员黄养、刘达潮的回忆资料（1959年）。

②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③据冯永垣的回忆资料（1957年）。

责交际方面的工作<sup>①</sup>。这样，林伟民便开始成为海员工人中的骨干人物了。

## 在香港海员罢工斗争中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致力于工人运动，并且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这样的革命形势，使香港海员受到了鼓舞，增强了斗争的信念。另一方面，当时物价不断上涨，海员生活日益困难，而资本家及包工头的盘剥，却更为残酷。广大海员工人因此迫切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在此情况下，香港海员工会决心带领海员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争取生存权利而进行斗争。

一九二一年九月，香港海员工会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反对包工剥削的要求。但是，轮船资本家不予理会。同年十一月，海员工会再次向资方提出，复遭拒绝。海员工会乃决心通过罢工手段来争取上述要求的实现。林伟民积极参加了组织“加工维持团”等一系列罢工前的准备工作，还具体负责了“防护破坏罢工队”的工作。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加资要求，限令二十四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到时就一致举行罢工对付。但是，轮船资本家依然毫不在意。受尽压迫剥削的香港海员，再也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带领下，毅然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

---

<sup>①</sup>据老海员冯燊、黄养回忆资料。

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新起点。

轮船资本家不见棺材不落泪。罢工正式举行后，他们才着急起来，连忙要求香港英国当局出面干涉和压制。当晚，香港当局华民政务司夏理德赶忙跑到海员工会进行压制。他用威胁的口吻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这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港政府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搞罢工，不怕饿肚子吗？”<sup>①</sup>苏兆征、林伟民当场给予严词驳斥。夏理德无词以答，后来又向海员工会提出十天八天的宽限时间，待商定一个意见后，再与海员工会磋商是否增加工资问题，企图用“拖”的办法来阻止罢工的蔓延。但是海员们并不上当，“坚持非答应条件誓不上工”<sup>②</sup>。罢工海员聚集于海员工会内外，高呼罢工口号。夏理德十分狼狈，在群众的嘲笑声中灰溜溜地退出海员工会。

翌日，在苏兆征等的带领下，罢工海员相继离开香港，回到广州。他们在广州成立了罢工的总指挥部——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下设总务科、财政科、粮食管理处、纠察队、宣传队、慰问队、骑车队以及招待处等机构。苏兆征被选为总务处主任，具体负责领导罢工内部行政及对外交涉等各项工作。林伟民则仍暂留香港，继续发动海员罢工，带领“防护破坏罢工队”维护罢工利益，惩处一些敢于破坏罢工的工贼走狗。

罢工初期，香港当局和轮船资本家企图用压制威吓手段进行破坏。一月十七日，香港当局华民政务司夏理德与轮船资本家约海员工会代表林伟民、邝达生、陈观民与蔡军保四人到华民政务司署“磋商罢工问题”。会上，轮船资本家要胁海员“须

---

<sup>①</sup>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

<sup>②</sup>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4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先行开工，方易磋商。”<sup>①</sup>林伟民等当场严词拒绝。翌日，双方再继续开会。夏理德威逼说：“本司今为最后忠告”，“汝等若信我言，早日先行开工，本司定必协力助汝工人向东家要求，否则无磋商余地。”<sup>②</sup>林伟民等代表毫不畏惧，一再坚持要资方全部接受海员的加薪条件，方才答允开工。资方破坏罢工的阴谋未能得逞。会后，林伟民一面将谈判情况及时报告广州罢工总办事处，一面继续带领留港部分海员工人坚持斗争。他们在海员工会门口书写“凡我海员工人，须候船东认允加工签字，方可开工”的大幅标语<sup>③</sup>。

海员工人在坚持罢工斗争的同时，还采取了成立纠察队封锁香港、对内河和沿海轮船实行严密管理，以及串连发动其他行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等措施，发生了巨大威力，使香港当局尝到了苦头。到二月上旬，因罢工而停泊香港的中外轮船已達一百六十八艘，共二十六万余吨，其中以英船为最多，共七十六艘、十二万七千吨<sup>④</sup>，使轮船资本家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例如“南洋班、沪港班等停留港埠之船达百余号，统计损失当在百万元以上。”<sup>⑤</sup>香港日常所需粮食、肉类及蔬菜等副食品，主要靠华南各港口供应，现在由于罢工，来源几乎断绝，严重影响香港的日常生活。香港“因鱼菜来源短絀，昨日鱼价已开始起价”，“若再延数天，则各物必大加飞涨。”<sup>⑥</sup>一月底，香港运输工人毅然举行同情罢工，参加罢工人数增到

---

①②上海《申报》1922年1月23日。

③上海《申报》1922年2月1日。

④上海《新闻报》1922年2月18日。

⑤上海《申报》1922年2月5日。

⑥上海《申报》1922年1月23日。

三万人以上。这样一来，全港市面十分紧张，居民怨声载道。

“港民因海员罢工而迁粤者约二十万人。”<sup>①</sup>香港当局惊呼这次罢工是“陷本殖民地生命于危险之境”<sup>②</sup>。二月一日，香港当局以海员工会“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借口，悍然宣布该工会为“非法团体”，派遣军警查封了海员工会，强行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的招牌抢走，不久，又将参加同情罢工的海陆现货员工会、同德工会、集贤工会等运输工会组织封闭，拘捕了四名运输工会的办事人员，使香港置于一片白色恐怖状态之中。

但是，香港当局的高压政策并不能奏效，相反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愤恨与反抗，后来只好改用“调停”、“谈判”的手法以对付罢工。为了表示海员工人的诚意，争取社会上的更多同情，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决定派苏兆征、翟汉奇等四人为代表，于二月十四日赴港进行谈判。谈判期间，因为原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杀妻被捕，苏兆征被推选为代理会长，所遗代表一职，改选林伟民继任。林伟民乃执行谈判代表的任务，与其他代表一起，于二月十七日赴香港，继续与对方谈判。

鉴于香港当局无理封闭工会，因此当时谈判的焦点是要香港当局首先恢复海员工会，然后就其他条件进行谈判。谈判时，香港当局与资方代表一再诱骗海员代表答应先行复工，方才考虑恢复工会等问题；其他条件，则交由公正人最后判决。至于是否切实保证恢复工会，香港当局却又支支吾吾，拒不答复。林伟民等人严词驳斥对方的荒唐主张，坚持“先要恢

---

<sup>①</sup>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2月15日。

<sup>②</sup>转引自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50页。

复原有之工会招牌，一面妥定工金问题，然后方能议”<sup>①</sup>，表达了全体海员们不可动摇的意志。会后，林伟民及时将谈判情况报告广州罢工总办事处。苏兆征十分嘉许他们的坚定立场，复电说：“务得船员满意，然后开工。如以上条件达不到目的，则无磋商之必要，各代表可立刻返省。”<sup>②</sup>二十一日，林伟民等代表返回广州，向海员大会作谈判经过的报告。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斗争到底，绝不屈服，以作谈判代表之后盾。二十三日，林伟民等带着罢工工人的决心，再次赴港谈判。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林伟民始终立场坚定，牢牢记住全体海员的嘱托，警惕并及时识破对方的诸般阴谋，既不为花言巧语所迷惑，也不为威迫利诱所动摇，一再挫败了香港当局和轮船老板们的种种花招，使他们所玩弄的“调停”、“谈判”骗局归于破产。

二月底，全港各行业工人为支援海员的正义斗争，奋起举行总同盟罢工。香港市面交通断绝，生产停顿，商店关门，市面冷冷清清，进一步陷于瘫痪状态。当时报纸报道说：香港昔日“入夜灯光四照，今则黑暗无生气。”<sup>③</sup>那些居住在香港、平日趾高气扬的外国人，如今因工人罢工，家务无人料理，孩子没人看管，环境无人打扫，束手无策，狼狈异常。路透社报道说：“欧人男妇及政府最高级官员，群集维斯满斯咖啡店前，购买面包，其景象实属罕见。”<sup>④</sup>

在此山穷水尽的情况下，香港当局终于被迫表示愿意以海员先前提出的要求条件作为谈判基础，要求海员罢工总办事处

---

①②上海《申报》1922年3月2日。

③上海《时报》1922年3月4日。

④转引上海《申报》1922年3月2日。

再派代表进行谈判。鉴于解决罢工的时机已告成熟，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乃委派林伟民等四人再次赴港谈判。他们抵港时，香港当局副华民政务司和广州英领事特意到车站迎接。这种如此礼遇海员的作法，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雄辩地说明了在全港工人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下，香港英帝国主义不得不低头认输了。

谈判的第一项议程，是关于海员与船主有关的各项条件问题。林伟民等不辞劳苦，旗帜鲜明，坚决维护海员的根本利益，在与对方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也注意到斗争的灵活性。在讨论到关于恢复罢工海员工作职位及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问题时，林伟民等坚持要一律恢复罢工海员原职，还要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对方则提出有些船已招雇了新工人，且已订有六个月的合同，因而无法让罢工海员全部复职，并拒绝补发罢工期间的工资。双方争论不休，谈判一直连续进行了十多个钟头，至深夜十二时仍未达成协议。濒于绝境的香港当局，深恐谈判因此破裂，连夜密议，促使船主与海员继续磋商。三月五日，双方继续谈判，最后资方表示接受海员的要求；对暂时不能复职的海员，则商定照这次增加工资的数目折半，由船主支付五个半月的工资。

谈判的第二项议程，是关于海员与香港当局有关的问题，主要是恢复海员工会以及释放各工会被捕人员等。香港当局表示：只要海员同意复工，香港政府即可于翌日取消先前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并保证释放被捕人员。林伟民等表示：只要香港当局确有诚意恢复海员工会，即可发出复工通知。

最后，林伟民等还提出了香港当局于三月四日制造“沙田惨案”时所杀害工人的抚恤问题，声明如果这一问题不获解决，



将会影响整个罢工的解决。香港当局表示一定要妥善处理，对死者家属予以抚恤。

经过反复的认真的讨论，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于三月五日由各方代表签字。林伟民、翟汉奇、陆常吉、卢俊文四人代表罢工海员在协议上签了名。三月六日，香港当局派专人将工会招牌挂回原处。工会门前，聚集着成千上万群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燃放鞭炮，尽情欢庆这次罢工斗争的伟大胜利。罢工总办事处随即下复工令。林伟民等人也以谈判代表的名义散发传单说：“本会同代表连日在大会堂与中西船东磋商一切，现本日下午将各件完全议妥，双方署名为据。凡我同人，预备复业为盼。”<sup>①</sup>

在这次罢工斗争中，苏兆征、林伟民等中坚人物，与广大海员团结一起，群策群力，英勇顽强，坚定果敢，排除万难，始终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邓中夏曾称誉这次罢工斗争是“掀起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第一怒涛”<sup>②</sup>。而苏兆征、林伟民等人的名字与这场伟大的罢工斗争连在一起，永远载入史册。

### 上海工运的先驱者

在香港海员大罢工胜利的推动下，并由于全国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一九二二年五月一

---

①上海《申报》1922年3月14日。

②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日，于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苏兆征、林伟民等代表香港海员工会参加了大会，向代表们介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经过及斗争经验，引起了到会代表们的巨大兴趣。

上海钧安水手公所海员代表朱宝庭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森等，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朱宝庭与林伟民、苏兆征等在会上认识了，从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苏兆征、林伟民深切感谢上海海员及其他行业工人在海员罢工期间所给予的无私的巨大的援助。朱宝庭也从香港海员工人的胜利斗争中受到了鼓舞与启发，因而在会上向香港海员工会提出了派人到上海协助建立统一的海员工会组织的邀请。

大会结束后，林伟民受香港海员工会的委派，与朱宝庭一起乘“海康号”轮船赴上海进行筹组工会的工作。五月十六日船过汕头时，林伟民与汕头各工团代表开会，介绍香港海员工会活动情况和这次赴沪目的。他说：“鄙人此次往沪，欲于海员总会组织成立后，即召集长江一带之海员，联同一气。”<sup>①</sup>林伟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着信心，使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的报纸曾报道说：“林君年约三十，颇饶精干之气。”<sup>②</sup>

到了上海，林伟民与朱宝庭等人并肩作战，立即着手进行筹建海员工会的工作。但是，这项组织工作并不是容易的。当时上海海员组织涣散，派系众多，封建行帮界限严重，各自为政，除了有三个较大的团体即叠叠社（烧火行）、钧安公所（水手行）及联义社（服务员）之外，还有很多小团体。针对这些情况，林伟民深入到各条轮船和各海员宿舍之中，与海员们促膝谈心，以香港海员团结战斗取得胜利为例，讲解建立统

---

<sup>①②</sup>广东《群报》，1922年5月17日。

一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鼓励上海海员要摒弃门户之见，团结一致，为着海员工人的共同利益而斗争。经过林伟民和朱宝庭等人的深入组织发动，“入会会员已甚踊跃，非仅本埠各海员甚为赞成，即其余各种团体，亦愿予以赞助。”<sup>①</sup>一九二二年七月二日，上海海员工人自己的统一的工会组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上海支部（以下简称上海海员工会）正式成立，会员人数达二千七百人。林伟民被海员们推选为主任。海员工会办事处设在百老汇路一六三号。

海员工会成立后，在林伟民领导下，立即着手酝酿进行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在具体研究斗争对象时，考虑到外资轮船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已经增加工资和承认工会，因此这次斗争锋芒应主要指向招商局，兼及其他中小轮船公司。招商局是中国官僚资本企业，也是国内最大的轮船公司；至于其他中小轮船公司，往往视招商局的态度行事。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先由海员工会正式向招商局提出加薪要求，如遭拒绝，就通过罢工手段来争取实现这一目的；与此同时，积极作好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七月二十三日、三十一日及八月三日，海员工会先后三次致函招商局，要求按照香港海员与资本家签订的协议加薪。但是招商局都置之不理。海员工人愤不可遏，纷纷要求以强硬的罢工手段来回敬他们。

八月五日，在林伟民的领导下，上海海员同盟罢工正式举行，海员工会发表罢工宣言说：“处于今日新潮膨胀的时代，工人觉悟，无复俯首帖耳，低压机于资本制度之下了”，“我同

---

<sup>①</sup>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6月29日。

业的兄弟，常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百端的辛楚，比别的工人，更有甚焉！”宣言号召罢工工人要服从海员工会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必要毅力坚持，万众一心。”<sup>①</sup>为了保证罢工的顺利进行，林伟民还作了一些具体部署：在南市中华茶楼设立临时海员罢工事务所，与各码头就近联络；在黄浦江中放舢舨二只，往返巡逻，维持罢工秩序；参加罢工的海员每天由海员工会津贴伙食费大洋三角；罢工期间，各公所负责妥善解决工人的住宿问题，等等。当天，“其停泊在沪者计十三艘，均已实行罢工，约计人数六百人”<sup>②</sup>。罢工以后，海员“皆纷至海员联合会签名，以表示自愿罢工”<sup>③</sup>。统计先后参加这次同盟罢工的，有招商局、宁绍、三北、裕丰等大小二十余家公司，六十余艘轮船，共三千人以上。

罢工第二天，元一、裕丰、平阳、宁绍等一些中小轮船公司的资本家，都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深知香港海员罢工的结果与教训，生怕罢工发展下去，势必给自己招致不堪设想的损失，因而派出代表前往海员工会，表示“答允海员联合会要求，签订加薪合同。”<sup>④</sup>至八月中旬，“二十余家未照约履行之公司，已次第签字履行矣。”<sup>⑤</sup>上述各船海员复工开航时，海员工会发动海员工人群众在黄浦江边悬挂旗帜、点燃鞭炮，为其送行，气氛甚为热烈。这样一来，使顽固拒绝加薪的招商局，陷于完全孤立的地步。

招商局对于海员工人的合理要求，一开始便抱敌视态度。

---

①②③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6日。

④上海《申报》1922年8月8日。

⑤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7日。

“既未允许加工，亦未有态度表示，仍旧坚持不加。”<sup>①</sup>与此同时，招商局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和阻止罢工，拒不承认新成立的海员工会，狂妄地宣称“招商局除水手、生火等公会外，决不承认其他新团体。加薪问题，如有其他新团体出面要求，则不在（招商局）董事会范围之内。”<sup>②</sup>招商局还收买失业海员，派遣走狗、工贼，分头到海员中活动，煽动他们不要服从海员工会的领导，并虚伪地表示，如果他们直接与招商局谈判，方允酌加工资。招商局又雇请流氓打手暗害罢工领导人。一个晚上，罢工领导人朱宝庭开会回来，半路上便遭流氓打手打伤，昏倒在地。招商局更竭力挑拨广东、上海籍贯海员之间的关系，分裂罢工队伍。为了挫败招商局所玩弄的上述阴谋，林伟民等领导人于十一日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付办法，“经讨论，决互相告诫，坚持到底，决不受外人利用，并缮就传单分发各界。”<sup>③</sup>在林伟民建议下，罢工海员还组织了一支“打狗队”，严惩那些敢于破坏罢工的工贼走狗。“打狗队头一次出阵，果然杀了狗腿子的威风。”<sup>④</sup>

招商局轮船公司老板为了分化瓦解罢工队伍，搞垮海员工会，又“直接致函各水手头目磋商”<sup>⑤</sup>复工问题。林伟民闻讯，当即召集各船海员代表开会，讨论对付办法，“一致决议由海员联合会负责洽商，私人则置之不理。”<sup>⑥</sup>这样，就进一步团结了广大海员，再次挫败了招商局玩弄的阴谋诡计。

---

①上海《申报》1922年8月8日。

②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9日。

③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2日。

④雷加：《海员朱宝庭》，工人出版社出版。

⑤⑥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5日。

招商局还无耻地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起来，破坏罢工。一方面，函禀北京军阀内阁和交通部，要求电令上海护军使“扑灭罢工”，“解散工会”；另一方面，又派出董事李伟候亲赴护军使署，“请求协助对付海员联合会，并请求护军使与租界各局协商，制止海员联合会之一切活动。”<sup>①</sup>护军使因为海员的活动多集中在租界区，于是无耻地向各国驻上海的领事团吁请协助镇压罢工。但由于帝国主义者刚尝过了香港海员罢工的苦头，余痛犹在，况且这次罢工并未波及外商企业本身，因此未敢贸然答允直接镇压，只派出警探监视。为了揭露和挫败招商局勾结封建军阀破坏罢工的阴谋，海员工会当即公开声明：“一、香港海员总会与中西船务公司所立之契约，为海员等全体之利益所关，誓不放弃；二、本支部为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之一机关，有对于未履行契约之公司，行使其要求履行之职权。”<sup>②</sup>招商局顽固拒绝加资，极力破坏罢工的行为，更加激起海员们的愤怒与反抗，参加罢工行列的海员进一步增加。“八月二十一日，招商局之嘉禾轮由汕头来沪，即签名加入罢工。”<sup>③</sup>“二十二日，又到遇顺轮一艘，当即参加罢工。”<sup>④</sup>在林伟民、朱宝庭等罢工领导人的坚强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罢工海员们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地坚持斗争，再加上香港、汕头等地工人给予有力声援，一再粉碎了招商局的种种阴谋，使其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在此情况下，招商局知道如再顽抗下去，必将招致更大的损失，终于被迫与海

---

①1922年8月10日上海工部局警察处日报。

②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17日。

③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22日。

④上海《申报》1922年8月26日。

员工人进行谈判。八月二十五日，双方正式达成了协议，“加工各条件内容主要为：江海各轮除驶（香）港五轮外，其余各轮船船员，照原薪金加二成，由本年五月一日起加给；罢工期内，各船应得工资十足付给”<sup>①</sup>。

八月二十六日，海员工会举行了盛大的复工庆祝仪式。海员工人在黄浦江边搭起了舞台，林伟民和其他海员代表先后登台演讲，庆贺斗争胜利。群众纷纷高呼“罢工万岁”等口号。各条轮船一齐升起了旗帜，点燃鞭炮，敲锣打鼓。在沿岸群众的欢呼声和锣鼓声中，缓缓地开航。情绪之高昂，气势之热烈，真是前所未见。

在整个罢工斗争过程中，林伟民立场坚定，依靠群众，处处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机智果敢的战斗作风，深得海员工人的信任与拥戴。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罢工期间，林伟民的妻子在广东家乡得了重病，曾数次来函催促他回家料理。但是林伟民考虑到当前斗争的需要，不能离开，因此毅然留下，去电嘱咐亲友代为照顾。不久，妻子病逝。噩耗传来，他忍受着内心的痛苦，继续坚守在战斗岗位上，再次去电托付亲友代为料理丧事，充分表现了林伟民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工人大众谋利益的高贵品德。

上海海员同盟罢工胜利结束后，林伟民领导上海海员进一步整顿海员工会。同年十月二日，工会重新改选，深受海员拥戴的林伟民，继续当选为上海海员工会主任<sup>②</sup>。

上海海员工会的成立，以及上海海员同盟罢工的胜利进

---

<sup>①</sup>上海《申报》1922年8月27日。

<sup>②</sup>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0月7日。

行，在上海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作为上述斗争活动的主要领导人林伟民，由于他的卓越表现和杰出贡献，不愧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 深受拥戴的工人领袖

由于上海法国租界当局的通缉迫害，一九二二年底，林伟民离开了上海返回香港。香港当局亦随即下令将他驱逐出境。但是林伟民毫不畏惧，仍然秘密留在香港，坚持工作，与苏兆征一起整顿香港海员工会，对一些把持工会、为非作歹的工贼，如翟汉奇之流，进行清算。

一九二四年春，林伟民接到了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会的邀请，以中国海员代表的身份离开香港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当他抵达莫斯科时，会议已告结束。他应赤色运输职工国际及苏联总工会的邀请，留在苏联进行参观访问，并与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工作、学习的中国同志取得了联系，应邀前往作关于“实行罢工、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斗争问题”的报告。他没有讲稿，但演说时，“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层层深入，充分说明了中国海员的力量。他的精采报告，博得了人们的喝采”，“当时参加报告会听讲的有王若飞、肖劲光、黄平等五十多人。个个都为林伟民的热情洋溢、生动风趣的演讲所激动。”<sup>①</sup>旅莫中国共产党组织还指定罗亦农、黄平等人专门负责与他联系，向他进行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性质任务等方面的宣传教育。

---

<sup>①</sup>据黄平回忆资料（1978年）。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期间，林伟民已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有所接触。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海员罢工始终给予热情关注和支持，并且帮助罢工工人在斗争中掌握正确的方向。当时党出版的一些报刊如《工人周刊》、《群报》等，经常及时发表有关支持罢工的消息与评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大力发动各地工人群众给予海员罢工以巨大援助。广东地方党组织更是全力以赴，“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待及演讲，以共产党名义散传单三千份。”<sup>①</sup>广东党组织在公开发表的《敬告罢工海员》的文告中，号召罢工海员“抖擞精神，完成我们的这一次伟大举动”，旗帜鲜明地表示“本党以海员同志们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为之后援。”所有这些，都使林伟民十分感动，留下深刻的印象，开始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动群众谋利益的政党，因而对党产生了敬仰之情。后来在上海领导海员罢工时，他又与朱宝庭<sup>②</sup>等共产党人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并且得到了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及时支持与指导。他还亲自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工人英勇地展开了一系列罢工斗争的情况，因而对党的信仰更加坚定了，决心跟着党干革命。在苏联期间，他直接得到党组织的教育，阶级觉悟更有所提高，经过罗亦农的介绍<sup>③</sup>，毅然加入中国共

---

① 《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

② 朱宝庭是1925年5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③ 据黄平的回忆资料（1978年）。

产党。从此，他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名战士，更加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作毕生的奋斗。

一九二四年十月，林伟民从苏联回到了广东，担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总办事处主任。他看到广州海员组织工作长期处于涣散和薄弱的状况，就团结广大海员工人对工会进行了整顿，把工会组织逐步健全起来。他不顾香港当局对他的通缉，经常秘密潜回香港，配合苏兆征继续进行整顿工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在香港海员工会组织的周末演讲会上介绍苏联工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后来，他又在香港海员工会干事会上作苏联之行的详细报告。

林伟民结合在苏联期间所了解到的关于工会建设的经验，在香港海员工会出版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指出几年来香港海员工会组织没有得到巩固与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工会基层组织不够健全，因为数万同人的工会仅委托于几个职员，如果职员中出现一些不良分子把持会务，胡作非为，工会工作就会动摇起来，“这种情形，实为我们工会莫大的危险。”<sup>①</sup>他在文章中具体建议在总工会之下，各船均应分别设立支部，作为总工会的基层组织，以利开展各种经常性的活动，“讨论应兴应革事宜，可藉此而谋密切强有力之统一。将来我们海员工会，就可成为最大之模范。”<sup>②</sup>

林伟民还认真总结了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时的斗争经验教训，著文指出这次罢工“乃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反抗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罢工结束后，香港当局及船东竟拒

---

①② <我们工人应当负责工会的责任组织与训练>，载 <海员工会月刊>，1925年。

不执行达成的协议，因此“我们还要更坚固地团结起来，准备反抗呀！我们要得到最后的胜利，还要不断的努力奋斗呀！”<sup>①</sup>

在整顿工会的基础上，一九二四年香港海员总工会干事会进行了改选，林伟民继续当选为工会干事。

与此同时，林伟民还密切关注广州地区工人运动的进行，及时热情地给予支持与指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三日，广州盐船工人因物价暴涨，生计难以维持，因而向盐商提出从本月十六日起增加运费的要求。盐商拒不接纳，勾结两广盐运使邓泽如，于二十四日派出武装盐警，将停泊于沿河黄沙一带的盐船一律封禁，又将盐船工人代表拘捕。盐船工人乃到广州海员办事处求援。林伟民挺身而出，支持与带领盐船工人进行斗争。

十二月二日，林伟民召集盐船工人六百余人开会，商量斗争对策，当场通过了三项决定：“一、盐船工人全体罢工；二、由海员工会派纠察队三十人协助调查罢工事务；三、通电全国各界予以援助。”<sup>②</sup>会后，全体盐船工人正式宣布罢工。

次日，林伟民再次召集罢工工人开会。他在会上指出：大家要求增加运费，本属劳资双方的事情，盐运使却采取种种压制手段，对此我们决不能屈服。大会一致通过向盐运使署提出三项具体要求：一、立即放人；二、立即取消封闭盐船的不法行为；三、有关增加运费事宜，应由劳资双方自行讨论解决，盐运使署不得横加干涉与压制。最后，林伟民鼓励大家说：你们的要求是正义的。只要你们齐心协力，坚持斗争到底，胜利就会有保证。

---

①见香港海员工会编印的《中国海员罢工第三周年纪念册》，1925年3月5日。

②《海员工会月刊》，1925年。

与此同时，林伟民还在报上著文公开揭露邓泽如迫害盐船工人的暴行，并且向社会各界散发“快邮代电”。当时，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部长廖仲恺得悉此事后，对工人的痛苦处境深表同情，责令邓泽如从速妥善解决。

在此情况下，邓泽如十分狼狈被动，只得于十二月四日派人请林伟民前往盐运使署商量如何解决。林伟民当场指斥邓泽如压制工人的错误作法，申明盐船工人生活所迫而要求增加运费，乃是十分合乎情理的。邓泽如无话可说，只好表示加价一事，任由劳资双方自行磋商解决，并请求林伟民将前扣留的盐工代表领回，“以平众意”。

十二月六日，盐商与盐船工人代表正式讨论加费问题，被迫接受工人的合理要求。盐船工人的罢工斗争乃告胜利结束。对于林伟民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所作贡献，当时《海员工会月刊》发表评论说：罢工斗争“收效之迅速，实赖林伟民君认真，而且运动机警，故能如愿以偿。”<sup>①</sup>

通过这次斗争，盐船工人认识到团结和组织起来的重要意义，因而纷纷向林伟民提出要求，申请加入海员工会。经过香港海员工会讨论，决定接收盐船工人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广州第一支部，归海员工会广州办事处领导，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举行了成立大会。

随后，广州和北江民船工人也在林伟民的领导下，进行了反无偿征调和勒索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事后，民船工人也纷纷申请加入海员工会。一九二五年一月间，林伟民乃“派书

---

<sup>①</sup> 《广州市盐工全体加入海员工会之可嘉》，载《海员工会月刊》，1925年。

记前往连江口，组织第二支部，以容纳该工友。”<sup>①</sup>他还向香港海员工会提出，“来往省、港、澳、梧州等船，亦宜联络”，准备“组织一演讲员到各船接洽演讲会务，并着同人入会，俾早日统一，完成我海员工会所持之目的。”<sup>②</sup>

有一次，来往香港、广州之间的“西安号”轮船，发生了外籍职员无理殴打烧火工人事件。烧火工人到广州海员办事处投诉。林伟民闻讯，当即通知全体烧火工人离船，齐集办事处商量对策，并同时通知其他轮船烧火工人采取一致行动，不要到“西安号”轮船顶工。

“西安号”原定当天下午返航香港，待开航时间临近时，船主才发觉烧火工人已罢工离船，便赶忙派人到广州办事处求情。林伟民痛斥其无理殴打中国海员的错误行为，责令其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船方迫于轮船急待开航，只好全部答应下来。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陈延年相继调来广东领导广东区委工作。广东区委组织机构进一步充实与加强。林伟民被任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后来还担任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举行。按第一次“劳大”议决，大会原应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召开。鉴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所控制的一些黄色工会的诬蔑攻击，我党便决定改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香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并委托香港海员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负责筹备。苏兆征、林伟民等积极投入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对香港工团总会等团体进行耐心的动员和教

---

<sup>①②</sup>林伟民给香港海员工会的信（1925年1月13日），载《海员工会月刊》，1925年。

育工作，晓以大义，指出应以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克服行会帮派界限。大会由刘少奇、邓中夏、林伟民等共同领导与主持进行。由于林伟民长期以来忠心耿耿地为中国工人阶级谋利益，对我国工人运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全国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深得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戴，因此在大会选举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时，他与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李森等人一起，被选为执委会委员。他还被一致推举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样，林伟民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一任委员长，成为全国工人所拥戴的工运领袖了。

### 为革命战斗不止

一九二五年五月底，上海发生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惨案”。为了响应上海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号召，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发动香港工人和广州洋务工人举行反帝政治大罢工。为此，党决定委派苏兆征、邓中夏、杨殷等人到香港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同时委派林伟民、李森等负责广州方面的罢工筹备工作。六月十三日，林伟民、李森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作为接待罢工工人及筹措罢工经费的办事机构。林伟民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投入这一工作。他们得到了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力支持，征用了市内一批烟馆、赌馆及其他空房作为安置罢工工人的宿舍，迅速筹集到一笔经费，购置了大批粮食、稻草以及其他生活用品，以供迟日罢工工人撤回广州后使用。与此同时，他还亲自跑到盐船工人中间，发动他们支援省港罢工，帮助罢工工人解决住宿、交通运输等问题。在林伟民的动员下，不少盐船工

人热情支援罢工，后来还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的各项具体工作。在林伟民、李森等努力下，罢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从而保证了罢工的顺利实现及胜利进行。

六月十九日，省港大罢工正式举行。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回广州。不到半个月，参加罢工人数达到二十余万人，经常逗留在广州的有六、七万人。他们都及时得到了妥善的安排，食宿无忧。

罢工举行的最初几天，苏兆征仍留在香港继续组织发动罢工。在林伟民、邓中夏、李森等人的领导下，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排除了国民党右派、黄色工会头目等方面的干扰，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罢工的“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执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议、带领罢工工人进行战斗的“最高执行机关”。省港罢工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广州沙面洋务罢工工人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三方面的代表共十三人组成。林伟民和李森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罢工委员会<sup>①</sup>。

七月一日，林伟民亲自主持了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讨论及选举罢工纠察队的工作人员问题，议决选举邓中夏为罢工纠察队训育长。会议还讨论通过对香港实行封锁粮食出口、设置粮食贩卖委员会以打击走私犯等重大问题。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后，七月三日，林伟民又主持召开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出苏兆征为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曾子严、何耀全为罢工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森为干事局局长等。罢工初期，林伟民还积极参加了罢工委员会组织的

---

<sup>①</sup> 《工人之路》第10期，1925年7月3日。

各项活动，发动罢工工人参加开筑黄埔公路的工作。八月十二日，他抱病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主持黄埔筑路委员会开幕典礼，勉励罢工工人团结一致，把反帝斗争坚持到底。

平日，林伟民经常深入罢工工人当中，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他性情坦率直爽，待人热情，作风干脆利索，与大家打成一片，因此深得罢工工人的拥戴，有事情就找他反映解决。

有一次，有一位妇女拖儿带女从香港返到了广州。因为不知道罢工委员会在哪里办公，一家人又不识路，正在马路上徘徊。林伟民外出办事，正好看到了，立即亲自带她到接待罢工工人的办公地方，帮她办理了手续，妥善地安排好她的食宿问题。当时，那位妇女并不知道他就是鼎鼎有名的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后来向办事人员打探到林伟民的姓名，真是感激不已<sup>①</sup>。

繁忙的工作，紧张的战斗，使林伟民腿部患的骨结核病恶性发作，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中旬被送到医院治疗。由于病情严重，医生给他动了一次手术。早于一九二四年到苏联开会时，他已发觉自己腿部异痛，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他一直顽强地坚持工作，不以为意。他入院后，虽然不能下床活动，但仍念念不忘地关注着省港罢工斗争的进行，向前来探病的同志们详细了解当前斗争进行情况，并且尽力为罢工斗争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不幸遇刺牺牲。林伟民一向敬佩廖仲恺在贯彻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时所抱的坚定

---

<sup>①</sup>据林俊华的回忆资料（1981年7月）。



立场。当年林伟民领导盐船工人罢工及这次组织省港大罢工过程中，与廖仲恺之间有过交往，建立了友情。因此，噩耗传来，他“悲愤难已”<sup>①</sup>，忍受着身上的痛苦，著文表示悼念。他称赞廖仲恺坚定不移的革命精神，说他是“吾国革命之领袖，吾工农阶级之良友”，他的不幸逝世，正象无数革命先烈一样，用“鲜红血色洗尽黑暗之地，嶙嶙白骨填满崎岖之区；使黑暗者为光明，崎岖者为坦途。”他号召人们一定要“继承先生之志，团结民众，以打倒帝国主义，使我全民族得到解放。”<sup>②</sup>

省港罢工期间，为了加强团结与统一，严密工人阶级的队伍，在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等领导下，进行了一次工会统一运动。林伟民虽身卧医院，但仍十分支持和关心这一工作，经常向有关同志了解及研究工会统一运动的进行情况，详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据《工人之路》报道：“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林伟民等”，“以海员工会缺乏严密有系统之组织，故决意在罢工期间，将组织大力改良，使海员为真正有力反对帝国主义、保护工人阶级利益之工会。”<sup>③</sup>他还结合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实际的经验与教训》的文章，指出当年香港海员罢工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后来英帝国主义者与外国资本家拒不履行协议，使“条约成为废纸”，其原因之一，便是因为“我等工会组织之不坚固也”。他恳切希望香港各工会组织能以“海员罢工胜而复败之往事为鉴”，“一致

---

①②林伟民：《痛悼廖仲恺先生》，载《工人之路》第69期，1925年9月1日。

③《工人之路》第172期，1925年12月15日。

促成香港工会统一之进行”，“不存丝毫自私之心，务期目的竟达。”<sup>①</sup>

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旬，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于广州召开。林伟民因病不能出席大会，但代表们仍一致选举他为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后，海员工会机关刊物《中国海员》为此次大会出版了专刊。林伟民还抱病为刊物撰文，赞扬这次会议使“我们海员工人向帝国主义资本家进攻的炮台从新修筑，准备向着帝国主义资本家进攻。”并号召海员仍要“切实依据大会的决议案去执行，尤望各位工友努力去拥护。”<sup>②</sup>

同年五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代表们选举他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委会的执行委员。三次“劳大”进行期间，大会特别派出代表前往医院慰问林伟民，还一致决定“大会代表每人捐助林（伟民）同志医药费半毫。”<sup>③</sup>充分表达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于自己的领袖的关怀和爱戴。

一九二六年夏天，林伟民的病情恶化，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当一九二七年春节前后病情稍有好转时，他为了减轻组织的经济负担，坚持离开医院回家养病。但因他家里医疗条件所限，护理又不好，不久，病情又趋恶化，再次被送到医院进行第三次手术。

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之际。林伟民入院留医时，把名字改为林齐脚。同志们都十分担心他的安全，为他的

---

①载《工人之路》第161期，1925年12月4日。

②《〈中国海员〉第四期出版弁言》，载《中国海员》第4期，1926年3月1日出版。

③《工人之路》第311期，1926年5月5日。

处境着急。但是林伟民十分镇静地说：“要是敌人下毒手，我也不怕。我要跟他们拚一场！”<sup>①</sup>这时党组织已无法从经济上接济他，许多盐船工人便自动捐款维持他的药费及生活费用。可见林伟民平日深深扎根于工人群众之中，工人们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在危难之中同舟共济。

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林伟民因医治无效，逝世于医院，时年四十岁。广州盐船工人不顾白色恐怖，冒着危险，集资收葬了他的遗体。全国解放以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骨移葬于广州银河革命公墓。

---

<sup>①</sup>据林俊华回忆资料（1981年7月）。

# 李 鸣 珂

王 斌 周秀芳

## (一)

嘉陵江水，蜿蜒曲折，穿南部县城向东南方向流去。在江左岸安坝乡龙王沱嘴的小山包上，有一幢草房，破旧不堪，李鸣珂于一八九九年就出生在那里。他家世代清贫，父亲李阳初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母亲李赵氏是邻近赵家教书先生的女儿，能勤俭持家。

李鸣珂先上私塾，一九一一年转入白登观村小学。四川保路风潮和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激励着他幼小的心灵。他非常爱听老师和长者讲述有关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故事，为国为民的思想开始在他脑子里萌发。老师赞扬说：“鸣珂年纪虽小，犹有救国之志。”不久，李鸣珂的父亲离开了人世。母亲劳碌奔波，省吃俭用，供鸣珂在收半费的南部乙种农业学校继续上学。他读书非常自觉，刻苦努力。当时县上实行“月考”制度，成绩优异者给以奖学金，李鸣珂常常是奖学金的获得者。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强奸民意，爬上皇帝宝座。消息传出，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首先是云南护国军宣布起义，四川

及其他各省也相继响应。消息传到南部，激起了青年学生们的无比义愤，李鸣珂与同学李载溥、李孔章、马安华等一道，四处宣传反袁反日的道理，抵制仇货，在偏僻的县镇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浪潮。

一九一九年，李鸣珂从南部到成都，考入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北京五四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成都后，李鸣珂跟同学们一道上街宣传，焚毁日货，站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列。他很快结识了吴玉章，得到吴玉章等的器重。从此，他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成都组织南部县旅省各界人士，揭发该县的贪官污吏，与之斗争。

一九二二年，李鸣珂在四川省高等蚕业学校毕业，经学校和袁诗尧推荐，回南部县任实业所长。他在县城创办农业训练班，招收知识青年一百七十多人入学，学技术，学政治，毕业后分回各乡办桑园、苗圃和林场，有的还开办缫丝厂，工作成绩显著，颇受乡亲们的欢迎。

于此同时，李鸣珂还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和新文化，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演文明戏（话剧）的办法，传播新思想。又与进步青年李载溥、赵文浩、马安华等组织青年义勇团，发动和组织群众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sup>①</sup>。

县知事毛光祖和当地土豪劣绅都忌恨李鸣珂。李鸣珂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但仍然坚持斗争。他团结进步青年和人民群众，一方面向驻顺庆（南充）的川军师长何光烈控告毛光祖贪赃枉法；另一方面通过成渝两地有关人士，登报和散发传单，揭露毛光祖草菅人命、鱼肉乡里的罪行。何光烈迫不得已，撤

---

<sup>①</sup> <革命先烈李鸣珂小传>，见 <南部县志>，1959年编印。

去毛光祖县知事职务，改派林伏崇继任。

毛光祖丢了官，土豪劣绅余锦江、颜万鉴等更加仇视李鸣珂。他们诬蔑李鸣珂宣传共产，赤化民众，捣毁庙宇，不孝不忠，分别向省署、道尹、防区等处控告。林伏崇虽倾向进步，但难为申辩，执拗不过顶头上司，只好将李鸣珂撤职。

当李鸣珂被撤职，要离开南部县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成了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各界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对官府此举均极为不满，咒骂他们践踏民意，迫害善良，为李鸣珂鸣不平。

李鸣珂离开南部到了顺庆，在张澜主办的职业中学教书。他经过一番思索，决心去当兵，以打倒列强，铲除军阀。

## (二)

去文从武，这是李鸣珂一生的一个转折。一九二四年，他到川军何光烈师二十团任一等书记（文书）。当时，刘伯承在川军中当团长，经同乡贾良俊介绍，李鸣珂与刘认识，后在斗争中结为战友。一九二五年，李鸣珂经陈任民介绍去广东熊克武的建国联军干部学校受训，后来又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①。

黄埔军校情况复杂，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异常激烈。李鸣珂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由于他的年纪比一般同学稍大，个性秉直，为人忠厚，群众关系好，加上他当过兵、会讲话，懂文又懂武，同学们称他为“老军务”，夸耀他既有诸葛亮舌战群

---

①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同学录>（1926年8月），藏重庆市档案馆。

儒的口才，又有武松打虎的本领。一次，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广州市区参加群众游行，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杨引之、潘佑强等先有预谋，率领一批顽固分子进行捣乱。这伙人先是信口雌黄，挑起争论；争论输了理，便大打出手。李鸣珂带领同学们奋起还击，将那帮顽固分子打得抱头鼠窜，杨引之等人被打伤，住了医院，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左派学生获得了全胜。

蒋介石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同年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在黄埔军校内，强迫凡是具有双重党籍的党员，交出共产党的党证，保留国民党的党证。对此，李鸣珂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分头给同学们做工作。结果，国民党右派未能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

### (三)

一九二六年秋，李鸣珂由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以叶挺为师长的第二十四师工作。二十四师是我们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党中央为了培养党的军事骨干，在该师下面成立了一个教导大队。李鸣珂等到二十四师后，受命赴湖南长沙、湘阴、浏阳等地，为教导大队招募了一千多名进步青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党团员，具有较高的热情和一定的政治觉悟。教导大队为团的建制，大队长是孙树成，副大队长为申朝宗，下设四个中队，李鸣珂为第一中队的中队长，队员中有粟裕、谭家述等<sup>①</sup>。

---

<sup>①</sup>粟裕：《南昌起义前后》，载《星火燎原》第2集。

教导大队继承叶挺独立团的优良传统，在叶挺师长的领导下，无论在军事训练或政治教育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李鸣珂以身作则，处处带头，事事认真。他严格要求学员，更严格要求自己，生活十分简朴，常常把节约下来的津贴交给伙食团，改善大家的生活。学员中有谁生了病，他都一一过问，亲自将病号送到医务所，甚至背着重病号去看病，感动得战友们热泪盈眶。李鸣珂的行动，给士兵们带来了党的温暖，全队学员视他为亲兄长、贴心人。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先后失败和广州国民政府迁都之际，新军阀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更加暴露。李鸣珂等在党的领导下，于武汉地区组织起来，进行讨蒋活动。在武昌阅马厂召开的一次讨蒋大会上，他历数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并宣读了讨蒋宣言。李鸣珂还十分警惕地注视着右派分子的活动，一旦发现，便及时痛击。例如，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杨引之、戴弁等，北伐期间被蒋介石派到四川拉拢军阀刘湘等，分裂革命，制造了一九二七年重庆的“三·三一”惨案。李鸣珂在武汉闻此消息，十分悲痛，立即和吴玉章、王维舟等一起，没收了四川军阀杨森驻汉办事处机关的全部房屋，成立起“三·三一”惨案救济会，声讨蒋介石，声讨四川军阀。

一九二七年五月，夏斗寅叛变革命，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已经打到了距武汉城四十公里左右的纸坊、土地堂一带。当时留在武汉的只有二十四师的七十二团、教导大队，二十五师的七十五团，以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武汉农讲所的学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决定由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领上述部队前往讨伐。李鸣珂所在的教导队，负责扼守洪山，保卫武汉南



大门。出战前，他召集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号召大家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由于指战员英勇作战，很快把夏斗寅部打得一败涂地，保卫了武汉，巩固了武汉国民政府。

在武汉期间，李鸣珂为了发展革命力量，还函邀原在家乡与他一起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青年李载溥、李宗昭、阳永盛等，到武汉参加革命队伍。经请示领导和吴玉章等的介绍，李载溥任教导大队第一中队书记（文书）、李宗昭任军需员、阳永盛任湖北省总工会纠察大队中队长<sup>①</sup>。李鸣珂经常和他们在—起研究政治形势，讨论国家前途，决心—起奋斗。

#### （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中央决定把我党掌握的部队集中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大队于七月中旬受命离开武汉向南昌开拔。出发前，周恩来亲临部队讲话。那天正下大雨，李鸣珂担任值日官，他看到周老师（黄埔军校学生对周恩来的尊称）站在过膝的水中，十分心痛，连忙说：“您讲重大问题就行了，具体事情我来布置。”周恩来说了声“好”，然后对着全体指战员严肃地说道：同志们，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为国为民的。经过—年的斗争，我们打垮了旧军阀，可又出了新军阀蒋介石，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现在，我们需要转移阵地，离开武汉去江西，讨伐新军阀，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勇敢坚强，胜利地完成战斗任务<sup>②</sup>。

<sup>①</sup> 《李鸣珂烈士》，存中共南部县委统战部。

<sup>②</sup> 访问刘人奎谈话记录，1979年于武汉。

部队乘船东下，经大冶、黄石、九江，于七月下旬抵达南昌。一路上，李鸣珂领导的第一中队，还担负着警卫周恩来、叶挺等负责同志的光荣任务。

教导大队到达南昌后，住在朱德所在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左侧的一所小学里，军事和政治训练比在武昌更为紧张。李鸣珂废寝忘食，终日辛劳，除搞好所属部队的军政训练外，还要警卫前敌指挥部负责同志的安全，经常向周恩来、吴玉章、恽代英、刘伯承等请示工作。

“八一”起义前夕的南昌，情况复杂，斗争异常激烈。一天，李鸣珂一个在黄埔时的同学突然来访，自称他是第二十四师参谋长的亲戚，刚调来师部作参谋，但言谈之间，渐渐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原形。李鸣珂强压怒火，一边听着他的满口胡道，一边秘密的向上级报告，经领导决定，立即将这个家伙镇压，为起义扫除了一个障碍。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教导大队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李鸣珂和大家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按命令要求认真做着准备。八月一日凌晨，指挥枪打响了，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李鸣珂带领战士迅速完成了策应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起义，接着又率队冲入敌阵，支援其他中队。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驻在贡院后面，遭到我军进攻后，先向北面湖边败退，由于我军阻击，又折回向我教导大队扑来。敌人困兽犹斗，来势凶猛，十多个学兵有些抵挡不住，中队长陈守礼又身负重伤，情况十分危急。正在这时，李鸣珂率领队伍从左侧冲杀过来，将敌人打垮了①。

---

① <八一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

起义胜利后，由周恩来主持，对部队进行整编。李鸣珂调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即手枪队队长）<sup>①</sup>。警卫营除担负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相当于军事委员会）的保卫工作外，还负责保卫文书档案、押送起义时所缴获的武器和现金，协助李立三领导的政治保卫处惩治反革命分子。李鸣珂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

### （五）

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保卫前委和革命委员会领导人的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李鸣珂率领的警卫战士，走在领导机关的前面，勇敢杀敌，扫清道路，并主动和兄弟部队配合阻击敌人。刚过宜黄，主力部队在前面广昌与敌人钱大钧部接火，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突然有一小股敌人迎面来犯。李鸣珂把领导同志、伤病员和民伏安排到隐蔽的地方，然后带领部队冲上山包，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终于击退了敌人。

在瑞金休整时，警卫营总结了前段行军的经验教训。他们还根据上级指示，将监护运送的文件进行清理，重要的交地方党收藏保管，次要的就地销毁，只留下极少数非常必须用的文件随军携带；警卫营保管的现金（银元），上级也决定分发给各战斗部队，作为途中开支。这样一来，他们的工作量就大大减轻了。加之离开瑞金以后，前委恽代英常深入各部队讲述当前的形势，进行政治动员；吴玉章常与李立三领导的政治保卫处

---

<sup>①</sup>中共中央组织部藏李鸣珂烈士档案，参看刘伯承于1965年2月20日给程子健的信，原件存四川省档案馆。

一道行军，因而警卫首长的任务，也不象先前那样繁重。李鸣珂主动找担子挑。他带领警卫战士在搞好警卫工作的同时，沿途积极参加宣传活动；那里战斗吃紧，就分出一支部队支援。他那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饱满的激情，深受战士们的赞扬。部队进入福建河田，上级命令李鸣珂担任临时城防司令，负责警戒巡逻。李鸣珂观察地形，布置城内外岗哨，亲自带人巡回检查，通宵没有合眼。第二天拂晓，远处传来敌人的枪声。部队集合出发，照原定计划向上杭转移，李鸣珂奉命率警卫营和二十四师一部负责断后。他们埋伏在两山之山腰，等待敌人的追兵。当敌人气喘吁吁地赶到山下时，李鸣珂等指挥部队左右出击，很快打退了敌人，掩护了主力顺利前进。为此，上级曾口头嘉奖李鸣珂等。

行军途中，李鸣珂还尽量作争取敌军的工作。在去上杭的路上，部队经过一个小镇子，镇子上驻有国民党地方军的一个团。李鸣珂带着副官李宇等徒手先入镇子交涉，说明我军路过此地，暂借一宿，希望双方互不侵犯。他的诚意得到了对方的赞同，从而避免了双方的消耗和伤亡。

在向广东大埔行军途中，一天，部队突然遇到敌人伏兵的袭击。李鸣珂马上组织反击，保卫领导机关。背运文件和银元的军需员李宗昭，为了抢快脱险，从一个崖坎上跳了下去，结果把装文件的箱子丢失了。李鸣珂闻讯后马上向秘书长吴玉章作了汇报。吴玉章指示要立即派人把文件箱子找回来，因为里边还装有不少中央发来的机密文件。李鸣珂领了一个机枪排、一个手枪连和一个步兵连，摸黑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了文件箱。在归途中被敌人发现，连续开枪射击。李鸣珂为了不让中央文件落入敌手，决定不与敌人纠缠，率领部队快速冲出险

区，安全地回到了驻地。同志们见了十分欢喜，领导上对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进行了表扬。

一九二七年九月，起义部队到达三河坝。由于部队冒酷暑长途跋涉，不少人生病掉队，加上连续作战伤亡较大，有的人害怕艰苦又开了小差，因而，兵员大为减少。就在此时，敌黄绍竑部乘机向我第二十五师发动进攻，情况非常危急。一天深夜，朱德来到警卫营驻地，对李鸣珂下达命令说：“敌人一个团的兵力从梅县方向扑来。离这里约三十里的蜈蚣岭是个要冲，决定派你队前往死守，不得命令，不准撤离。”李鸣珂迅速集合部队，跑步到达指定地点，加紧修筑工事。骄横愚昧的敌人，根本未想到这里设有伏兵，大摇大摆地向山梁上爬来。当接近我阵地时，李鸣珂一声喊“打”，全队指战员排枪齐放，手榴弹遍地开花。敌人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毫无准备，慌忙退缩。战后，李鸣珂一边命令在原阵地上继续加修工事，一边派出侦察员访问当地群众，看是否另有通道上山，结果查明确实还有一条平时很少行人的小路通往山上。他立即决定抽一个班带机枪去小路扼守。次日拂晓，敌人果然沿大、小两条道路向山上进攻。由于我军早有准备，沉着应战，又一次打退了敌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

起义部队到达潮州、汕头时，警卫营还被派去镇守汕头炮台，阻击敌人从海上登陆偷袭，前后坚持了一个星期。后因整个部队失利而转移，李鸣珂也取道香港返回上海。

## （六）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到达上海后，具体领导中央军委

和中央特科。陈赓、李强和李鸣珂等在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领导下，各负一个方面的工作。当时党中央实行机关社会化和家庭化，即党的各个部门以社会团体、商店、企业、医院等灰色面目出现，或以建立一个家庭为掩护。李鸣珂以三洋经济川裕公司负责人身份开展活动，同黄云桥装扮成假夫妻，住上海南成都路，同住的还有原第二十军党代表廖乾吾、中央机关交通员李觉鸣等。

不久，中央派李鸣珂去广东执行任务。时值广州起义失败，敌人正四处搜捕和屠杀革命者，城内外岗哨林立，密探四布，形势十分紧张。李鸣珂同交通员刚进入市区，就被敌人的便衣特务盯上了。李鸣珂见势不妙，很快地走进一家大百货店，又由百货店的另一道门走出，但仍未甩脱尾巴。他穿过一条街，迅速地闪进一家旅馆。跟踪的特务以为这一下可以手到擒拿，便严密地把守住旅馆的大门。然而，机警的李鸣珂却从旅馆后面的一个小门飞步走出了。

李鸣珂赴广州执行任务返回上海，时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未及歇缓，中央又派他到湖南给朱德送信。这封信根据南昌起义和各地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指示朱德及其所部要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充分发动工农群众，相信群众力量，建立工农群众武装；注意革命军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不要以武力包办一切，要“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不要盲目暴动，而要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乡村进军；要迅速脱离范石生部，以“避免消灭的危险”。信中还写道：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认真解决部队给养，注意应急措施等。全信共十二条，其中心是指明了工农暴动的方向，提出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原则，是一份极其重要和珍贵的文件。

中央派李鸣珂送信给朱德，决不是把他当作一般的交通员，而是作为中央的特派员，这可从信中的几段文字看出：

“自从三河坝与潮州的交通被切断后，党的指导机关即与二十五师全体同志失去了联系。潮州失守后，粤省委曾两次派人追赶你们，及你们退出武平转入江西信丰时，江西省又派人接洽，最后知道你们已越大庾岭而入湖南，中央乃又命湖南省委派人与你们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劳，始终未得赶着你们。现在你们的踪迹，从报上的记载和辗转传来的消息，似乎是驻在桂东和桂阳一带，惟仍未能证实，并且据江西省委报告，你们入湖南时，曾与范石生有一度之联系，此事如果属实，在广东暴动失败后，能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很是疑问，因此中央特派李鸣珂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接头。除了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形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珂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外，中央还有以下的话要说……。”“鸣珂同志的任务完毕，即须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鸣珂在那边工作，他可以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一切一切都由鸣珂同志面达，此次就不详写了。最后中央对你们这一师死难的同志，特致最诚恳的哀忱和永不能忘记的心意，同时并祝你们后死的同志努力！”<sup>①</sup>

李鸣珂对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表示坚决完成。他带着党的期望同交通员李觉鸣立刻离开上海，踏上去湖南的征途。他们装扮成做小生意的两兄弟，沿途买些浏阳的夏布、长沙的雨

---

<sup>①</sup> 《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

伞和湘南的木屐随身贩卖，以此作为掩护。到长沙后，他们向湖南省委汇报了中央的意图。湖南省委介绍他们到湘潭县委去。可是，这时湘赣粤几省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围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南游击区，严密封锁各地，四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李鸣珂和李觉鸣几经转折，均未能在湘南找到朱德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只好返回上海，仍留中央军委工作。

### (七)

为了加强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力量，一九二八年夏，经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周恩来提议，中央决定派李鸣珂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负责全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此前不久，即一九二八年三月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傅烈等在重庆兴隆巷八号召开巴县县委成立会时，不幸被捕牺牲。李鸣珂入川后，不畏艰险，立即开展工作，为完成先烈们未竟事业而英勇斗争。

在重庆，李鸣珂化名李春华、钟鸣等，时而装扮成医生，穿着褪色的蓝布长衫，出没于大街小巷，宣传组织群众，指导工作；时而又变成商人，到涪陵、江津、泸州、自贡、南充和成都等地检查工作，组织武装起义。为了掩护党的工作，他将爱人李和鸣、妹妹李蜀俊、堂弟李孔章<sup>①</sup>等从家乡南部接到重庆，在顺城街租佃一间房屋住家。这个“家”门上贴着“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从外表看完全象个商号；实际上，它是党的交通联络站。联络站由李和鸣负责，人

---

<sup>①</sup>李和鸣、李蜀俊和李孔章都是共产党员。



们尊称她为三嫂。她热情接待外地来的革命同志，安排食宿，煮饭、洗衣，十分耐心；她保管党的文件，井井有条，往来传递消息，非常认真细致，深受同志们的爱戴。李鸣珂的妹妹李蜀俊由党派到南岸区做工人和妇女工作，公开职业为小学教师。李鸣珂的哥哥李祥如，为人忠厚老实，勤劳纯朴，安排在重庆十八梯浩池街开一家酱园铺，以掩护设在三楼上的省委机关。李鸣珂的一家，结成了一个革命集体，分别战斗在各个岗位上，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勤奋地工作着。

李鸣珂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敌友我三方面的力量对比，决定在军事方面进行三大项工作：第一，开展军事运动。省军委派出共产党员到川军各部，把川军各部队中原有的党员组织起来，争取在一些师或旅部中建立起特别支部。大革命失败后，党从上海、武汉、北京等地陆续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四川工作，其中不少去到川军各部，如共产党员胡成杰任郭汝栋部政治部主任，秦哨川任邓锡侯部第七混成旅政治部主任，刘文仕、秦仲文任第二十八军第五混成旅团长等等；第二，发动士兵群众，开展兵运，建立江（北）巴（县）士兵运动委员会，争取士兵倒戈；同时，在省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伪军和警察工作小组，派共产党员打入伪军和警察局内部，搜集情报，同伪军官、警官中的中下层交朋友，争取他们的同情，为我们送情报，透露消息，暗中对革命者进行一些保护；第三，建立保卫小组，保卫党的组织，镇压叛徒和特务。三项任务，都建立在发动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

李鸣珂仔细地研究了四川各军阀的特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决定在兵运工作中紧紧抓住三个环节，即兵运、民（团）运和匪运，主动向敌人展开进攻。他认为：一，四川军阀多，

统治残酷，各有靠山，矛盾重重，可以利用；二，各地民团系地主武装，是军阀统治的基础，是地头蛇，残暴凶狠，压迫老百姓最直接；三，当时的四川，土匪多，占山为王，常给老百姓带来痛苦。所以，人民群众称军阀、民团（或团阀）和土匪为三大祸害，并编了一首民谣：“兵如梳，匪如篦，团防好似剃头刀子剃。”由于这三大祸害横征暴敛，百般搜刮，把天府之国的四川弄得民不聊生，劳苦大众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日子。如果做好这三项工作，就可以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将矛头指向新军阀蒋介石和他在四川的走卒刘湘之流，就可以减轻人民的疾苦，扩大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便于发动群众。李鸣珂对各地搞军运的同志讲：“我们的军运，包括了兵运、匪运和团运三种工作对象，只要瓦解了人民头上这三把刀子，我们的工作就事半功倍了。”李鸣珂虽为省委军委领导，但毫无半点架子。他事事身体力行，亲自深入虎穴，在争取重庆城防司令郭勋祺、师长潘文华，合川驻军师长陈书农，广汉驻军旅长陈静珊，邻（水）、岳（池）、广（安）驻军旅长任玮章、陈杰才等工作中，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李鸣珂不但重视武（掌握枪杆子），也很重视文（抓宣传舆论）。他动员川军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派驻重庆的师长张清平<sup>①</sup>出经费办一报纸，名《新社会日报》，由我党掌握，社长为罗承烈，编辑有项鼎<sup>②</sup>、刘仁伯等。省委书记刘愿庵和李鸣珂等都十分重视这家报纸，亲自为报纸写社论和文章，帮助审稿，常彻夜不眠。这家报纸以新颖的文风和生动活泼的文

<sup>①</sup>张清平当时是共产党员。

<sup>②</sup>项鼎为共产党员，后任川东特委书记。

字，宣传反帝反封建等革命道理和我们党的各种主张；狠狠抨击国家主义派，群众爱看，效果良好，发行量由每天二千份增加到五千份，仍然供不应求。军阀刘湘很讨厌这家报纸，但因这是以张师长的名义办的，社长罗承烈是刘文辉派出同友军谈判的代表，而刘湘与刘文辉又是叔侄关系，所以不好宣布查封。我们党就利用这种复杂关系，将报纸办了一个时期。

除了办报，中共四川省委和共青团四川省委机关还办了一些刊物，用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党团员，指导四川党和团的工作，如《四川通讯》、《青年通讯》等。李鸣珂领导的省军委，为了开展党的工作，保证省委和各地组织的联系，同省委有关单位配合，在重庆市区开设商店、茶铺、饭馆，作为党的交通站或联络点，如“协合寄宿店”、“南来燕食店”等。

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觉悟和激发青年们的革命热情，动员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开战，李鸣珂、刘愿庵和穆青等还研究决定开设了两个书店，发售进步书报杂志，聚集革命力量，一为“九七书店”、一为“掘新书店”。书店曾以“招股”的办法筹积资金，以避免反动当局怀疑为我党所办。

李鸣珂、刘愿庵和穆青等就这样日夜战斗在敌人残酷统治的山城。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艰苦努力，工作进展很快，短短半年时间，党的组织就有了较大的发展。四川的统治者对此大为惊恐，一九二八年十月的《国民公报》，曾以《四川共党如此多耶》为题，专门作了报道，原文照录如下：

渝讯：此次卫戍部破获共案牵涉甚大，四川共党查有四千余名，女党员约八、九百人，其最高领袖，

现尚在省外某最高机关担任要职，闻刘湘拟将前后一切情形，向国府呈报，请示办法云。

可见，李鸣珂等的工作，是何等的有成效啊！

## (八)

重庆有个戴弁，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派到四川勾结反动军阀的特使，时任刘湘的二十一军政训部主任。这家伙是制造“三·三一”惨案和一系列白色恐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李鸣珂与省军委其他同志一致认为，如不迅速除掉这个残暴的豺狼，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于是作出了处死戴弁的决定。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听了李鸣珂的汇报后，同意了省军委的决定。

一九二八年九月下旬的一个下雨天，李鸣珂带上李觉鸣和一位姓陈的同志，在戴弁平日由较场口附近公寓乘轿往大梁子二十一军军部办公的路上，枪毙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坏蛋。

戴弁被我枪决，惊动了全川军阀，有力地打击了刘湘的反动气焰。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也大为震动。他和国民党政训部长戴季陶，一面致专电表示哀悼，一面要军阀刘湘严缉所谓“正凶”。此后，四川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武装进行疯狂的报复，先后破坏我党、团省委机关，并捕去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多人。

面对白色恐怖，李鸣珂和穆青等在积极设法营救战友的同时，领导全川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

## (九)

一九二九年春，四川省委于成都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sup>①</sup>，首先由刘愿庵报告在苏联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会议的情况和传达“六大”的主要精神，接着讨论“六大”决议和四川的工运、农运、军运以及发展组织等问题，作出四川党的决议案。在决议中指出：由于四川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农村经济破产，城市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极苦，纷纷要求解放，革命高潮有首先到来的可能，要求各级党组织加紧争取工农兵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会议选举刘愿庵、穆青、刘云简、李鸣珂、熊子良、刘远翔、曾海云、周敦婉、陈嘉钰等为省委委员，前五人为省委常委。

李鸣珂领导的四川省军委，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省党代表会议决议，在省委的领导下，分头去南充、涪陵、达县、泸州和川西北等地布置和检查工作，发动工农群众，搞兵变，组织工农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深入土地革命，成立苏维埃政府。从一九二九年初开始至一九三〇年春，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双江镇兵变、旷继勋部兵变和涪陵武装起义等等。

李鸣珂亲自指导了川军边防军第五混成旅瞿联承部的兵变。一九二七年初，刘伯承、朱德等发动领导顺泸起义时，瞿联承是驻南充川军第五师何光烈部的一个团长。这个团后来改编为边防军第五混成旅，瞿联承升任旅长。在这个旅中，我们党

---

<sup>①</sup>一说是省委扩大会议。

的工作比较活跃，旅部秘书赵子文、十团团长江文仕和十一团团长江仲文等，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秋，瞿联承逐渐发现了我党在该旅进行革命活动，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向其主子边防军司令李家钰密报，说“共产党要在第五混成旅搞暴动。”李家钰一听，立即命令对江文仕、江仲文两个团进行改编。消息传出，赵子文等马上进行研究，决定一方面派人向省委汇报，一方面积极准备进行武装起义。李鸣珂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到瞿旅。这时，江、江两团已把瞿联承赶跑了，但不知下一步如何办？李鸣珂马上召开各级党员干部会，讨论部队的出路。会议根据李鸣珂等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独立第一旅，由江文仕、江仲文负责；旅委改为前敌委员会，由赵子文任书记；部队开往下川东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由于这支部队只有几十个党员，党的力量不强，思想不统一，担任团长职务的两个党员政治觉悟不高，部队行动缓慢，步调不一。李鸣珂等虽作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效果均不很大。加之，部队无粮饷，生活发生困难，行至壁山，又遇刘湘重兵的阻击，伤亡重大。不久，早已下台的川军五师师长何光烈利用旧关系控制了这支部队。而刘湘又以委官发饷为诱饵，收买了何光烈，并将该部调至重庆浮图关整训。刘湘、何光烈仍恐江文仕难于驾驭，便在浮图关驻地将其暗杀了。李鸣珂等为了继续作好这支部队的工作，再次派出思想好、能力强的干部李春畅等去加强该部党的领导；同时，将一些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调至其他部队或地方工作。后来，这支部队开往邻水，何光烈实行“清共”，将官兵中有革命嫌疑的一律枪毙，我党的忠诚战士李春畅遇害牺牲。但我们也何光烈这个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镇压了。至此，这支部队完全解体。

一九二九年底，李鸣珂又亲自去涪陵抓军运和农运。涪陵驻军为郭汝栋部，郭原是军阀杨森手下的一个师长，后杨森被军阀刘湘等赶出四川，郭曾一度任军长。此人善于投机，大革命时期，他眼看北伐将有成功的可能，想为个人增添革命色彩，为自己培植实力，就派了一些青年去广州黄埔军校和武汉分校受训，并接纳了一些黄埔生到他的部队工作。我们党利用这个机会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到郭汝栋部，先后有尹绍洲、胡成杰、徐孔嘉、任狄犹、赵启明等，胡成杰还担任了军政治部主任职务。李鸣珂原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在黄埔军校中有较高的威信，回到四川后，大家都尊重他。李鸣珂利用这种关系到涪陵，首先与胡成杰商量起义事宜。

一九三〇年初，蒋冯阎大战正酣，后方空虚，蒋介石命郭汝栋部出川至湖北镇守。李鸣珂等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在涪陵发动郭部第一师第一团兵变。李鸣珂头缠布帕，身着蓝布对襟短衣，完全象一个老实忠厚的农民，整天奔走在涪陵县城内外，调查起义出走的路线，布置起义计划，组织农民武装接应等等。二月的一个晚上，起义开始，但该部地下党组织中出了叛徒，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因而只有第一团三营八连连长、共产党员赵启明率领不到一连的兵力起义成功，进入罗云坝与当地农民武装结合。三月初，在涪陵县的齐团镇召开军民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二路正式成立，赵启明为司令，梁歌为党代表。不久，部队进入忠县、丰都和石柱几县的边境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的围攻。李鸣珂在涪陵领导兵变和建立二路红军后，返回重庆投入新的战斗。

李鸣珂奔走四川各地，不仅抓军运，而且也重视工运、农运和学运，并以工运、农运和学运作为军运的基础。同时，他

还很注意地方党组织的建设。一九二九年秋，他同老战友李载溥等一道回到家乡——南部，进行社会调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李鸣珂深深感到，离开家乡整整四年，今日的南部与一九二五年的南部大不一样了，虽然山河依旧，但人民群众的觉悟已大为提高，不但打倒列强和铲除军阀的口号已成为群众的行动，而且共产主义理论也开始传播。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中，已有不少人经过了革命洗礼，意志坚强起来，并且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南部县是四川一个小军阀李伟如的防区，因李部所占地盘小，而部队开支大，加之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盘剥，每年所征粮款和苛捐杂税都非常重，广大人民生活极苦，因而要求推翻军阀封建势力的革命热情很高；同时，李伟如对南部县的统治又不如刘湘统治重庆那样严密，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发展革命力量。鉴于上述情况，李鸣珂等确定了“发展农村党组织，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的指导方针。他动员同乡尹绍伊从成都回到南部，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筹办国民党南部县指导委员会，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他还把在外地加入党组织回到南部的马安华、李仕修等组织起来，成立了南部县第一个党支部。李鸣珂同南充中心县委派来的项志平一道，抓住国民党反动派捣毁左派国民党南部县指导委员会一事为导火线，有领导有组织地向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军阀势力发起了一场猛攻。他们在黄金、三合、元坝、永定、流马、寒坡等乡镇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抗税抗捐。

这些革命活动，惊动了当地的地主豪绅和封建余孽，他们纷纷要求军阀李伟如派兵镇压。为了回击反动派，我党动员各界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斗争。由共产党员李仕修、赵文浩等



率领永定区的数百名农协会会员，开往县城示威，队伍沿途不断扩大，增至数千，进入南部县城，冲入县衙门，高呼：“强烈要求县府惩办捣毁县指导委员会的凶手熊仕卿、孙铸成！”

“发还农民修建潼（南）保（宁）公路的血汗钱！”县知事和马路局长吓得魂飞云霄，惶惶从后门逃走。群众气愤之余，砸烂挂在墙上的“明镜高悬”匾，捣毁了公堂。接着，以县团练局长为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张友明，召集市民大会，揭露熊仕卿等人的罪行，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声援农民的正义行动<sup>①</sup>。会后，将捣毁县指导委员会的凶手熊仕卿、孙铸成游街示众，人民群众皆大欢喜。在觉悟了的人民面前，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社会舆论压力下，军阀李伟如无可奈何，不得不把熊、孙二人监禁起来。

李鸣珂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积蓄革命力量，曾建议在县城办一所小学，作为党开展工作的联络点、交通站。不久，“群乐小学”诞生了。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革命斗争的深入，群众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有的被发展为党员，有的被吸收为团员。此后，南部县的党组织领导南部人民向敌人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如一九三二年发生的“异保暴动”，声势之大，为全川之冠，这与李鸣珂等在那里艰苦奋斗，创立南部县第一个党的支部是分不开的。

## （十）

随着四川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工农运动的不断兴

---

<sup>①</sup> <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模范——记李鸣珂烈士>，1980年南部县文化馆撰写。

起，以及武装起义的蓬勃发展，军阀刘湘一伙胆战心惊，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四处网罗大小军阀联合“剿共”。刘湘还在谋士们的精心策划下，采取各种卑劣手法，收买叛徒，以破坏革命。

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刘愿庵、李鸣珂、穆青等即时研究决定，在党员中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要求大家坚定革命立场，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克服暂时困难，去迎接新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阴谋。同时，由李鸣珂负责，加强锄奸保卫小组，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李鸣珂领导的省军委派出一些坚强的共产党员打入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及其所领导的特务委员会中，了解敌人动向，摄取情报，便于对付敌人的破坏，进而主动地消灭敌人，处死叛徒。

由于军阀刘湘采取种种毒辣手段，从各个渠道破坏我们党的各级组织，我们党虽经多方防御抵制，但仍有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先后叛党投敌。在这方面，叛徒易觉先起了带头羊的作用。易觉先是四川长寿县人，曾任我党忠县县委组织部长、省委士兵运动委员会委员兼江巴联防总会秘书长<sup>①</sup>。他投入了刘湘的怀抱之后，经常带着特务在重庆城内外捕捉革命者，甚至去万县、成都等地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真是十恶不赦！省军委经过研究，决定采取果断措施，除掉这个害人虫。

与此同时，敌人也准备对李鸣珂下毒手。一九三〇年春天的一个夜里，在敌二十一军副官处当勤务兵的我地下工作者，找到李鸣珂报告情况，他说：“各地的军阀都急于要搜捕你，只苦于摸不着头脑，现易觉先叛变，他知道你的行踪，看来在重

---

<sup>①</sup> <一个共党里过来人的遗墨——易觉先上刘湘书>，载《国民公报》1930年6月21日。

庆不能久留了，中央不是已经任命你为红六军军长吗？你快离开这里到湖北上任去吧！”李鸣珂回答说：“易觉先不除，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生命要遭到更大的危害，个人安危算得什么。我一定要根据省军委集体的决定，先将这个叛徒除掉，然后再去新的工作岗位。”此前，国民党的反动报纸，就发表了一则“通缉令”式的“消息”，要各地军警捉拿李鸣珂，“消息”说，共党四川“省党部委员李鸣珂，黄埔生，于前数日来渝，在各地活动甚力，盛传该党以图取重庆之故，近来特别注意兵运匪运妓运三种，并以将其在涪陵所设之军委会移到重庆指挥一切云。”<sup>①</sup>

易觉先的叛变，报纸上的“通缉”，给李鸣珂的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他自己也很清楚，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大义凛然，愿为共产主义事业洒热血，而不吝惜自己。他向同志们讲：“胜利是争取来的，我们要日夜不停地工作，不要怕牺牲。当然不能听任牺牲，要在死亡线上求生，为革命牺牲是值得的。”他还嘱咐爱人李和鸣，要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抚养好孩子，并将各种文件进行处理，以防意外。

一天，叛徒易觉先带了几个匪徒破坏了我江北特支机关，逮捕了特支负责人。匪叛们由江北回转途中，刚爬上朝天门码头，恰巧遇见李鸣珂、邓文书等外出执行任务。冤家相遇，格外眼红。易觉先一下扑到李鸣珂面前，恶狠狠地说：“我已反了党。”话毕，就指使特务捉拿李鸣珂。李鸣珂从容不迫，回答了一句“我早已知道，你这无耻的叛徒。”接着，连发两枪，易觉先应声倒下，结果了性命。李鸣珂机警地又连发数枪，先

---

<sup>①</sup>见1930年1月7日《国民公报》。

后打倒几个匪徒，其余吓得目瞪口呆，不敢上前一步。此时被枪声惊动了的城防司令部和团务局航管处，出动了大批匪兵，并宣布全城戒严，李鸣珂等不幸被捕。

## (十一)

李鸣珂被捕后，最初关在重庆卫戍司令部里。省委书记刘愿庵等积极组织营救，派省农委负责人陈茂华去找卫戍司令郭勋祺的亲戚、地下党员徐春芳，要想尽各种办法将李鸣珂救出来。可是，陈茂华这时已对革命发生动摇，虽口头答应，却迟迟不动。经刘愿庵再三催促陈才前往，结果晚了，李鸣珂已由卫戍司令部转押到刘湘的二十一军军部。李鸣珂在被捕、转押过程中，仍尽力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以及共产主义一定要在中国实现的道理。对此，敌二十一军特委会写给刘湘的报告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述：“此人是有才华的，善于词辩，被逮捕进部，见士兵宣传士兵，见夫役宣传夫役，有机会便利用。共产党人的魔力真可恶！”<sup>①</sup>

李鸣珂被押解到刘湘二十一军军部后，刘湘首先派特务头子、二十一军副官兼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带着刽子手贺蜀筠、宋毓萍等前来审讯。这帮人虽采取种种威胁利诱的卑劣手法，但共产主义战士李鸣珂根本不吃这一套。他把审讯室变成对敌人的审判室，把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讲台，义正词严地同反动派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李根固问：“你是不是叫李鸣珂？”

---

<sup>①</sup> <朝天门事变>，1930年敌21军特委会报告，藏重庆市档案馆。

李鸣珂答：“我就是，你要怎么样！”

“你是共产党的省军委书记吗？”李根固又问。

“一点不假！”李鸣珂毫无惧色，昂首回答。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天上地下，五湖四海。”

“你有那些同党？”

“千千万万，数不清。”

“难道你不怕死吗？”

“怕死的就不是共产党。”

李鸣珂铿锵有力的回答，象一记沉重的耳光，打在李根固的脸上。他凶狠的威胁道：“你打死侦缉队员易觉先要抵命。”

“可惜杀得太少，连你们这般狗东西也该杀！”李鸣珂迎头反击，字字千钧。

理屈词穷的李根固暴跳如雷地吼道：“我要把你千刀万剐！”

李鸣珂淡淡的一笑，说：“留取丹心照汗青，虽死犹生。”

“审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李根固一伙象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对李鸣珂施以种种酷刑。但李鸣珂坚贞不屈，未向敌人供出半点党的机密。

在狱中，李鸣珂始终不忘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他团结难友，用一切机会向难友们讲述革命形势，鼓励大家继续斗争。同时，他也知道敌人很快就可能对自己下毒手，便抓紧时间给省委书记刘愿庵、爱人李和鸣等写了遗书，以表达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同志的无限深情。现抄录于后，

### 给刘愿庵的信

敦信同志：暂请出城，避免毒手。五弟请严施训练，将来是很有作为的，祝你领导四川革命成功！

### 给李觉鸣的信

五弟：与你永别了，你在四川工作，不要走，你必须爱护敦信，在他指导下努力学习，以后不要发孩子的脾气了，你目前可请省委派到中央学习一次，训练转来了，到游击区去或仍努力继续军委工作都可，临行前几分钟对你讲的话，望牢记！

### 给刘愿庵、李觉鸣的信

敦信、觉鸣两同志：请速下乡暂避，闻说军部专门捉拿你两个，并准备拿到就地正法，望珍重。

### 给李和鸣的信

和鸣：从此与你们一家大小永别了，不要伤心，好好教育我们的孩子，准备帮我复仇！你不要回家，同五弟住，或由敦信指定你地方住，你今后惟有革命，并听五弟及敦信的话，紧紧记住。①

特务头子李根固的“审讯”，未捞到半点油水，刘湘便亲自出马，搞所谓公开“审讯”。他集合部队千余人，在一个大

---

①四封信均转引自《朝天门事变》。

坝子里助威，想以此来慑服李鸣珂。李鸣珂带上沉重的脚镣，出牢房时，他向邓文书笑了一笑说：“今天是我俩效忠于党、效忠于人民的日子了。”说罢，便昂首挺胸而去。

刘湘见到李鸣珂后，装出一副慈悲的样子说：“李先生，你是既聪明又能干的人，要认清形势。你看过激党处处失败，只是捣乱，那象个成功的样子，如能翻然悔悟，我们同造国家，你说好吗？”

李鸣珂高声说道：“要我说，我就要说一点钟，不准插嘴。”

刘湘还以为李鸣珂要“回头”了，连忙答应：“好，好！”这时，李鸣珂站在阶沿上，向左右看了看，然后说：

“士兵们，我们是穷人，世界上那样东西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受着火热太阳的暴晒，受着寒冷霜雪的刺扎，风吹雨打，肩挑背磨，白天晚上忙个不停，然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妻子老小病在床上吃不起药，无人管……”

李鸣珂的话打动了许多官兵的心弦，有的士兵流下泪来。他更提高嗓门说：“这都是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剥削压榨造成的。他们征粮派款，拉丁拉夫，喝干了我们的血，不是我们命不好。”

刘湘再也忍不住了。他怒气冲冲，拍案叫道：“不要听他宣传！”

李鸣珂不理刘湘的恫吓，进一步说：“社会上的寄生虫，假造什么道德法律来束缚我们，只许他们杀人放火，不准我们活命，我们要撕碎这些条文，我们要作主人，不当奴隶，大家要起来革命，要打倒我们的敌人军阀狗腿子……”

军阀刘湘急忙拦住了李鸣珂的话头，咆哮道：“这是我的

部队，你敢鼓吹？！”

李鸣珂轻蔑地笑着说：“你这没有灵魂的东西。你睁眼看，这些都是我们的人，不是你的！你如不迅速省悟，等几天，你的脑袋就要被他们的子弹穿过。”

刘湘恼羞成怒，狂吼：“给我拉出去枪毙！”

是日下午，从二十一军军部到朝天门码头的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李鸣珂、邓文书、张绍武等四位同志被押赴刑场。沿途街道两旁，挤满了悲愤的人群。李鸣珂望着仍在受苦受难的工友、农友，高呼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于朝天门外，时年三十一岁。

对李鸣珂等押赴刑场的情况，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九日的《国民公报》上，以《重庆共党开枪拒捕——打死侦探一名，拿获四名》为题进行了报道，原文如下：

“本报廿号特约渝讯：渝二十一军军部于四月十九日午后，绑出共党四犯，赴朝天门外枪毙，均坐无顶肩舆，由大梁子下打铁街，约有两连手枪队押送，内有一犯，年约三十余，八字短胡，毫无惧色，沿途大呼共产党口号，如登讲演之台，闻系共产党著名首领李鸣珂，中央曾下通缉命令，该犯更名李春华，潜来渝市。竟敢于十八日晨，在城外击毙反共之调查易觉先，立即就擒，讯供不讳，临刑连受五弹。”

“又讯，十八日朝天门外有暴徒枪击侦探员，死一人，伤三人，昨日下午四点钟，二十一军军部，已将当时拿获凶犯李春华、邓文书、龚佐新、张某某四



名，讯明枪毙。”

李鸣珂英勇就义后，刘湘仍不解其恨，张贴布告，下令示众三天，不准收尸。但李鸣珂一生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深受党内外群众的爱戴，因此当天夜里，就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尸体运往南岸弹子石，安葬在松柏成荫的青山之中。

同志们在掩埋李鸣珂烈士的时候，还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这是他留下的最后遗言：

天愁地暗，惨雾凄凉，千万人声沸腾，来到杀场，不觉恨填胸。我心中含着许多悲愤，别了！别了！别了！许多朋友别了，许多士兵别了，许多工农及一切劳苦大众别了。我今躺在血地上，切莫为我空悲痛，但愿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攻！<sup>①</sup>

---

<sup>①</sup> 《革命烈士李鸣珂小传》，载《南部县志》第100页。

## 穆 青

王 斌 苏温译

一八九八年，穆青出生在四川省合江县福宝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的父母终年勤劳，全家仅能免于冻馁，但他们仍节衣缩食，设法让穆青读书。穆青七岁时，到骑龙义馆上学，因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和族长的喜爱，并在经济上得到资助。因此，穆青得以在辛亥革命后考入合江县中学，为第五班学生。

当时，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护国之役的革命声浪，先后传到合江，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穆青入校后，经常和进步同学一道上街讲演，反对袁世凯卖国、复辟的罪行。

五四运动爆发后，成都、重庆以及许多县份的青年学生纷纷集会，举行示威游行。在合江，县中学生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示威，穆青这时已成为带头人之一。

穆青在各次运动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初步接受了争取民主、讲究科学的民主主义思想。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中国先进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也有所影响。他立志救国救民，决心寻找一条改造社会的道路。

此时，吴玉章正在成都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创办留法

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输送有志青年赴法留学。穆青得此消息，十分高兴。在亲友们的支持下，他到成都进入了留法预备学校。经过短期训练之后，于一九二〇年出川，由上海转赴法国。

当穆青这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达法国时，法国正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寻找工作极不容易。因此，穆青和一些勤工俭学学生就先到里昂补习法语；不久，又就学于一所农业学校；后来，才进入蒙特里冶铁厂做工，干笨重的活。他们在工厂，看到法国工人，尤其是华工，劳动条件恶劣，生活低下，加上自身的体验，对工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一九二一年，穆青和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陈毅、邓希贤(小平)、聂荣臻等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几次斗争，曾到驻法公使馆请愿和示威，并开始研究马列著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共中央通知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穆青参加了中共旅欧支部，并积极参与支部的各项活动①。

一九二四年下半年，穆青奉调由法国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共东大旅莫支部组织委员；后因患肺结核动了手术，曾到黑海休养了一个时期；一九二六年初回到国内②。

穆青回国后，党中央分配他到广东区委担任组织部长。

穆青到广东区委工作不久，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区委领导成员都异常愤慨，多数同志主张给予反击。区委书记陈延年也赞成反击，但又认为这关系到整个党的政策，主张慎

---

① <活跃在“五四”时期的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载《成都日报》1959年5月2日。

② <逝世二十周年的穆青同志>，王真若于1950年3月撰写。

重。穆青的意见也是如此。

一天下午，广东区委一些领导人在陈延年办公室漫谈。陈延年说：“唉，你们看，我的父亲，竟把无产阶级当作革命历史过程中的苦力，简直是苦力主义！”“书生！书生！这怎么行呢！”邓中夏（省港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说：“仲甫（陈独秀字）越来越显出是一个学究，那里象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张太雷（区委宣传部长）说：“他在开会讲话时，摇着白扇，简直象那城隍庙里的说书佬，没有一点革命党领袖的气概！”穆青对这些话，都点头表示赞同①。

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和工运、农运骨干的觉悟，区委决定举办党员干部深造班，由穆青领导的组织部负责具体工作。深造班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唯物主义论、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章程、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职工运动、广东农民运动以及其它政治专题报告等。恽代英、罗亦农、萧楚女、邓中夏、彭湃、项英等都被聘为教员，苏联顾问鲍罗廷曾多次到班上作专题报告，穆青也是主要教员之一。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广东区委陈延年、邓中夏等赴武汉出席党的五次代表大会，穆青、赖玉润（区委秘书长）等主持日常工作。穆青仍负责党的组织建设，指导各级组织开展活动。不久，党中央指示广东区委设置秘密机关，以应付突然事变，并寄来了经费②。

区委缜密研究中央指示，立即采取了多项紧急措施。穆青负责分配各部门的秘密机关经费，掌握各秘密机关地址和相互

---

①② <关于广东区委的回忆>，赖先声撰写，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会供稿；1981年4月访问徐彬如记录。

联络情况。他主管的组织部则完全隐蔽起来，在广州市内外分设多处接头机关和通讯机构，均由他亲自掌管。区委还挑选忠诚可靠并有斗争经验的党员组织了秘密赤卫队<sup>①</sup>。区委这些措施，对应付反动派后来实行的“四·一五”大屠杀作了一定的准备，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广东反动派也在四月十四日晚上动手拘捕屠杀革命党人。

四月十五日晨，秘密交通员到穆青秘密住所来告诉他：“昨晚半夜，文明路党、团区委办公处被反动军警包围，捣毁了机关，逮捕了油印员、交通员胡继声、洪兆潮等同志。”“中山大学也有人被捕，听说反动派到宿舍抓人，学运书记毕磊起来反抗，被打死在床上。其他地方尚未弄清。”穆青叫他再去打听，弄清哪些机关出了事，哪些同志被捕，还叫他替自己买一件长衫、一顶呢帽、一副玳瑁眼镜。穆青送走交通员后，心情十分沉重。

早饭后，穆青向爱人王凜若说：“不知军委机关怎样？你们邓老师从医院回来没有？”叫她前去打听。邓老师即邓颖超，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主讲妇女运动史的教员。王凜若化装为富家小姐，去到军委机关所在的惠爱中路，从军委秘书朱凯的爱人刘荣芬处得知：邓颖超住院还未回去，朱凯和军委机关的黄亦辉被抓走了。在回家途中，她又听妇运讲习所的一位工友说：妇运讲习所团支部书记蒋舜华昨夜被讲习所学监、反动派暗探刘嘉桐抓了。王凜若回到秘密住所后，

---

<sup>①</sup> <关于广东区委的回忆>，赖先声撰写，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会供稿；1981年4月访问徐彬如记录。

将所知情况告诉了穆青。

午后，交通员再次向穆青汇报，又得知刘尔嵩、李森、何耀全也已被捕。穆青的厨房有一扇小门与团省委书记黄居仁的住所相通。穆青打开小门，与黄居仁交换情况，又得知军委书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上火车去武汉时不幸被捕，惨遭杀害，政治教官、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育长萧楚女因患肺结核住在医院，也被敌人抓去杀害了。

穆青转回寝室，又挂念着宣传部，任卓宣（叛变后改名叶青）当时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傍晚穆青穿上哗叽长衫，戴上呢帽，架一副茶色玳瑁眼镜，扮成富商，同交通员一道出去找任卓宣。在任卓宣处又了解到：区委宣传部未遭到破坏，罢工纠察队和粤汉路工人武装曾同反动军队和反动的机器工会武装激战了三小时；当反动军队押送被捕工人在大街上走过时，工人们毫无惧色，昂首挺胸，还高呼革命口号，沿街群众无不为之动容。

四月十七日，穆青、赖玉润、杨殷（区监委书记）、冯菊坡（区委工人部长）、罗绮园（区委农民部长，后叛变）、任卓宣、周文雍、吴毅等又聚集在一起开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下列积极措施：（一）积极恢复和巩固各级党的组织，尽可能选拔过去不太露面、忠实可靠、敢于斗争的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调周文雍负责领导广州市各工会党支部，掌握各工会赤卫队组织。（二）以各工会党支部和赤卫队组成的十人小组为基本队伍，掌握各工会的领导权和工人群众，同反动工贼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三）由穆青负责组建广州市委，以加强广州市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指定吴毅任广州市委书记，周文雍为组织部长。（四）粤汉、广九、广三等三条铁路和运输工

会于二十一日中午罢工一小时，以表示对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抗议；以广东区委和所领导的群众团体的名义，发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残暴大屠杀宣言》，于二十一日中午散发。（五）加强广东济难总会工作，认真作好调查，想尽一切办法援救被捕的工会骨干、工人和学生；发动各工会团体进行请愿，要求释放被捕革命群众，赔偿损失。（六）由于区委和中央消息断绝，与所属各地党组织失掉联系，工作难于进行，根据杨殷建议，决定暂将区委迁到香港办公，以便一方面接上同中央的联系，另一方面与东江、潮汕、西江、南路、琼崖等地加强联系，切实地领导各地党的工作。会议还确定：由穆青、赖玉润等着手整顿各地党组织，到武汉向中央汇报情况，去香港设立区委办事机构。

广东区委四月十七日紧急会议后，穆青根据会议决定，立即组建广州市委。四月下旬，在穆青主持下，召开了广州市委成立会议，市委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四月底，穆青化装由韶关经湖南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四·一五”大屠杀经过。之后，绕道上海转赴香港。在香港，穆青和赖玉润、杨殷等组成领导机构<sup>①</sup>，设立了区委办事处，组织部秘密处所和通讯联络机关等。几个月中，他们作了下列几项工作：（一）整理和加强了部分地区的领导工作，建立了潮梅、东江、西江、粤北、南路、琼崖等地区特委和联络机构。

（二）恢复、整顿和加强了港九党的组织，调冯菊坡到香港领导港九地区工作，发展了港九各产业、各行业工会党支部。

（三）通过广九铁路党组织和内河轮渡党组织，建立了与广州

---

<sup>①</sup> 《忆穆青》，王凜若于1958年口述，苏温泽整理。

及各地的秘密通讯联络机构。（四）开展了宣传报道工作，以区委秘书处名义编辑、油印《红旗通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报道广州和各地区斗争活动情况，秘密分送到广州市及各地特委<sup>①</sup>。

穆青在香港工作期间，获悉陈延年在上海被蒋介石逮捕杀害，极为悲痛。陈延年牺牲后，中央决定改广东区委为广东省委，不再领导闽南和广西地区，并任命张太雷为广东省委书记，穆青在省委仍担任组织部长。

一九二七年秋，广东省委迁回广州。

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武装起义总口号。张太雷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回到广东后，根据中央精神，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召开省委会议，通过了发动工农兵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穆青奉派参加起义行动委员会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代表联系，因此移住东山苏联顾问住宅区<sup>②</sup>。

省委会议后，穆青、杨殷、周文雍等分别到工人群众中秘密作宣传、组织工作，号召武装起义。十二月七日，广州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越华路一家电影院里秘密召开，决定十二月十三日起义。后起义消息泄漏，把起义提前到十一日举行。

十二月十日晚饭后，穆青低声对王凛若说：“今晚上我要同国际代表去参加武装起义。如果我牺牲了，你一定不要哭，也不要难过！相反，要为我牺牲得壮烈、有意义而自豪。你要听党的话，刻苦地学习，踏实地工作，继承先烈们未尽之志，

---

① 《忆穆青》，王凛若于1958年口述，苏温泽整理。

② 《逝世二十周年的穆青同志》，王凛若于1950年3月撰写。



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又拿出港币三十元给她说：“万一起义发生意外，党组织一时找不着你，你也找不着党，这三十元钱你就拿去作回家的路费吧！回到家乡再找党。”随即离开妻子下楼，去西关参加起义部队各级指挥员会议。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广州武装起义的战斗打响后，穆青身穿黑色工人服，头戴鸭嘴帽，项系红领带，背挎一支上了刺刀的长枪，腰间捆着子弹带，紧张而有秩序地在指挥部工作。十二日中午，指挥部在西瓜园召开群众大会，张太雷、恽代英、周文雍和穆青等均出席大会，到会群众数万人。张太雷在大会上宣布“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接着产生苏维埃政府，穆青为土地委员会成员之一。

广州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张发奎、李福林、薛岳等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立即向起义军猛扑过来。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起义军撤出广州。起义失败了。

十二月十五日穆青送走了共产国际代表。十六日下午，他和王凜若一起暂时去香港<sup>①</sup>。

一九二八年元月，穆青夫妇从香港回到上海。不几天，周恩来、邓颖超到穆青夫妇所住的旅馆看望他们，穆青向周恩来汇报了广州起义的经过。随后中央通知穆青，派他去武汉参加湖北省委工作。穆青到武汉后，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在武汉，穆青夫妇和省委秘书长任开国夫妇同住在法租界一幢房子的二楼上，前楼住任开国夫妇，穆青夫妇住亭子间。任开国夫妇都是四川人，穆青和任开国对外以表兄弟相称，以便掩护<sup>②</sup>。

---

① <逝世二十周年的穆青同志>，王凜若于1950年3月撰写。

② <忆穆青>，王凜若于1958年口述，苏温泽整理。

一天下午，一个穿深黄色长袍、戴咖啡色呢帽、年约二十六七岁的男人突然上楼来，口称找秘书长任开国，第一次被支吾出去了，不一会又上楼来，未说话就转身下楼去了。任开国、穆青都觉得有问题，决定立刻转移。穆青去住福昌旅馆，任开国和他爱人顾文衡去住另一家旅馆，王凜若留机关。

不久，任开国夫妇上街，碰见叛徒，任开国于是被捕。当晚，反动派在各旅馆进行搜查。鄂北区委接头点原来设在福昌旅馆，已被敌人破获，因此对福昌旅馆搜得更严。搜查前，侦缉队曾告诉茶房：通知旅客不要出房门，谁出来就抓谁。茶房未给穆青讲，穆青刚出房门，就被捕了。

湖北省委听说穆青、任开国被捕，立即派人赶来安慰王凜若和顾文衡，向她们表示，党组织一定想尽办法营救。王凜若提出准备去上海找她父亲的好友陈古枝想法，省委立即同意。王凜若到上海找到陈古枝，说自己的“表哥颜嗣良”从法国留学回来，路过武汉，被政府当局误认为是共产党逮捕了，请他搭救。陈古枝便托人写信给湖北省政府委员孙华佛帮忙。

穆青先关押在武汉侦缉队里，敌人曾用刑逼供，他坚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结果被当作共党嫌疑犯押解到武昌警备司令部。后由孙华佛活动该部副官长詹某，把他保释出来<sup>①</sup>。

穆青出狱后，省委决定让他去上海医治刑伤，以免被敌人查出再遭逮捕。穆青夫妇又去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家成衣店的前楼。周恩来知道后，曾去看望他。穆青伤愈，中央决定派他以特派员身份到四川视察和协助省委工作。

一九二八年夏，穆青回到阔别八年的家乡四川。这时，整

---

<sup>①</sup> 《忆穆青》，王凜若于1958年口述，苏温泽整理。

个四川也笼罩着乌云，白色恐怖十分严重。

穆青到达中共四川省委所在地重庆后，同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朝夕相处，共同研究和指导各地党的工作。不久，四川省委召开了一次临时会议，会议作出了向中央建议留穆青在川工作的决议<sup>①</sup>。会议结束后，穆青去川南地区视察。在川南泸州、自贡一带，党的工作比较活跃，组织建立得比较早，工农群众的发动工作也较为扎实。穆青根据自己参加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和别的同志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提出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县区。他选择了高县、珙县、筠连、永宁、古蔺等边区作为建立长期革命根据地的基点，而以泸县、叙府、自流井三地为集结地；中心工作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以至建立革命政权。经过穆青的动员、指导，当地党组织很快在自流井区的大坟包、三多岩等地，组织了盐井工人数千，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叙永、古蔺等地，先后建立了农民武装组织。

穆青生活艰苦，工作踏实，密切联系群众。他在川南经常化装为苦力或小商贩，到山区召集基层干部座谈，帮助他们总结工作，制定计划，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一次，在一个霜冻的早晨，穆青与几位当地干部从江安去泸县，在途中被地头蛇、团阀程子芳发现，跟踪追来。穆青当时本已过度劳累，胃部疼痛，步履艰难，但他临危不惧，为掩护同志们脱险，独自断后。他忍痛爬上一个森林茂密的山头，居高临下，数处放枪，敌人不知虚实，以为中了埋伏，竟未敢穷追。到泸县后，

---

<sup>①</sup> <关于穆青同志的我的确忆>，张秀熟于1975年5月撰写。

穆青的病越来越沉重，但他照常坚持党的工作。

四川省委和穆青很重视争取进步人士，常常派遣党员参加军阀部队，争取其中倾向进步的分子为党工作。当时驻川南泸县一带的部队是刘文辉二十四军所属唐瑛师。川南特委在穆青的指导下，作了争取该部参谋长的工作，取得成功<sup>①</sup>。

一九二八年十月，正当穆青视察川南地区的时候，军阀刘湘破坏了我党、团在重庆的省委机关，逮捕了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穆青闻讯后立即取道自流井去成都，在成都成立了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穆青（化名吕维新），组织刘披云，宣传张春帆，军委李鸣珂，工运程子建<sup>②</sup>。穆青、刘披云、张春帆和交通员许仁智、文书陈志筠五同志住在成都笆笆巷的一个小院里。他们为了敷衍敌人军警的查问，统一口径，说是由邻水县前来成都找工作做的；穆青和刘披云是兄弟，张春帆是表兄，陈志筠是妹妹，许仁智是佣人。一天军警查户口来了，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除留下象个农村姑娘的陈志筠看房子外，把其余四人带走。幸好共产党员李欣云在街上看见他们，他立即去找他在四川军阀田頌尧部工作的父亲进行活动。加上三军联合办事处军法官彭某先后审问穆青、许仁智等，未获可疑口供，才让他们取保释放出来<sup>③</sup>。

一九二八年底，刘愿庵在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成都。一九二九年初，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选举新省委。刘愿庵为书记，穆青任组织部长<sup>④</sup>。

---

① <穆青烈士>，穆济波于1950年3月撰写。

②1980年于重庆师范学院访问苏雁秋记录。

③1980年2月访问刘披云记录。

④1979年11月于武汉市政协访问刘人奎记录。

根据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精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初，省委先后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军坝起义、邝继勋起义和涪陵罗云坝起义。在各次起义中，组织部在穆青领导下，都积极调配了党性强、有能力、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去参加领导。如派出罗世文、邹进贤等到邝部参加旅委和前委领导；派李鸣珂（省军委书记）去涪陵任起义总指挥等。穆青也常常亲自去各地检查工作<sup>①</sup>。

一九三〇年初，四川形势越来越紧张。穆青置白色恐怖和生死于度外，在四处驻扎军队、警察，街上布满特务、叛徒的山城，仍昼夜不停地到党的基层组织去指导工作，找党员谈话。这期间，他曾写信给亲友们，表示对未来充满希望，还寄去“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的豪迈诗句。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二日，穆青（吕维新）正行经回水沟街上，突然被认识他的叛徒、敌侦缉队长邹荣芳带人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穆青沉着镇定，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自己叫吕维新，更不承认自己当过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当叛徒出面指供时，他以叛徒同他为女人争风吃醋因而陷害他来搪塞，竟弄得敌人一时难辨真伪。这个情节，可以从当时刘湘军部所辖特委会写的一份摘由为“省委书记吕维新被捕”的报告中看出。现摘录如下：

易觉先既到万县，重庆方面的反共工作，完全交由邹君主持，邹这时已被任命为侦缉队长……邹君只知道他是吕维新，是省委书记，故于三月二十二日率同

---

<sup>①</sup>1979年10月于北京访问文强记录。

本部差遣数人，在回水沟街上将他捕获……据邹君报告：吕维新在一九二八年七月 CP 川南代表大会时，曾作省委代表参加此会议，会毕，吕即由自流井上成都召集其余未被获之委员，在成都组织临时省委。

因他不承认是吕维新，而是袁雨苍（当堂取出袁雨苍名片），说是成都人，最近由上海转渝，替时闻通讯社清理渝报各家账目，住在七九书店，系上海泰东图书公司介绍的。问他时闻社介绍你来有无信件，他说仅有图记一颗。明明他的舅〔岳〕父王旭初在法院任检查官，他答应没有亲戚。提共党嫌疑犯严××与他对质，他假意不认识。而严曾在窗内被令其指谁为吕维新，谁为陈泽煌，严指出不差，因吕、陈均到总土地二十五号同她谈过话也。后来，逼问不过，他说大概是二月十几，在商业场见两女子，因其行动轻薄，即尾之到她们住所，另一位姓杨，杨系邹夫人——说是什么姐妹，我认为是随便玩的地方，只说我姓李，没有说姓吕，邹某来撞见，大起醋意，当下我们口角一场。二十几又去过一次，问严进工厂没有是实，从未劝她拿此百一十元开店子。说我是吕维新，明明是邹某教她的。并且做了一篇很长的呈文申辩，说邹君如何挟嫌诬告他，如何利用严××神经昏聩时来诱惑欺骗她，令她诬他的罪。同时，在叙泸的证据又搜查不着，只得搁下……

就是这样，穆青利用敌人对叛徒既不全信，又无可靠证据的弱点，编造情节，竟使敌人对他无法辨识，只好将他移禁巴

县监狱。不料，同年五月初，省委机关又因叛徒出卖被军阀破坏，书记刘愿庵等被捕，一部分文件和会议记录落入敌手，使敌人从这些文件和记录中，最后查明了穆青的身份。敌特委会的报告接着说：

嗣后，在浩池街省委临时机关破获后，搜出许多重要文件，有一册是三月份的常务会议，有维、敦、宽（维新、敦信、宽怀）的笔录，又载“维新此次被捕，即受邹荣芳之害”，又称“自维新被捕，钟鸣被难，常委极不健全”，又载“严与这次反动分子邹、杨在一块，从此吕即被捕”，又载“自三月二十日起，同志在狱中者省常委一人”。查袁雨苍是在三月二十二日被捕，在他以前没有捕获任何人，在他以后，狱中没有第二个吕维新者，从这方面考查，袁雨苍即吕维新，自无疑义了。

敌人既已查实袁雨苍确系吕维新，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就不会放过他了。以此，他的岳父王旭初先生虽多方营救，并无效果。穆青在巴县监狱中，见到了张秀熟等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六大”精神，介绍了四川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的现状。他沉着、乐观，常写大字，还用中、法、俄几种文字给外面的亲友写信，表达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四月下旬，穆青等在狱中听说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等在朝天门打死十恶不赦的叛徒易觉先，心情无比痛快。过了两天，传来李鸣珂、张绍武等四位同志被刘湘抓住英勇牺牲的恶讯，悲痛万分。

五月的一天早上，穆青突然被捉走。下午，传来噩耗，他被刘湘杀害了。穆青遇难后，他的爱人领出尸体，把他葬在重庆南岸海棠溪。

穆青的一生，是为人民为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胸怀磊落，百折不挠，多次面临死亡而仍奋斗不息，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他的诗句——“光明日月无私照，万古经天给与人！”正是他光辉一生革命精神的写照。

**作者附记：**本文撰写中，参阅了中共合江县委、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等单位的资料。



# 赵醒侬

曾志巩 文耀奎

## (一)

赵醒侬，原名性和，乳名细禾，后改名赵干，曾用过赵兴隆、邵兴隆等化名。一八九九年出生在江西省南丰县城一个贫苦家庭。

赵醒侬的父亲是个裁缝，终日劳动，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因此，赵醒侬高等小学毕业后，被迫中断学业，开始学徒生涯。他在长沙和常德等地当学徒，一天要劳动十多个小时，还要帮老板娘抱小孩，夏天还要为老板打扇。而他吃的是残羹剩菜，穿的是破衣烂衫，睡的是日拆夜铺的门板。赵醒侬不能忍受这种悲惨的生活，于是他抱着一线希望，到了上海。当时，他想求学，但身无半文，付不起昂贵的学费；想就业，无人理睬。为了活命，只好白天到街头卖报，晚上去戏院跑龙套，夜里没有地方住宿，就蜷缩在小菜场或屋檐下。有时遇上巡捕驱赶，只好在马路上步行达旦。

后来，在一些穷朋友的帮助下，他在一家小店里当了“伙计”。他自己后来曾经回忆道：“我生在这种万恶社会，从小又没受过良(好)教育，所以我长了二十多年，就过了二十多年

的非人生活。”<sup>①</sup>失学、流浪、当学徒、受欺压，到处碰壁，使赵醒依感到前途渺茫。

就在他陷于消极与苦闷之时，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声势浩大。赵醒依心情激动，从斗争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决心“还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去做人！”<sup>②</sup>于是他将原名“性和”改为“醒依”，表示自己觉醒的决心。

当时，上海有个工商友谊会。赵醒依怀着“为伙友谋幸福，谋大团结”的愿望，和新结识的店员沈资田<sup>③</sup>一起，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加入了上海工商友谊会。他积极参加友谊会的活动，经常为该会刊物《上海伙友》写稿。每年十月十日是民国国庆纪念日，学生、官僚和老板们提灯庆祝，却看不到伙友们的影子。赵醒依十分感慨。一九二〇年十月他在《上海伙友》创刊号上发表的《为今日问问伙友们》一文中写道：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先烈，赴汤蹈火，骨肉横飞，拚头颅，洒热血，换得来的”；而今天，“我们伙友还在千钧压力底下，想动也动不（起）来，一盘散沙，没有团结。”他疾呼：“难道我们伙友不是中华的国民？难道我们不是黄帝的子孙？难道我们甘心做凉血动物只肯雌伏而不动？”他号召伙友们团结起来，去改造社会。

在上海工商友谊会成立之初，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争取和团结广大店员工人，曾经给予《上海伙友》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并在该刊上发表了一些宣传劳资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文章。

---

<sup>①②</sup>赵醒依：《谢谢胡适先生一句话》，《上海伙友》第2册，1920年10月17日。

<sup>③</sup>见《沈君资田事略》，《牺牲》第1集，1929年3月15日。

陈独秀还为该刊写了发刊词，《新青年》杂志社为它发行了第一册至第六册。可是不久，工商友谊会的组织者就撕去了“工人解放”的伪装，暗中与资本家勾结，领取津贴，贩卖改良主义思想，妄图瓦解店员工人的革命意志。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停止了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当时，赵醒依还没有完全识破他们的假面目，仍然留在该会之中。他赞同工商友谊会“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宗旨，然而他又看不到资本家与伙友之间有什么“平等”、“互助”，他赞同过“一点一滴改造社会”的主张，可是他看到“改造”的结果，很多伙友仍然受资本家的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赵醒依对《上海伙友》杂志上宣传劳资对立和劳资调和、宣传革命与改良的文章，迷惑不解，痛苦地思索着。后来，赵醒依毅然与工商友谊会断绝了关系。一九二一年秋，赵醒依和沈资田都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学习。在党组织和团组织的帮助下，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解开了思想上的疙瘩，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以后，赵醒依“便是在艰难辛苦的革命工作中过活了”<sup>①</sup>。

## (二)

一九二二年冬，赵醒依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南昌开展革命活动，着手创建江西党和团的组织。赵醒依通过先期回到南昌的方志敏<sup>②</sup>与江西改造社的主要负责人袁玉冰等取得了联

---

<sup>①</sup>孟冰，《悼赵醒依同志》，《向导》第175期，1926年10月12日。

<sup>②</sup>1922年7月，赵醒依认识了为寻找革命真理漂流到上海的方志敏，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系，并得到了改造社的大力支持。经过短时间筹备，赵醒依、方志敏和袁玉冰等十五人发表《南昌文化书社宣言》，成立了南昌文化书社。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南昌平民图书馆。开办文化书社是“因为革命思想，在江西传播不广”<sup>①</sup>。书社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革命书报”<sup>②</sup>，负责人是方志敏。赵醒依住在书社，一边帮助方志敏营业，一边开展秘密活动。

当时，江西除安源煤矿有一个直属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支部外，其他各地还没有建立党团组织。赵醒依根据党的指示，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决定首先筹建团的组织。他通过方志敏的介绍，结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和向往革命的青年。有一个叫刘拜依的穷困失业青年，经常到书社来看书，曾向赵醒依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又不知社青团在何处。经过考察，赵醒依将拟在南昌建立社青团的打算告诉了他，并要他找一些与社青团的宗旨相合的青年，到书社来座谈。第一次邀了十余名学生开了一次谈话会，赵醒依向他们讲解革命的道理。那些胆小的学生，一听到“革命”二字，吓得再也不敢来了。后来又邀集了几个青年到书社开谈话会，经赵醒依的多次耐心启发和教育，几个青年有了革命的愿望。这样，在江西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包括赵醒依和方志敏在内的七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在南昌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sup>③</sup>，推举刘拜依为临时书记。在成立会上，决定加强

---

①②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版。

③按照团章规定，因人数不足三十人，未曾组织地方执行委员会，人们称它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临时地方执行委员会。

对各学校的宣传工作，争取更多学生加入共青团；要求团员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尽力支援工会组织；还要求团员向青年推销团中央机关报《先驱》。

不久，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袁玉冰从家乡度寒假后到达南昌，赵醒侗和袁玉冰、方志敏等一起讨论了江西此后的工作，并作出如下决定：“一、组织‘民权运动同盟’，对普通人的宣传。二、组织‘马氏学说研究会’，为我校<sup>①</sup>吸收新的分子。三、南昌还在手工状态中，自后应在九江、饶州、丰城三个工业区域内积极去设（分）校，吸收青年工人。四、南昌工人方面（的）活动，督促胡占魁去做”<sup>②</sup>。同时还决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青年声》周刊，作为宣传我们主义的刊物。”<sup>③</sup>

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工作，二月底至三月初，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继成立。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会的会员有五十多人，来宾有四十多人。

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第二天，江西督理蔡成勋即逮捕了袁玉冰和民权运动大同盟文牍股主任刘子池、南昌工会会长胡占魁，勒令《青年声》周刊停止发行；接着又下令取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查封文化书社，并通缉赵醒侗、方志敏等人。赵醒侗被迫去上海，方志敏和刘拜侗往南

---

①当时为保密起见，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学校，把江西的团组织称为分校。

②赵醒侗1923年8月给光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③刘拜侗：《南昌地方团的报告》（1923年），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京。军阀的残酷镇压，并没能阻挡江西革命运动的发展，相反却促进了江西青年的觉醒，正如赵醒依所说：“可以告慰的，就是这件事唤醒了好多青年，……千百万的传单还没有这样的效果呢！”<sup>①</sup>

一九二三年八月，赵醒依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到南京和方志敏一起商量，组织旅居上海、南京等地的二十余名江西进步青年，仍以停刊的《新江西》杂志为名，创办《新江西》半月刊<sup>②</sup>，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江西的革命斗争。他俩还决定发起组织江西学会，以团结青年，宣传革命思想，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

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赵醒依回江西继续开展建团工作。路经九江时，赵醒依到庐山进行调查，建议在九江工作的同志，可暂缓发展脚伕工会的组织，要集中力量搞好铁路工人、码头排伕和学校学生的工作；并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了团中央。

十月中旬，赵醒依回到南昌，二十一日召开团员大会，传达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经团中央特许，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赵醒依被选为委员，担任委员长。团地委在南昌设立三个支部，在九江设立一个支部，共有团员二十一人。当时的活动计划是：组织江西学会，开展大规模文化运动和国民运动；重视加入学生会活动，以便领导学生运动；扩大团的组织，恢复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调查南昌手工业工人工会，调查和联络铁路工人；开展反对英美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

---

<sup>①</sup>赵醒依 1923 年 6 月给光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sup>②</sup>《新江西》半月刊于 1923 年 10 月 1 日出版第 1 号。

为了迅速开展这些活动，赵醒依在险恶的环境中，开始了紧张繁忙的战斗。从一九二三年十月中旬至十二月中旬，他除因病外，每周都要召开一次委员会，汇报活动进展情况，讨论工作安排，并亲自负责调查南昌市的烟工、运输工、制帽工、纸马工人的状况和各县旅省同乡会的情况。为了不使文件和刊物的传递工作发生意外，赵醒依总结经验教训，在九江安排了一个机警老练的团员担任交通员；在南昌找了两家可靠的商店分别代收信件和印刷品，并向团中央建议“刻一颗商店的图章，凡用商店收信的，可在底下印商店章。”<sup>①</sup>赵醒依自己化名赵兴隆，以小商人的身份作掩护。由于赵醒依的精细安排和辛勤工作，南昌团地委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至一九二三年底，团员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团地委的机关刊物《红灯》<sup>②</sup>正式出版发行。

### (三)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赵醒依坚决执行党的“三大”决议。一九二四年一月初，赵醒依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月九日途经上海时，他写信给团中央汇报工作，说：“醒依本拟在寒假期间抽空回家（南丰县）一走，藉可摒挡一切家务，不料南昌民校<sup>③</sup>同志又推我为大会出席代

---

<sup>①</sup>1923年11月9日赵醒依给团中央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sup>②</sup>《红灯》杂志于1923年12月出版第1期后，被迫停刊，至1927年2月才复刊。

<sup>③</sup>民校，是指南昌的国民党。

表，我认民校前途进步于我们主张上有极大的关键，故决计前去出席。”<sup>①</sup>会议结束后，赵醒侗和邓鹤鸣一起返回江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筹建共产党的组织，同时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委派，筹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

赵醒侗和邓鹤鸣回到南昌后，立即和南昌团地委的负责人共同研究，从团员中发展一批党员。经赵醒侗等的介绍，方志敏、邹努、朱大贞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二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属江西支部在南昌成立，赵醒侗任支部干事会书记兼组织干事，邓鹤鸣任宣传干事。为了加强对赣江两岸和铁路沿线工作的领导，决定首先在九江、永修、南昌、吉安等地建立党的小组，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中共直属江西支部的建立，是江西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件。江西人民有了党的领导，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中共直属江西支部建立后，赵醒侗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领导江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当时江西的国民党组织涣散，党员成分复杂，有些自称“同盟会老革命党员”的国民党党员，已投入军阀的怀抱，当上了省议员。为了改变这种瘫痪状态，三月间，在中共直属江西支部帮助下，成立了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当选的七个筹备委员中，有赵醒侗、邓鹤鸣、曾国香（即曾天宇）、邹努和涂振农（后叛变）等五个共产党员，赵醒侗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临时省党部成立后，立即开展工作，派出干部到全省各地，把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两个市党部和五个县党部、四个临时县党部。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

---

<sup>①</sup>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的统一战线，便在江西初步形成。

当时，江西的军阀取缔国民党的一切活动，诬蔑国民党党员是“赤化党”、“过激分子”，捉到国民党员，轻则坐牢，重则枪毙。为了便于开展活动，赵醒侗和由党派回江西工作的曾天宇等人商定，一面租用一幢民房，设立党的秘密机关；一面由曾天宇出面，通过各种上层关系，筹办明星书店和黎明中学，作为掩护革命活动和宣传革命思想的基地。

一九二四年六月，明星书店正式开张营业，由曾天宇任经理。书店楼下设门市部，公开或半公开销售各种书刊和进步读物（以后经营扩大，兼卖文具）；楼上是“店员”宿舍，临街窗口可以观察周围动静。赵醒侗经常在此活动，会见各地来的进步青年学生，了解各地的情况，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有时在书店召开党的秘密会议，筹划全省的工作。他们编了暗语，准备了麻将和一些乐器，遇见紧急情况，即用拉琴唱戏和打麻将来作掩护。

同年秋，黎明中学筹备就绪。为了便于“立案”，聘请江西省议会议长龙钦海为名誉校长，实际工作则由校务主任曾天宇主持。学校教员多数由党团员和有进步思想的老师担任。学生除学习一般课程外，特别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开初招收了两个班，次年春又招收了两个班。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保送来的进步青年。学生中青年团员多，建立了团支部。这所学校，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材，输送了一批干部到全省各地从事革命工作，还输送了一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苏联学习。

黎明中学成了当时江西党组织的一个活动中心，许多重要会议和党与各地的联络，以及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许多重大活

动，大都在这里进行。赵醒依常在学校办公，作报告和讲演。

赵醒依个子不高，黑瘦的面颊，戴副黑边近视眼镜，常穿件粗布长衫，说话轻言细语，待人热情诚恳，和蔼可亲，与他接触过的许多同志，都把他当作良师益友；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更把他看成自己的兄弟。根据党的秘密工作的需要，赵醒依以“老爷”的身份出现；方志纯则是“赵老爷”家的“佣人”，担任党的机关的机要员和交通员。开始，方志纯不安心机关工作，认为做“佣人”低人一等。赵醒依教育他说：“这也是革命工作。看门、做饭、搞勤务，总得有人去做，如果大家都不做，我们这个机关便维持不下去了，党的其他同志所做的其他工作也做不成了。”赵醒依还常常恳切地对他说：表面上，我们是主仆关系，实际上，我们是同志关系；有生人在的时候，我是“老爷”，没生人的时候，我们是兄弟。方志纯文化低，赵醒依一有空就教他读书写字，帮他提高文化。在赵醒依的帮助和教育下，方志纯安下心来，积极工作，不久，经赵醒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我党的活动经费很少，而国民党中央党部又一时没有拨款接济，工作遇到很多困难。但赵醒依“只知尽忠于党，不图稍利于己，无尝典衣节食，以充党费。”<sup>①</sup>他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七日给邓中夏的信中列了这样一份预算：“南昌地方团每月常费预计表：津贴一人生活费（至少十元拟由民校担任五元）五元、邮费一元、印刷费二元、纸笔及杂项二元，共计十元”<sup>②</sup>，请求上级批准。而在这以前，他每月经支取四元半

---

<sup>①</sup>见《为赵醒依同志抚恤》，《江西民声报》1926年11月25日。

<sup>②</sup>赵醒依给邓中夏的信，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钱的生活费。后来增加到六元时，他还分出一半给朱大贞。朱大贞不肯接受，他便说这是组织决定，硬要朱大贞收下。赵醒依身体不好，有严重的肺病，同志们偷偷地给他买一点鱼肝油，他叨念了好几遍。有时赵醒依工作到深夜，方志纯帮他买碗清汤吃，他都执意不肯买带鸡蛋的清汤（每碗三十个铜板），只让买普通的清汤（每碗五、六个铜板）充饥。

赵醒依艰苦奋斗、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在他的带动下，南昌的党团员积极开展活动，工作卓有成效。一九二四年四月，南昌一平印刷厂和官纸印刷所成立了铅印工会，由赵醒依亲自领导，发展了四十多个会员。秋季，江西第一个农会在南昌市场子洲秘密成立。学生运动更加活跃，南昌举行了“五一”、“五四”、“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活动。在“五五”纪念会上，赵醒依发表了演说，指出：“从马克思唯物史观推移到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中国实行国民革命无疑。”<sup>①</sup>“五七”国耻日，南昌一万多学生、青年集会游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赵醒依以“席伍”为笔名，写文章给上海《民国日报》，热情介绍了江西青年在红五月里的活动。九月，改组了江西省和南昌市的学生联合会，由共产党员担任省、市学联主席。十二月，又成立了江西青年学会总会，出版了《江西青年》周刊。

在进行上述组织和宣传工作中，江西党的组织得到发展。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党的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为即将到来的

---

<sup>①</sup>席伍：《江西青年最近之运动》，《民国日报》1924年5月12日。

革命高潮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 (四)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发表《北上宣言》，离粤北上。孙中山北上的行动，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很快展开。是时，北洋军阀江西督理蔡成勋被驱逐出江西，军阀方本仁就任江西督办。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军阀内部矛盾的加剧，方本仁曾和广东国民政府拉过关系。赵醒侬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一方面积极开展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秘密工作，一方面通过国民党的组织，进行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日，赵醒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指示，以孙中山特派员的身份，积极领导全省人民广泛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集国民会议运动。十二月三十一日，由南昌市八十多个团体组成的国民会议江西促成会正式成立，赵醒侬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九江二十多个团体发起成立国民会议九江促成会，赵醒侬前往参加，指导工作。接着，吉安、临川、弋阳、景德镇等许多县市纷纷成立促成会。省促成会派出宣传员和讲演队深入城镇和农村，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和宣言，揭露军阀的罪恶。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江西人民沉痛哀悼。当北京孙中山先生行辕以电讣告赵醒侬时，不料方本仁竟令稽查将他拘入督办公署，严行审讯。在敌人面前，赵醒侬大义凛然，不畏强暴。在赵醒侬的斗争下，方本仁只好在第二天将他释放，但仍派稽查密探严加监视。不久，北京执政府迫于广大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在北京举行追悼孙中山大会。

赵醒依抓住这个机会，以“江西国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会的名义，通过省议会出面，请求省署拨款五千元大洋作筹备追悼会费用。筹备会决定将这笔经费的大部用于宣传方面，并派赵醒依亲自前往上海购买宣传品。

在上海期间，赵醒依向党中央详细汇报了江西的工作，印刷了孙中山的遗像、遗嘱、著作和国民党一大宣言等大量宣传材料，还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四月下旬，赵醒依回到南昌，主持了悼念孙中山的活动。在百花洲沈文肃公祠内设立祭场，从四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连续举行公祭活动，接着又于五月四日在大校场举行了追悼大会，并对参加公祭和大会的几万群众散发了大量的宣传品，大张旗鼓地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和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在悼念活动期间，赵醒依还用民间曲艺如“四季调”、“十杯酒”、“莲花落”等形式，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请说书人到群众中说唱。方志敏、邹努和汪群等许多同志撰写了很多纪念文章，宣传国民革命。这次悼念孙中山的活动，持续了两个多月，形成了一个全省性的广泛宣传革命的政治运动。后来，方志敏回忆道：“对于‘拥护中山北上’，与‘追悼中山逝世’的两次运动，是做得比较广泛而深入，唤起了江西广大群众对国民革命的认识和同情。”<sup>①</sup>

这年春天，恽代英受党中央和国民党的派遣曾来江西指导革命运动。赵醒依陪恽代英到各地了解情况，宣传革命道理，所到之处，受到热烈的欢迎。恽代英特别注意蓬勃兴起的工人和农民运动，他和赵醒依会见了许多工农代表，对江西革命运

---

<sup>①</sup>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

动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后，全国掀起了反帝斗争的高潮。江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以声援上海人民为中心的反帝运动。赵醒侗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六月三日，他在省教育会召开了南昌市各界代表紧急会议，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后改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六月五日，南昌三万多人举行集会，由赵醒侗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通电，坚决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表示江西人民誓作他们的后盾，同时通告全省各县市组织大规模的反帝群众运动。会后，赵醒侗等带领群众冒雨游行。六月十四日，上海学生代表三人途经南昌，向各界人民陈述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真相后，南昌人民更加愤怒。赵醒侗和同志们根据这一形势，于十八日组织群众举行了第二次示威游行，并继续开展捐款和抵制仇货活动，江西后援会仅在六月二十八日一天就给上海罢工工人汇去捐款四千元。六月三十日，后援会又举行了公祭上海、青岛和汉口惨案中遇难烈士大会。

当时，适逢学校放暑假，党、团组织研究决定，乘学生放假回家之机，组织党、团员带领学生下乡宣传，把革命思想灌输到基层去，将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党、团员的带动下，南昌中等学校的学生大都踊跃下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由于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国民党内积极进行工作，江西的国民党组织得到健全和发展，有十几个县市成立了正式党部。七月间，由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昌黎明中学秘密举行，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会上选出赵醒侗、张朝燮、方志敏等七人为执行委员，其

中有六人是共产党员，曾天宇等三人被选为监察委员。左派力量在江西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居于优势地位。

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震撼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在江西的统治。江西督办方本仁在英日帝国主义的收买下，极力破坏江西人民声援五卅斗争的反帝运动。九月三日，方本仁以所谓学生抵制英日货造成重大外交干涉为词，指令南昌戒严司令部逮捕江西学生会主席邹努等人，殴伤群众多人。接着又查封了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通令解散各地学生会，出动大批军警阻止群众集会游行。为了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中共江西地委领导全省人民向帝国主义的走狗封建军阀开展了坚决的斗争。在南昌，领导工人群众组织援助被捕学生委员会，并发表宣言，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揭露方本仁摧残江西人民反帝运动的阴谋，号召江西人民结成巩固的联合战线，向北洋军阀政府开展坚决的斗争。由于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方本仁被迫释放了邹努等人。经过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为北伐军入赣和加速江西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 （五）

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群众运动迅猛发展。因此，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军阀方本仁更加暴露出狰狞面目。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赵醒侬一行三人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行至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稽查扣留，即送军法处。同时，方本仁又下令封闭

了一平印刷局，搜查明星书店，凡印有“青年”二字的报刊书籍一概没收。在南昌城“捉共产党”的声浪大起，很多同志被迫暂时离开南昌。赵醒侗在狱中思念同志，曾设法托一个学生秘密传出一张纸条，嘱咐战友说，万一他牺牲，留在南昌工作的同志要继续奋斗，决不能与反动势力妥协。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和公正舆论的压力，赵醒侗等在关押三个月之后，被释放出狱。

赵醒侗出狱后，不顾孱弱的身体，又投入了紧张繁忙的革命工作。在他的主持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传达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通过了反对奉直军阀的宣言。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不久便占领长沙，威震江西。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一方面把二十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摧残革命力量。邓如琢便以检查户口为名，查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办事员四人，并将各项重要文件一起抄去。于此同时，军警密探四出活动，邮电、行人横遭检查，集会、结社全被禁止，南昌城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邓如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各地纷纷函电谴责。邓如琢慑于革命声势，不得不暂时指令启封国民党省党部，释放被捕人员。在这种恶劣环境下，赵醒侗仍然镇静工作。邓鹤鸣劝他暂时隐蔽一下，他坚定地回答：“我负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他要邓鹤鸣到九江去，自己留下来，进行联络工作，秘密发动群众，作好迎接北伐军的准备。

八月十日下午，赵醒侗冒着酷暑，前往明星书店办公。



刚走到百花洲附近，便衣侦探突然拦住他的去路，不由分辩把他押送到稽查处，接着军警又搜查和封闭了明星书店、黎明中学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机关，逮捕了四名工作同志。

赵醒依被捕后，由稽查处押解到军法处。江西警备司令刘焕臣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妄图迫使赵醒依招认是共产党的宣传员。赵醒依严守党的秘密，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九月初，湖南、湖北两省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开始向江西推进，逼近南昌。邓如琢看到自己末日来临，悍然下令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杀害赵醒依。

九月十六日凌晨，赵醒依被秘密地押到德胜门外芝麻田里。他见军警林立，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于是要求书写一份遗书，但却遭到横蛮拒绝。

凄厉的枪声撕碎了人们的心。赵醒依就义后，当即有许多男女学生，忍着悲痛前往刑场拍照，悼念烈士。警备司令刘焕臣害怕激起民愤，急请教育厅命令各校对学生要“严为教训，免入歧途”，并企图“暂行停课”，阻挠青年和学生举行悼念赵醒依的活动。

赵醒依壮烈牺牲后的第三天，北伐军曾一度攻克了南昌城，不久退出。十一月八日，再克南昌。是月二十八日，南昌二十余万群众集会，悼念赵醒依烈士和北伐牺牲的将士。党中央《向导》周报《悼赵醒依同志》的文章，称誉赵醒依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文章说：“醒依同志死了！醒依同志的精神——革命的精神，是永久永久在我们面前活着的！”<sup>①</sup>

---

<sup>①</sup>孟冰：《悼赵醒依同志》，《向导》第175期，1926年10月12日。

**作者附记：**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已注明出处者外，还参阅了赵醒依 1923 年 1 月至 1926 年 5 月给团中央的报告和信件，1920 年 7 月至 1921 年 5 月上海《时报》、《民国日报》，1923 年 2 月至 1926 年 12 月上海《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中央政治通讯》第 2 号（1926 年 8 月），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的《江西人民革命斗争史资料》（1962 年），以及方志纯、朱大贞、邓鹤鸣、刘其农等的有关回忆文章和资料。

## 陈毅安

陈志凌

陈毅安，又名陈斌，湖南湘阴县界头铺（现金龙公社）人，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二日（农历甲辰年腊月初七日）出生。出生后不久，过继给二伯母。二伯母家境贫穷，耕田为生，辅以纺绩。毅安从小随伯母从事砍柴、种菜、捕鱼捞虾等家务劳动。毅安七岁时到离家不远的金山庙上小学。十二岁考入长沙县临湘镇书堂山第一高级小学。这所高小，校址是座古老的书院建筑，环境优美，还具有优良的学风，经常有些著名的学者到此讲学。毅安在这里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并喜爱参与学校的讲演会，博得教师和同学的赞扬。一九二〇年，毅安到长沙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这时的长沙，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新的思潮广泛传播。毅安受到新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在该校第一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五月，长沙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毅安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和其他同学一起组织工人和学生轮流把守码头，杜绝日货进港口，动员市民不买日本货物，不坐日本轮船，坚决同日本经济绝交。在学生的鼓动下，日本轮船公司由长沙开往益阳、常德的轮船票卖不出去，不得不停开。日轮船公司的资本家气急败坏，采取了报复行动，指

使走卒枪杀了把守码头的中国工人。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当天下午，长沙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抬着烈士的尸体，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向教育会坪省政府集中，将教育会坪挤得水泄不通，一致要求省政府惩办日本凶手，要求省长赵恒惕亲自出来答话。省政府的大门紧闭着，赵恒惕不敢出来。毅安和几名同学搭起梯子爬过墙去，逼着赵恒惕出来与群众见面。赵恒惕见了示威群众惊慌失措，说话喃喃不清，毅安带头喊：“赵省长讲话声音放大些！”“政府要严惩日本杀人凶手！”在群众的威逼下，赵恒惕答应了群众的要求，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一九二四年六月，毅安从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党派遣他到汉阳兵工厂从事工人运动。毅安对工厂的规模很赞赏，他在给未婚妻李志强的信中写到：“工厂规模之大，曾未所见。每日出快枪三百余支，还有机枪、子弹和手枪等，均用机器制造，用人力者少。我在这里工作，当增加学识不少”<sup>①</sup>。工厂里一排排巨大的厂房和冒着滚滚浓烟的烟囱，机器不分昼夜的运转，一批批兵器生产出来。这一切都吸引着毅安，使他对从事现代化生产的工人阶级产生了深深的敬仰之情。毅安的公开职务是锻压车间工人，但他的主要工作是搞工人运动。在党组织领导下，毅安联络了许多工友，向统治工厂的军阀代理人进行了广泛的斗争。他组织工人，为了增加工资，于七月间举行了五次罢工斗争；为了不使枪枝弹药被军阀用来屠杀革命群众，他发动工人故意出废品，让机器空转，使生产流水线瘫痪；还组织工人破坏仓库，阻拦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只靠岸。

---

<sup>①</sup>陈毅安 1924 年 7 月 6 日给李志强的信。

一九二五年初，毅安离开汉阳兵工厂来到长沙，受党的派遣准备到广东黄埔军校学习，经党组织同意，他顺道回到湘阴家乡探望父母亲，并在家度过了二十周岁的生日。回家不久，继母去世，接着，生父也去世。毅安在料理完两位老人的丧事后，大约于七月间取道长沙、武汉，转乘江轮经上海到广州，路途旅行两月有余，抵广州时已是冬天了。

一九二五年底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毅安被录取。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参加军官班的复试合格。三月三日正式开学，毅安被指定到军校特科先入炮科后转入经理科学习，直到九月毕业。在这半年时间内，毅安给在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稻田女师）学习的李志强写了十六封信，倾吐了他的革命理想，介绍了他的学习生活，抒发了他对未婚妻诚挚的爱情。

毅安认为革命就得准备流血牺牲。他针对李志强来信中谈到的怕自己的爱人打仗牺牲，但又愿“教育青年成为爱国者，为革命流血”的矛盾思想时指出：“你不愿意你的爱人流血，而要别人去流血，难道你的学生没有父母吗？没有家吗？将来没有爱人吗？他们不是中国人吗？他们就应该去血战吗？假若他们的爱人也死死地不要他们去流血，那中国就无可救药了。”<sup>①</sup>毅安要志强“把眼睛看远点”，懂得为了革命而牺牲个人的乐趣<sup>②</sup>。他还写信给李志强，要求她进一步懂得革命战争的深远意义。他写道：“革命不打仗，又算什么革命呢？革命的战争，就要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绝不同于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信中还呼吁：“创造世界的工农们，我们赶快团结起来呀！死气沉沉的黑暗世界，需用我们的热血染它个鲜红。”他

---

①②陈毅安 1926 年 4 月 14 日给李志强的信。

立下誓言：毕业后，要把“所学的革命技能发挥出来，不达到目的地——烈士墓不止。”他在另一封信中讲到：革命是逼出来的，“欧美没有资本家的垄断，断不致有社会革命；中国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断不致有国民革命。我们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sup>①</sup>

毅安很热爱军校生活，他夸耀军校是东方觉悟青年的集中点，能在此地求学，真是幸福不浅。他觉得军校学生“每天自早六点钟起，至晚九点钟止，没有一点得空的时间。形式上要感受些痛苦，然而精神上却非常的愉快。”<sup>②</sup>学校民主作风很好，从教员至学生，除各尽责任以外，没有一点压迫的手段，都是一律平等的<sup>③</sup>。黄埔军校在我党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学的是系统的课程，讲的是努力杀贼的方法”，同志之间“同心同德，精诚亲爱”，“黄埔的革命军人没有虚伪”，在世界上都享有盛名<sup>④</sup>。毅安对他学的经理科也很感兴趣。他说经理是“一门最合潮流的科学”，按规定“在军官班八个月毕业以后，才能当经理官”，“我现在已进了军官班，是很安适的。”<sup>⑤</sup>军校生活很紧张，“每天有九小时的正课，一点半钟的自修，七个半钟头的睡眠时间”，假若随便一点，违犯了规定就要受到处罚。有些人感到纪律太严受不了，认为太不自由了。毅安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他写道：“要求中国之自由，就要牺牲自己的自由。如果个人的自由没有一点范围，那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了。我们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就是有些人太自由了；如帝国主义可以自由地侵占我国领土，军阀走狗可以自由地杀人放

---

①陈毅安 1926 年 6 月 4 日给李志强的信。

②③陈毅安 1926 年 3 月 7 日给李志强的信。

④⑤陈毅安 1926 年 4 月 14 日给李志强的信。

火，弄得人民的自由一点也没有了。我们干革命的人，性命都可以牺牲，难道牺牲个人一点自由都不行吗？”<sup>①</sup>

毅安在树立革命世界观方面给志强很多帮助。他要求她成为一个同志，才算是“真正的爱人”。如果“各人目的不同，如何可能发生爱呢？”他希望她“要研究主义，勿读死书”；要求她看进步的书籍，思想要不断地进步，“人类是进化的，所以思想万不能落后”；“如果有人思想落伍，他就会变成朽木。”<sup>②</sup>要求她正确认识爱情和革命的关系。他说：“爱情固然重要，但不能成为痴情”，不能以牺牲革命来换取爱情。还说：“爱情是爱情，革命是革命，为爱情而不革命可以说不是人了。”<sup>③</sup>如果这样，那“人生观就全然错误了”。他要求纯正的爱情，反对轻薄子弟，今天同这个女性好，明天又同另一个恋爱。从前他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后来“同他断交了”<sup>④</sup>。他要求她不要经常写些什么“不幸”、“哀哉”等伤感的東西，这只有消磨青年人的志气，“只要振作精神，什么事情都好办了。”<sup>⑤</sup>

一九二六年十月，毅安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教导师师部，不久，下到第三团<sup>⑥</sup>第三营第七连任党代表，驻韶关北门外广州会馆。毅安工作十分勤劳，早晨天未亮就起床，晚上十二点还不能入睡，每天同士兵一起上四小时的操，给他们上两小时的课，此外，还要抽时间作民众运动工作和办理党务。

---

① <革命烈士书信> 第70—71页。

② 陈毅安1926年4月5日给李志强的信。

③ 陈毅安1926年8月18日给李志强的信。

④ 陈毅安1926年4月14日给李志强的信。

⑤ 陈毅安1926年6月26日给李志强的信。

⑥ 该团是1927年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的前身。

毅安处处以身作则，遵守军纪。他生活艰苦，不喝酒，不吸烟；工作上谨慎小心，一丝不苟；对党的组织特别尊重，他说：“我们必须以党为中心，以党的意志为意志。”<sup>①</sup>他同士兵关系很好，在他过生日那天，请了二十桌客，全连士兵都请来了。他亲自陪士兵们吃饭，象招待亲戚朋友一样。因此，毅安在士兵中享有威信，是国民革命军中有影响的基层政治工作人员。

一九二七年一月下旬，毅安去马坝，给那里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二月八日教导师三团开往离韶关九十里的沙口剿匪，当日伤亡数人。毅安奉命送伤员到省城医治，十二日返回沙口。四月十五日毅安所在部队开到湖南郴州，驻扎在东门外；五月十日，进抵衡州；六月初，至衡山；六月七日，开赴株州；九日乘火车北往，经新河至湖北蒲圻县城，驻城隍庙。不久，第三团开进武昌城，担任武昌国民政府警卫任务，称“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

这个团的各级干部，包括团长卢德铭在内，多系共产党员。这是我党掌握的一支军队，它担负着重要军事据点蛇山、龟山、黄鹤楼等地的警戒任务，并监督和检查长江各港口。七月中旬，汪精卫叛变革命，武汉地区实行清党。警卫团各连党部，也利用“清党”名义，组成了两名共产党员一名国民党左派的清党小组，乘机清除了警卫团内的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分子，纯洁了内部。

毅安在警卫团里担任辎重队队长兼供给主任，总管全团后勤工作，从武器弹药、运输、筹款，到吃饭、穿衣、照料伤病

---

<sup>①</sup>陈毅安 1927 年 1 月 5 日给李志强的信。



员，都由他负责。他一会儿检查弹药储备数量，一会儿又去了解粮食供应情况，日夜不停，工作十分繁忙。警卫团有个干部连划归辎重队管。这个连大部分人是各省工农运动的领导骨干分子，缺乏军事训练，游击作风较重。一天，毅安来到这个连队，命令：“全体集合，立正，坐下脱鞋！”全连遵命，但大家都以好奇的眼光望着这个黄埔出身的年轻军官，不知他想搞什么“名堂”。毅安检查了大家衣冠是否整洁？指甲剪了没有？对他们提出了勉励和批评。何长工当时在这个连当排长，他回忆当时这一情景时说：“我们干部连的每个人都喜欢陈毅安同志微笑的面容，同时乐意接受他的批评。”

七月底，武汉地区已集结了大量的反动军队。警卫团秘密地召开了党员大会，作出了紧急向南昌方面靠拢的决定。八月二日傍晚，全团十二个连队乘招商局大轮船，沿江东下。毅安在抵达江西武宁时给李志强的信中写道：“二号由武昌乘船出发至大冶，闻九江消息不好，改由陆路行进”<sup>①</sup>。警卫团从阳新黄颡口登陆后，与敌警卫队遭遇，经过激战，将敌全部消灭，缴获甚多。

部队行军作战，后勤工作更是繁忙。毅安在部队出发前，要筹备好全团的给养，并派人先去安排宿营地。部队住下后，又要筹划第二天的供应工作。对于后勤各方面工作，毅安总是亲自检查、督促，安排得细致周到。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工作，给他配备了一匹马，但他很少用，却让给那些身体瘦弱的同志骑，自己步行，经常走的两脚起血泡。

八月九日，部队到达江西武宁。不久，又离开武宁进驻奉

---

<sup>①</sup>陈毅安 1927 年 8 月 9 日给李志强的信。

新县城，得悉南昌起义部队已南下，追赶不上，乃折向西，进驻修水休整。八月底，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湘东，组织秋收起义，共有三个团，警卫团编为秋收起义军第一团。九月八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爆发了。九日，毅安随第一团进攻长寿街，失利，转向文家市集中。毅安在给李志强的信中写道：“我昨天到浏阳文家市，今日又要到萍乡去”<sup>①</sup>。毅安这封信是确定秋收起义军文家市会师日期的重要历史见证。

文家市会师后，起义部队继续向罗霄山脉中段前进，到达江西芦溪时，遭到敌军朱世贵师的伏击，伤亡过半，团长卢德铭牺牲。芦溪失利之后，前委将几个受挫连队剩下的人员集中起来，成立新的连队，调任陈毅安为连长。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时，又进行了改编，陈毅安升任第一营副营长。三湾改编以后，尽管战斗环境非常恶劣，生活艰苦，但部队精神大为振奋。毅安亦是处在欢乐之中，亲自带领部队唱歌。据谭政回忆：毅安是一位名歌手，他唱的歌非常动人。他那沸腾的革命感情驱散了消沉，把人们引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来，同志们非常喜欢听他唱歌。

毅安在给李志强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精神非常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们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sup>②</sup>三湾改编，确定党支部建立在连上，废除了打骂制度，实行官兵平等，这是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毅安的信，反映了三湾改编这一重大历史功绩。

---

①陈毅安 1927 年 9 月 20 日给李志强的信。

②陈毅安 1927 年 10 月 3 日给李志强的信。

一九二七年冬，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中心区茨坪，决定在茨坪“安家”，建立后方机关。毛泽东考虑到毅安在汉阳兵工厂搞过工人运动，在黄埔军校经理科学习过，又担任过警卫团的辎重队长，是难得的管理后勤人才，便让他兼管在茨坪等处筹建兵工厂、被服厂、军火库和战地医院的工作。毅安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在他的努力下，不久，在茨坪等地，小型兵工厂、战地医院、军械修理厂都因地制宜相继建立起来了。

井冈山时期，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毅安经常带领部队打土豪、分田地、筹款，以解决部队供应问题。那时，工农革命军规定，抓住大地主一般不杀，命令他们用钱和粮来赎买出去，然后将地主送来的钱买成布匹、棉花，发给战士们自己缝棉衣；从地主那里筹集的粮食也运往井冈山，供应后方机关。由于任务繁重，思想教育注意不够，部队中个别人有违反纪律和侵犯群众利益的事发生。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组织了检查组，派毅安为组长，专门检查部队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对受损失群众道歉并赔偿损失，承认错误；对犯错误严重的人给以处分教育。这项工作，毅安做得很认真。他一方面要求部队以排、班为单位检查登记违反群众利益需要赔偿的户有多少；同时又派出政工人员深入到农村调查了解，做到一户不漏。结果应该赔偿损失的赔了，应该道歉的进行了道歉，群众很满意。挽回了对部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毅安和营长员一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下山去收集敌人报纸，以便分析形势，判断敌情。员一民和毅安带领第一营经过一夜急行军，到达茶陵县境之高陇。他们命令一连担任警戒，二连作预备队，三连派人分头去侦察，机炮连上山头挖战壕，作好战斗准备。过了不久，三连偵

察兵回来报告，在前面不远的一排房子旁边发现敌军在操练。经过了解，那排房子是谭延闿的家，那支部队是谭延闿的警备队。员一民和毅安商定在小河边的山沟里，设下一个埋伏，命令三连边打边撤，将敌人引进埋伏圈。当敌人先头部队钻进埋伏圈后，一连发起猛烈攻击，经过几分钟战斗，消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敌人大队人马随后赶到，死死咬住我军不放，连续向我军阵地发动进攻，均被我军打退，双方坚守各自的阵地。员一民和毅安经过仔细观察，发现敌军阵势很乱，一堆人前后拥挤。他们认为现在是反击敌人的最好时机。于是决定员一民带领第一连从正面攻击，陈毅安到第二连指挥部队从侧面配合。冲锋号响了，战斗十分激烈，员一民带领一批战士，冲向敌人阵地，大批敌军举手投降，眼看很快就要结束战斗，突然，从邻近山头上敌人打来一排冷枪，员一民躺在血泊之中，牺牲了。陈毅安从二连阵地上赶过来，悲痛万分。他站在员一民身边默哀片刻，然后举手高呼：“同志们，为营长报仇！”一时报仇杀敌之声震荡山谷，群情激昂。在毛泽东指挥的第三营赶来配合下，迅速地歼灭了谭延闿的警备队，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员一民牺牲后，陈毅安接替他担任第一营营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毅安率领第一营跟随毛泽东离开井冈山，向遂川县城挺进，守城的敌军闻风逃窜。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工农革命军占领了遂川城。毅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部队分散开，以班、排为单位组成宣传队，逐村挨户宣传穷人要革命的道理，刷写标语，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号召群众起来打土豪，建立革命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陈毅安等的具体组织下，遂川兴起了声势迅猛的革命风暴。许多城镇、乡村纷纷建立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建立了区乡工

农政府。一月二十四日，建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

一九二八年二月，正当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之际，赣敌朱培德率部向我革命根据地进犯，战情紧急。毅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请求任务。毛泽东指示陈毅安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令他将第一营带回井冈山。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茨坪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攻打新城的战斗任务，命令陈毅安率领第一团第一营主攻东门，第三营在南门、北门阻击，第二团进抵西门埋伏在稻田两侧。十八日早晨，城内敌人一部到南门出操，被埋伏在护城河的第三营打得蒙头转向，奔枪往城里逃窜。主攻东门的第一营，在毅安指挥下，架梯攀越城墙，同敌人展开肉搏战，终于攻破了东门。我军大队人马从东门杀入，敌人向北门逃命，被占领制高点的我军击退，又逃向西门，遭到早作埋伏的我二团的袭击，前后夹攻，敌军溃败逃散。这次战斗全歼敌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五百余人。

二月底，毅安升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五月，红四军成立以后，毅安被任命为第三十一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

五月中旬，赣敌二十七师杨如轩奉命率四个团从吉安向永新前进，占领永新城。为了调动敌人，毛泽东命令毅安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佯攻高陇。高陇战斗打响后，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向湖南，便对永新根据地发起进攻。敌留一个团守城，派出两团军队进犯永新，前锋到达龙源口。这时毛泽东命令毅安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王尔琢率领第二十八团立即返回龙源口，一天急行军一百三十里，飞兵里田，埋伏在草市场袭击敌军，全歼敌军一个团，缴枪数百，当场击毙敌团长刘胡子。

六月，蒋介石命令湘敌吴尚率领五个团，赣敌杨池生、杨如轩率领五个团，联合进攻井冈山。毛泽东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在新老七溪岭一带歼灭江西进犯之敌，命令陈毅安率领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和二十九团迎击由新七溪岭进攻之敌，红军第二十八团迎击老七溪岭之敌，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抄袭龙源口，并监视龙田方向的湖南敌人。毅安率领部队到达新七溪岭，把营指挥所设在新七溪岭的“望月亭”，挖好工事，严阵以待，做好杀敌的准备。端午节那天，毅安命令营部警卫员杀了几只鸡，做了几个菜，把各连主要干部请来共度节日。各连干部到齐后，毅安给大家敬了第一杯酒，一连连长陈伯钧敬了第二杯酒。他们一面互相勉励，预祝在新的战斗中杀敌立功；同时又畅谈各营各连的战斗作风，消灭敌军的条件和方方法，以及红军的各种战略战术问题。大家边吃边谈，兴致勃勃。突然，山下传来了密集枪声，毅安命令各连干部返回战斗岗位，他自己来到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他发现敌军第二十一团从山下正面向营指挥所两侧发起进攻，便命令机炮连发炮轰击山下的敌人；同时命令一连派出两个排埋伏在营指挥所两侧，伏击敌人。炮弹在敌群中爆炸，一炮落地，敌人倒下一大片。侧面敌人也遭到伏击，死伤很多。敌人扔下无数尸体狼狈逃窜。红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夺取了敌制高点，乘胜直抄龙源口。毅安率领红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立即向敌人出击，同二十八团配合夹击敌人。敌人腹背受击，全线崩溃。这一仗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粉碎了湘赣两省敌人的联合“会剿”。

八月初，红军大队在湘南失利的消息传到井冈山。毛泽东当即决定，亲自率领第三十一团第三营去桂东迎还红军大队，着令陈毅安率领第一营坚守井冈山根据地。八月中旬，湘敌第八

军一个师，乘我军主力在桂东之际，急忙从酃县进攻宁冈，偷袭井冈山大本营。陈毅安得此情报后，率领第一营和团部直属队，日夜兼程从宁冈、永新、茶陵边界地区撤退，直奔井冈山重要哨口黄洋界。八月二十九日，第一营全部进入黄洋界阵地。当晚，一些干部在阵地上围在几条破旧的军毯或夹被里。这些人有的是农村私塾出来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农讲所学生。他们在一起论古道今，兴奋地展望即将开始的黄洋界保卫战的发展情况。毅安也来到他们中间，参加他们的“讨论会”。有的说在中外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很多：曹操在官渡打败袁绍，刘备、孙权联合在赤壁打败曹操，谢玄在淝水战败苻坚。越谈对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越充满信心。毅安也发了言，他着重分析了当前的战争形势和我军的有利条件。他说：“湖南的敌人以为我主力正在湘南和永新，山上无红军主力，这是进袭我井冈山的好机会。因此，便轻装到了黄洋界山下，想速战速胜，邀功请赏。我们处于地利人和的有利地位。每连一百三十人，战斗力强，还有后方作依靠，可以持久地打；而敌人在我们根据地内作战，困难很多，是不能持久的。我们要艰苦奋斗不懈，做好充分的准备，决心夺取这次保卫井冈山的战斗胜利吧！”<sup>①</sup>大家听了他的话，振臂挺胸，摩拳擦掌，表示决心要打好黄洋界保卫战这一仗，给历史上再增加一个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八月三十日清晨，云雾消散。麇集在黄洋界山脚下的湘敌先头部队，向黄洋界阵地发起了进攻。由于草丛里插了竹钉，敌人只能一个个地缓慢匍匐前进。敌兵力虽多，但无法展开，

---

<sup>①</sup>见《红旗飘飘》第2集第11页。

最多一次只能使用一个营的兵力。敌军进攻，红军开始不予理睬，等敌军进入有效的射程内，毅安一声令下：“打！”步枪、鸟铳一起发射，滚石、榴木同时向敌阵倾泻，大批敌人被打死打伤；活着的慌忙钻进树丛中，又掉进陷井和竹钉阵里。战斗打响后，毅安一直在前沿阵地，密切注视着战情变化，随时改变打法。激战一上午，敌人连续发起了三次冲锋，都未能通过小山梁的一条隘路，就被红军击退了。下午四时，毅安命令部队从茨坪修械厂拾来一门修好的八二迫击炮，安在指挥所阵地附近，向敌人发射了三颗炮弹，一发炮弹正好在敌群爆炸。炮声轰隆，吓得敌军魂飞魄散，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不敢恋战。晚间，敌人乘云雾弥漫，我军无法下山的时候逃回酃县去了。在宁冈、新城伺机出动的赣敌听说湘敌败退，也赶紧逃跑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毅安奉命率领部队向井冈山北面进军，迎接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十一月六日，红五军和红四军会师于宁冈。当天举行了隆重的会师仪式，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人出席大会，登上主席台；毅安担任大会司仪。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江西敌人组织十一个团的兵力进犯井冈山，红四军在黄坳与敌军作战三天三夜，给敌军以重大杀伤。敌军溃退，毅安率领一营追击至永新北岸的烟江。此时，从井冈山南麓增援的部队到达这里，张宗逊，朱良才带领的部队，正由阳桥出发，向指定的方向迂回；伍中豪率领的部队则向西移动，准备围歼敌军于永新以南烟江以北地区。突然，敌三十五旅从西北角猛扑过来，同红军在一条狭长的河床地段遭遇，发生争夺战。敌指挥所阵地前有几挺机枪封锁一片洼地，压得我冲锋部队无法通过。为了攻占敌军阵地，打掉敌指挥



所，毅安亲自带领一支小部队向敌人侧面运动。当他通过开阔地带时中弹跌倒，负重伤被抬下战场。

不久，毅安被送到井冈山井冈山红军医院治疗。毅安的小腿被打穿，流血过多，医院药物缺少，伤口化脓，伤势一天天恶化，连大小便都要人背。同毅安住在医院的，还有张子清、陈伯钧。他们也都是腿部受伤，陈伯钧的伤口在大腿，张子清的伤口在小腿和脚掌之间。打入张子清腿中的那颗子弹已陷在骨缝里，先后开了十几次刀，也不能取出来。他们三人在一起，虽然伤重，身体痛苦，但精神很好，经常是谈笑风生。他们谈到家世、战斗经历、理想和爱情。张子清说，他父亲原是个学徒工，后在谭延闿部下当兵，他从年轻时候起，就跟父亲一起当兵，混口饭吃。后来他父亲骂他当兵没有出息，要他回家上学。这样，他就到长沙上了陆军芝芳小学，后入湖南讲武堂。参加革命后，由排长、副官到红四军的参谋长。毅安也很健谈。他说，他们家孩子少，他出生不久，就过继给二伯母，是一子挑两房的人。陈伯钧听到这里，便开玩笑地说：“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一子挑两房的人，允许讨两个老婆。你现在虽苦，将来要比我们幸福，可以娶两位夫人。”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在宁冈县白露村召开了前委、特委、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根据地。还决定张子清、陈毅安、陈伯钧由于伤未愈，行走不便，不随红四军远征，派遣他们到红五军工作。任命张子清为红五军参谋长，陈毅安为副参谋长，陈伯钧为参谋。

毅安同红四军的干部、战士有着深厚的感情，舍不得离开

他们，但自己的伤未好，已由不得他了。毛泽东在出发前的一个晚上来到医院，同毅安、伯钧谈至深夜。还有其他许多战友如周访、谭希林等也来到医院同毅安他们道别。据毅安后来回忆，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的那几天，他的心情很不好。从秋收起义以来，经过的大小战斗、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又一幕的展现在他面前，真舍不得他们，有时简直想哭<sup>①</sup>。

红四军走后，围攻井冈山的敌军增加到二十一个团，形势越来越严重。红五军决定先把伤病员撤走，部队准备突围。张子清是第一个用担架送出井冈山的，但行至永新县境内，牺牲了。张子清死后，陈毅安担任红五军参谋长，参予红五军的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但伤未痊愈，难以适应极为恶劣的战斗环境。在同志们的劝说下，毅安服从组织决定，骑上彭德怀的大枣红马从井冈山双马石峭口南面的荆竹山突围。彭德怀亲自到毅安住处为他送行，希望他回家安心治伤早日痊愈归队。毅安离开敌人的封锁地区后，日夜艰难地赶路，多次因伤口剧痛，躺倒在客栈中，大约在三月初，才回到了家乡。

毅安回家以后不久，和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湘阴、平江、浏阳等县的负责人常找他商谈一些问题，红军联络员也常来向他介绍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形势。毅安还患有严重的肾炎。地方党组织对他十分关心，派医生为他看病治伤。经过一段时间精心治疗，伤病逐渐痊愈。同年十月底，毅安同志强结婚。当时湖南的反动军阀政府，对红军和共产党追查很严。毅安为了掩护自己，装着埋头家业的样子，同时积极锻炼身体，做好重返前线的准备。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

<sup>①</sup>据李志强的回忆。

一九三〇年七月初，彭德怀派他的联络参谋来到毅安家中，带来了彭德怀给陈毅安的信。第二天，毅安送走了客人。第三天，毅安辞别母亲和妻子，便启程归队。在毅安未到达部队之前，红五军已扩大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何长工任第八军军长，毅安被任命为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副司令员，彭雪枫任副政委。不几天，毅安来到军团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军团一些高级将领正坐在草地上开会。彭德怀首先看到了毅安，迎上来和毅安握手，说：“你来得真快！”毅安说：“听说你们打了几个大胜仗，我怎么不快些回来呢。”黄公略、滕代远、何长工、彭雪枫、黄克诚等老战友，都一齐涌上来，同毅安拥抱握手。他们别后又重逢了①。

一九三〇年初，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红五军利用军阀混战之机，打了几个大胜仗，开辟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占领了北至长江沿岸，南至广东南雄，西至平江、浏阳的广大地区。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为各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命令红三军团攻打长沙和武汉。彭德怀认为武汉周围有敌重兵防守，不易攻克，即使一时侥幸取胜，也不能久守。他说，如要攻占武昌，必须先占领鄂南周围数县，占领岳州，夺取长沙。根据彭德怀的意见，红三军团从大冶出发，接连攻占了咸宁、通山、蒲圻、崇阳等县城，七月初，又乘敌钱大钧两个师调离岳阳之际，攻克了岳阳城。

攻打长沙战役的序幕是从占领岳阳以后开始的，当时毅安还未归队。岳阳攻下后，部队重返平江扩军整训，做进攻长沙

---

①见《红旗飘飘》第21集第44页。

的准备工作。七月中旬，何键率他的主力部队向衡宝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长沙空虚；于是，湘鄂赣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团在七月二十五日向长沙进攻，同时任命陈毅安为攻打长沙战役总指挥。毅安协助彭德怀指挥红军在晋坑歼灭敌军一个团，在金井歼灭敌军两个团的大部，突破了敌人的金井防线。二十七日，在槩梨同敌激战，毅安亲自指挥一支三百人的敢死队，一律背着冲锋枪，配带手榴弹，绕到敌人侧面杉木港渡河。敢死队登岸以后，猛攻敌人左右两侧，突破敌人七里巷据点，敌人在长沙外围的防线，全部陷入瘫痪状态。毅安马上找到渡口船夫说：“你们天天盼望红军来，今天红军真的来了，快些搭起浮桥让红军大队通过吧！”船夫敲锣集合船只，立即在浏阳河上架起了浮桥，集结在河对岸的第一纵队全体官兵，便迅速地从浮桥上通过，进逼长沙城。

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傍晚，在毅安指挥下，第一纵队先头部队两个团首先从长沙韭菜园小吴门入城。接着，各路大军象潮水般地向长沙城挺进，直捣省政府。在那里的两千余敌军被包围缴械。红军随即占领了发电厂、江岸、码头、火车站等地和高大的建筑物。革命红旗在长沙城上空飘扬，整个长沙被红军占领了。

攻克长沙的第二天，毅安在圣经学院军团指挥部大厅里主持召开了一个外事会议，到会的有各国驻长沙领事馆人员一百余人，第八军军长何长工用法语讲了话。他要求各国军舰务必于明日八点钟以前一律撤出长沙，撤走时必须鸣放礼炮，各国电台、报刊、杂志等，不得对红军有任何不尊重的称呼。以上各项，如不依照执行，一切后果由各国政府承担全部责任。当时有一家外国电台报道了这一消息：“在红军指挥部，发现一个

青年军人，腰间系一根皮带，从外表看象是个班长，但法语流利，神通广大。”<sup>①</sup>

长沙攻克后，大批俘虏兵集中在城郊第四十九标兵营。毅安奉命对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他当众宣布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不打不骂，不搜腰包，每人发一个月的饷，有伤的发两个月，一律动员回家。有不少俘虏深深为红军的优待政策所感动，要求留下当红军。毅安通过了解，挑选一批成份好、年纪轻的补充了红军队伍。毅安在与俘虏兵交谈中，找到一个被服厂，里面库存有上万套军服。他又动员被服厂工人用三天三夜功夫为红军赶制了一批军服，每个战士发给两套。毅安还发现位于市中心荷花池有敌人的军火库，里面储存了大批机枪、子弹、火炮，由于红军来得神速，只顾逃命的敌人，来不及把这批军火带走，就把火炮、机枪上的零件拆下扔到井里。毅安组织一批人搞来了一台抽水机将井水抽干，终于找到了各种零件。在敌人仓库里还清查出来九部无线电台。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深深敬佩毅安的才干，觉得他不仅会打仗，而且会管理后勤。他对毅安说：“你这个黄埔生真是多才多艺！”

毅安的学生时代，有一半时间是在长沙度过的。因此，他对长沙城内的情况十分熟悉。一天，毅安对彭德怀、何长工、彭雪枫、黄克诚等说，打开长沙几天了，我们还没有吃点好东西，到长沙著名的面馆“奇珍阁”去吃碗面吧？他们带着一个警卫排，骑马来到奇珍阁。市民争先恐后围拢来看热闹，端详高大的战马。毅安推开面馆窗户，利用这个机会向市民讲话，

---

<sup>①</sup>这则消息是当时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的刘伯承在一本外国杂志上看到的。

宣布了何键的“八大罪状”①。

红军占领长沙期间，毅安的爱人李志强因患有露胎病，要打安胎针，也到了长沙城，同毅安见了两次面。第一次是李志强去找毅安的，毅安因军务繁忙，急待处理的事一件接一件，见面时间很短。后一次是在红军撤离长沙的前夕，毅安带几个人来到李志强住地向她告别。等毅安一行坐下后，志强告诉毅安，她已怀孕了。毅安听了十分高兴，连声叫好！并说：“将来生下来的，不论是男是女要和我一起干革命！”毅安还告诉志强：如果今晚发生战斗，必定有军令要他上前线指挥作战。他要坚决去执行任务，这是革命的需要。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随时准备牺牲个人，服从组织，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②。毅安满面笑容地说完这些话，起来和志强握手道别走了。

当天晚上，国民党反动派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分三路渡河进攻长沙城：一路从南门外灵官渡渡河；一路从大西门外的湖南纺纱厂渡河；第三路从北门外的新河渡河。毅安指挥第一纵队，沿新河，经武门、小吴门和浏阳门防线正面阻击敌人。这一线向红军发起进攻的是敌战斗力较强的王东原旅。他们依仗优势的火力，向红军发起强攻。红军坚守在工事里顽强地阻击敌人，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敌人采用人海战术，命令成排成连的士兵向红军阵地扑来。毅安组织爆破队，令每个战士背着几十斤重的炸药包前进到敌阵地前沿。每当敌人发起进攻时，爆破队就点爆炸药包。炸药包一响，敌阵地被火海吞噬，大片的敌人被炸死。毅安便乘机指

---

①见《红旗飘飘》第21集第46页。

②据李志强的回忆。

挥部队冲杀出来与敌人搏斗，击退敌人的进攻。

我军各部虽然杀退了敌人的多次攻击，但终因敌众我寡，战斗逐渐由长沙城向经武门外的乌梅岭转移。此时，驻在市中心的军团政治部还在敌军包围中未撤出来。彭德怀听到这一情况后，万分着急。他马上找毅安商量，决定由他和毅安亲自带领一个师对市中心的敌人发动钳形攻势，经过激烈的战斗，把政治部同志接出城外。在战斗打得最紧张的时候，毅安和彭德怀一直在一起指挥作战。毅安对彭德怀说：“子弹打得这么密，你快走开吧！让我在前线指挥！”

天快破晓，毅安来到前沿阵地上。他带领警卫员朝枪声密集的方向走去。这时敌人一挺机枪突然从侧面向他开火。他跌倒了，腰部中了四弹，血流不止。拂晓，担架队员将毅安从前线抬下来。由于伤势严重，流血过多，经急救无效而牺牲了！这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七日清晨，毅安时年二十六岁。毅安的遗体，由他的警卫员护送至浏阳县境的永安市，埋葬在附近的荒山中。

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李志强突然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毅安写的亲笔字，打开信一看，里面装的是两张白纸。这是毅安在出战前交给他的战友的。如果他牺牲了，就将信发出，收信人接到信就知道他已牺牲（根据李志强回忆，毅安曾经这样同她相约过）。不过，她不肯相信。这封信是毅安烈士为了革命的胜利宁愿牺牲个人生命和爱情的崇高品质的见证，是我们今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作者附记：**本文主要根据陈毅安烈士的夫人李志强、儿子陈晃明提供的材料，和李志强访问彭德怀、何长工、宋时轮、谭政、黄克诚、肖克、陈伯钧、刘型、邓华、张宗逊、韩伟、谭希林、赖毅、赖传珠等同志的资料编写而成。

## 毛 简 青

吴定邦 林 霖

毛简青，名纶，字东成，湖南平江人。一八九一年农历十月生。父亲毛丰山，以经营槽坊及履泰商店致富，广置田产，年收租五百余石，并在县城附近的金窝，营建一栋精致的别墅，成了当地有名的富绅之家。毛简青是独子，父母对他异常溺爱，尤望他长大成名，增光门楣。他六岁入学。一九〇四年，他满十三岁，偕好友欧阳坦君同入碧潭小学，受业于朱鉴堂先生。碧潭小学原系碧潭书院，虽改名小学，仍因袭书院旧制，专重讲授经史国文，学生年龄均较大。一九〇五年，父亲以重金礼聘茂才张淑纯先生来家为他课读，并允许欧阳坦君一人附读。一九〇六年，又送他就读于拔贡廖泛青先生门下。他读书认真，天资又好，业绩常不后人，年少时就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一九〇七年，他考取了平江县中学。同年冬，又转学到岳州中学，直读到一九一二年毕业。这时，他已二十一岁。

中学时代的毛简青，在同学中以性格倔强、思想进步见称，丝毫没有富家子弟的纨绔习气。他从小爱打抱不平，遇有大同学欺侮小同学，总是挺身而出，同其较量。稍长，更有胆有识，敢说敢干。凡反对道台、鼓动学潮等事，他总是“一马当先”，“少不了有他的份”，因此，同学们都叫他“毛大炮”。他十分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经常大骂清廷政



府的腐败无能，而思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辛亥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改造中国、改造社会、臻国民于富强的希望。他在岳州中学毕业后，婉拒了同学要他去考长沙岳麓高等师范的劝告，说“吾志不在此”；而是想自费去日本留学。他的志愿，得到父亲的支持。一九一三年，毛简青带着妻子吴淑坤，随同几位同学来到了日本东京。

据当时一起在日本留学的凌霞新、凌炳等老人的回忆：毛简青到东京后，先租居几间房子，与同学凌霞新、凌炳等住在一起，补习功课。大约在一九一五年，他考取了仙台第一高等学校，在第一部文科学习。这所学校，属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办的预备学校，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凡考取这所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每年还可享受本国政府的津贴。他在这所学校毕业后，又以好的成绩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

毛简青在日本留学期间，学习刻苦，每晚总是读书到深夜或鸡叫；天一亮，又将同学叫醒，一起早读。他成了被同学取笑的“书呆子”。当有人问他“读这么多书有何用处”时，他笑着回答说：“中国民众，再不能愚昧无知了。要解脱愚昧的思想绳索，就必须多读书。毕业后回国，以知识唤醒民众，共谋民族之利益，这才不枉为中华子孙！”<sup>①</sup>他阅读了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当时在日本能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学会了日文、英文和俄文。他还留心留学生中各个派系的言论观点，有时也同同学一起讨论，阐述自己对社会改革各种问题的看法。在东京的九年间，由于他的辛勤学习，成了同学们所推崇的“学有根底”的人物。

---

<sup>①</sup>1979年12月访问凌霞新谈话纪录。

毛筒青在日本长达九年的留学生活，既注重俭朴，讲究情操，又富有风趣。他有件冬夏两用的日本和服，冬天，填上棉花当棉袍；夏天，取出棉花当夹衣。同学们笑他：“你的经济学真是学到家了，连穿衣也这么讲经济！”他笑着说：“生活上艰难点有好处，把节下来的钱买书，不是更有意义吗？”同他住在一起的同学，开始大家还轮流做饭，上街买菜，后来这些事，包括同学的衣服浆洗，全由他妻子吴淑坤给包了，让同学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他对吴淑坤很好。按照帝国大学的规矩，学生必须剃光头和穿制服。他虽一身东洋学生打扮，但总是和身着中国女装的吴淑坤走在一起，坦然自若，不怕一些日本男女的围观和嘲笑。有人说他“洋学生配小脚女人是奇闻”，而他却说“这有何奇怪？中国人配中国人，穿中国服装，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伴侣！”有次，他和同学一起去游泳，吴淑坤也去了，但不敢下水，只在海滩边走走。他看淑坤这个样子，笑着说：“中国的小脚妇女，应到东洋的大海中锻炼一下。”话音未落，他一把将淑坤拉入水中，使得淑坤一声惊呼，淹没在海浪之中，还呛了几口海水。当他扶着淑坤走上沙滩时，大声笑着说：“这也是中国妇女的一次革命啊！”

毛筒青留下的读书笔记不多。仅找到他用当时流行的日本文言文写的几页残存的笔记，现把它翻译摘录如下：在题为《读书之乐》一节里，他写道：“凡事无友不成，惟读书一事须无友而独乐。居一室之内，望天下四海，知天下万物之理，居数千年之后，望数千年之前，知社会变革之事。……以吾愚人，而得结交圣贤，皆读书之乐也。……然世人不好此道，其不幸甚矣。好此道者，可谓得天下之至乐也。”在题为《立志》一节里，他写道：“学问以先立志为本，志者心之所

行也。……君子之心，常常不懈，念念不止，谓之立志。志不立，学必无成，故古人有云：‘有志者事竟成’。又云，立志者，学之本也。譬如射弓者志于的，行路者志于宿。万事必先务本，立志者即学问之本也。立志须勇猛，不可柔弱怠惰，怠惰无效而不行。求道，譬如饥而求食，渴而求水。悠悠怠惰则废志，宜专注而不可为外物所夺。尚书有云，玩物丧志。耽欲于无益之杂艺，倾心玩物，则丧学道以成君子之心。好玩之物，皆害志也。程子曰，不专不能成事。专一，譬如猫之捕鼠，鸡之孵卵，无他念也。……文艺武艺，诚为士人必习之事，须勤习之。然则，艺者，末也；道义之学者，本也。只顾好艺，学之，志必被夺，况任私欲所恣！应有所诫……有职者从职，有产者治产，专一其心以修学，朝温夕勿冷，昨勤今勿怠，如斯日日不变，月累年积不止，……成学之效验必可见也。”在题为《修业之心得》一节中，他写道：“……就业不可怠，成功不可急……急于成功，则生无聊之念，事则难遂。于业不怠则有趣，有获致成功之望。学问之事，为事业之最，无心得则不可。然学生之常情，初时尚能充分努力，不久便生无聊之念，其甚者，终至废学。……如木匠、泥瓦匠之辈，尚且须下数年之功夫以修其事，否则不能称其职；而况修为人之道，修士大夫为人师表之学问之道，非容易成就之事也。人之精力原本有限，非勤勉无以遂其志……。”这虽是些片鳞只爪，也可见他求学用功之一斑。特别是他强调把立志作为求学之本；求学必须月累年积，日日不变；怠惰必然导致废志废学；只有勤勉，才能志有所专，学有所成，等等，都是些十分中肯之言。

一九二一年夏，毛简青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与李六如在长沙任教；一九二二年，又经李

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在长沙，在广州，在梧州，在平江，他都以学者的身份来掩护党的工作。这时，他的性格已不像以前那样“火炮”了，而是“为人举止从容，性情爽直，言谈诙谐，平易近人，各阶层人士都乐于接近他”。在长沙期间，他当过湖南审计院的审计员；又当过省财政厅经济股股长，并在法政学校讲授经济学。他与李六如、方维夏、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往来甚多。以致他住在荷花池的房东，误把他当毛泽东，曾劝他另迁住所，他笑着解释说：“我非毛泽东，乃润之之友耳。”这时欧阳坦君在坐，相与附掌而笑。他在长沙两年多的活动，现知道情况的人不多。据李六如老人的回忆，也只能说他入党后，“革命性很强，忠于党的革命事业。在长沙文教界从事革命活动，十分积极”而已。

一九二四年五月，他被党组织选派到广州新成立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一九二五年，两广区委决定派他去广西梧州从事党的工作，到设置在梧州的“中国国民党广西省宣传养成所”任教。这年五月，他带着妻室和两个孩子，一道来到了梧州，以养成所教员身份开展活动。不久，区委又派谭寿林来所任教。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党的工作很快顺利开展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当地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梧州地区党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首先是恢复了停刊已久的《民国日报》，作为指导群众运动的舆论阵地。梧州是英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开为通商口岸”之一，在当地设有英领事馆、海关及教堂，控制着梧州的经济命脉，民族矛盾甚是尖锐。辛亥革命后，一些进步人士在这里办有《民国日报》，经常揭露英帝国主义分子在梧州进行经济、文化侵略

的罪行,尤其是副刊“冲锋”,办得尖锐泼辣,使得反动当局非常害怕,不得不勒令停刊。这张为人们所喜爱的报纸复刊后,又以新的战斗面貌,展现在读者面前。毛简青、谭寿林为办好这张报纸重新组织了班子,谭寿林还兼任报社的文化主任,成了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桥梁。例如,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民国日报》及时向梧州人民提出了七项呼吁:一、从速筹款汇沪,接济被难同胞;二、设法使本市受雇于外人之工友,一律离职,并设法收容;三、请教会学校学生离校,由教育界收容;四、请各校学生每星期天离校和每晚出发演讲;五、请各商界停止购卖英、日货;六、禁用英国纸币和银币;七、各机关成员抽薪一成,接济被难同胞。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发生沙基惨案,《民国日报》又以“十万火急!万急!万万急!”的特号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惨案的经过,配合全国人民的反帝浪潮,进行了有力的战斗。

其次,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冬,广西最早的一个党的支部——梧州支部建立了。被吸收入党的都是一批优秀的共青团员,谭寿林任支部书记。一九二六年,又成立了梧州地委,谭寿林任地委书记,毛简青任宣传委员。地委机关就设在毛简青住房的楼上。二楼是地委办公室和谭寿林、马英的住房,三楼是地委会议室,室外有一小阳台。由于毛简青是学者,声望高,大家叫他毛先生,当时的反动分子还没有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因而有力地掩护了党的活动。在梧州地委的领导下,南宁、桂林、柳州、桂平、玉林、来兰、怀集等地的党组织,都先后建立和得到发展。

再次,改组了国民党梧州市党部,着力发展群众组织,支持群众进行各种斗争。由于党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在国民党梧

州市党部的改组中，新选的七名委员，共产党员就占了五名，掌握了领导权。在市党部的领导下，一些工会、商会、学生及妇女等团体，都先后建立起来，它们组成了一个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整体，特别有力地支援了一九二六年二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一期间，全市还开展了没收仇货和拍卖仇货的斗争，《民国日报》每天刊登拍卖仇货的消息。仅两个月时间，拍卖收入达五千五百余元，全部汇出作为支援省港罢工斗争的经费。

第四，毛简青和谭寿林利用养成所这块阵地，着力地为党选择和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他们用自己办的《火线》半月刊及其他进步刊物，向养成所的进步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然后个别做工作，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要在广西招收四十名学员，仅梧州市养成所就选送了三十三名。这是他们对发展农民运动所作的重要贡献。

第五，组织梧州市工人、市民、学生举行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被国民党右派把持的苍梧县党部，为了破坏当时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勾结军警枪杀了三名工人，制造了有名的“三工人惨案”。梧州地委立即组织罢工、罢市、罢课进行反击，提出“三条要求”：一、将肇事者第六旅旅部副官刘善鸣撤差，发赴前方效力；二、对被枪杀的工人，其家属每人抚恤一千元；三、再由军部调令各部，此后对于农工要切实保护。这一斗争得到香港、上海、北京、天津及其他地方的工团和总工会的一再声援，并取得胜利。

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工农运动风起云涌，我党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也越来越尖锐。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右派

借口苍梧县党部经费无着，对群众强迫征收所谓“冥镪炮竹捐”。梧州地委发动群众进行抗捐斗争，并于十一月十九日召开群众大会，提出打倒县长严海峰、县党部书记长廖家昌和县立中学校长黎植松的口号。严、廖等人则以“私运军械，图谋作乱，扰乱治安”的罪名，密令警察局长赫蒂，带领军警包围了梧州市党部、《民国日报》社、工联、商民协会等机关，逮捕了谭寿林、钟山、胡奕卿、蔡美利、李锡彤等五人。这就是当时梧州的“一一·一九”事件。在群众的掩护下，毛简青转移到了南宁。经过我党的营救，虽然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得不一九二七年三月释放了谭寿林等同志，但毛简青和谭寿林已不能再在梧州工作了。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毛简青回到了湖南。

这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省政府主席唐生智的支持下，已在长沙教育坪办起了省党校，唐兼任校长。我党曾选派谢觉哉、李达、郭亮、夏曦等去该校任教，毛简青也被派往该校任政治教官。在当时，这所党校实际成了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场所之一。

“四·一二”事变后，湖南省委派毛简青回平江，任务是领导当地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他接受任务后，带着妻室儿女，又回到了平江老家金窝。这时的平江，反革命当局正在策划一场对革命工农的大镇压。代理县长曹修礼，正式宣布关闭所有革命机关。这个县长还纠集还乡的土豪劣绅，组成所谓“拥蒋捧喝团”，公开宣布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策划成立“救党委员会”，秘密制定了杀人计划，将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都列入屠杀名单。这个县长还与国民党在平江的驻军十六军第四师相勾结，制造了抢夺农民自卫军枪枝事件。有的反动分子蠢蠢欲动，捣毁区农会、工会，

逮捕农会干部的事经常发生。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大搏斗即将爆发。

毛简青回到平江的首要任务是掌握武装。这时，早已秘密入党的县团防总局局长余贲民，掌握着团防总局的五百人枪，成了省、县当局的拉拢对象。他们想诱骗余贲民接受政府军的改编。党内有的同志也错误地认为接受这种改编是“好事”。毛简青及时做了余贲民的工作，向他传达了省委的工作部署，并商讨如何保存这支武装力量等重要问题。反动派见余贲民没有上当，于是将余的母亲及亲属抓起来游街示众，扬言余不接受改编，就要杀死他的母亲。但敌人的恶毒手段，没有动摇余贲民坚持武装斗争的决心。

不久，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一场血雨腥风的大屠杀，立刻在全省各地展开。平江也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为了应付这瞬息万变的险恶局面，湖南省委郭亮来到了平江，在县城的培元学校召开了县委紧急会议，改组县委，由毛简青任县委书记，并决定五条应变措施：一、必须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屠杀，以革命的武装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扩充现有武装，将县团防局、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平江工农义勇军”，由余贲民任总指挥，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剿”，保卫平江；三、推翻国民党的现政府，建立联合各界进步人士的临时委员会，代替政府工作；四、成立特别法庭，坚决打击那些不法地主、土豪劣绅和反动资本家；五、动员城关地区所有群众参加大会，声讨反动军阀许克祥。会议还议定将县委机关设在毛简青的家里——浊水金窝，利用他父亲和他的社会地位掩护党的工作。

在县委的领导下，余贲民于六月十九日，带领团防局的武



装，突然包围了平江县政府，逮捕了代理县长曹修礼，给曹戴上高帽子游街。第二天，宣布成立县临时政府委员会，由共产党、国民党、爱国知识分子及工农代表共五名委员组成；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特别法庭。七月一日，在县城月池塘召开“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有数千群众参加。大会喊出了“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并向全省寄发了《平江人民讨许大会敬告民众书》。特别法庭还公审了浯口大劣绅江望南及县警察所的反动头目，判处了他们的死刑。这一行动有力地说明，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不管敌人怎样疯狂镇压，也不管革命遭受多么大的挫折，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总是要曲折地向前发展的。

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于同年九月间，在湘赣边区领导了秋收起义。余贲民指挥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参加了秋收起义，并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从事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平江工农义勇军撤出平江后，国民党省政府对平江实行了残酷的清乡，将平江人民置于大屠杀的血海之中。清乡委员阎仲儒，县长王紫，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人们叫他们为“阎王清乡”。他们到处抓人杀人，抢物烧屋，罪行血债，擢发难数。在这种严酷的白色恐怖面前，毛简青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关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谢觉哉有如下比较详细的回忆：

“平江在大革命时期，为革命工作先进地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何键匪部，派阎仲儒所部驻平江，对共产党及工农积极分子大肆屠杀，有阎王之称。简青同志有几次几被所擒，但他毫无逊色，与罗纳川等同志一面恢复组织，先后于长寿、加义、献冲、安定、思村、虹桥、长庆等地建立区委及

支部，并设暴委于根据地的献冲罗家祠，简青任县委书记，罗纳川任县委组织部长；一面扩大工农游击队，以东乡的长寿、加义、献冲，南乡的思村、安定，北乡的虹桥、长庆等地为根据地，不断打击国民党匪军及地主恶霸组织的反动武装挨户团。不数月，平江党的组织大量发展，革命武装及工农群众组织空前壮大。国民党匪军及伪政权，偏促于县城弹丸之地，不敢出城一步。”<sup>①</sup>

能够促成上述大好形势的发展，主要是毛简青和罗纳川等同志着重抓了以下几件事：一、抓紧恢复党的组织，在“阎王清乡”期间，全县二十个区委及其所属支部，几乎全被破坏，七千多党员锐减为三千七百余。经过他们的工作，不仅区委全部恢复，还加设了上东乡、下东乡、南乡、西乡、北乡五个特委。党员人数也增加很多。二、抓紧建立革命武装。在县委的领导下，罗纳川以收集到的三支半枪（有支打不响的算半支）起家，成立了一支游击队。不久，蒋（介石）唐（生智）战争爆发，平江成了主要战场。县委发动群众，以各种办法收缴散兵游勇的枪枝子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全县共收缴了两百多支枪和数千发子弹，武装了分驻各乡的几支游击队。三、利用军阀混战形势，及时组织暴动，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促进革命形势的好转。这时，省委派夏明翰、李六如来到平江，毛简青向他们请示和汇报后，立即在全县作了组织暴动的部署，这一斗争很快在全县各地展开。例如，罗纳川率农民自卫军缴了献冲警察所的七支枪，并将警察所长、杂税所经理、献冲段长等人处决。上东乡特委书记吴钦民，在长泰乡组织暴动，一举包围了

---

<sup>①</sup>谢觉哉：《毛简青同志传》，载《湖南烈士传》。

长泰乡警察所，缴枪八支，并将所长处决。北乡特委书记李宗白，带领暴动群众，搬走了大土豪劣绅家里的财物；南乡特委书记邱训民，用三支枪和两把马刀，深夜袭击思村挨户团，斩杀团丁十余名，缴枪八支。全县类似这样的暴动还有很多很多。与此同时，县委还重视做策反工作，如黄金洞的矿警队，就是经过做好策反工作之后，队长侯金武率队起义，投向革命队伍的。武装暴动的风起云涌，控制了平江广大农村，迫使县城的反动势力龟缩在城里，惶惶不可终日。

这时，全县的革命武装，已有枪三百多支，游击队员八百余人。为了统一指挥，县委决定成立平湘游击总队，由余本健任总队长，罗纳川任党代表，属县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总队下设五个大队：第一大队驻南乡，队长钟绍秋；第二大队驻下东乡，队长俞赓；第三大队驻北乡，队长徐子俊；第四大队驻西乡，队长钟永彪；第五大队驻上东乡，队长侯金武。这是平江继余贲民上了井冈山之后，重新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

平湘游击总队成立后，曾进行了两次大的战斗。一是消灭了盘踞长寿街的邱国轩团。秋收起义后，邱曾投靠革命。不久，他在长寿街的金坪叛变，使秋收起义部队受到损失。毛简青经过周密的部署，在长寿街将邱团一举击溃，并在加义杏树滩将邱捕获，然后召开万人大会将邱处决，为民除了大害。二是发动了著名的“二月扑城”战斗。这次声势浩大的扑城战斗，是以罗纳川为主任的平江县暴动委员会领导的。毛简青作为县委书记，虽然没有公开出面，但他实际上是执行暴动计划的总领导。他为组织这次暴动，夜以继日，四处奔走，做了许多工作。在政治思想上，他把这次暴动看成是对全县人民的一次大发动，是要给疯狂的敌人一次严重的教训；同时认为对我党

我军及广大人民群众，也是一次实战的考验和锻炼。因此，他和罗纳川一起，对组织这次战斗，作了极严密的部署。例如动员群众的规模，指挥系统的设置，各种部队的配合，调整行动的信号，武器装备的筹措，扑城日期的选择，对县城消息的封锁，等等，都一一做到考虑慎密，部署周到，因而能很快把近十万的扑城队伍组织起来。

一九二八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凌晨，暴动部队根据县委和暴动指挥委员会的命令，从四面八方向县城进发。走在最前面的，是五花八门的化装队伍，其中，有和尚，有道士，有抬轿迎亲的，有抬神还愿的，有做小买卖的，有玩江湖把戏的，一路吹吹打打，后面还跟着许多看热闹的人，一起混挤，涌进城去。不久，攻城信号的松树炮响了，各路人马，一齐动手。城外的敢死队，奋起冲锋；城内的化装队，高呼响应，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一片慌乱，并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下午，扑城部队快接近县政府所在地时，得知敌人增援的两个师，已到了离城只有十多里的沉石。毛简青、罗纳川当机立断，下令扑城队伍抢在下午五时前全部撤走，使敌人包围县城的计划扑了空。这次战斗，虽然没有达到占领县城的目的，但对敌人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显示了党领导的农民武装的巨大威力。

“二月扑城”的革命烽火，使得湖南省反动当局极其害怕。他们派出王东原、陈光中、李觉三个师的兵力，来平江“清剿”，叫嚷要“地翻边，人换种”，“血洗平江”。县长刘作柱上任后，更是纠集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成立清乡委员会，组织挨户团常备队和难民团，对农民进行疯狂的报复。王、陈等部在长寿、加义、献冲、思村、安定、龙门等所谓“赤色地区”驻有重兵，与挨户团配合，逐村逐屋，挨家挨户进行搜捕和屠

杀。在龙门，他们一次就杀了一千三百余人。陈光中还给士兵分配杀人任务，以回交左耳记数。平江农村淹没在刀光血海之中。

屠杀吓不倒平江人民，也割不断平江人民同党的血肉联系。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特别对于被敌人到处挂像悬赏搜捕的毛简青、罗纳川等同志，许多农民都是冒着牺牲身家性命的危险来掩护的。有次，毛简青被敌人追捕，走进一户农民家里，当这户农民认清他是县委书记时，立即将他藏在地窖里。结果，这户农民母子俩都死在敌人屠刀之下。此后，由于形势的不断恶化，毛简青不得不离开平江。

在平江，虽然有很多从事革命斗争的干部和群众，只知道有罗纳川，不知道有毛简青，但经过这次“扑城”以后，凡知道他是县委书记的人，无不对他由衷爱戴。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无私地献给革命的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以前，他家虽是有名的富绅之家，但他和父亲从不以自己的财势去欺压群众，相反，还乐于资助别人，为人们排忧解难。有这样两件事：有个常来毛家做衣的钟姓师傅，家里很穷，几次想借钱又不敢开口，毛简青知道后，动员母亲派人送两石谷到钟家，至今钟师傅家里的人还铭记着这件事。又有一次，毛简青看到两个妇女在路上打架，上前把她们劝开，又请到家里，详细问明情况，原来是为着十块钱的争执。毛简青立即拿出十块钱为她们解了纠纷。因此，人们传说他生了一个富人的身，却长了一颗穷人的心。这次他回平江后，又把家里的资财，都作了革命的经费开支，只剩下一栋房子了。他这次离开平江时，连路费也没有，只好向一位好友筹借。为了感谢这位好友的资助，他把一颗图章留赠作为纪念。他走后，敌人将他的房子也拆了，将砖石用去修了碉堡。

毛简青离开平江时，穿起在日本制的那套西装，打扮成一位阔少，坐着轿子，带着随从，说是从省府来的巡视员，还有清乡委员会的特别通行证，加上他那副高傲的神气，把一些关卡的团丁都吓退了。就这样，他平安地来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平江的情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湖南省委选举毛简青为省委委员和出席“六大”的代表。这次去莫斯科的全国代表共八十四人，同去的湖南同志有何叔衡、徐特立（由上海选派）、夏曦（浙江代表）等。而湖南的正式代表只有他一人。他还被选进了有周恩来、项英等二十一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大会结束后，他回到上海，被安排在全国互济会工作，并从事日、英、俄等国文字的翻译。这时，他的妻子吴淑坤和孩子也来到了上海。

一九三一年，党调他去湘鄂西工作。这以后的情况，只能从他的亲属和战友的回忆中，简略的知道一些。

毛简青的堂弟毛玉，曾在一九四五年见到毛简青的夫人吴淑坤，吴转告毛简青在离开上海时对她说的一段话。当时，吴淑坤问毛简青：“你出去工作，其它都没有什么，只是孩子太小，这个家怎么办，还要不要？”毛简青一面亲着孩子，把一块银元塞在孩子手里；一面亲切地对吴淑坤说：“家，我当然要。作为每个人的一生来说，当然希望骨肉团聚，过着美好的生活。但我们干革命，正是为着家，特别是为了四万万人的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是大家所知道的。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亡国灭种之祸，使得我们随处寄迹，劳碌奔波，去日本，回长沙，赴黄埔，往梧州，回平江，来上海，经受了多少惊涛骇浪，忍受了多少困苦艰辛！特别是您同我顶风冒

雨，同舟共济，为我做了许多掩护工作，真是茹苦含辛，始终不渝，这不正是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为了爱护四亿人民的家吗？我这次去湘鄂西，是组织的决定，革命的需要。我们这次暂时的分手，也是为了你母子的安全。你们不要离开上海，有困难，党会照顾你们的！”当吴淑坤谈到他们夫妇这次分手，竟成了最后的永别时，忍不住悲痛地掉下泪来。

谢觉哉也有关于毛简青在湘鄂西工作及牺牲经过的一些回忆：“我和毛简青同志一同工作了一个时期。一九三一年，我去湘鄂西（洪湖）苏区工作，不久，简青也来了。我编省苏维埃的《工农日报》，他编省委的《红旗日报》，都是一人兼编辑、采访、校对诸工作。洪湖地区低温，不适于简青同志的文弱身体，然而简青同志总是带病工作，未曾停止。我和简青同志同工作时，他给我的印象是：爽朗、诚恳、耐艰苦，对革命坚定，这样一直到他的死。”①

谢觉哉在另一份材料里，扼要地叙述毛简青的被捕情况：“……简青同志是一个颇有学问和道德的人，我和他在上海同居年多。虽因他出身大地主家庭，有些小资产阶级意识，但对于革命大道理，是完全了解，并愿意实干的。一九三一年，我和他先后来到湘鄂西苏区，我编《工农日报》（政府的），他编《红旗日报》（省委的），时常往来。直到他被捕那天翌晨，我跑到他房里，灯未熄，铺盖依然而人不见，旋知因肃反案入狱，但我想不出他之可疑之点。简青同志病死狱中，其案也未宣布……。”②

---

①见谢觉哉1953年2月16日给毛荫生寄的《毛简青同志传》的打印稿。

②抄件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现在比较清楚地知道，毛简青是在当时“左”倾错误的迫害下被冤屈致死的。同志们为他这位有才华而对革命忠贞的人，竟至被害牺牲而感到十分痛惜。他牺牲在洪湖边的瞿家湾，时年四十岁。一九四五年，谢觉哉曾为毛简青写过传略，列入当时延安编的《中国共产党烈士英名录》。全国解放后，谢老又一次为毛简青写了传略，收集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编的《不朽的战士》一书里。一九五一年，经内务部批准，毛简青的家属，按省一级烈士待遇进行优抚。特别在粉碎“四人帮”，彻底清除“左”倾错误对党的危害之后，平江人民更加怀念毛简青，永远纪念着这位为革命献出一生的好同志。

#### 附：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谢觉哉：《毛简青同志传》；载《湖南烈士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 方强：《平江怒潮》，载《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3. 邱创成：《直扑平江城》，载《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4. 陈再励：《大革命和秋收起义时期平江的革命活动》，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南地区革命斗争史资料》。
5. 谢觉哉、李六如、吴铁鸣、欧阳坦君、毛玉等写的回忆毛简青烈士的有关资料。
6. 关于毛简青情况，凌炳给毛简青之子毛荫生的信，李六如给中南人民出版社的信，龚饮冰给长沙市民政局、中共平江县三阳区委的信。
7. 访问凌震新、周省新、李省群、李直南、朱跨欧、杨光华等谈话纪录。
8. 广西梧州地委、特委旧址陈列馆有关资料。



## 李明瑞

罗永平

李明瑞，原名李瑾瑞，号裕生，广西北流县清湾乡人，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九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五）生<sup>①</sup>。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〇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第八军总指挥，红七军军长等职<sup>②</sup>。

李明瑞的远祖是一个产业丰厚的大家族，其祖父的晚年已成为破落地主，到了他的父亲，因为生活穷困，不得不离开原住的朱砂村，迁到十里外的平旦村，向地主租佃一些田地耕种过活。李明瑞青少年时代，在家里参加过各种农副业劳动，养成了勤快的好习惯。他和本村的贫苦农民关系融洽，了解和同情他们的苦难遭遇。李明瑞从小勤奋好学，先后就读于北流高小、玉林五属中学，学习成绩优异，深受教师和同学的赞赏。一九一八年，他中学毕业后，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到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以后他离开故乡，经人介绍到广东韶关云南韶州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一九二〇年他在“讲武堂”毕业后，即投身于军界。二十年代初期，他先后参加过讨伐老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等战斗，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

---

①李静生：《关于李明瑞烈士情况的复信》（1979年9月29日）。

②据中央组织部档存的《烈士英名录》第4册第3页和1975年12月8日、9日访问黄一平记录。

一九二五年秋，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当时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阴谋配合退踞在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军阀部队进攻广州，推翻广东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军队以统一广东，广东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进行第二次东征的同时，进行了南征。李明瑞参加了讨伐邓本殷的南征战斗，任国民政府南征第二路军俞作柏部第三团团长。他带领部队从广西玉林出发，经陆川北流进入广东化县，向高州方向的邓本殷主力进攻。由于他治军严明，指挥有方，英勇善战，在南征战斗中进展神速，战功显著，从十月至十二月间，在其他部队配合下，相继克服化县、高州、钦州、廉州等地，使军阀邓本殷的主力“除逃窜海南岛外，大部投降，少数上山为匪”<sup>①</sup>。随后，第一路军也在海南岛消灭了邓本殷余部。东征和南征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和巩固。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李明瑞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旅长、师长，率部转战于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一九二六年八月下旬，北伐军第四、七两军在湖南予敌以重大杀伤后，进攻的矛头直指军阀吴佩孚盘踞的武汉。天险汀泗桥被叶挺独立团和其他的北伐军部队攻破后，吴佩孚亲自带领其精锐部队数万人赶到贺胜桥防守。李明瑞率领部队配合叶挺独立团，在有重要意义的贺胜桥战斗中冲锋陷阵，把吴佩孚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随后，又和其他北伐军一起乘胜追击敌人。九、十月间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两湖战斗告一段落之后，李明瑞又挥戈东进，在江西箬溪、德安等地的战斗中，给了军阀孙传芳的反动军队以重大的打击。

<sup>①</sup>冯瑛：《参加讨伐南路军阀邓本殷的回忆》，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50页。

一九二九年春，爆发了第一次蒋桂战争。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军队，西上直捣武汉。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所辖的第七、第十八、第十九军在武汉布防对蒋作战。当时，李明瑞任桂系军队前线指挥官。蒋介石派人活动李明瑞来瓦解桂系，李明瑞与其表兄弟俞作柏、俞作豫密商决定：先倒桂后反蒋，利用蒋的力量倒桂后，再伺机反蒋。三月，蒋桂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李明瑞联络好桂军杨腾辉等部，于三月二十八日按照预订计划一致行动，在湖北黄陂的阵前宣告脱离桂系独立。他的倒桂行动象“晴天霹雳，全军震动，士无斗志，骄横一时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号称十余万之众，至此遂告土崩瓦解。”<sup>①</sup>第一次蒋桂战争于四月结束，桂系军阀头目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桂系军阀势力被逐出广西。

同年六月，李明瑞率领军队从湖北返回广西，就任广西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主任和广西绥靖司令之职，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当时，我们党在广西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俞作柏、李明瑞在大革命时期受我党的影响，同情革命，靠近我们党。他们掌握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请求我党派干部来广西工作。我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一时机，派遣一批干部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和政权机关工作。“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邓斌）、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sup>②</sup>在我党的努力推动下，俞、李执政期间，广西出现了大好的革命

---

<sup>①</sup>吕鉴周：《俞作柏李明瑞倒桂反蒋经过》，见《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sup>②</sup>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见《星火燎原》第1卷（下）第846页。

形势。党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很快；俞作柏、李明瑞释放和任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桂系军阀逮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解散了为反动派所把持的国民党各级党部，逮捕了一批桂系军阀安插在地方政权的反动骨干分子，下令开放工农群众运动，创办军官学校，李明瑞任校长。根据党的建议，李明瑞还在南宁开办了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党员徐开先任总队主任，张云逸任副主任。为了改造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大队，李明瑞又请张云逸兼任大队长，李谦任副队长。警备第五大队长则由俞作柏之弟、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经过党的努力，教导总队、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中的党的秘密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俞作柏、李明瑞执政才几个月，一九二九年八月，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拉拢俞作柏、李明瑞与军阀张发奎联合反蒋。当时我党认为他们回广西不久，反动势力还没有清除，政权不巩固，力量还未准备好，仓促行动，必然失败，曾加以劝阻。俞、李对改组派的策动反蒋，虽曾有过犹豫，但又认为当时全国南北各方联合反蒋，势力雄厚，是反蒋的大好时机，不可错过。因而他们不听我党的劝告，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通电反蒋，十月初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成立讨蒋南路总司令部，俞作柏任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率领军队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我党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是新建部队和需要保卫后方为理由，向俞、李提出这些部队留守南宁，维持后方治安。经一再说明和坚持，俞、李终于同意我党的意见，并委派张云逸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省军械库等机关。不久，由于他们手下的三个师长

吕焕炎、杨腾辉、黄权等相继率部叛变投蒋，他们的反蒋很快就失败了。留守后方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率领下，于十月中旬分别开赴左右江地区，作武装起义的准备。俞作柏、李明瑞从前线带着几个警卫人员回到南宁，随同警备第五大队到龙州；俞作柏经越南逃往香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又卷土重来，广西重新处于桂系军阀的统治之下。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在韦拔群率领的农民武装配合下，于百色举行革命武装起义。百色起义之前，留居在龙州的李明瑞，曾经到百色和我党联系，想拉起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进攻南宁，与桂系军阀李、黄、白较量，不利时则到十万大山割据，另立山头，重走军阀混战的老路。我党负责同志邓小平、张云逸先后对李明瑞做了许多耐心的思想工作。他们恳切地向李明瑞说明：“我们党是反对军阀战争的，是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的，而且要成立工农红军；今后是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搞土地革命，在左右两江，特别是有雄厚群众基础的右江建立根据地，并希望他和我们一道，参加革命，才是出路。再搞军阀混战是没结果的。”<sup>①</sup>并向他表示待左、右江正式建军后，我党准备请他担任两军总指挥，希望他走革命的路。邓小平、张云逸的这些话，使李明瑞深受教育。随后，他返回龙州，积极参与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龙州起义前，李明瑞头戴瓜皮红顶帽，身穿粗布便衣，和其他负责同志一道，深入到士兵群众中去，亲自讲课，做武装起义的思想发动工作。他说：“革命，这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

---

<sup>①</sup>莫文骅：《回忆红七军》第15页。

了，我们要准备起义，象红七军那样，跟共产党走！”<sup>①</sup> 龙州起义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一九三〇年一月底，李明瑞从龙州到达右江革命根据地。红八军成立后，他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中共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干部战士大会，热烈欢迎和祝贺李明瑞参加革命和就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职务。李明瑞参加革命后，在红七军党的负责同志教育帮助下，认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努力改造思想，积极争取进步。在工农红军这座革命大熔炉的熏陶冶炼下，李明瑞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他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本质和一定要遭到失败的历史必然性；懂得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和必定最后取得胜利的历史客观规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九三〇年二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sup>②</sup>。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广大革命战士一道，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

蒋介石在俞、李反蒋失败后，曾多次派其心腹带着“广西省主席”、“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和巨款，到龙州、香港等地活动，向李明瑞本人及其亲属进行游说，妄图诱使李明瑞改变反蒋立场，为其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效劳。李明瑞断然拒绝委任和收买。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了空<sup>③</sup>。李明瑞参加革命后，国民党军官杨腾辉、岑建英又以老同学、老同事的身

---

①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1辑第130页，未刊稿。

②1975年12月8日、9日访问黄一平记录。

③1975年12月18日访问李静生记录；《颜德忠赴梧晤李明瑞》，见1929年12月26日广州《公评报》。

份，写信要他脱离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和李、黄、白的改编。对于他们的这种反革命煽动，李明瑞十分愤慨，去信严加痛斥。他说：“共产党前途是光明的。国民党的味道已尝够了；它要利用你时，双手捧你，它不需要你时，一脚踢开。”<sup>①</sup>他奉劝岑建英等人改变与人民为敌的反动立场，弃暗投明，投向共产党和红军这方面来。李明瑞的复信，表明了自己忠于革命、忠于党的坚定革命立场。

桂系军阀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对红七军、红八军的诞生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极端害怕。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他们向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为了粉碎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李明瑞和红七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一九三〇年二月，他和军部其他负责同志一起，率领部队在隆安、平马、亭泗一带，同来犯之敌展开激战。三月，红七军转移到凤山县休整，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开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今后的行动方案。会议作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线出击的决策。四、五月间，李明瑞和张云逸带领红七军第一、二纵队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广西、贵州边境进行游击战争。韦拔群率领第三纵队留在右江，保卫和建设根据地。在攻占贵州军阀盘踞的榕江城的战斗中，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亲自带领特务连爬城墙打进城里去，全歼守城敌军，缴获了大批武器<sup>②</sup>。六月，在红七军回师右江收复百色的战斗中，他在离敌人只有五百米的地方，亲自架山炮轰击敌人用以负隅顽抗的大碉堡，两发两中，打得敌军死

---

<sup>①</sup>岑建英：《右江抗拒红七、八军亲历记》，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sup>②</sup>1976年5月13日访问黄一平记录。

伤累累。接着，我红军战士发起冲锋，分几路冲进城内，很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sup>①</sup>。解放百色后，红七军又挥师东下，收复了右江沿岸的恩隆、思林、隆安等县。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党中央领导机关犯了“左”倾错误。九月，中央代表邓岗到右江传达贯彻“立三路线”，要求红七军“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向北增援，最后夺取广州，以保证全国红军首先夺取武汉的‘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sup>②</sup>

一九三〇年十月，红七军原有的三个纵队和新编的第四纵队奉命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到河池集中整编。在这里召开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在邓岗、陈人豪的主持下，通过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决议，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错误口号<sup>③</sup>；改选了红七军前委，由陈豪人任书记。会后，将红七军四个纵队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红八军被敌人打散后剩下的几百人，历尽艰险到达河池，也编入红七军，李明瑞仍任总指挥，邓小平继续任政治委员，但这时只指挥一个军了。十一月上旬，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开始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韦拔群等带领二十一师少数人员回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七军攻打敌人重兵据守的城镇，连遭挫折。特别是在长安、武岗等地进行的长达数天之久的攻坚

---

① 《右江革命史略》，存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1975年12月23日访问陆秀轩记录。

② 莫文骅：《回忆红七军》第40页。

③ 莫文骅：《回忆红七军》第43、44页。



战、阵地战，虽然我军指战员在战场上打得很英勇，但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红七军受到重大损失，许多优秀的指战员牺牲了，部队的元气受到很大的损伤。广大指战员对“立三路线”的怀疑和不满日益增长。部队到达全州后，红七军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会上，陈豪人等人仍然坚持攻打桂林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和前委的多数同志正确地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决定抛弃“立三路线”，取消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的冒险计划。会议还决定恢复邓小平前委书记职务。会后，红七军前委带领部队沿桂粤边界前进，去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邓岗、陈豪人在全州离开了红七军队伍<sup>①</sup>。随后不久，根据部队减员情况，红七军由十九、二十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红七军在横渡广东乐昌河时，遭到了数倍于我之敌的猛烈袭击，部队被截为两段，情况十分危急。李明瑞临危不惧，沉着指挥战斗。他和邓小平率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指战员强渡乐昌河后，同敌人展开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后因敌军不断增兵，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与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一部分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系。李明瑞在我军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亲自带领少数战士留在最后面，指挥部队有秩序地转移。他鼓励大家坚持战斗，争取胜利。他说：“我们不怕，革命是有出路的。这次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突破敌人的包围线，到江西与朱毛红军汇合。”<sup>②</sup>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在邓小平、李明瑞的率领下，冲破重重困难，于二月上旬末到达江西的崇义。

<sup>①</sup>1976年4月访问袁任远、陈漫远、钟夫翔记录。

<sup>②</sup>卢绍武：《广西红七军历史检讨》（1945年）。

部队到达崇义后，与地方党委取得联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地方武装。随后，红七军前委决定邓小平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部队由李明瑞、许卓等负责指挥。崇义位于湘赣边区，是我军和敌人互相争夺的一个据点。三月初的一天，敌蒋光鼐、何键等部，突然向我发动进攻。敌人从三面包围了崇义，只剩下由崇义到莲花、宁岗方面去的一条小路。敌军无论在数量和装备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我军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那一天，细雨蒙蒙，浓雾弥漫，五六十米以外就看不清方向。李明瑞冷静分析敌情，巧妙地利用当时大雾弥漫的有利自然条件，指挥大部队从小路撤退，以两个连在后边作掩护。我军行动的果敢和敏捷，造成了敌人的错觉，结果左右两侧的敌人看不清楚，互相打了起来。在敌人火并的激烈枪炮声中，我军迅速甩开敌人，安全撤离崇义。当我军离开崇义几十里后，敌人还在那里互相厮杀。“这一仗由于李明瑞指挥得法，我军以伤亡几个人的损失，使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从崇义出来的群众说，敌人的伤兵摆得满街都是。”<sup>①</sup>

一九三一年四月，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与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一部和后勤部队在江西苏区永新汇合。两支兄弟部队的重新汇合，使红七军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情绪更加高涨。不久，中央革命根据地总前委指示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在赣江以西的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任命李明瑞为总指挥，曾炳春为政治委员<sup>②</sup>。

李明瑞参加了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行军作战，同邓小平、

---

<sup>①</sup>1976年5月19日访问谭庆荣记录。

<sup>②</sup>1975年10月3日访问姜茂生谈话记录；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  
《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第1辑第212页。

张云逸等一起指挥了途中同敌人的一系列战斗。在将近一年艰苦的征战中，他和广大革命战士一道，经受了革命战争的严峻的考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身先士卒、勇敢沉着的战斗作风，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品德，使他和红七军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在红七军广大指战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对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红七军这支革命部队从广西带到中央苏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对我湘赣边区根据地也发动了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保卫革命根据地，李明瑞率领红七军、红二十军和湘赣边区独立一师，向盘踞安福的敌人发动进攻。驻守安福的敌人是韩德勤部的一个旅。我军发动进攻时，敌人紧闭城门固守。李明瑞指挥部队佯攻一阵，然后在黄昏时，命令我军后撤三十里，引诱敌人出城。敌军果然中计，出城追击我军。当敌军来到有利于我伏击歼敌的地点时，李明瑞指挥红七军五十五团和独立一师迂回到敌后，发起攻击。在敌人正面的我五十八团和红二十军也回过头来打击敌人，使敌人处于腹背受击的困境。在战斗的紧要关头，李明瑞高喊：“特务连跟我来！”<sup>①</sup>亲自带领特务连冲杀到敌群中去，对我军的士气鼓舞很大。这次战役，消灭敌人一个团，俘虏敌人数百，缴获枪枝近千。随后，红七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连续攻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红七军在李明瑞等同志指挥下，在湘赣边区对敌作战，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

---

<sup>①</sup>1976年4月21日访问莫文骅记录。

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一九三一年六月，红七军前委接到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四日写给红七军的信。中央决定李明瑞为红七军军长、红七军前委常委。七月，红七军奉命开过赣江以东，在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师。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兴国会师不久，红七军领导人李明瑞、张云逸等在瑞金北面的壬田寨，受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的亲切接见<sup>①</sup>。毛泽东和朱德鼓励红七军指战员继续努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奋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为了表彰红七军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特授给红七军“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sup>②</sup>。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红七军指战员在李明瑞等率领下，坚决执行毛泽东“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击”的指示，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经过两个多月的较量，进犯我根据地的敌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全线崩溃。我军于九月七日分三路向逃跑的敌人发起追击。九月十五日，李明瑞按照统一的战斗部署，率领红七军急行军八九十里，插到敌人后面，在东固方石岭紧紧咬住逃敌的尾巴——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在兄弟部队的紧密配合下，红七军在黎明时分，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敌军的前后逃路。战士们跃出阵地，将敌军团团围住，只用了几个小时即全歼韩德勤的五十二师，击毙、生俘敌旅长二

---

<sup>①</sup>郭化若：《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见《远谋自有深韬略》第62页。

<sup>②</sup>1975年10月11日访问姜茂生、覃国翰、黄超记录。

人，团长以下除被打死外，全部被我军活捉。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化装成伙夫仓惶逃走<sup>①</sup>。方石岭全歼敌人一个师的辉煌战果，充分显示了李明瑞的军事指挥才能。

一九三一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七军奉命开到江西于都县小密镇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地方巩固和发展革命政权。这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把红七军看成是从国民党改组派军阀部队改编过来的军队，对红七军怀疑和不信任，认为红七军的干部都不可靠。他们派忠实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葛耀山当红军政委，把红七军军长李明瑞排除在外，秘密组织肃反委员会，在红七军中开展肃反。他们大搞逼供信，把红七军的许多干部、战士打成“改组派”，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令人痛心的损失。他们一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对他进行多方面的威胁和恐吓。一九三一年十月的一天，李明瑞从军部小密镇到几十里以外的一个靠近前线的连队，不幸被误杀身死。李明瑞的牺牲，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肃反路线所造成的一个严重恶果。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党内外广大同志的要求和充分的调查研究，已为李明瑞公开平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李明瑞烈士的沉冤已得到昭雪。

---

<sup>①</sup>1976年4月27日访问陈漫远和5月19日访问谭庆荣记录。

## 周 维 炯

台 运 行

周维炯，一九〇八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白沙河的楼房村，自幼家境贫寒，就读于舅父漆先涛的私塾。漆先涛受到当时新思想的影响，经常和他的好友、清末武举漆树仁，商南知名绅士、秀才徐朗山等人谈论国家前途，以及如何拯救民族危亡的问题，并以此教育学生。周维炯等很受启发。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我民族之大，国民之众，举世不二，而今倍受外侮，齐家、治国、平天下，实为吾辈无旁贷之责……。”漆先涛阅完此文，批语：“后生可畏！”<sup>①</sup>

周维炯好学，尤其喜欢阅读历史书籍，经常和同学们讲述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并和表兄漆德玮一起拜漆树仁为师，学习武术，用竹刀木枪演习拚刺射击，用砖石瓦片摆城布阵，演习阵法。一次，他和德玮正练拚刺时，一位学长前来劝阻，他不听。那位学长便拉他一同到漆先涛那里评理。先涛对那个学长说：“你们都是无知之辈！圣人还学六艺呢。”支持周维炯他们练下去。由于周维炯天资聪颖，勤学苦练，十三岁时，不但文章写得很好，武术也练得不错，能敌得过几个人的进击，邻居都称他是有为少年<sup>②</sup>。

---

<sup>①②</sup>据周淑敏、蔡恒清、周其春等的回忆。

一九二一年秋，维炯和德玮十四岁，先涛送他们到南溪明强高等小学读书。南溪是商城县南乡的重镇，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明强小学是这里颇有盛名的学校，师资力量强，课程齐全。周维炯勤学苦读，毕业考试，获得全校总分第一名。红榜公布后，轰动了南溪镇，称誉他是“山窝里飞出的大鹏鸟！”一九二三年秋，维炯和德玮一同考入了商城县笔架山甲种农业学校①。

五四运动后，这所学校经常有很多进步教师来讲学，《新青年》和一些介绍社会主义思潮、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也在师生中流传，并成立了“青年读书会”、“英（语）数（学）研究会”、“演剧社”等进步组织，思想十分活跃。一九二四年春天，董事长廖石甫诬指进步教师罗志刚行为不轨，是过激派，迫使六位教师集体辞职，学校被迫停课。学生极为愤怒，扭住廖石甫要老师上课。廖石甫煽动一部分人来学校行凶，并挂牌开除一部分同学。公告牌刚挂出来，就被周维炯等同学砸了。周维炯等组织了告状团到商城县告状，要求挽留进步教师，撤换董事长，如不答应要求，全校学生来城请愿。县长怕事情闹大，下令撤了廖石甫的董事长职务，并由学校出面向罗志刚等六位教师道歉。辞职教师复了职，学校复了课。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周维炯深受鼓舞，感到集体的力量伟大②。

一九二四年秋，在志城小学任教的共产党员詹谷堂、袁汉民等到汤汇和南溪一带活动，在进步师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不久，周维炯和李梯云、漆德玮、漆禹原、李遵

---

①据周淑敏、蔡恒清、周其春等的回忆。

②据吕自煌、徐其昌等的回忆。

吾等一批进步同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

周维炯入党后，努力学习功课，还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组织同学到社会上进行宣传活动。一九二五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周维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趁双河山庙会的机会，组织了一次反压迫、反剥削、反封建礼教的大宣传。他们编演了一出话剧，内容是讲一个地主逼债，强占一个贫苦人家的姑娘做小老婆，姑娘誓死不从，又改做童养媳，姑娘跳塘反抗，被一个长工救了起来，后来姑娘和长工相爱逃跑，被地主抓回，逼得悬梁自尽的故事。当演到姑娘自尽时，台下一片哀叹声和哭泣声，周维炯带头高呼“打倒封建主义”、“废除封建礼教”、“铲除剥削制度”等口号。一个姓冯的绅士派个狗腿子前来阻止演出，说：“这个戏助长邪恶，有伤风化。”周维炯痛斥说：“你有没有姑娘姐妹？叫你姑娘姐妹给地主做小老婆、当童养媳，你愿不愿？你姑娘姐妹跳塘、上吊你心疼不心疼？”这个家伙遭到一顿痛斥，抱头窜去，周维炯带领同学们在双河连演三天<sup>②</sup>。

一九二六年七月，周维炯在农校毕业后，受党的派遣，和漆德玮等一批党员前往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黄埔武汉分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德玮等被党组织派回家乡，从事士兵运动和农民运动<sup>③</sup>。

周维炯回到家乡后，以教书为业，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和士兵运动。这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鄂东、豫南的革命组

---

① 《辞海》1980年版缩印本第202页“周维炯”条；《金寨县大事记》（未刊稿）第29页。

② 据吕自煌、徐其昌、周其春等人的回忆。

③ 《辞海》“周维炯”条；曾静华、漆先棣的回忆。



织也受到一些损失。但商南地区革命形势依然很好，县和部分区、乡农民协会已相继建立，广大农民斗争的热情很高，党的组织有很大发展，并成立了中共商城县委。一九二八年春大荒，商南地区农民大部分无粮断炊，周维炯根据党的指示，积极组织农民进行抗租抗税和向地主豪绅借粮的斗争。胭脂坳大地主吴少群，把数百担粮食分散藏在十几个佃户家，唆使佃户阻止农协会借粮，其他一些地主也都效仿此法拒绝借粮。一度出现农协会和一些地主佃户之间的冲突，借粮斗争不能进行。周维炯立即发动农会会员揭露地主的阴谋，并组织一些与藏粮佃户有亲朋关系的会员，进行说服工作，要他们站在穷人一边，和穷人心连心，不要中地主的诡计，不要当地主利益的保护人。为了解除一些佃户怕承担责任的顾虑，农民协会采取打借条的办法借粮，佃户们很快觉悟了，从胭脂坳到银山畈，从大埠口到冈家山，十多户地主囤积的三千多担粮食，都被农协会分给了农民，并组织农会对少数顽固抗拒借粮的劣绅，进行斗争。从此，借粮斗争遍及商城南乡<sup>①</sup>。

正当商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商城县委和鄂东特委派员来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领导，会上成立商城南邑区委（又称商南区委、丁家埠区委），周维炯担任少共书记，负责青年和士兵运动。为了掌握武装，决定派一部分党员打入民团，在士兵中发展党的组织，掌握枪枝弹药，伺机举行暴动。周维炯通过漆树仁的关系，打入了商南大绅士杨晋阶的民团。漆德玮也打入了县民团大队<sup>②</sup>。

---

①据《红四方面军战史》（未刊稿）和曾静华的回忆。

②据《辞海》“周维炯”条、《红四方面军战史》和曾静华的回忆。

杨晋阶团总听说周维炯在武汉受过专门军事训练，十分高兴。特地大摆宴席，宴请周维炯，邀请当地乡绅名士作陪。席间，杨晋阶对周维炯大加奉承，说周维炯是李鹤鸣县长的至交，文才出众，军事精通，是国家栋梁之材，当即委以民团军事教练和第四班班长的职务。周维炯也乘机扩大影响，纵谈天下大事，大讲国民革命，从军事训练讲到商南防务……，使四座宾客赞叹不已，都为杨团总能得到如此干才，举杯庆贺。杨晋阶高兴得前仰后合。从此，周维炯便成了民团中的红人，倍受杨晋阶的器重。民团中士兵称他为“炯爷”<sup>①</sup>。

杨晋阶民团，一共三十多人，分四个班，住在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丁家埠小集镇上的一个大庙里。民团里的士兵除个别是地方上的流氓地痞外，绝大多数是被迫抓来的农民。平时除帮杨晋阶催租要捐外，就是闲游浪荡，欺压百姓，从不搞什么训练，有些士兵连左右转也转不好，军事素质很差。周维炯到民团后，定了训练制度，每天训练五、六个小时。在训练中，由于他身体力行，耐心讲授，不打不骂，士兵的军事素质有了提高，纪律也好多了。副队长张瑞生是个不学无术的兵痞，开始对周维炯有些嫉妒，后来看杨晋阶如此器重周维炯，也不敢怠慢。周维炯对张瑞生也以礼相待。因而张瑞生对周维炯渐渐好起来了，队里什么事，常叫周维炯代办，自己图个快活<sup>②</sup>。

周维炯性情刚直，作风正派，待人和气，办事公道，又知古通今，士兵们亲近他，连小镇上市民和周围老百姓也和他混得很熟。

周维炯在民团站稳脚跟后，开始进行革命活动。他首先利

---

<sup>①②</sup>据《金寨大事记》和王玉田的回忆。

用当时人们容易接受的烧香结拜形式，在贫苦出身的士兵中，组织了兄弟会。周维炯虽然不算年长，但因他处事稳重，大家都非常尊敬他，把他当成大哥哥，无不言听计从。周维炯还以讲岳飞和梁山泊英雄的斗争故事，向兄弟们灌输民族精神和敢于反抗权贵的思想，进而讲到帝国主义如何欺负我们，国民党军阀如何靠帝国主义抢夺地盘，地主豪绅如何剥削压迫穷人，穷人为什么受苦受难，我们为什么当兵，为谁当兵等道理，启发兄弟们的阶级觉悟<sup>①</sup>。

不久，周维炯积极慎重地在民团中发展了七名党员，在周围农民中发展了四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

一九二九年春天，商南地区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二月三日，鄂东特委和豫南特委在柴山堡举行联席会议，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举行商南起义。起义时间，开始定为八月十五日，后又定为五一劳动节。周维炯提出：五一节是革命节日，敌人必然加强防范，建议改为立夏节（当年是阴历三月二十七日，阳历五月六日）。因为这个节日山区大家小户都庆祝，而地主老财还要大吃大喝一番，便于我们行动。县委同意这个意见，决定在立夏节晚上，由周维炯乘民团过节大吃大喝之机，发起夺枪暴动<sup>②</sup>。

立夏节这天，刚好轮到周维炯担任值星，他以打扫卫生、整理内务为名，将枪枝弹药集中挂在一间房子里，晚上又派了两个党员放哨，他和其他几个党员在屋里大摆宴席，对民团副队长张瑞生和团丁们轮流劝酒，直喝到深夜，张瑞生和团丁们

---

①据《金寨大事记》和王玉田的回忆。

②据《金寨大事记》和蒋明华、徐立钊的回忆。

一个个醉如烂泥。周维炯遂命令动手，并立即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两枪，大喊：“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缴枪了！”张瑞生和团丁们全部当了俘虏。经过宣传教育，除极个别的要求回家外，其余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就这样，丁家埠民团起义了。

这天夜里，南溪、斑竹元、牛食畈、禅堂和白沙河等地暴动，也获得成功。胜利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斑竹元会师，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任命周维炯为师长，徐其虚为党代表，漆德玮（尚在商城县未到职）任副师长，下辖九十七团、九十八团。这是鄂豫皖边第二支红军队伍。

红军三十二师成立后，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土豪分财产的斗争。一些地主老财，纷纷向商城县里逃跑，并要求县政府派兵“围剿”红军。县长李鹤鸣认为周维炯起义，不过是为了某些利欲权势之争，指定县民团大队长王继亚派人安抚收编。周维炯得到这个消息后，将计就计，乘机写信给打入民团大队当中队副的共产党员漆德玮，叫他对王继亚说：他起义主要是为了对付杨晋阶和张瑞生，现在想投奔县民团，并要漆德玮主动要求来收编，以便乘机脱离民团。当漆德玮将周维炯要求投奔县民团的信交给王继亚时，王继亚满心高兴，即指派漆德玮来丁家埠执行收编任务。漆德玮挑了八名精明强干的士兵（都是共产党员和漆德玮的把兄弟），带八支短枪，顺利地回到了红军怀抱。周维炯、漆德玮——这对莫逆之交的战友胜利地团聚了，三十二师犹如猛虎添翼<sup>①</sup>。

阴历四月八日，王继亚带了一个连的兵力，经余子店、四道河到南溪，分两路向我活动在大埠口一带的红三十二师进

---

<sup>①</sup> 《金寨大事记》和曾静华、王玉田等的回忆。

攻。当晚，王继亚率领的一部分住在南溪西边的吴家祠堂，另一部分住在余福山的土地庙里，形成钳形攻势。周维炯探明情况后，命肖方等四人装扮打柴农民，干掉土地庙敌人岗哨，自己带大队直取土地庙敌人；漆德玮带一班人在离吴家祠堂不远的上坳子阻击王继亚来援。傍晚时分，肖方等四人很容易干掉了土地庙的岗哨，周维炯率部迅速包围了土地庙，经过几分钟的激战，将敌四十八人缴械。王继亚听到枪声，率部来援，被漆德玮的一个班堵住。正打得激烈时，周维炯率队赶到，一个猛冲，民团溃不成军，夺路逃回商城。不久，王继亚被撤职，气病死去；李鹤鸣也因“剿匪不力”，革去了县长职务<sup>①</sup>。

这以后，红三十二师又连续消灭了几个地主的护庄队，缴枪三十多支，红军发展到近二百人，有枪一百三十多支。

五月二十日，红三十二师发起攻打鄂豫皖边区重镇金家寨的战斗。守敌汪东阁部二百多人，弃城逃跑。二十一日我军挥师东向，缴获燕子河黄英老八团步枪十余支，并在流波碛打败了诸佛庵民团。回师途中，丁家埠赤卫军报告说：河南有一股流散土匪近百人枪，住在狗迹岭，要来投诚红军。周维炯即派人前去联系，为首的连长吴云山说：弟兄们要求入伙，随调不随编，枪枝要钱买。周维炯和师部负责同志认为：红军正在发展时期，枪枝弹药缺乏，吴云山投诚应表示欢迎。于是便答应了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遂将这支队伍编为第一百团，由吴云山任团长。但这支队伍收编后，土匪恶习不改，不服从调动，还经常抢老百姓的东西，甚至任意打骂我们去做政治工作的同志。经周维炯等师领导多次教育，毫无效果。七月间，湖北军

---

<sup>①</sup> <金寨大事记> 和曾静华、王玉田等的回忆。

闽夏斗寅十三师，皖西敌五十六师，以及商城、罗田、麻城、六安、霍山等地民团四千多人，向我中心根据地南溪、丁家埠一带发动进攻。红三十二师决定暂时离开根据地，转入外线，联系鄂东红三十一师开展游击战争。当部队开至葛家湾时，一百团不听调动，要住下休息。周维炯考虑：这支队伍严重不纯，极不可靠，不采取果断措施，终是祸患。于是师党委决定在葛家湾将一百团改编。周维炯以召集开会名义，将一百团连排干部调至村东一个庄子上，并在村外面布置了警戒。会上，周维炯便单刀直入地说：“今晚请大家来，宣布一个命令：师部决定将第一百团改编，不听编的，以军法论处！”会场立刻紧张起来，几个排长正准备掏枪行凶，周维炯手握双枪，一步跳上桌子，大喝一声：“你们全被包围了，谁敢动一动，我就敲掉他！”但这些亡命之徒，毫无收敛之意，把我们两个警卫员打倒了。周维炯手疾眼快，连发几枪，七个连排长，打倒六个，就剩吴云山一人，他全身发抖地说：请师长饶命，我是真心投诚，主要是部下恶习不改，如能宽恕，我一定跟红军干到底！周维炯收起枪来说：“今天，我们是不得已才如此，你如真心诚意跟我们干，就是我们的好同志。”命令他召集一百团战士集合听候改编，不愿干的，发路费遣散回家。当晚遣散了三十多人，留下来的六十多人，一部分编入了九十七、九十八团，又从九十七、九十八团调来三十多人，恢复了一百团，吴云山担任副团长，连夜向鄂东方向转移了①。

红三十二师在转入外线作战时，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不断地打击敌人，并在麻城边界的八字楼与徐向前领导的红三十

---

① 《红四方面军战史》和王玉田的回忆。

一师汇合。双方举行了联席会议，交流作战经验，分析形势，认为大敌当前，仍要以避实就虚的战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壮大红军<sup>①</sup>。这时，进攻商南之敌，发觉我军主力转入外线，在对我根据地进行一番摧残之后，即离开商南，寻找红军主力作战。九月十二日，红军三十二师，乘机返回商南，以摧枯拉朽之势，给地方民团、编练队、清乡队、还乡团等反动派以致命的打击，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詹谷堂牺牲的南溪，召开了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上，烈士家属控诉了敌人的滔天罪行，纷纷要求参军参战，为烈士报仇。因而红军得到了迅速扩大，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sup>②</sup>。

一天，周维炯在丁家埠检查赤卫队装备情况，有人向周维炯报告：他的小舅漆自州（排行第九，外号九老爷）上个月从开封回来，和顾敬之等当地土豪劣绅勾结，咒骂共产党是“乱国之寇”，攻击农民协会是“殃民会”，骂赤卫军是“强盗土匪”。周维炯听说罢，极为气愤地说：“共产党的政策，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别说他是我舅舅，就是老子娘也不行！”话毕就派人把漆自州抓来了。漆自州一见周维炯就摆起长辈资格，大骂：“你个小东西，原来是你把我抓来的呀，你眼里连尊长都没有，还有什么民众！你把德玮（他的侄儿）小子叫出来，我跟你们拚了！”说罢举手上前来打周维炯。

周维炯大喝一声：“你敢动手，看你这副凶样子，不是我，还有谁敢抓你，不用找德玮了，我和他商量过了，就是因为保护民众，才不能尊重你这个尊长！”命令警卫员：“把他绑起来！”漆自州嘴里大叫：“你们这几个红毛猴子少

---

①② <红四方面军战史>。

造孽，我帖子早到开封了，不出十天，叫你们全部完蛋。现在悔改，为时还不晚，有我九爷给你们讲情！”警卫员有点犹豫，周维炯上前抓过绳子把漆自州绑了个小靠子说：“我们不要你讲情，还留两只手给你，让你多写几张贴子到开封搬兵！”

就在这时，漆自州老婆带了三十多人和一箱子地契、一箱子银元，来保漆自州。周维炯说：“你们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舅舅他是革命的敌人，他写信叫国民党派兵来打我们，来杀我们父老兄弟，这样人不能保，你们回去，由我们交给人民处整！”下午就把他枪毙了<sup>①</sup>。

一九二九年十月，蒋冯战争爆发，对边区防范兵力减少，六霍中心县委决定发动农民、士兵举行大规模武装暴动。霍山县西镇事务所是六霍西部极为反动的据点。燕子河、闻家店、长山冲等地的地主恶霸经常集聚在这里，阴谋镇压农民运动。燕子河党支部在刘仁辅、徐育三的领导下，组织了一百多人的赤卫队，积极准备暴动，六霍中心县委派人来三十二师要求予以支援。周维炯立即带一个连，当晚十点钟就赶到了闻家店，和刘仁辅、徐育三领导的赤卫队汇合，连续打掉了闻家店、楼房湾、燕子河三个地主的自卫团（每团约二十人枪），拂晓前包围了正在长山冲策划逮捕赤卫军的乡保团总。经过半小时的激战，全歼了包括西镇事务所自卫团团总陈先觉在内的乡保团总五十多人。接着，乘胜攻入漫水河西镇事务所老巢，守敌二十多人，除打死三人外，其余全部缴械投降。一夜之间，整个西镇地区反动势力全部覆灭。战后，六霍县委将缴获的枪枝弹药分一半交周维炯。周维炯不但没有接收，反留下一个排枪枝给

---

<sup>①</sup>据葛明龙、蔡恒清、周其春、曾宪平等的回忆。



他们，六霍县委的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不久，六霍地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鄂豫皖边区第三支主力红军诞生了<sup>①</sup>。

周维炯在驰援西镇前，就探知商城县民团和李克邦土匪混战于商城北乡的消息，城里只有三百多敌人驻守。周维炯从西镇回来，抽调十多名手枪队战士，化装成卖柴草的农民混进城去，里应外合，一举攻入县城，城里三百多名敌人，打死打伤过半，其余当了俘虏。当天，没收了县政府和官商的款项和粮食救济穷人，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赤城县苏维埃<sup>②</sup>。

商城打开以后，为了扫除豫南和皖西边界残余之敌，使两块根据地连结一起，周维炯和红三十三师联系，成立了前敌指挥部，周维炯和三十三师师长徐百川分任正副指挥，兵分两路，南北合击，仅二十天时间，全部歼灭和驱逐了麻埠、独山一带数股顽敌；四月份，两路红军汇合，一举攻下了霍山县城，缴枪二百多支，军威大震<sup>③</sup>。

皖西和豫南根据地连接后，周维炯迅即和鄂东徐向前领导的红军三十一师配合，横扫盘踞在长岭关、松子关、青苔关等险关隘口的敌人，打通了通往鄂东的要道，鄂东、豫南根据地也连成了一片。从此，鄂豫皖三省边区根据地逐渐形成整体，人口也发展到二百万，红军扩大到二千多人，并有近二十万人的赤卫军等地方武装。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建立工农政权等运动<sup>④</sup>。

一九三〇年四月，中央指示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三十

---

① 《红四方面军战史》、《金寨大事记》和王玉田、曾静华的回忆。

②③④ 《红四方面军战史》和郭述申的回忆。

一、三十二、三十三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二、三师，周维炯先任二师副师长，不久任三师师长。部队六月南下英山。当时有唐生智军阀一个旅驻在英山县城至金家铺一线，军部决定由第二师先打金家铺一部，由周维炯率第三师布防于离县城十五华里的狮子坳，控制去英山的通道，阻击县城援兵，并截击金家铺可能向县城逃窜之敌。果然不出所料，金家铺之敌遭我突然打击，仓惶向县城逃跑，这时县城敌人也倾巢来援。当时三师兵力仅三百多人，拦击和打援同时进行，部队一时有些紊乱，呈现腹背受敌的局面。周维炯立即将部队一分为二，命令副师长肖方带一个团（仅一百多人）誓死堵住金家铺潜逃之敌，不让其向县城逃窜；自己带一个团（二百多人）在狮子坳阻击援敌。战斗进行一个小时，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周维炯便抽了两个排的兵力，从山梁迂回到敌人后面突击，打乱敌人部署，消灭敌人。当我两排兵力从敌后猛烈开火时，敌人误认为被我包围，顿时阵脚大乱，慌忙向左侧运动。但就在这时，周维炯左臂受伤，鲜血直流，战士要给他包扎，他推开战士，右手挥枪，跳出掩体，大叫：“冲啊！”我军乘敌混乱之际，一阵猛烈冲杀，敌伤亡惨重，溃不成军。这时，金家铺之敌由于被我前阻后击，待援无望，全部缴械投降。二师立即赶来狮子坳与三师共同围歼援敌，激战一个小时，敌全军覆没，我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周维炯师长，因流血过多，昏倒在一堆草丛里，在他的周围还有几具敌人的尸体<sup>①</sup>。

红一军初建，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红军和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如果能更加主动地利用蒋冯阎战争，和敌人对根

---

<sup>①</sup> 《红四方面军战史》和王玉田的回忆。

根据地兵力减少的机会，进一步扩大红军，发展根据地，消灭敌人，我军将会得到更好地发展。但这时中央第二次“左”倾盲动主义统治了全党，责令红一军不惜一切牺牲，向京汉线出击，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打到武汉过中秋”。红军离开以后，皖西根据地遭致敌潘善斋第五旅和数千地方民团的疯狂摧残，革命干部、红军家属万余人惨遭杀害，房屋被烧毁无计其数，整个皖西根据地几乎全部沦陷，很多群众拖儿带女跑反，找红军回根据地杀敌报仇。军部决定打回皖西，远程奔袭金家寨，命周维炯率第三师作先遣队，对敌实行包围。周维炯指挥第三师，以一天一夜急行军，于次日拂晓将金家寨团团围住。这时一、二师也全部赶到，同敌激战三小时，全歼守敌八个民团和敌四十六师一个营共一千五百余人，缴长短枪千余支，迫击炮两门；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麻埠、独山、叶集、苏家埠、霍山顽敌，全部收复了皖西根据地①。

这时，蒋介石趁蒋冯战争结束，正集中近十个师的兵力，对鄂豫边红一军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由于红一军东进皖西，敌第一步计划落空。敌人又调两个师向皖西扑来，伪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得知皖西吃紧，也急调一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分三路进击我军。我军先在鲜花岭设伏，阻击陈调元中路两个团，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都难以推进。周维炯组织了一个连炸弹队，迂回向敌指挥部勇猛冲击，数百枚炸弹砸向敌群，敌阵势大乱，我军乘势猛冲，生俘敌团长柏心山以下二千多人。其余各路之敌惧歼遁走，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破产②。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旬，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周

---

①② 《红四方面军战史》和储明谷、黄锦思、张经安等的回忆。

维炯任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三团团长。三月初，敌岳维峻三十四师由孝感向豫南窜犯，我军星夜奔驰，将敌全师包围于双桥镇。岳维峻仗其兵多装备好，弹药足，又有护镇河等障碍，拚命抵抗，战斗近半日，未分胜负。这时敌人已派飞机来援，如不速胜，对我不利。周维炯将全团组织了三个梯队，冒着敌机轰炸和敌人密集炮火，强渡护镇河，冲入双桥镇，插进敌指挥中心，一阵猛打猛冲，敌指挥失灵。红军乘势发起总攻，地方党组织了数千名赤卫军放炮呐喊。岳维峻见势不妙，率一部突围逃跑，周维炯指挥一个营穷追不舍，岳维峻终于被活捉。战役结束，毙敌一千多人，生俘五千多人，缴枪六千多支，迫击炮十门，山炮六门。这是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一次缴获最大的胜仗<sup>①</sup>。

同年八月，红军第二次强攻英山城。该城两面环山，两面临水，有城墙、护城河、铁丝网等坚固工事，俯瞰全城的鸡鸣尖，更是天然屏障，有敌一个营驻扎。城里有敌张汉泉一个团和地方武装近两千人凭险固守。战斗开始后，我军伤亡很大。周维炯组织了一个营的重机枪和四门迫击炮对北门猛烈射击，又亲自率领两个营敢死队，冒着敌人强烈的炮火，从北门搭人梯，强行登上了北门城墙，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这时我十二师一个团乘势攻来，打开了北门，红军大队一涌而入，城内近两千守敌被全部歼灭，敌团长张汉泉被我生俘<sup>②</sup>。

在这之前和以后的罗田、曹河、洗马畈等著名战役，周维炯率领的红十一师，都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了党中央。不久，派野心家、阴谋家张国焘执掌鄂豫皖根据地党和军队大权。张国

---

①② <红四方面军战史> 和章明、黄锦思的回忆。

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搞了一系列改造红军的所谓“新政策”，大肆撤换党政军领导干部。他的“威逼安庆，震撼南京”的冒险计划，比立三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更“左”，使得本来可以获得大发展的红军，反而遭到很多不应有的损失。周维炯和其他军师领导对张国焘这些倒行逆施，多次善意提出不同意见。张国焘不但不予采纳，反而诬指曾中生、许继慎、周维炯等一大批红四军将领“对抗分局指示”、“反党”。适逢蒋介石施“许继慎、周维炯率部投蒋”的离间计，正中张国焘下怀，周维炯——这位风华正茂、屡建功勋、年仅二十四岁的红军名将，和许继慎、肖方等一大批红军指挥员，被张国焘以“反革命”、“改组派”逮捕，周维炯被用乱石击死。他在停止呼吸前，还大声痛斥张国焘：“老子暴动后，一天没离开过红军，没离开过根据地，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你打死老子不怕，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sup>①</sup>

周维炯热爱党，忠于革命事业，但他也爱人生，他有父母兄妹，他有和他感情非常好的未婚妻。但自暴动后，由于战事紧张，戎马生涯，他连一次家也没回去过。他父亲想他想急了，带着他小妹，跑了一百多里路找到了他，他只讲了几句话，就跨马出征了。他的未婚妻也很想念他，不知在路上等了多少次，有一次等到了，他也只下马深情地表示：“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成亲。”，话毕，便扬鞭而去。由此可见，周维炯这“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既不是什么“贪念红尘”的叹惜，更不是“投胎来世”的自慰，这正是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心声！

---

<sup>①</sup> 《红四方面军战史》、《红旗周刊》第28期（1931年）。

## 赵博生

曾庆圭

赵博生，乳名连科，学名恩溥，一八九七年九月七日出生于河北省黄骅县东慈庄。他幼年时，家里三代同堂。父辈兄弟五个，其父赵以明排行第二，是个憨厚、朴实的普通农民。母亲刘氏，能耕会织。赵博生亦有兄弟四人，他是老大。其时，家庭生活殷实。他七岁入本庄私塾读书。九岁时，家里遭本庄地主赵以林的压榨，逐渐贫困破产了。

一九一四年，赵博生念完私塾，因家穷辍学在家。此时，他接到其三叔赵以立（在皖系军队中任下级军官）的来信，要他去投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未考取；经再三要求，当了旁听生。又经过半年刻苦学习，才以合格成绩被录取到该校第六期正规班学习。一九一七年夏毕业后，被分配到皖系军队北京北苑参战第一师步兵三团二连当见习官。

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赵博生受到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抱救国之志，负救国之责，不得不努力求学，身欲救国，必先求学问，百般知识，无不学问中得来；人若无高尚知识，虽欲救国，则心有余而力不足，然欲达到此目的，非努力求学，则不能成功。”同时，他还立志做一个“模范军人”<sup>①</sup>。

---

<sup>①</sup>张福田、赵恩洪，〈赵博生战斗的一生〉，藏北京军区烈士陵园。

赵博生这种不现实的志向，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打响，皖系一败涂地，赵博生被转到直系军中，开初学习无线电，继而担任无线电中队长。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失败，他又落入奉系军中。如此辗转数年，三易其伍，始终落在一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圈子里。忧愤、焦灼、苦闷使他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我想下去拉洋车……”<sup>①</sup>。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不久，他便投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的纪律比较严明，官兵都佩带着写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在这样的环境中，赵博生以为这就是新的前景了，非常刻苦自励。他不吸烟，不喝酒，不带妻室，所获薪金，除维持自己的俭朴生活外，其余都用以奖励与救济士兵。由于他的德行和才能，使其在国民军中很快享有新秀的声望。他的职位也在逐步提高，历任团参谋、团副、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长、军参谋长等职。一九二五年，他任第五旅参谋长，有一次，对部下演讲时，曾比喻着说：“中国好象将要倒塌的一座大楼，人们住在里面，将有死亡的危险。这座大楼必须落地重修，才能坚固。这个责任，就是吾辈军人的天职。”<sup>②</sup>并认定现在的作为就是“重修大楼”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末，国民军被各派军阀联合击溃。次年一月，冯玉祥宣告下野，随后赴苏联考察学习。冯玉祥走后，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又大败，退到绥远、察哈尔一线，赵博生随军退守包头。一九二六年八月，冯玉祥在共产党人刘伯坚、乌

---

<sup>①②</sup>张福田、赵恩洪：《赵博生战斗的一生》。

斯曼诺夫（原苏联红军第三军团长）等的陪同下，由苏联回国。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召集全军在五原易旗誓师，发表宣言，接受革命的三民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聘请乌斯曼诺夫等为政治军事顾问，并派党政人员分赴各军成立政治处，担任全军党务政治宣传训练工作。从此，赵博生获得了与共产党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受到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五原誓师后，赵博生所部经宁夏、甘肃向陕西推进，实施“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行动。部队一路疾进，于十一月下旬直捣陕西，解围西安。尔后，国民军联军又改名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转战河南，先后击败许昌、郑州、新乡等地的军阀部队，有力地策应了北伐军的进军。

正当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六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合作，反对共产党。顷刻间，第二集团军中革命空气遽然消散，又是一片沉寂，宣传社会科学的讲演停止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书报停刊了，许多共产党人出走了，有的被“礼送”出境，有的黑夜失踪……。赵博生对此感到茫然、痛苦、愤慨，常对有觉悟的官兵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坚决地为工农劳苦群众奋斗一天！”<sup>①</sup>

一九二九年，赵博生在西安任十四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并兼城防司令。时值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无数农民卖儿

---

<sup>①</sup> 《赵博生烈士传略》，载《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卖女，背井离乡。而军阀反动政府却依旧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凄惨景状，赵博生对反动政府、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和累累罪行，极为愤慨。他忧国忧民地写下了《救国救民之责任》一文，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示决心拯救人民出苦难。但因受历史的局限，当时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在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处于忧虑和苦闷之中。不久，他作了一首《革命精神之歌》，歌词是：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犹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实现大同。①

从这首歌词中可以看出，赵博生多么期望“警醒先锋”，起来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实现大同而努力奋斗啊！歌词写好之

---

①孙毅：《赵博生同志传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

后，他花去八十块银元，请一位教授给谱上曲子，然后亲自在自己所掌握的特种兵旅教导大队中广为教唱，以激励部属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并借以抒发自己的壮志豪情和革命理想。不过，他这时的思想还没有超出三民主义的思想范畴。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大战，赵博生未去参战。十月，冯玉祥大败，其主力部队在河南郑州等地被蒋介石收编，残部由宋哲元掌握。十一月，杨虎城率部入陕，直趋西安，要赵博生所部十四军投诚，接受改编。当时十四军孤军无援，处境危险，军长陈毓耀决定投降，听任改编。而赵博生不愿意继续干那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决计另找革命出路。由于他在特种兵旅教导大队中，平素很注重灌输进步的思想，使这个大队的官兵，已经初步具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因此，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全队人员的积极响应。于是，他把这支有五百人的队伍，组成一支“三民主义救国军”，自任军长，孙毅佐之。下分三个支队，分别由李青云、郭如岳等担任支队长。在杨虎城入西安前夕的一个夜晚，以演习为名，带出城外，拟入汉中，另创革命局面。

行军第一天，遇上户县县长去西安给宋哲元送款子和军需品。赵博生向该县长说明形势：宋哲元已去山西，杨虎城进西安，陈毓耀投降了。该县长即将所送款物交给了赵博生。当天，部队进到劳峪口附近露营，他把大部分款物分给官兵。第二天上午，部队登上秦岭，下午到达东江口。在东江口被窜犯土匪武装所阻，队伍停下来了。由于寡不敌众，只好白天隐蔽于村庄，夜晚露营在野外。如此多天，军粮无着，大队人马便上山以核桃、包谷为食。此时，杨虎城部的一位参谋长，原系赵博生的同学，多次派人持函前来慰劝回西安听候改编。赵博

生无奈而从之，回到了西安。实际上，大多数人员均未投归杨部，而是以分散的形式各奔前程，待后视情况聚而再举。在西安分别前，赵博生提议给“救国军”的成员印发《同仁录》。因印刷局不肯印刷，又改名为《秦岭游记》才承印。上面除载有序言、日记之外，还刊有各人姓名、籍贯、通讯地址及誓言。分别时，每人一册。赵博生在誓言栏中写下的誓言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不达目的不止！”<sup>①</sup>

随后，赵博生也离开西安，偕同警卫员孙芳桂等人来到河南吉鸿昌部。赵博生的五叔赵以元与吉鸿昌为结拜兄弟，担任二十二路军少将交际处长。赵博生先在总指挥部住闲。因其素以廉洁多谋而闻名，受到吉鸿昌的欢迎。赵博生表示想去苏联学习，以后回来再干。吉鸿昌和赵以元劝他住下，准备任命他担任新的职务。正在此时，驻守在山东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派人邀请赵博生去二十六路军任参谋长，襄助军务。他接受了孙的邀请，去济宁担任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后来，他先后把李青云、郭如岳、孙毅等旧属也介绍到二十六路军来了。

孙连仲原系冯玉祥的亲信将领，同样是在中原大战后，受蒋改编，笼以重任。所部二十六路军，计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合计约三万人。蒋介石对这支原属西北国民军的部队是歧视的，士兵月饷只有蒋之嫡系部队的百分之六十五。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开始纠集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令二十六路军入江西“围剿”红军。部队沿津浦路向南开拔途中，七十三旅的一个团因拒绝入赣作战而破坏了铁路、车辆，使得整个二十六路军无法开

---

<sup>①</sup>孙毅：《赵博生同志传略》。

动。后在蒋介石威逼、利诱下，才得以继续南行。

三月，二十六路军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沿宜黄、乐安一线。五月，在永丰县的中村与红军初次作战，所部二十七师师部和一个旅大受损失。不久，第二次“围剿”被红军彻底粉碎。同年七月，蒋介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此时，二十六路军被推入宁都。九月，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彻底粉碎，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这时，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实际上是陷在红色区域的包围之中。

二十六路军到了江西，每况愈下。不仅打仗受挫，尤其是被困在宁都之后，因为薪饷没有保障，物质生活菲薄，加上北方士兵不服水土，瘟疫蔓延，几个月中便死了几千人。所以，官兵中思乡厌战情绪的人十分普遍。赵博生从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中，受到了更多的启发，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送总指挥部后，他都设法释放了。为了拯救这支部队，他希望找到共产党，因而更加怀念老政治部长刘伯坚。认为找到刘伯坚就是找到了共产党。但因求访无门，没有找上。因此，他不时在作试探。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是湖北人，赵博生风趣地问罗：“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血盆那么大？”<sup>①</sup>

其实，在赵博生渴望寻找共产党的日子里，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也在时刻关注着他的政治态度。

二十六路军原无地下党组织，只是它开到江西后，在上海的党中央鉴于这支部队的历史和现状，于五月间派出王超、袁

---

<sup>①</sup>袁血卒：《红五军团的诞生》，见《星火燎原》第2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汉澄(血卒)、李肃三名共产党员打入了该军。他们和二十六路军成立后该军中唯一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五师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一起,按照党中央的策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对二十六路军开展兵运工作。而且,经过几个月的秘密活动,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约在六、七月间,成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会,下辖官长党员和士兵党员两个支部。而且还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同情者。

一天,特支在宁都城北门外石拱桥背刘记小酒馆(现桥背五十二号)的楼上,以打麻将、煮鸡吃作掩护举行会议,第三次讨论赵博生的入党问题。特支的同志根据赵博生的一贯表现,特别是他到江西后的言行,认为他是倾向革命的,决定先写封信去试探一下。这封信主要是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信由罗亚平趁工作之便,压在赵博生的办公桌上,并注意观察反应。为慎重起见,在送信之前,特支作了四种打算:第一,如果赵博生能接受信中主张,就直接向他表明态度;第二,如果他迟疑不决,就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第三,如果万一出问题,罗亚平就直接转移到苏区或者准备牺牲,其他同志不暴露;第四,如果一般的追查,就说拣到一封信,放在这里,若是不该,下次不这样干了,应付一下<sup>①</sup>。

那天,赵博生外出回来,在办公桌上发现这封“亲启”信。他急忙拆开,一气读完,并仔细琢磨着信里的内容。

一星期后的一个早操时间,赵博生把罗亚平叫到自己的卧

---

<sup>①</sup>袁血卒:《宁都暴动纪实》,见《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室（也是办公室）里。他先是让坐、沏茶，然后从书堆里取出那封信，以亲切、和蔼的口吻说：“我看这信虽不是你写的，但是与你有密切的关系。”罗亚平一见信皮就知道赵参谋长找自己是什么事，但态度镇静。接着，赵博生诚恳地称赞：“说得对呀，有独到见解，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你们分析得很好，说得完全对！”罗亚平仍然没有作声，认真地观察着。于是，赵博生神色庄重起来，诚恳地说：“亚平，我赵博生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我曾到上海，渴望找到刘部长（即刘伯坚），但没有达到目的。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要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你做我的引路人吧！”<sup>①</sup>

罗亚平把赵博生找他谈话的情况详细地向特支作了汇报后，王超代表党组织出面跟赵博生谈入党问题。特支决定发展他，罗亚平作介绍人，并上报党中央。一九三一年十月，党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赵博生入党后，感到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久存矢志革命的理想，从此可以实现。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sup>②</sup>，积极认真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使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二十六路军的广大爱国官兵都不愿继

---

<sup>①</sup>袁血卒：《红五军团的诞生》、《宁都暴动纪实》。

<sup>②</sup>当时在二十六路军秘密流传着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如普列汉诺夫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等。

续留在江西“剿共”，他们联名敦促总指挥孙连仲拍电报给蒋介石，请准许回北方抗击日寇，以拯救民族与家乡的父母妻儿。孙连仲出于摆脱困境的企图，即电呈蒋介石，而且未等复电，便命令部队向北开拔。可是，这种行动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反对。部队刚走到离宁都六十余里的湖岭嘴，便被挡了回来，令他们“死也得死在宁都”。于是，一些高中级军官由此进一步感到处境危险：前进将被红军消灭，后退乃为蒋之军令不容。加上总指挥孙连仲、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先后离开了宁都或江西，使得官兵情绪更加不振，特别是在留下的一些高中级军官中，伺机探寻出路的日渐增多。

孙连仲走后，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他给部队讲话时，公开抨击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政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sup>①</sup>一天，他在军人大会上，把预先画好的一张大地图，挂在会场的正面，凡被日寇侵占的地方，他都用红笔圈出来。官兵们眼看红圈就要伸到关里了，心里都在忐忑不安。赵博生告诉大家：我们要挽救民族的危亡，不做亡国奴，就要有勇气，冲破一切障碍，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抗击日寇去。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他没有明白地说，但是多数官兵是能够意识得到的。当时根据地对白军散发的传单和刷写的标语中，就有这样一条：“二十六路军的弟兄们，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联合红军，到红军中来！”在二十六路军中还曾经发生过一件轰动全军的事情：

---

<sup>①</sup>袁血卒：《红五军团的诞生》。

七十四旅二团一营一个建制班，在班长带领下，集体携械投奔了红军。

赵博生私下与其部属交谈中又常说：“我们所住的、穿的，全是工人做成的，我们所吃的全是农民费了无限的血汗耕种的，离开了工农劳苦群众，我们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生存的。时机一到，我们为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并为我们自身的解放起见，即拚命、流血、牺牲，亦在所不辞！”<sup>①</sup>

赵博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关心士兵的疾苦和痛痒，把部属看作是自己的兄弟；生活艰苦朴素，为人表率。他身为高级军官，但不带妻室，而且，在日记中还这样写道：“妻丑无子，而不再纳娶。”<sup>②</sup>他这些高尚品质，博得广大官兵的尊敬和拥戴。所以，他的上述言论，给官兵们以精神上的宽慰，思想上的开导和意志上的力量。他们骂蒋介石，说：“大好河山快丢尽了，还剿什么赤！”骂孙连仲“喝兵血”丢下我们不管了。公开呼喊：“红军主张抗日，我们联合红军抗日去！”<sup>③</sup>

赵博生还积极做团结高、中级军官的工作。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是河北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赵博生利用与董振堂同乡、同学和旧交的关系，做团结董的工作。当董振堂告假回原籍“省亲”返回宁都后，赵博生带着一份孙连仲“暂免董振堂旅长职务”的电报去看他，并对董说：“有什么事，我们团结在一起，才不被人吃掉。”董振堂表示同意。此后，彼此关系更加亲密起来了。

---

①亮平：《追悼赵博生同志》，见《斗争》第1期，1933年2月4日。

②孙毅：《赵博生同志传略》。

③熊伯涛：《宁都兵暴前后》，见《红旗飘飘》第12集。



赵博生于西安举旗拟入汉中一周年时，邀请旧友孙毅、李青云、郭如岳、孙芳桂等开纪念会，温故知新，共勉前程。

十一月底，特派员王超奉调回上海党中央，途经南昌时，不料党的接头关系被破坏了，王超被捕，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领导人名单和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落到了敌人手里。十二月五日，蒋介石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伍三名共产党员<sup>①</sup>，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电报是由罗亚平收译的，赵博生获悉后，与特支的同志一起，沉着、机智、果断地对付着这突然的事变。首先，他们判定王超不是有意出卖党的组织，否则严缉的就不止这三名共产党员，自然包括赵博生在内，而且是首要的。基于这个分析，他们决心化险为夷，将此事转化成为全军举行起义的导火线。于是，他们立即分头紧张地开展组织起义的直接准备工作。按当时分工，刘振亚、王铭伍、李青云负责下级军官、士兵及党员中的鼓动与组织工作；袁汉澄、郭如岳去瑞金向红军总司令部汇报，请示组织起义的事宜；赵博生负责妥善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和做联合董振堂、争取季振同等人的工作。

赵博生坚定、沉着，立即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又经过慎密思考，要罗亚平假造了一份南昌行营拍来的电报，准备带去找董振堂商定机宜。电报的内容是：“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把电报编好之后，又在总指挥部执法队弄来一张证明给袁汉澄，好让袁顺利通过二十六路军的警戒线。这些事都办妥

---

<sup>①</sup>他们都是特支的成员。

当了，他带着这份“行营来电”去找董振堂。

董振堂得悉他的七十三旅在南昌的留守处被行营查抄一事，一直表现愤懑，这时又读了参谋长送来的“火速进剿”电报，认为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要下新的毒手。于是，赵博生提出了以七十三旅为主举兵起义加入红军的计划和争取七十四旅一道行动的设想。董振堂本有抗日爱国的思想，心里对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也是钦佩的，并且私下也多次设法寻找刘伯坚和党组织。他对以七十三旅为主举兵起义加入红军表示坚决赞同，但对争取七十四旅季振同一道行动表示忧虑。经过赵博生的分析，董亦表示拥护，并协助赵博生做争取季振同的工作。

季振同，河北沧县人，与赵博生是邻县同乡。他性情爽直，精悍、好胜，有魄力。他的七十四旅也是二十六路军实力最强的旅之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驻在城内，担任城防。能不能争取季振同参加起义，是关系到起义能否顺利举行的重大问题。特支和赵博生认真分析了季振同的情况，认为存在着不少有利因素：他对蒋介石积有旧怨，对孙连仲也心怀不满。李松崑被提升为二十五师师长时，他曾破口大骂：“枪毙不了这个狗东西！我听他的？”部队被困在宁都后，他也在觅寻一条返回北方去的途径。赵博生和董振堂一起，带着那份“火速进剿”的行营来电，来到了七十四旅旅部找季振同。季振同看完赵、董递给电报，毫不迟疑地表示：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去！接着他们三人又共商机宜，并由季振同做团结他本旅主力第一团团团长黄中岳等人的工作。

十二月七日，一架国民党飞机，送来了给赵博生的亲启“机密”件。赵博生拆开一看，原来是落在敌人手中的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那两个决议案和蒋介石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中共党

员的“手令”。赵博生镇定自若地再次妥善地应付了南昌行营的“命令”。

袁汉澄带着那张总部执法队的证明，通过了二十六路军的警戒岗哨，进到苏区，用“朱瑞叫来的”联络暗号，在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接上关系之后，即顺利地赶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瑞金的叶坪，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向他汇报了二十六路军的情况。朱德听了汇报，当即表示欢迎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并说这是大事，起义该怎么搞好，须马上召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经过详尽的研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二十六路军起义作了如下指示：

（一）用最大努力争取全部起义；（二）假如不能全部起义，则以七十三旅和党员能够掌握到的其它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三）如果是局部起义，凡是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立即随起义部队离开宁都到苏区来，未暴露的同志则继续隐蔽在二十六路军开展工作；（四）派红四军在宁都东北二十里的会同地区监视蒋之嫡系部队，以便相机策应起义；（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携带电台到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联络指挥；（六）起义后部队改称为红军第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行动要机密，起义的时间定为十二月十三日晚十二时；（七）起义时，在可能情况下，把宁都的地方反动武装头子严维绅、黄才梯逮捕起来。行前，叶剑英参谋长还将一幅标明了起义军开进苏区的路线和驻地的地图，交给袁汉澄带回。

特支接到指示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但刚刚把这些指示扩大传达到特支以外的有关人时，突然获悉：二十六路军

的两万套冬衣，十一月份的薪饷和经费已经到了广昌，不日即可运到宁都。如果按原定计划起义，这些资财就无法得到。季振同主张把起义的日子推迟一天，争取给大家发了衣服，发了饷，再起义去当红军。赵博生和特支的同志认为，这是季振同的一片好心。于是，特支决定一面派袁汉澄和七十四旅的卢寿椿秘密出城去固厚圩向驻在彭湃县苏维埃政府负责联络指挥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汇报、请示；一面派七十四旅旅部副官李达星夜赶到广昌，催促骡马大队将冬衣和薪饷兼程运回宁都。为了达到全部参加起义的目的，赵博生继续做团结季振同的工作。他拥护季振同做起义和起义之后的领导人，亲自搬到七十四旅旅部去住，以坚定季振同参加领导起义的决心。

季振同集合全旅官兵在操场上进行了动员讲话。季讲完后，赵博生也讲了话，说：这个旅好比一只大船，旅长就是舵手，舵往哪里摆，大家就往哪里走，要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说完，还叫大家互相认识认识，拉拉老乡。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推迟一天起义，并考虑了季振同嫌起义后改编为红十六军的番号太小的意见，决定起义成功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代表回来后，特支召开了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参加的行动会议，就举行全部暴动的事宜作了认真研究和周密部署：十四日黄昏，全城换岗哨，实行戒严；赵博生以宴请的名义在总指挥部解决各旅、团以上的主官问题；对总指挥部、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枢纽、兵站及通往苏区的要道和可能反对起义的对象均指派可靠的人员，配备足够的力量去控制、占领和监视。

总指挥部设在城东耶稣传教士住过的西式二层楼房里。十四日，赵博生通知总指挥部特务营营长，于下午四时把总指挥

部的警戒交给七十四旅一团第三营，特务营另有任务，在驻地待命。黄昏，按预定的部署均各就各位。赵博生在总指挥部的宴会，分楼上楼下举行。楼上是团以上的主官席，楼下是他们的卫士席。为了使宴会达到预定的目的，事前大造了一番舆论，说参谋长晚上的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有南京运来的白兰地酒、炮台烟，还有美国的水果，宴会以后还要打麻将等等。六时许，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外，其余留在宁都的那些团长、旅长们，一个个全都应邀前来总指挥部参加“盛宴”了。总指挥部的警戒虽早已撤换，但因他们的装束和总指挥部特务营一模一样，加上天黑，所以谁也没有发现换了人。八时许，赵博生在席间，简明地向军官们讲清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出路，宣布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赵博生宣布起义后，获得了大多数军官的拥护。对少数反对者禁锢起来，并缴下他们的私章，以他们的名义下令，调其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在解决楼上军官问题的同时，楼下卫士也按预先的布置一举被夺下了武器。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赵博生等旋即返回七十四旅旅部，指挥全城各部统一行动。由于二十六路军党的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准备充分，部署周密，起义基本上是顺利的。仅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伤三人，死二人。经稍事周旋，至次日凌晨二时许，终于完全解决，只是李松崑翻墙逃去，带走了城北四十里外驻砍柴岗的一个团，其余各部包括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计一万七千多名官兵全部参加了起义。

起义成功了！赵博生挥笔写了“解放”两个字，全城换口令为“解放——自由”。

拂晓，全城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在曙光

中，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宁都古城上空迎风飘扬。

天大亮后，准备出发的起义部队依次整齐地集合在南门外河滩上。赵博生来到队列前，以铿锵的语言向全体官兵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庄严宣布起义胜利了！并且带头扯下了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碎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然后，挥手率部跨过梅江，迎着朝阳，浩浩荡荡地开往苏区。

宁都起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党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兵运工作的一个壮举，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宁都起义六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并在合影留念的照片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起义部队进入苏区后，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到达宁都城东南六十里的固厚圩，并在那里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的迎接。赵博生忙迎上去，紧紧地握住刘伯坚的手。刘伯坚关切地说：“昨晚，我一夜没睡好觉，以为你们中有几个同志牺牲了，实在担心你们的安全。”赵博生爽朗地笑着说：“让蒋介石通缉我吧，我这几根骨头是属于苏维埃的了！”<sup>①</sup>

这天，赵博生和刘伯坚一起讨论和修改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晚上，通过电台向全国播发。“宣言”向全国的工人、农民、白军士兵们庄严宣告：“我们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

---

<sup>①</sup>孙毅：《赵博生烈士传略》。

路军，受国民党蒋介石的压迫，开到江西‘剿共’，但是我们整个两师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红色的江西彭湃县城（即旧宁都县城）实行革命的暴动，消灭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军官，扯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加入工农红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了。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

十六日早晨，刘伯坚代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起义官兵宣读了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和毛泽东、朱德同志签名任命红五军团及其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接着，部队开向石城县的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县的壬田、九堡、沿坝等地进行整编。

在部队整编的过程中，赵博生努力学习，带头协助党派来的政治干部搞好整编工作。这支刚刚起义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了，可是官兵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仍表现出许多旧思想、坏作风、陋习惯。他们不习惯红军的生活，受不了红军的纪律约束。为了改造这支队伍，赵博生严格要求自己，和官兵同甘共苦，并经常用谈心的方式启发官兵的思想觉悟，教导他们遵守红军纪律，去掉不良作风，认真改造世界观。他说：能够为劳苦工农谋利益贡献力量，就是莫大的光荣，等苏维埃在全国胜利后，与全国人民一道过幸福日子。他还经常以自己的

格言：“要负责任就不要怕挨骂、怕挨骂就不要负责任”<sup>①</sup>，教导部下做到无私无畏。总之，他为改造这支部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编后，赵博生偕同其他同志率领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一九三二年二月，参加围攻赣州的战斗；四月，与一军团组成东路军，参加东征福建漳州的战役；接着，回师江西与三军团会合，于七月间向粤北的南雄挺进，在水口大败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八月，一、三、五军团并肩北上，连克宜黄、乐安等县城；尔后，率部参加了攻克建宁的战役。

这一时期，赵博生曾担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

他在指挥作战中，表现勇敢、坚定、沉着。如在水口战斗中，他的左臂受伤，同志们劝他下去休息，他说：“流血很少，微伤何足虑。”<sup>②</sup>他还很注意在实践中，学习红军的作战原则，改造自己在旧军队得来的那套死板的作战方法，做到果断、机动、灵活。凡是重要战斗和关键时刻，他都亲临前线，周密部署，反复检查，亲自指挥。红五军团的战士在作战中非常英勇、顽强，尤其是拚马刀厉害，杀得敌军胆颤心惊。之前，苏区军民称赞说：“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此后，又加上“五军团的马刀！”因赵博生指挥作战有功，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级红旗勋章。

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的主力第九十师、二十七师和十

---

①孙毅：《赵博生同志传略》。

②亮平：《追悼赵博生同志》。



四师向金溪、南城一带苏区进犯。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在左翼之长沅庙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己的敌人。长沅庙是个只利于守，不利于攻的小山地。当时，赵博生深感这次战斗的重要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于是，他亲临前线，精心勘察地形，积极指导构筑工事，并缜密布置兵力。由于敌军向我进攻时，来势十分猖狂，先是集中火炮轰击我方前哨阵地，接着，便向我发起集团冲锋，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在这一激烈的战斗中，由于赵博生能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实施灵活的指挥，不仅连续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进攻，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而且扼守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一月八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相距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弹中右额，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赵博生不幸牺牲的噩耗传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电五军团，吊唁赵博生。唁电说：副总指挥赵博生“是为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无限的悲悼和敬意。”唁电并慰勉五军团的指战员“更要继续赵博生同志的牺牲精神，坚决的进攻敌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攻’与对我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胜利，来完成赵博生同志未完成的任务。”<sup>①</sup>为了永远纪念“宁都起义”的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一月十三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命令全苏区于一月二十一日这天的列李卢<sup>②</sup>纪念

<sup>①</sup> 《红色中华》报第47期。

<sup>②</sup> 列李卢即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

中，举行追悼大会<sup>①</sup>。后来，又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德亲笔题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称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sup>②</sup>。叶剑英曾于一九六二年“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前夕，作诗怀念先烈赵博生。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  
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sup>③</sup>。

**作者附记：**本文除已注依据外，还参考了孙毅、袁血卒、郭如岳、苏进、徐国珍及赵博生的亲属等写的回忆材料，初稿经孙毅、袁血卒、郭如岳等同志审阅修改。

---

① <红色中华> 报第 47 期。

②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 1 卷第 132 页。

③ 1962 年 7 月 31 日 <解放军报>。

# 董振堂

董汉河

## 远大的抱负

董振堂，字绍仲，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sup>①</sup>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

李家庄地处海河水系滏阳河流域的黑龙港一带，气候非旱即涝，土地非沙即碱，历来都是一个非常贫苦的地方。老百姓多以熬硝盐为生，生活很不稳定。经济上的贫穷，带来了文化上的落后。李家庄虽有一百多顷土地，近两千口人，却极少有人上得起学。

在地广人稀的李家庄，振堂家虽比不上地主、富农那样富足，日子过得还算殷实。振堂兄弟三人，兄升堂，弟庆堂。父亲很希望三个孩子都念书成才，无奈家庭经济力量不足，只能让哥哥去念私塾，留下振堂和弟弟在家劳动。

振堂幼年正是清朝末年，八国联军入侵不久，华北大旱三

---

<sup>①</sup>董振堂出生时间说法不一，高台烈士陵园烈士碑文上写的是1894年；华北烈士陵园碑文上写的是1895年。董振堂夫人贾明玉说，董振堂属羊，生于清光绪21年（乙未）旧历11月初6。作者取第三种说法。

年，霍乱病流行。振堂全家七口人都染上了瘟疫，祖父、祖母相继病亡。一切医药丧葬费用都是借高利贷支付，从此，家境日蹙。八国联军入侵后，帝国主义分子在离李家庄五里的毕家庄建立天主教堂，发展教徒。有些教徒依仗教会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振堂家也深受其害。他家的土地和毕家庄相连。每到麦收时，毕家庄有一家教徒就组织人来抢掠。振堂父亲告到县衙门，县官不敢惹洋人，官司自然不会打赢。于是，教徒就更加猖狂，抢掠年甚一年，振堂家遭受的欺压也日甚一日。父亲董俊清气愤不过，就破口大骂：“这些坏蛋，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同胞，认贼作父，真是无耻！”这些话被毕家庄的教徒张三听到，便纠集教徒宋毛兰等多人，用木棍把振堂父亲打得头破血流。目睹教徒们的暴行，振堂实在不能忍受，便向父亲要求说：“让我念书去吧！我要好好念书，学了本事，让洋人、洋奴不敢再欺侮我们！”<sup>①</sup>从此，振堂到邻村曹庄进初级小学读书，这年他已十三岁。

在学堂里，振堂年龄较大，穿的又是母亲织的土布衣袜，因此常受富家子弟的嘲笑。憨厚的振堂默不作声，更加奋发学习。在学校里他刻苦用功，回到家中也从不闲着。农忙时，帮家里干活；农闲时，就学毛笔字，拜师练武，从不外出闲逛。在穷僻的乡村里，一个富裕中农之家也很难供得起两个学生的学费。买不起笔墨纸张，他就用麻刷子蘸水，在墙上练字。没有灯油，他就背靠窗子，借黄昏时天空中微弱的光线读书。不久，振堂的学习成绩超过了那些富家子弟。于是，周围的嘲笑渐渐没有了。

---

<sup>①</sup>访问董光权记录。

振堂十九岁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由于他学习刻苦，四年中未曾缺过一课，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奖品。一九一七年，振堂二十二岁，到北京报考保定军官学校预科——清河预备学校，被录取。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振堂从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边防军第一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开始钻研炮兵理论和技术。六个月后，他决定进保定军官学校深造。适逢直皖战起，保定军校因校舍被乱兵焚毁，暂时停办，遂决定先投效到陆军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炮兵营当新兵。延至一九二〇年暑假后，振堂才进保定军官学校。因其数学成绩突出，且钻研过炮兵技术，被分到第九期炮科。一九二二年春，振堂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与何基沣等十三名同学，被当时的北京政府陆军部派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冯玉祥的部队军法森严，待遇甚低，许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愿到这个军队中来，惟振堂不然。他听说冯玉祥的第十一师，纪律严明，吃苦耐劳，用人取才，重实际，不专讲人情。所以，他在保定军校毕业时，填的志愿便是陆军第十一师。

到十一师后，董振堂、何基沣和同去的其他两名同学被选派到师部参谋处工作。这年夏天，董振堂、何基沣等四个同学，接受了到南苑绘制地图的任务。主管部门只给了四管毛笔，两盒药墨，此外无任何绘图仪器，却限令两月完成。他们不顾炎夏的酷热，每天大汗淋漓地干十三四个小时。工作苦累不说，生活待遇也很低，只及陆军部规定的一半。最难令人容忍的，是部队中的军阀制度。当他们绘图到一个月的时候，陆军部检阅使冯玉祥，把当地的参谋、教官和见习军官约一百余人，召集到大军帐前，听其训话。他讲了一大套军人以服从为天职，

上级错了下级也不准申诉争辩的“道理”，接着便把两个参谋拉出来，每人痛责了四十军棍。站在一旁的军官们，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吭声。事情发生后，派到冯部的三十多个见习军官，不到一个星期就逃跑了一多半。四个绘图的人，除董振堂外，何基沣等三人都感到前程暗淡，心神不定，想离开冯玉祥的部队。这四个人中，董振堂年龄最大，其他三个同学都称他“绍仲兄”。此时，他更象个忠厚长者，关切地为他们备水备饭，问饥问渴。一天，两个同学进城找“门子”去了，只剩下他和何基沣。工间休息的时候，何基沣把自己想要逃走，另寻一支能够救中国的军队去投奔的打算，告诉了董振堂。董振堂说：赤手空拳，到那里也不能救中国，应当立定志向，埋头苦干，锻炼身心，互相勉励，不怕任何困难，先在这里干几年，争取掌握一定的兵权，有了机会，就可以救中国<sup>①</sup>。何基沣接受了董振堂的劝阻，打消了要走的念头，表示要跟绍仲兄互勉互励，在冯部再苦干几年。

两个月的绘图工作，很快就结束了，董振堂等又面临着一个去向问题。保定军官学校分到西北军的见习官有两条路，一条是留在上层，当教官或参谋；一条是到连队当下级军官。前者生活舒适，待遇高；后者工作辛苦，薪饷低，而且军纪森严，处处要以身作则。当时许多人都以走前一条路为幸运，以走后一条路为倒霉。董振堂与众不同，让他当参谋，他不愿意，却自愿要求到学兵团炮兵连当排长。

西北军下层军官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名义上规定排长每人每月发二两半银子薪饷，实际上因西北军无兵饷来源，

---

<sup>①</sup>何基沣：《怀念董振堂同志》，原件存甘肃省档案馆。

每月都发不了。董振堂和士兵一起吃大灶，每天亲自带领士兵操练十小时以上，还要参加修路、种树等许多杂务劳动。这样的生活，使许多下级军官忍受不了。和董振堂一起分到西北军的另外两个炮科毕业生，都先后开了小差，而董振堂却硬是坚持了下来。

董振堂事事和学兵们同甘共苦。出操、演习、抬土、挑砖，一切学兵能做的事，他都做；上讲堂、做示范，一些学兵不能做的事，他也做。学兵们公认，董振堂最大的特点是，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关心士兵。一天，他正在和学兵们一起抬土、挑砖，修建营房的时候，冯玉祥到部队视察，发现他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很是赞赏。后来，炮兵野外演习，董振堂打炮，三发连中，冯玉祥叫他对众讲评。董振堂就现场的地形、时间和“敌情”状况，清晰明了地讲了一番，得到许多同事的称赞。从此，冯玉祥对他更器重了。冯玉祥任用军官学校毕业生的惯例，是由排长升上尉参谋，此后便永远在参谋工作上打圈子，对董振堂自然也不例外。冯玉祥看中之后，想把他提升为上尉参谋。但董振堂却表示仍任排长，不升参谋。冯玉祥觉得董振堂不识抬举，并且打破了他用人的惯例，心中甚是不快。后经参谋长刘骥解释，认为提升应随学生个人的志愿，冯玉祥这才把董振堂提升为炮兵连连长。

### 参加五原誓师 策应北伐战争

一九二四年十月下旬，北京政变。董振堂随冯玉祥，参加了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驱逐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的斗争和欢迎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等活动。随后，冯

玉祥部编为国民第一军，董振堂被提升为炮机教导队大队长和陆炮营营长。

一九二六年八月，冯玉祥由苏联回国，九月十七日在绥远省五原县授旗誓师，国民军改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论功行赏，董振堂升任国民军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接着，随冯玉祥重上征途，经宁夏、兰州、平凉、乾州和咸阳，打退了围困西安杨虎城等部的河南军阀刘镇华所部。事后，董振堂率部驻在西安南关一带，整顿补充。

一个大雪初晴的早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基沔来看董振堂。何基沔当时是国民军联军第十四旅旅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老同学相见，十分亲热，谈到中午，董振堂留何基沔吃饭。何基沔这才发现董振堂卧室的床上只有一条白床单和一件棉大衣。何基沔还以为他不在这里住呢，一问陪同吃饭的参谋长才知道，这确实是董振堂的卧室。饭后，参谋长走了，何基沔劝董振堂好好保重身体，并拿出一床刚刚买来的金钱豹皮裹红布的褥子要送给他。由于他一贯俭朴，何基沔费了好多唇舌，才勉强收下。与此同时，董振堂还对老同学进行了严肃批评，提醒何基沔，胜利的时候不要骄傲，生活上不要脱离士兵大众，并把听到的有关反应告诉了对方。何基沔听后深为感动，诚恳接受了董振堂的劝诫。

为策应武汉方面北伐军的作战，一九二七年五月上旬，国民军联军改名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分两路出荆紫关和潼关。董振堂在右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统率下，东出荆紫关，顺汉江而下，途经河南淅川县和鄂西老河口及襄樊等地，一举击溃了吴佩孚的豫鄂联军，包围该军于邓县。当时邓县是于学忠军据守。经过几天的激战，情况逐渐判明：于学忠部在人数和装



备上都数倍于孙连仲所部。加上孙部攻城失利，守城的于学忠部向孙连仲右翼迂回攻击。孙连仲不得不命令全军撤退到淅川附近，固守待援。此时，敌军已全面向孙连仲部展开进攻。为使全军得以安全撤退，孙连仲命令董振堂率一个旅到互亭镇一带布置掩护。董振堂接受任务后，将主力埋伏在互亭镇附近，并把自动火器集中使用，阻击敌人。待敌人接近时，董振堂亲率大刀队从正面出击，以主力从两翼夹攻，敌军大败，董振堂率部乘胜追击，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批枪炮，使于学忠、张联陞部不敢再犯，孙连仲部得以安全撤退，转移到淅川去休整补充。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左右两路在郑州会师后，冯玉祥为支援孙连仲部，曾派方振武军出河南南阳。吴佩孚率残部退驻襄樊。此时，吴部已军心涣散，于学忠七个师亦进退失据，彷徨无主。董振堂便亲率一个旅，从内乡、邓县之间向东南出击，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直插樊城西面的竹获铺，迅速围歼了吴佩孚的警卫旅和他的司令部，吴佩孚的参谋被俘，秘书长被击毙，吴本人和他的小老婆，坐了一只小船渡过汉江，狼狈南逃，才侥幸未被活捉。此后，于学忠逃走了，他部下的十六个师被改编，张联陞和他的一师军队也在老河口开城投降。战役结束后，董振堂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三十六师师长。他听说何基沣在战役中跑路很多，负了伤，缴获又很少。为了表示对老同学的关切，他把在这次战役中缴获的吴佩孚坐骑连同鞍具和长柄盒子枪二十支，送给何基沣，并写信勉励他，鼓起勇气，争取在下一战役中立功。何基沣接到信和赠品之后，又感激又惭愧。吴佩孚所用的鞍具都是用黄金装饰的，真是所谓金鞍玉辔，看到它，使人很自然地想起过去的封建王侯。何

基津经过考虑，认为应该以军阀腐朽的生活作镜子，使自己时刻警惕，便在征得董振堂的同意后，把那套鞍具上交了。

一九二八年六月，董振堂带队伍由河北向河南移防，路过河北深县。有名的深县五月鲜桃正值采收，果实累累，伸手可摘。董振堂预先下了一道命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结果，他的部队谁也不敢偷摘老百姓的一个桃吃。

农历五月端午节的前一天，董振堂借部队移防之机，绕道新河县，到李家庄探望父母。到家后，见父亲新盖了几间外面包砖的房子，就劝父亲不要再盖房子，将来国家富强了，人人都会有房子住。这次董振堂在家只住了一天，就匆匆归队了。

### “不爱钱将军”和“傻司令”

这次离家，董振堂把十六岁的侄子董光权带了出来，准备让他跟上自己到河南念书。

部队驻在河南新乡，叔侄二人住在里外连通着的两间房子里，里间是叔侄二人的卧室，外间是董振堂的办公室。侄子经常看到叔叔办完公后，就躺在外间的一张竹躺椅上看书，并且总是拿着警卫员为他削好的红蓝铅笔，在书上圈圈划划；看完一本，就装在帆布箱子里；待箱子装满了，便让同乡捎回河北新河县老家去收藏起来。前前后后，董振堂托人往家捎过许多箱书。那些书除了讲军事的以外，还有邹韬奋、郁达夫和鲁迅的著作，也有讲三民主义、讲政治经济学的，有《名人传》，还有《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一类暴露现实的文艺书。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几次抄董振堂的家，藏书全都散失了，惟独有一个装书的小帆布提箱，至今仍保存在董振堂夫人

贾明玉的身边。

董振堂的部队后来从新乡进驻开封。一天晚饭后，叔侄二人漫步走出了营房，路过一所冯玉祥用公款盖的新村，里边住着老百姓，还有公费办的学校，董振堂见了，感慨地对侄子说：“将来中国都要象这个样子，家家有房子住，人人有书读，有地种，有工做，那样中国才会成为强国。”<sup>①</sup>

后来董振堂调离开封到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豫西在旧社会，是土匪聚集的地方，素称“难治”。直军和镇嵩军的散兵游勇，也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为害乡里，骚扰地方治安。如果对他们不加区别，全都采用“剿灭”的办法，不但势有所不能，而且情亦有所不忍。董振堂便通过地方开明人士，对他们中的多数进行说服教育和妥善安置，使之明是非，辨善恶，权轻重，度利害，自觉改过从善，不再为非做歹；只对那些顽固不化，怙恶不悛的匪杆，才派兵剿除。这样做了以后，地方治安有所改善。此时，恰巧其兄董升堂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科长，兄弟二人便共同商量，迎养父母妻小于洛阳。

董妻贾明玉在洛阳居住期间，董振堂给她买了一件棉袍、一个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们见了，觉得“师长太太”太寒酸，董振堂却不以为然。

不久，贾明玉要回河北新河县老家去，董振堂又给她买了一件毛衣，一个枕头，交给她十元钱，嘱咐说：“我这一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我阔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sup>②</sup>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告别了。

---

①访问董光权记录。

②访问贾明玉记录。

以后，他终生恪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的全部精力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出路。

一九二九年夏，韩（复榘）石（友三）叛冯，冯部撤进潼关以西。那年正值陕、甘大旱，军粮民粮都十分困难。陇海铁路也仅能通到河南灵宝，运输十分不便。为了避免因陕西受灾而造成军队缺粮的困难，冯玉祥下令所有西进部队都要多带面粉。许多部队的官兵，因为怕行动累赘，并未认真执行这一命令。当时，董振堂任第五师师长，他真诚服从命令，把所有的乘马全部用来驮军粮，他本人也和士兵一样，背一袋面粉，徒步行军。因此，进潼关后，董振堂所部之第五师，军粮充足，避免了与饥民争粮的惨剧，赢得了冯玉祥的通令嘉奖和当地群众的赞扬。

陕、甘的大旱，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真是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反动头子蒋介石不但不设法救灾恤民，反而严禁米粮西进潼关，妄图借自然灾害，消灭国民军。一九三〇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出兵讨伐蒋介石。董振堂率领第五师东出潼关，参加讨伐蒋介石的豫西战役，激战月余，屡挫敌锋。

同年夏，董振堂参加讨蒋的豫东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率部冒雨驰援皖北亳州，受伤不退，裹伤再战，激战七昼夜，终于击退强敌，解亳州之围，受到冯玉祥的通令嘉奖。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但是，当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二百多元，却依然十分简朴，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级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地解囊相助。他每月的薪饷发下之后，全部让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从自己的薪饷里拿给二十元；明天

那个营长家里出事了，又让小高从自己的薪饷里拿给三十元，却从来不往家里捎钱。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吃饭的时候，董振堂让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他又让小高送给郭参谋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和后来的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是河北同乡，也是过从密切的好友，因为他们都重义轻财，关心下级，所以，当时二十六路军中，很多人称他们为“不爱钱将军”，也有人把董振堂叫“傻司令”。

## 准 备 起 义

一九二九年秋天，和董振堂在同一个部队任职的朋友苏进，把一个叫刘振亚的青年介绍给他。这个刘振亚是地下共产党员，宁都起义时是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特支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驱逐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刘伯坚等许多革命同志都先后离开，惟独刘振亚潜伏下来，并和上级保持着联系。后来，他在二十六路军中，发展党组织，并向赵博生、董振堂等高级将领做政治工作，对宁都起义的成功，起了组织和保证作用。但董振堂结识刘振亚时，并不知道刘的真实政治身份，只是在相处中感到，刘振亚这个青年，与过去他所敬仰的西北军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员刘伯坚，有许多相同的品质和观点。把刘振亚介绍给董振堂的苏进，也不知道刘是共产党员。他是因为一个叛投蒋介石的军官要捉拿自己时，刘振亚冒险给自己送信，而对刘产生好感和信任的。

一九三〇年九月，正当蒋、冯、阎中原鏖战正酣的时候，董振堂对到日本学过军事的老部下苏进说：“总司令（指冯玉

祥)今天同这个打,明天同那个打,也没有个目标,打到什么时候算完?”并且要苏进介绍在国外读过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派人到北京购买<sup>①</sup>。

蒋、冯、阎军阀混战的结果,西北军失败,冯玉祥出走。第二年初,蒋介石趁机把几十万钞票塞进孙连仲的腰包,将这支部队调往山东济宁地区,把原来的西北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下辖二十五师和二十七师。改编后,董振堂原来所在的十三师,改编为二十五师七十三旅,董振堂任旅长。

一九三一年旧历二、三月间,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匪”,进攻红军,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在和红军相互拚杀中两败俱伤。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多系华北籍,鉴于已往“剿共”部队失败的教训,都不愿南下。当南下的第一列军车开到济宁、袁州之间一个叫孙氏店的小站时,车上的军人全部下来,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这些破坏铁路的军人,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七十三旅第一团。因这一团人把铁路交通堵死,使得整个二十六路军无法南下。蒋介石闻讯后,利用原西北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并以不发军饷相威胁。部队滞留数日后,只得继续南下。从此,蒋介石便把董振堂恨在心上。

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后,奉命参加蒋介石对红军和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在“围剿”中,董振堂捏造了一些假情报,并以此为由,不肯进“剿”。蒋介石通过其他的情报系统知道真实情况后,对董振堂更为不满。对此,董振

---

<sup>①</sup>苏进:《回忆宁都起义》,载《解放军报》1981年12月12日;访问苏进的记录。

堂心里十分清楚。他认为决不能依靠蒋介石，曾派人到山西和冯玉祥联系。但冯玉祥此时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那么出路何在呢？董振堂陷于苦闷和彷徨之中。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以后，又命令二十六路军困守宁都孤城。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到宁都后，因水土不服，许多人都染上了恶性虐疾或痢疾，加上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队的歧视，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不到几个月，几千人患病死亡。宁都城西北的山坡上，翠岗下面，到处都是新堆起的坟堆，谁见了都黯然伤神。有些下级军官，为了吃“空名字”，贪污兵饷，伤病士兵还没有死，就用破席裹上去埋，坟地里的呻吟声，不绝于耳，凄惨的景象，使人目不忍睹。宁都城周围的红军趁机展开革命宣传，号召二十六路军倒戈当红军。但是二十六路军多数官兵由于对红军缺乏了解，倒戈的决心并不大。他们心情苦闷，只希望尽快返回北方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沦亡，华北危机。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遂一面电报蒋介石请示，一面下令全军北上。蒋介石怎肯让二十六路军离开“剿共”前线。因此，当部队刚向北开拔六十余里到达湖岭嘴时，便受到重兵阻拦，只得重返宁都。此后，孙连仲丢下部队到上海去治牙病，日常军务转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

回宁都后，董振堂非常苦闷：他不愿继续跟红军打仗；返回北方，又绝无可能；部队在疾病的威胁下，一天天减员，困守宁都孤城，只能坐以待毙。大难临头，到底出路何在呢？大革命时期，他曾接触过刘伯坚等许多共产党人。他觉得象刘伯

坚那样的共产党员，都是做人的楷模，却被逐出了西北军。董振堂怀念这些人，多次闪现过要追随这些人参加红军的念头。为此，他曾想方设法打听他们的下落，都毫无音信。这年五月，刘振亚请假回家时，董振堂又托他到上海打听刘伯坚等，也没有消息。他反复思考，谁能把他领上投奔共产党的道路呢？正在这时，南昌的留守处被蒋介石抄了！很显然，这是蒋介石对他不肯南下江西、不肯进“剿”红军的报复。

苦闷、愤怒煎熬着董振堂。他终于病倒了。七十四旅一团团副苏进前来探望，董振堂又一次打听刘伯坚的消息，并把自己准备起义的想法告诉了苏进。不久，董振堂到南昌去看病，回来后问勤务员高志中，部队中有些什么反映。小高便把部队中流传的一首《大家一起来倒戈》的歌谣，和有些人想投奔红军的议论，原原本本作了汇报。董振堂听了，默默地沉思着，没有吭气。不几天，苏进来看他，他又一次询问苏进，哪里有共产党的组织？但仍然毫无结果。

其实，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已经有了，并积极开展着工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处于绝密状态，董振堂和苏进哪里能知道呢？

二十六路军中和上级保持着联系的共产党员，起初只有一个人，这就是董振堂的七十三旅上尉参谋刘振亚。后来，上级党组织通过同乡、同学等关系，又派进几名共产党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他们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这个部队的政治影响，用个别交朋友和单线联系等方法，谨慎而有步骤地发展党员，相继成立了特别支部、官长支部和学兵连支部。开始发展的党员大部分是士兵和下级军官。后来，他们也注意到高级军官中一些人的情况，并及时地发展赵博生入了党。



赵博生入党，对董振堂有极大的影响。虽然，由于当时党的纪律，董振堂不可能知道赵博生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们是长期共事的河北同乡，在政治倾向、思想品质和生活作风等方面基本相同，几乎无话不谈。所以，党的主张，能够通过赵博生这条渠道，灌输给董振堂。

起义前夕的一个多月，董振堂无比兴奋，工作空前的积极和努力。因为那时他已经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再也不苦闷彷徨了。决心下定之后，他及时地给住在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老家的亲属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准备起义的事只字未提，只是告诉家中，要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大灾大难。如遇灾难，就到当时驻防山西的长兄董升堂处躲避。家里收到这封信，感到莫名其妙，直到后来从报纸上看到宁都暴动的消息后，才明白董振堂写那封信的用意。董振堂预料到起义之后，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迫害亲属，所以他写信让亲属到山西避难，因为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蒋介石的势力不能在那里横行无忌，是比较安全的地带。

## 宁都起义的日日夜夜

决定起义之后，董振堂把七十三旅旅部搬到了七十四旅旅部的东边。从此，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的来往更加密切。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们经常利用相互借阅书籍和打猎的机会，进行密谈，并决定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让部队出操、上课，积极做好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宁都城衙门东侧的一幢二层小楼上，灯火几乎亮了一夜。这就是二十六路军七十三

旅旅部和旅长董振堂的住处。

晚上七、八点钟，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旅部参谋刘振亚、郭如岳，学兵连连长李青云，政训部上尉马金富、马富有等人，陆续来到这幢小楼上。

大家又开始议论起来，议论的中心议题是二十六路军去向何方。董振堂的勤务员小高，因为想回北方，就借出出进进给他们倒水的机会，仔细听他们的议论。赵博生说：“我们再继续跟红军打，没有前途，只有全军覆灭。”

董振堂接着说：“现在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病亡的这么多，士气很低落……”接下去，他把听到的反映和部队中流传的那首《大家一起来倒戈》的歌谣给大家说了一遍。最后，他又强调说：“现在一无兵源，二无弹药，加上生活不习惯，再也不能跟红军打下去了！”

这时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特支书记刘振亚故意插了一句：“赵参谋长，红军倒底怎么样啊？你们在上面可能知道得比我们多一些。”

赵博生说：“也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听到的跟看到的也不一样：听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看到的却不是那么回事，红军连抓去的俘虏都给我们放回来了。你们下级在前线，接触红军比我们多，你们说说吧！”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谈了许多红军的好处，一直谈到深夜十二点过后，才陆续离去，分散回到各自的住处。惟独赵博生一个人留了下来，继续和董振堂谈论二十六路军的前途。赵博生说：“咱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全部丢了，弄不好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董振堂说：“只有一条路，就是把部队拉上去投红军！”

赵博生接上问：“你有决心吗？”

董振堂十分坚定地说：“只能走这条路！”说完，他让小高收拾好茶具去睡觉。这一夜，赵博生就住在董振堂的卧室里<sup>①</sup>。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的各种条件日益成熟。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严重事件：党组织在南昌的一个地下交通站遭到敌人破坏，中央军委派在二十六路军中工作的王超于回上海途中在南昌被捕，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两个重要材料被敌人搞去了。蒋介石了解到二十六路军内我党活动的情况后，立刻指令南昌行营拍出十万火急的电报，要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接着，又派人乘专机送来蒋介石妄图一网打尽二十六路军地下党员的“手令”。因总指挥孙连仲到上海治牙养病未归，“急电”和“手令”全都落到当时主持全军日常工作的参谋长赵博生手里。党组织研究了 this 突然事件，决定尽快举行起义，并采取两项紧急措施：一方面由赵博生拍出“遵令即办”的电报，敷衍南昌行营的压力；一方面派地下党员星夜赶到瑞金的叶坪，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汇报，请示起义事项。

中央军委听了有关情况汇报后，作了如下答复：用最大的努力争取全部起义，起义后组成红五军；万一不能全部举行起义，董振堂所领导的七十三旅以及党组织能够掌握的其他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

---

<sup>①</sup>以上几段均根据访问高志中记录写成。

起义；局部起义时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随起义部队到中央苏区，未暴露的继续隐蔽下去；起义时间定在十二月十三日夜十二时；并指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宁都地方反动武装头子黄才梯、严维坤逮捕起来。为了确保和配合起义的胜利，中央军委又决定派红四军到宁都东北二十里的会同地区，监视和牵制广昌县境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同时派王稼祥、刘伯坚等携带电台到当时的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圩联络指挥。

这时，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对起义有些犹豫和动摇。这又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二十六路军的六个旅中，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武器最好，实力最强，这个旅是否参加起义，对全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季振同如能率七十四旅起义，二十六路军的六个旅全部起义就会基本不成问题；如果这个旅不起义，那么起义的就只有董振堂的七十三旅，甚至只有七十三旅学兵连。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分析研究，认为季振同对蒋介石不满是真的，但对红军也缺少了解，作为一个旧军人，他犹豫动摇是因为考虑到自己起义后的前途和职位。为此，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及时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中央军委同意采取如下措施：（一）暴动成功后，编为红五军团，让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二）钱餉由季振同统一支配；（三）暴动前，赵博生以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的身份，搬到季振同的七十四旅旅部居住，表示听从他的指挥。这三条措施实施后，及时有效地坚定了季振同起义的决心<sup>①</sup>。

十一日晚上，七十三旅旅部的秘密会议又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组织起义的骨干分子董振堂、刘振亚、郭如岳、李青

---

<sup>①</sup>以上几段据袁血卒的《红五军团的诞生》和访袁血卒记录。

云、边章五等人。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七十三旅连以上军官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可靠程度。当研究到一个叫郭德培的团长时，大家认为他不可靠，是个有钱就干的兵痞。因此，决定让旅部的人去控制这个团。有人还提到一个姓黄的营长，他带的三营能打仗，是个主力营，但就是怕靠不住。刘振亚想让郭如岳参谋去控制。董振堂阻止说：“先不用派人去，黄营长从部队在甘肃时就跟着我，我找他谈谈看。”<sup>①</sup>

这天晚上的会，又是一直开到深夜一点多才散。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宁都城东南的山坡上，董振堂召集一部分自己的下属军官在那里开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弟兄们，你们风里来，雨里去，跟我董振堂多年，河南大战八个月，我们的血汗都流在一起，我们幸好没有死，要是死了，那才冤枉呢！大家想一想，我们打仗为了谁？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样的，没有打过败仗。咱们西北军的失败，是没有钱，没有粮，没有弹药供应，被人给出卖了！我也跟大家一样，被人出卖了。蒋介石把我们调来江西打红军，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日本？日本鬼子侵占了咱们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成了亡国奴。红军和我们既无冤也无仇。红军是工农的军队，我们在家也是工人农民。红军要打日本，我们也要打日本。咱们跟红军联合起来，弟兄们赞成不赞成？我决不会领着弟兄们去跳火坑。假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弟兄们，请相信我董振堂吧！”<sup>②</sup>董振堂平日不多说话，不善言辞，但此时此刻，他竟

---

<sup>①</sup>访问高志中记录。

<sup>②</sup>访问蒋跃德记录。

讲得如此诚挚感人，以至于几乎使所有的军官都点头称是。是的，多年以来，他们是信得过董振堂的，愿意跟他走！

晚上，董振堂、赵博生、李青云、刘振亚、袁汉澄又在一起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就如何举行暴动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二十六路军全部举行暴动。实现这个方案困难较大，但只要把季振同的七十四旅争取过来，也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方案，七十三旅起义，因为旅长董振堂是坚决的，下面某些军官通不过，也好解决。第三个方案，只把七十三旅学兵连拉到红军去，实现这个方案最容易，最有把握。大家一致同意争取实现第一个方案。

在这紧急关头，传来一个消息：从南昌给二十六路军运来的棉军衣和薪饷已经到达广昌。为了得到这批眼看到手的物资，党组织同意季振同的建议，临时决定把起义的时间推迟一天，即由原来的十三日改为十四日。经请示，中央军委及时批准了二十六路军党组织的这一临时决定。

十四日黄昏，宁都城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七十三旅旅部小楼周围，全部是手枪警卫排荷枪实弹的战士。旅部里边，董振堂在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振亚、李青云、郭如岳、马金富、边章五，还有那个起初怀疑有点靠不住的黄营长，以及几个下级军官。

会上，董振堂简短明了地下了命令：“今晚要行动，到红军那边去！学兵连要把北门和东门把好，警卫连加强巡逻。李青云到学兵连去！郭参谋到特务连去！……。”<sup>①</sup>

听到旅长果断的命令，大家立刻分头出动，中国近代武装

---

<sup>①</sup>访问高志中记录。

革命斗争史上一次伟大行动开始了！

蒙蒙细雨中，警卫连荷枪实弹在街上巡逻。

暮色苍茫中，旅参谋处新贴出的标语依稀可辨：

“打倒截断我军北归道路的蒋介石！”

“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

“到红军中去！”<sup>①</sup>

同一个时间，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的小楼里，灯火辉煌，赵博生以参谋长的身份正在设宴请客，大摆酒席。楼上招待的是团以上军官，楼下招待的是他们的侍卫随从。楼上，赵博生向到会军官讲明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及出路，并当众宣布起义加入红军。席间立刻骚动起来，有人赞成，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宣布震惊，一时不知所措。个别企图反抗的军官，当场被解除武装抓了起来。对不愿起义的军官，缴下了他们的武器和私章，以他们的名义分别下达命令，调动他们的部队按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待命。接着，预先布置好的警卫营士兵，一举解除了卫兵们的武器。总指挥部的行动胜利结束，宁都城临时宣布戒严，赵博生重新颁布口令，他亲手写下两个字：“解放！”接着，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这是预先约定的全城行动信号。

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枪声，各支起义部队按预先指定的目标行动起来：

董振堂的好友、八十旅参谋长边章五控制掌握八十旅；

袁汉澄以师生关系争取二十七师参谋处长掌握七十五旅；

---

<sup>①</sup>王幼平：《回忆宁都起义前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里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

季振同选拔七十四旅精锐，由卢寿椿带领到北门外解决总指挥部；

李青云带领学兵连一部分，控制二十五师电台；

郭如岳带领学兵连另一部分，控制总指挥部电台；

刘振亚率领特务排，保持起义后到达根据地的交通联系；

董振堂率领特务连扼于总部与七十四旅之间，准备策应意外的事变；

……

宁都城响着稀落的枪声，大街小巷里，不时传出忽高忽低的口令声和忽快忽慢的脚步声。身穿呢装革履的国民党小官僚，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和红绸绿缎的太太小姐，三五成群地被押进学兵连连部。多数地方的行动都在顺利地地进行，唯有两处遇到了顽抗。

一处是二十五师师部。这个师的师长李松崑，可能事前有所觉察，没有应邀赴宴。七十四旅一团一营营长卢寿椿带领一营人马前去捉拿这个师长时，他的警卫人员进行反抗。卢寿椿带领队伍缴了这支卫队的械之后，李松崑越墙仓惶逃走。事后得知，他逃到宁都城北四十里的砍柴岗，把驻防在那里的一个团带走了。

再一处是二十五师电台。起义部队去夺取时，遭到了顽固抵抗。董振堂闻讯，带着一个警卫员，前往策应指挥。十几分钟后，战斗胜利结束，董振堂身边的那个警卫员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回到旅部后，董振堂连夜用电话、写信、派人等各种方法向他的同乡、同学、朋友、部下，以及一切相识和不太熟识的人们作着殷切号召：“你们还不相信我董振堂吗？我只能带大家走向光明，不会带大家跳火坑。即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来



吧！到城外东南角高塔下集合。”①

十五日清晨六点钟，宁都城里的战斗全部结束。大股小股的起义队伍，陆续向宁都城东南角的高塔下走来。

上午九点钟，红艳艳的太阳升起在雨后初晴的天空，宁都城内外到处都洒满了金色的光辉。二十六路军起义部队（包括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一万七千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汇集在宁都城东南角的高塔之下。董振堂站在高处，大声向自己所领导的部队宣布：

“我们起义成功了！我们再也不受国民党的气了！”说着，他把国民党的帽徽、胸章从身上撕了下来，又把国民党的一面青天白日旗当众撕碎，扔到一边，“从现在起，我们和这些东西永别了！我们马上到红军那边去！”②队伍中立刻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蒋介石！”“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

会后，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向中央根据地进发！部队的前锋是董振堂率领的七十三旅，其它各旅依次跟进，七十四旅殿后，以防意外。起义队伍走过的路上，丢满了国民党的帽徽、胸章和青天白日旗；起义队伍走过的梅河沙滩上，留下了一排排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足迹……

## 为了红五军团的成长壮大

起义队伍向宁都东南的彭湃县前进。苏区的老百姓，提壶

---

①王幼平：《回忆宁都起义前后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里的一个中共士兵支部》。

②访问高志中、蒋跃德记录。

携浆，在村口路旁欢迎招待。到了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固厚圩，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著名共产党人刘伯坚，领着儿童团在村口迎接。

当天晚上，部队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出了《原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于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宣言》（又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宣言，表示了原二十六路军全体官兵，宁都起义后“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统一”的决心；沉痛地控诉了国民党军阀的深重压迫；热切地号召一切白军官兵“掉转枪口”，“站到苏维埃这边来！”宣言最后的署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副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十五军军长黄仲岳、全体指挥员战斗员。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起义官兵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并颁发了委任状。接着，部队开到石城县的秋溪、龙岗、横江一带进行改编。

原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改编成红五军团第十三军后，在龙岗圩整顿。十二月下旬，部队的党组织召开支部会。十三军第一任政委旷珠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支部书记李青云首先报告了宁都起义的经过。然后，一致讨论通过了董振堂的入党问题，并报上级党组织审批。

在部队进行整编和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董振堂特别能够以身作则，并经常深入连队进行检查。他最关心部队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常去警卫队检查询问：“干部有没有打骂战士的？”“有没有打骂老百姓的？”“有没有拿老百姓东

西的？”查询之后，他就教育干部注意向老红军中派来的政治干部学习。董振堂本人，就是虚心向红军政治干部学习的模范。

起义两个月之后，为了把十三军办成红五军团的先进典型，把十四、十五军带起来，军委调何长工任十三军政委，并嘱咐何长工，到十三军后，抓紧研究批复董振堂的入党问题。

军委派何长工到十三军后，董振堂觉得何长工很正派，有学问，有很多实战经验，所以，非常尊重他。无论是下去检查工作，还是开干部会、士兵会，总是让政委先讲。回到军部，又请何长工介绍红军如何练兵，怎么打仗。何长工觉得，董振堂虽然出身于旧军人，但本质纯正，缄默少言，很有上进心。因此，两人关系融洽，相处很好。

老红军的传统和经验，经过各种渠道灌输下去以后，十三军改造得很快，各项工作都走在十四、十五军的前面。十四、十五军经常派人到十三军座谈，交流经验，董振堂、何长工毫无保留地把改造十三军的经验告诉他们。

董振堂并不以十三军的先进为满足，他经常带着十三军各级干部，到一、三军团和中央各机关参观学习。毛泽东、项英等亲自接见他们，并同他们亲切谈话<sup>①</sup>。到一军团参观之后，他亲自撰写了《模范的红五团》<sup>②</sup>一文，介绍老红军的情况。回到十三军，他就照着老红军的样子做。

起义之后，董振堂学习的愿望更强烈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学习到十二点以后。他不但抓紧学习，还经常言传身教，

---

①见1932年1月13日《红色中华》。

②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58期及1933年9月3日《红星报》。

培养自己的下级。要带兵，首先要爱兵。这是董振堂的一贯思想。他当红军将领后，对兵士更是视如手足。凡是和他相处过的同志，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全都被他的爱兵精神所感动。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有这样一个深刻印象：如果董军长的棉衣穿上了，就说明部队的棉衣都穿齐了；如果董军长的棉衣还没有穿上，那就说明部队还有人没穿上棉衣。

### 把一切献给党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并把一省数省的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要求中央红军攻打赣州。从二月四日开始，红三军团开始进攻赣州。由于赣州城池坚固，守敌兵力雄厚，三军团久攻不下，伤亡较大。加之三军团一个叫郭秉生的师长火线叛变，三军团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中央军委交给五军团的任务是：掩护三军团撤出阵地，防止敌人从城内冲出，阻击城外增援的敌人。这是五军团组建以来的第一仗，临危受命，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五军团开上去，顶住了前来救援的敌主力陈诚的十一师，掩护三军团安全撤了下来。在这一战役中，董振堂率领红十三军之一部，手拿雪白的马刀，赤着膀子，怒吼着，象猛虎一样冲入敌罗卓英师的阵里，杀得敌人横尸遍野，狼狈逃入赣州城内。

经过宁都起义、龙岗整编和赣州战役，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红五军团迅速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董振堂也以实际行动和卓越的功绩证明，他是一心一意要革命，要跟党走的。各级党组织都认为，他已经完全够得上一个共产

党员了！

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对董振堂的过去是了解的，即使在旧军队中，董振堂也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正派的军官。起义和起义以后，董振堂的一系列表现，他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完全同意尽快批准董振堂入党。

一九三二年四月，上级党组织批准了董振堂入党。他兴奋，他激动，“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使他严肃地想了好多，最后归结到一点，这就是：共产党员就要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献给人民，要始终不懈地为党工作一生，战斗一生，直到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把自己的想法倾吐给政委何长工，并且说：“何政委，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就把它拿出来，全部分给战士吧！”

何长工劝他说：“你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给你家老人养老！”

董振堂坚持说：“那我就全部缴了党费！”

何长工解释说：“你是个新党员，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一部分给老人吧！把三分之二分掉，留三分之一。”

争来劝去，最后商量的结果是，董振堂同意留五分之一，大概是三百块银元左右。这三百块银元，董振堂原封不动地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个不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些来，给他们补养身体。一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三百块银元<sup>①</sup>。

---

<sup>①</sup>访何长工、高志中记录。

在捐献积蓄的同时，董振堂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送给了朱德总司令。朱德对这条毛毯非常珍视，从江西苏区一直带到陕北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经常往返于延安和西安之间。朱德把董振堂赠送给他的毛毯，转赠周恩来作御寒之用。“七·七”事变后，在朱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刻，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朱德带着它，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最后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这条普通的毛毯，记载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之间的诚挚友谊，也是董振堂对革命赤胆忠心的历史见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名义，指挥东路军（一、五军团）发起漳州战役。董振堂率部参战。四月十日东路军攻占龙岩城；十九日，歼敌第四十九师主力大部于漳州外围；二十日，解放漳州。这一胜利，使红军筹到了大量的物资和现款，同时也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打下漳州之后，董振堂率部撤往永安一带休息。一天，董振堂擦枪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原因走火了。他立刻找到何长工说：“政委，我擦枪时走火了，按部队规定，走火要坐禁闭三天。”何长工劝阻说：“你是军长，就不坐了吧！”“不，我坐。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官兵一致嘛！”董振堂坚持着。何长工觉得，应该尊重这个新党员的自尊心，让这个起义过来的高级将领做一个模范，对全军也有好处，最后终于同意。

董振堂背着被窝，到禁闭室关了三天<sup>①</sup>。消息传出，广大干部战士对董振堂更尊重，遵守纪律也更自觉了。

---

<sup>①</sup>访问何长工记录。

## 大 战 水 口

漳州战役后，红军声势浩大。广东军阀陈济棠、余汉谋，怕红军发展起来，危及自己的地盘，在蒋介石挑动下，纠集二十个团的兵力，向江西南部进攻。广东军阀从来没有和红军打过仗，还没有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因此，在余汉谋亲自指挥下，一路上气势汹汹，直向中央根据地扑来。

一九三二年六月底，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军团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南康、信丰、大余地区，准备打击进犯赣南的粤敌。此时，董振堂已继季振同之后，任红五军团军团长。

董振堂指挥作战的特点是细致、果断、勇敢。这一次，他带领五军团开上去之后，没有贸然和敌人接触，而是首先让侦察科长、作战科长和下面的各级干部了解敌情，汇报敌情。他把参谋刘振亚找到军部，问了他许多问题：敌人是谁？敌师长都是谁？他们的装备、弹药、武器和炮火怎样？士气如何？刘振亚一一作了回答。

干部汇报完了，董振堂又找老百姓座谈，询问敌军是从那里来的，都带了些什么武器。

经过细致周密地调查之后，董振堂下了和敌人决战的决心。干部会上，他作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给敌人一个狠狠的打击！这一仗能不能打好，对我们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如果打不过敌人，我们就很难站得住脚……。”<sup>①</sup>

---

<sup>①</sup>访问高志中记录。

七月八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水口圩附近与敌接战，因兵力薄弱，打成对峙，敌进入水口圩固守待援。九日，余汉谋以两个师零一个旅向水口圩增援。红一、五军团和第十二军（红三军团此时尚未赶到）与敌展开激战。战斗开始后，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开往前线。一声令下，红五军团战士，挥舞大刀，分作四路，一齐向敌人冲杀过去。刹那间，红绸飞舞，银光闪闪，满山遍野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董振堂带着警卫员，到了离敌人六七十米的地方。前方的战士顿时士气大增，一个个更加勇猛。敌人吓坏了，抵挡了一阵之后，溃退下去。五军团战士乘胜追击，一阵砍杀，敌人陈尸遍地，伤亡三千余人。

胜利归来，五军团声名大震。由于董振堂等同志战绩卓著，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央苏区军民隆重纪念宁都暴动胜利一周年的时候，董振堂、赵博生、刘振亚等同志荣获红旗勋章<sup>①</sup>。

一九三三年三、四月份，宜黄战役之后，上级经过研究，调高志中到三十七团当副团长。董振堂叮嘱他，下去以后，要注意这样几条：一是要把兵带好，要让你领导的干部战士和你一心，爱护当兵的要象爱护自己的亲兄弟一样。二是遇事要沉住气，要稳当，特别是在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要深思熟虑，既要考虑到前进的道路，也要考虑到后退的道路。第三，要很好地向老红军学习，向下面的同志学习，不要产生自高自大的情绪。第四，要注意纪律，要模范执行红军的纪律，没有纪律不可能把兵带好，也不可能打胜仗。这四条一定要记住，以后

---

<sup>①</sup>见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



有什么事情可以再来找。

最后，董振堂送给高志中一个望远镜、一支旁开门二十响手枪、一个公文包和一双筷子，作为临别的纪念<sup>①</sup>。

## 遵义会议前后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不得不一九三四年十月，离开建设多年的江西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征途。

从长征一开始，红五军团就担任全军的后卫，担负着繁重的掩护任务。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领导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仅携带了大批笨重的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象大搬家似的向西突围。虽然勉强通过了敌人在赣南、粤北、湘南设下的三道封锁线，但是一路上行动缓慢，损失很大。五军团在后面，被敌人紧紧咬住屁股，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吃不好，睡不好，也补充不上，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部队急剧减员，通过湘江封锁线的时候，担任掩护任务的五军团三十四师被合围的敌人封锁在江那边，损失惨重。董振堂心情非常沉痛。

部队进入贵州后，敌人仍然紧紧尾追不放。一次，五军团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击，加之弹药缺乏，几次冲杀都未能奏效。董振堂命令大刀队埋伏在山腰的草丛中，而令一部分持枪的战士，在山顶故意暴露，装作停止战斗的模样，敌人发现后，一窝蜂似地向山上冲。待敌人冲到半山腰我大刀队埋伏的地方

---

<sup>①</sup>望远镜和筷子现存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时，董振堂一声令下，顿时手榴弹象一颗颗流星一样向敌群飞去，把敌人炸得血肉横飞。董振堂乘势率部出击，猛打猛冲近十余里，变被动为主动，胜利地掩护了主力西进。

十二月下旬，部队到达了贵州的黄平县。这是一座山城，四周都是山峦，几乎没有平地。但市面却很热闹，街道上人来人往，各式各样的店铺也很多。上级决定，在这里进行几天短暂的休整。

董振堂住在城内一家很普通的民房里。一天，小院内静悄悄的，董振堂一个人在洗衣服。三十七团政委谢良和团长王彦秉来了。董振堂立刻站起身来笑着打招呼。谢良说：“首长要考虑咱们全军团的事，工作这样忙，还自己洗衣服，为什么不让警卫员他们帮帮忙呢？”

董振堂让他们坐下，笑着说：“洗衣服是一种很有益的劳动嘛，既可以休息脑子，又可以锻炼身体。再说，我自己也有一双手，何必要麻烦警卫员他们呢？他们既要行军打仗，又要站岗放哨，很辛苦啊！”<sup>①</sup>

军团长的这番话，使谢良很受感动，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王彦秉笑着解释道：“老谢，你来咱们五军团时间不长，还不大了解咱们军团长。多年以来，军团长从来都是衣服破了自己补，衣服脏了自己洗的。”接着，董振堂询问起部队的供给情况和伤病员的多少，嘱咐他们，趁部队驻在城市里，要设法多买些药品，给同志们治病。最后，董振堂十分兴奋地告诉他们，中央军委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决定部队休息三天，进行整编。整编的具体办法是，撤销五军团师一级的机构，精

---

<sup>①</sup>见谢良：《铁流后卫》。

减机关，充实连队，并把八军团和五军团合编，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这样每个连队将有一百五六十人，战斗力就会加强，有利于对敌作战。

长征以来，董振堂很少骑马——他的马上经常骑的是伤病员，现在他就更不骑了。他时常和警卫连、通信连走在一起，利用行军时间和他们谈话，生活呀，卫生呀，枪枝呀，什么都谈。战士们都觉得军团长待人亲热，一点架子也没有。

长征路上，董振堂和新调来的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也相处得很融洽。一有军委的电报，他总是首先拿上和政委商量。董振堂身体很好，睡得很少。找来向导，他总是亲自谈话，询问路线。宿营时，不管多晚，他又总是亲自检查阵地的布防情况后，才回军团部休息。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又乐观又能干，但董振堂仍然经常过问他的工作，时时告诫他：我们军团的担子重，关系到全军的安危，一定要计划得很周密才行。敌人尾追部队的兵力部署，进攻次数，飞机骚扰的情况，他每天都亲自询问之后，向中央军委汇报。

一九三五年元月，前面的部队攻下了遵义，五军团在遵义东南方向布防，军团部就驻扎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小村子里。董振堂和军团政委李卓然分别住在三间瓦房的两头，中间的房子空空荡荡，只有一张小桌，作吃饭和办公用。

部队还没有完全布防好，董振堂和李卓然就接到了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的通知。因为董振堂要布置和检查部队的设防情况，李卓然只好先走一步。第二天，董振堂赶来参加会议。会议讨论时，董振堂和李卓然向到会的同志汇报了五军团担任后卫的情况，认为博古等的军事指挥很不得力，应立刻撤换。经过充分讨论，遵义会议得以胜利地纠正了“左”

倾军事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委李卓然留下来，处理一些其他事情，军团长董振堂连夜赶回部队，传达会议精神<sup>①</sup>。

董振堂回到军团部后，高志中来看望他，告知刘振亚病重的消息。刘振亚，这个宁都起义前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特支书记，是董振堂政治上的启蒙人和引路人。起义之后，在军团部当侦察科长。前些日子，董振堂就听到刘振亚生病的消息，想去看他，却一直抽不出时间。这时，他把警卫员叫来，要过自己的皮包，从里面拿出二十块钱，让高志中转送给刘振亚治病和保养身体。

四、五天后，刘振亚病逝。董振堂闻讯，立刻赶到医院，向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告别。艰苦的生活，可恶的病魔，在红军将要走向胜利、走向光明的时刻，过早地夺走了这位年轻共产党员的宝贵生命，董振堂无限痛惜！

遵义会议之后，红五军团仍然担任长征红军的后卫。到了金沙江边的绞平渡附近，五军团奉命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布防，掩护主力北渡。石板河背靠一座上六十里下五十里的大山，山那边就是波浪翻滚的金沙江。董振堂看过地形，要求各级指挥员，既要完成任务，又要爱护战士，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要把兵力分散配置，占领山前高地和纵深各制高点，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如有可能，还要在夜间出击，骚扰敌人。

---

<sup>①</sup>本书编者注：董振堂参加遵义会议的情况，是作者按照过去访问李卓然的记录写的。据倪毓英《有关遵义会议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8期）考证，董振堂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李卓然最近也说：“在会议上没有见到董”。此问题尚须进一步查实。

在董振堂亲自指挥下，五军团在每个山头上配置一二十人。这样，既有效地减弱了敌人炮火的杀伤力，又可以不断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争取到一定时间以后，分散在各山头上的战斗部队又分别后撤一段距离。敌人在五军团的节节抗击下，每天最多只能前进七、八里。

打到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麇集山下，形势逼人。这时中央军委又传来命令：红五军团必须在石板河一线坚守九天九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正当有些同志迷惑不解的时候，第六天，党中央和毛泽东特地派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从金沙江北返回石板河，到五军团解释中央的命令来了。

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军团部召开。李富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向大家介绍渡江的形势：

原先，全军准备从三个渡口过金沙江。现在，三军团从驛江渡过去一个团，因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被洪水冲垮了，不能继续渡江。一军团在龙街渡佯作渡江准备，吸引了不少敌人。但是，由于那里江面太宽，容易受到敌人飞机的袭击，也不能渡江。如今只有绞平渡一个渡口能够通船。现在，全军所有人马，都要从这里过江，短时间是不行的……。直到这时，大家才明白，为什么上级一再延长掩护的时间。

李富春讲完之后，董振堂站起来威严地说道：“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任务完成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红军是整个的组织，各军团如手足之不可分离，本军团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即令全军覆没，也要掩护一、三军团和党中央安全渡河！”<sup>①</sup>

---

<sup>①</sup>见1937年4月25日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

散会之后，干部们立刻返回阵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战士们纷纷表示：“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任务！”“告诉党中央，就是五军团打的剩下一个人，也要掩护主力安全渡江！”“不要说九天九夜，就是十天十夜我们也坚决守住！”

敌人又开始向五军团前沿阵地打炮了，这是敌人进攻的前奏。董振堂指挥战士们躲到山背后休息。待敌人炮火一停，他又命令各级指挥员一起跑到山头，进入工事，阻击冲锋的敌人。敌人进攻了多次，只是在前沿阵地前丢下了许多尸体。到第九天傍晚，接到中央要五军团撤退的命令，董振堂指挥全部人马连夜渡过金沙江。敌人的尾追又一次宣告破产！

### 坚持原则 顾全大局

红五军团掩护主力部队北渡金沙江后，随大军北上。一路上，凭险固守，顽强阻击，顺利通过彝族区，跨过大渡河，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在四川理县、懋功一带，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红军应集中主力北上，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肩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重任。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五军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

一天，三十七团政委谢良和团长李屏仁找董振堂请示工作。谈到如何打敌人骑兵的问题，董振堂嘱咐说：打敌人骑兵的战术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不然，今后过草地遇上敌人骑兵，是要吃亏的。敌人的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失去指挥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但打敌人的骑兵也有有利的方面，那就是敌人骑着马，目标

大。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干掉领头的几匹马，后面的敌人稍一停顿，我们就能够发挥火力，迅速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①。

正当部队进行热火朝天的练兵，征集粮草，准备过草地北上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了会议。会上，张国焘认为，“长征是失败了”，革命“现在是在两个高潮之间的总退却”阶段，因此竭力反对红军北上，主张向西部边远地区逃跑。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遭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会议通过了北上抗日的决定。

八月上旬的一天，在一家藏民的风子里，五军团军团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议首先由五军团代理政委曾日山传达毛儿盖会议精神。随后，军团长董振堂又作了简短的指示，他提醒大家，要认真贯彻毛儿盖会议精神，越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越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何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的倾向，都是有害于红军，有利于敌人的。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长处，都值得我们虚心学习。他询问了部队打骑兵的情况，要求大家一定要做好过草地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

毛儿盖会议之后，根据中央的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在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包座、出腊子口到甘南；左路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

---

①见谢良：《铁流后卫》。

刘伯承和当时身居红军总政委要职的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出发，准备经查理寺、阿坝，到班佑、包座，与右路会合，然后一同北上。

过草地时，五军团变为左路军的前卫。当五军团的前卫团——三十七团到达噶曲河边的时候，却突然接到左路军总部立即返回阿坝待命的命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三天的路程就能到班佑和党中央会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却中途折回呢？当红五军团的广大指战员疑虑重重地踏上返回阿坝的道路时，他们那里知道这是张国焘搞的鬼呢！

五军团撤到上阿坝后，张国焘又命令营以上干部到中阿坝开会。在这个会上，张国焘大放厥词，攻击北上抗日是无止境地逃跑，是机会主义。

张国焘的恶意辱骂和中伤，使五军团的干部怒不可遏，会场上骚动起来，有的小声嘀咕，有的轻蔑地笑着。会议结束后，他们拒绝传达所谓阿坝会议精神，拒绝传达那个臭名昭著的“阿坝会议决议”。

阿坝会议后，四方面军中少数人，在张国焘的欺骗和煽动下，对五军团的干部战士横加欺辱。董振堂及时找代理政委曾日山和保卫局长欧阳毅开会研究。欧阳毅见四方面军少数人这样无理取闹，心里早就窝火，就开门见山地说：“四方面军中少数人这么闹，问题的总根子不在下面！”董振堂点点头说：

“你的看法是对的，问题不在下面。四方面军中的广大干部战士也是党领导的红军，他们少数人受了煽动，故意找事，我们要和他们讲道理，把情况如实向他们的领导人反映，要求他们处理和制止。但不要把情况向下面扩散，要警惕、避免事态扩大发生冲突，那样就会上当！”停了一会，董振堂怕欧



阳毅年轻气盛，又特别嘱咐说：“讲道理时要注意态度！”<sup>①</sup>会后，欧阳毅把下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实事求是地写成报告，要求总部、四方面军和五军团联合调查纠正。朱德当场就表示同意，但张国焘却拒不采纳。

当时，五军团军团部还控制着一部电台，经常利用这部电台和党中央联系，并把得到的消息向周围的同志宣传。不久，五军团电台和党中央联系的事被张国焘发现了，他指责五军团“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下令把电台的密码没收。从此五军团便和中央失去了联系。

一天下午，朱德到五军团来了。他的面容明显的消瘦、苍老而憔悴。可以想见，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前些日子，由于张国焘的控制，连这位总司令也失去了行动自由。现在虽不能说他已经完全恢复自由，但总算可以出来走一走，和同志们见见面了。亲切的问候之后，董振堂立刻通知五军团营以上干部到军团部开会，听朱德讲话。

此刻，董振堂正在抓紧开会前的一点时间，坐在靠窗的一张长凳上，和朱德亲切的交谈着。干部们陆续到齐之后，董振堂宣布开会，请总司令讲讲话。朱德首先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然后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告诉大家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的北上抗日主张是正确的，南下对我们都极端不利，是一条绝路。在事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毫不含糊。但是，在兄弟部队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不要斤斤计较。

朱德讲完了，董振堂最后站起来说：“请总司令放心！我

---

<sup>①</sup>访问欧阳毅记录。

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决不辜负党对我们的期望！”然后，他又转向大家说：“总司令的这些话，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同志们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①

五军团随四方面军沿大金川南下以后，张国焘驱使四方面军的主力，经绥靖、丹巴、懋功，翻过夹金山，到天全、芦山一带，开辟“川康根据地”去了。五军团被留在后方丹巴县，担任警戒，以对付康定方向的敌人。同时，张国焘为了加强对五军团的控制，精心策划了对五军团的所谓“改造”。他先是以种种借口从五军团调走一些干部，又想方设法把一些自己的亲信安插进五军团，还挖空心思对五军团的部队进行调整。对张国焘的这些阴谋，董振堂是有觉察的，并进行了抵制。

张国焘对五军团保卫局的欧阳毅早就很反感，要调欧阳毅离开五军团。董振堂说：“欧阳毅同志对我们保卫局的工作很熟悉，这里工作离不开他。”②给了张国焘一个软钉子。后来张国焘又调欧阳毅两次，董振堂也都找借口顶了回去。

不几天，张国焘硬把五军团代理政委曾日山调走，派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团的政委。黄超到任不久，便趁欧阳毅生病住院之机，把他“调”到红四方面军一个单位当有职无权的秘书长去了。

随后，黄超又按张国焘的旨意，把原属五军团的三十九团和四方面军兄弟部队的一个团对调，同时，命令五军团三十七团离开丹巴，住到丹巴东南一百三十余里的牦牛村，去扼守一

---

①谢良：《铁流后卫》。

②访问欧阳毅记录。

座名叫大炮山的荒凉雪山。这样，董振堂手下的老干部，以及仅有的两个团全部被调走，董振堂完全被架空了。从此，他不能不服从多数人的“组织决定”。

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辖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委，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

同年六月，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转战千里，历尽艰辛，来到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增强了。朱德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持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迫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于是，二、四方面军各部陆续北上，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第三次踏上了过草地的艰难历程。

环境是险恶的，饥饿严重地威胁着红军战士。早在进入草地之前，部队就严重缺粮，主要靠野菜充饥。进入草地以后，野菜也很难找。大概是由于去年红军打这里过，把野菜都挖光了。晚上宿营时，同志们饥肠辘辘，怎么办呢？五军军部里，董振堂正在接待为解决战士们饥饿问题而伤脑筋的下级干部——团政委谢良和团长李连祥。他沉思良久，然后说：“今后宿营要尽量避开去年部队宿营的地点，这样野菜可以好采一些，还可以注意发现一些新的可吃的野菜。”接着，他又说：“最近我尝了两种野菜，是过去没有吃过的，味道很好。可见能吃的野菜一定还有，要发动群众多想办法。”①

---

①谢良《铁流后卫》。

这时，警卫员端来了一小盆菜糊糊汤，又拿来了四个热气腾腾的野菜、青稞窝窝。董振堂亲自把野菜糊糊匀成六碗，把四个窝窝匀成六份，招呼其他三位军首长和谢良、李连祥吃饭。董振堂的言语举动，深深地感动着两位临时搭伙的“客人”。他过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生活，却仍然关心大家，宽慰大家，用深厚的阶级情谊温暖大家！

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出腊子口，到了悬窝，先头部队准备了大批的炒面、土豆，五军终于摆脱了饥饿的严重威胁，吃上了两个月来的第一顿饱饭。

十月八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了。此时，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作为四方面军的后卫，在会宁南面的西兰公路上警戒尾追的敌人。他不断用电话激动地传播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喜讯，鼓励全军将士打好仗，多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庆祝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 高台为你著荣光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三十军在黄河东岸的靖远县渡河西进。张国焘则别有用心，企图调红四方面军主力去建立甘肃北部根据地，对执行宁夏计划是动摇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底，红三十军、九军、五军次第渡黄河西进。十一月十一日，过河部队正式称西路军<sup>①</sup>，董振堂所率领的五军仍然担任后卫。因战局变动，宁夏战役计划未实现。西

---

<sup>①</sup>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的电报，见《军事文献》。

路军向凉州、甘州、肃州方向西进。同年十二月，西路军占据永昌、山丹之后，五军调任前卫进驻山丹。为了对付西北军阀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骑兵，五军临时组成一个骑兵团，吕仁礼任骑兵团团长。董振堂军长亲自抓新建骑兵团的训练工作。一天傍晚，董振堂把吕仁礼叫去，询问骑兵团的训练情况。吕仁礼汇报完总的情况以后，又说：“训练时一个战士从马上摔了下来，把枪也摔坏了！”

“培养一个骑兵战士不容易啊！战士从中央苏区出来，跑了这么多路，一定要好好爱护，不要摔坏，要慢慢来。”接着，他又讲起了训练骑兵应注意的事情，“骑上马后，开始不敢跑，要先慢慢地走圈，马要拉屎，尿尿，人也要在马上适应一下……。”<sup>①</sup> 听着军长的讲述，吕仁礼感到很惊奇，想不到军长还有骑兵的素养！

谈完，董振堂要吕仁礼留下吃饭。这时，他才注意到，军长的卧室竟那样简单，除了一张铺板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军长本人的穿戴，除了他随身不离的那支盒子枪之外，再也看不出与普通士兵有什么不同。一会儿，警卫员把饭端来了，是清水煮挂面，两个人都吃得很香。

从山丹出发时，董振堂和骑兵团一起行军。他带着十几个人的警卫班和一个司号长走在前面，吕仁礼团长带着骑兵团三百多名骑兵紧跟在他的后面。开始，他不上马，大家也学他的样子，牵马步行。走了五、六里路，他把马肚带紧了一下，然后上马。大家也学着他的样子，紧了紧马肚带，骑到马上。马踏着碎步，走了十来里路，出汗了，他又下马步行起来。他告

---

<sup>①</sup>访问吕仁礼记录。

诉吕仁礼说：“这样可以保护马的战斗力。”①

十二月七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项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关向应、叶剑英、陈毅、肖克、董振堂、徐海东、聂荣臻、郭洪涛、张云逸、王维舟等二十三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和张国焘为副主席②。

一九三六年除夕，董振堂率五军首先攻占了临泽县县城，城内守敌仓惶而逃。部队休息几小时后，董振堂率四十四团、四十五团、骑兵团（辖三个连）和特务团（辖三个连）总计三千多人于次日凌晨离开临泽，一举攻占高台县城。军政治委员黄超带军直属队约一千人另加一个团留驻临泽附近，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留在黄超手里。

高台守敌，除一个骑兵加强连闻风而逃外，民团一千余人全部被俘，各种武器弹药都被缴获，并生擒了伪县长和伪县政府的所有官吏。

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刻领导大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军民情绪十分高涨。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马步芳”、“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等各种标语。后勤工作人员忙着发动全城妇女，组织缝纫商店，赶制棉衣。当时，他们不但要解决五

---

①访问吕仁礼记录。

②见《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年大事记》。

军大部分人员的冬衣，而且还要给九军、三十军准备一部分。为了征集布匹和棉花，他们召集了城里所有商业户和有钱户的座谈会，交待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出钱支援红军，对小商店的布匹则是按价购买。

政治工作人员发动群众，在县城文庙广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会上，当场逮捕了大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王兆德。董振堂在会上讲了话，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支援红军。会后，分了卢怀植的当铺，开粮仓给群众分了粮食。

紧接着，红军又帮助人民群众，组织抗日人民政府，选举当地人许青年担任抗日人民政府主席。在东西两条街上，建立了市镇政府，选出城内居民李仙担任东市长，夏登云担任西市长，并且组织了有一百多户贫民参加的贫协委员会。

与此同时，红军还积极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武装。红五军进占高台时俘获的一千多名民团，其中除个别地痞流氓外，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红军给他们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欢迎他们参加红军，不愿参加红军的可以回家。当场就有近千人接受改编，加入红军。此外，红军又号召和组织青壮年，临时组成了约有一团兵力的抗日义勇军，由当地人席斋担任司令员。

正当高台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翻身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时，敌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约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切断了红五军和临泽县城的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的红军主力。

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董振堂立刻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大家把木箱和木柜抬到城墙上，填上沙土，泼水结冻，把

城墙加宽加高。红军还组织城内所有的铁匠昼夜不停地锻造大刀长矛，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董振堂把城内划分若干防区，分别派兵固守。元月五日开始，敌人不断向城内射击，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

从元月十二日起，马匪军猬集八倍于守城红军的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城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敌人先是用大炮拚命轰击城墙，然后抬着云梯，挥舞马刀，向城墙涌来。董振堂那高大的身躯转遍了城墙各处，指挥部队进一步加强城防工事，一次又一次地把进攻的敌人打退。

高台城墙是个大土围子，高不到二丈，顶上又窄，并非刚能走两个人，且只有单人射击孔，很难组织火力，又不易隐蔽。守城红军在人力和弹药方面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形势越来越严重。如果死守下去，只能全军覆没。董振堂深知处境的严重性。他命令骑兵团团长吕仁礼：“根据目前情况，东西两个碉堡被敌控制，城里活动困难。你团立即在北城墙挖一大洞，准备突围，和临泽部队会合，待机破敌。”<sup>①</sup>城北是一片荒草地，离北山不远，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保存力量，防止敌人各个击破。吕仁礼非常理解军长的意图，便迅速带领一个连，在城北大佛寺后面的城墙下，挖了一个宽三米、高两米的大洞，只在城墙外侧留下一层薄薄的土，插个小窟窿眼，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突围时，一脚可以踢开，两匹马或者三个人可以并排通过。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董振堂军长下达突围的命令。

正在准备突围的时候，董振堂突然接到政委黄超派人化装

---

<sup>①</sup>访问吕仁礼记录。



送来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坚守，如高台有失，就要你军长的头。看完之后，他凝思片刻，表情严肃，立即在东城天主教堂里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黄超的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决守住高台！我们人在高台在，誓与高台共存亡！”<sup>①</sup>此时此刻，董振堂语气沉重，但态度严肃而又坚定。会后，大家立刻回去作了最后的动员，要求战士们死守高台。

元月十八日，敌人把西关的民宅院落的墙壁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规模地向红军发起进攻，但仍被守城红军击退，未能进城。

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加，攻势越来越猛，红军将士多数已血洒疆场。城内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浓烟四起，城墙象锯齿似的残破不堪。机关人员、女战士、炊事员、马夫全都上了城墙，用大刀、长矛、石块和敌人拚杀着，轻伤员用手抓牙咬，重伤员抱住敌人滚下了城头……。城内的老乡赶来助战了，有的青年人  
不避枪林弹雨，奋勇抢救伤员，一些妇女把热水热饭送上了城墙。

十九日上午，形势危机。董振堂带领五十多个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庄严地向党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革命一定能成功，自由幸福的日子一定能够到来。”<sup>②</sup>

他的声音威严而坚定，坚毅的脸上，滚动着泪珠，其他同志也都热泪盈眶。此时此刻，他们都已下定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

---

<sup>①②</sup>吕仁礼：《高台战役》，见《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元月二十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用最后剩下的手榴弹和石头瓦块，和敌人进行殊死的争夺和厮杀。正在紧张搏斗的时刻，收编民团中的少数坏分子乘乱打开城门，敌人象疯狗一样涌进城内，高台城沦陷了。

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长，从东门以北的城墙上跳了下去。敌人围了上来，他因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手使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完，壮烈殉职<sup>①</sup>。

噩耗传来，红军广大将士无不为之悲痛！同年，毛泽东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在延安宝塔山下，为董振堂烈士召开的追悼会。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中曾访问过烈士生前战友何长工、李卓然、王幼平、苏进、谢良、袁血卒、张永勋、高志中、孙毅、吕仁礼、蒋耀德、徐国珍和烈士亲属贾明玉、董光权、董光楹、董用威、董光苔、陈凌等同志；参阅了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宁都起义纪念馆、高台烈士陵园、河北烈士陵园的有关资料，以及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

---

<sup>①</sup>因董振堂牺牲时是最后一个子弹把自己打死的，所以这里用“殉职”一词。

# 童长荣

宋世幸 蒋晓钟

童长荣，字灿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生于安徽省枞阳县一个贫民家庭。他在安庆上学时，就积极参加并领导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留学日本，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负责人之一，领导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的反帝爱国斗争。一九二八年回国后，历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东满特委书记等职，积极从事白区斗争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三月，在同日伪军作战时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七岁。

## (一)

长荣出生在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中国，清王朝腐败没落，面临彻底崩溃的黑暗年代。长荣一家和其他劳动人民一样，过着艰辛窘迫的生活。父名童尔甫，是当地一家药铺的店员，工薪微薄，入不敷出，难以度日，由于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在长荣出世前三个月便去世了。母亲吴氏料理家务，生子女五人，长荣兄姐四人，先后夭折，只剩下母子二人，孤苦伶仃，相依为命，一家的艰苦生活，全靠母亲给人家缝补浆洗等挣点钱勉强维持。

母亲日夜操劳，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儿子身上，盼望儿子求

学上进，将来有个出头的日子。长荣刚满六岁，母亲便把他送进私塾读书，不久转入枞阳县枞阳镇陶公祠小学上学。长荣深切体会到穷人家孩子读书的不易，下决心发奋苦读，因而取得优异的成绩，博得师生的赞扬。

一九二一年，长荣离开家乡到了安庆，考进了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值五四运动以后不久，许多进步书刊广泛传播，安庆知识青年思想非常活跃，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蓬勃开展。长荣受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思想，同许多先进青年一道，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参加“六·二”学潮<sup>①</sup>等学生爱国运动中，长荣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受到各校学生的信任，被推举为安徽省（市）学生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一九二一年春，在进步教育家蔡晓舟的主持下，安庆各校的一批先进知识青年，先后在怀宁宫和菱湖公园举行集会，决定在安庆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首批入团的有王步文、许继慎、舒传贤、童长荣等三十多人。从此，长荣在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

一九二二年，他参加并领导了安庆市数千名青年学生反对军阀反革命统治的示威大游行。

当时，安徽封建军阀和反动政客狼狈为奸，互相勾结，省长吕调元派兵镇压安庆学生的革命行动。吕调元的野蛮行径，激起了全省教育界的公愤。在青年团和学联的组织领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大规模的“倒吕运动”。长荣和学联的其他领导

---

<sup>①</sup>1921年6月2日，安庆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姜高琦、周肇基为增加教育经费向省议会请愿时，被军阀马联甲等开枪打死，造成安徽学运史上有名的“六·二”惨案。

人率领示威学生包围了省长公署，声言如果吕调元胆敢再次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就纵火焚毁他的公署。其斗争气势，使吕调元大为惊恐。

一九二三年春，由于军阀政府长期拖欠教工薪俸，安庆一中和法政专科学校的教职员工，相继去省教育厅和省长公署要求发放欠薪，遭到吕调元卫队的殴辱，激起了各界人士的义愤，尤其使安庆各校学生怒不可遏。长荣等领导的安徽学联，当即发表宣言，呼吁全省学生一致声援，并组成“安庆各校教职员工索薪后援会”，提出“驱逐摧残安徽教育的吕调元”等口号，进一步掀起了反军阀斗争的高潮。吕调元在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下，惟恐事态扩大。经过皖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的调解和仲裁，责成吕调元惩凶道歉，立即拨发欠薪，斗争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三年秋，王步文、童长荣等领导的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在废督裁军运动后，进一步开展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当时“国会”贿选直系军阀曹锟做总统。安徽的国会议员张伯衍、何雯等，在北洋军阀倪嗣冲督皖时，充当倪的忠实爪牙，他们依仗倪的势力，当了国会议员，又接受曹锟的重金贿赂，为贿选曹锟当总统卖力效劳。安徽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长荣等激于义愤，决计利用安庆各校学生庆祝“双十节”结队游行的机会，捣毁他们的住宅。这天，安庆各界在黄家操场举行庆祝会。会后，各校师生六千多人整队游行，由会场出发，取道吕八街，直趋状元街“猪仔议员”<sup>①</sup>张伯衍的住宅。张家人见势不妙，即将大门紧闭。长荣等随即率领学生队伍破门而入，捣毁门窗家俱和花园陈设，并将箱笼柜橱、衣物首

---

<sup>①</sup>当时人们对接受曹锟贿赂，贿选曹锟当总统的国会议员的称呼。

饰、仓内积谷等扫数抛弃街头，任凭贫民大众拾取。还将张家后堂挂的张母遗像和供奉的祖先牌位，一并抛入厕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旋即赶至西门城边另一“猪仔议员”何雯的家里，予以同样捣毁。这使安徽各界人心大快，并给张、何等“猪仔议员”和当地军阀官僚以沉重打击。

事后，张伯衍、何雯向曹锟哭诉。曹锟乃下令苏浙皖巡阅使齐燮元和安徽省长军务帮办马联甲，将安徽省教育厅长江彤侯撤职，并下令通缉童长荣等三十多人。长荣等先后避居上海，在上海组织“安徽流亡学生反对贿选团”，发行《黎明周刊》，继续进行反对贿选总统和驱逐马联军、声讨吕调元的斗争。

一九二四年冬，冯玉祥回师北京推倒曹锟，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在安徽人民的压力下，段祺瑞政府下令将马联甲、吕调元撤职，并取消了对童长荣等人的通缉。

一九二五年春，长荣从上海回到安庆。五月，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长荣等积极组织安庆学生罢课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军阀当局为了不让长荣等人在省内继续“肇事”，遂以公费生的名义，将他们遣送日本留学。

## (二)

一九二五年七月，长荣和王步文、余大化等东渡日本，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第一高等学校。他在留日期间，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认真钻研马列主义，努力提高政治理论水平。长荣在长期的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一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先锋和领导骨干，赴日留学不久，即一九二

五年下半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sup>①</sup>。在党的领导下，他在留学生中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宣传教育工作，争取和团结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中的爱国力量，坚持开展反帝爱国斗争。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分裂国民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当国民党内右派反对革命派的斗争日益激化的时候，设在东京西巢鸭的国民党驻日东京支部，被“西山会议”派分子汤志先、路锡祉、葛晓东等人所霸占。他们公开扬言接受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中央”的领导。童长荣和王步文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国民党左派江完白、翟宗文等，在东京“神田青年会”内成立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驻日东京支部，与汤志先等国民党右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大力宣传我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主张，揭露“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反苏反共反革命的本质，指出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是中国人民和孙中山先生的叛徒。

一九二六年春，长荣当选为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人之一。这年冬天，蒋介石指令戴季陶到日本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东京特支决定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勾结日帝的阴谋。当戴季陶在东京露面时，当场遭到留日爱国学生和旅日华侨的愤怒斥责，使其不得不匆忙地逃窜回国。这次斗争，是在王步文、童长荣等领导下进行的。长荣在这次斗争中，奔波于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之间，组织集会游行，带头呼喊口号，彻夜不眠地拟定宣言、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表现了共产党员那种坚

---

<sup>①</sup>一说是1924年在国内入党。

强果断、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因此，一些反动分子对他进行恐吓或利诱。对此，他无所畏惧、毫不动摇。也有人劝他，留学在外，机会难得，多学点真才实学要紧，少参与那些担风险的活动为妙。对这些好心人的劝说，他总是以热情诚恳的态度向他们作解释。他认为，要想救国救民，必须具有真才实学，掌握实际本领；但是，在国家民族没有获得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一个人就是有再大的才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只有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所学得的本领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光和热。

童长荣留学日本期间，深切怀念祖国和母亲。他在寄给母亲的信<sup>①</sup>中写道：“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罢，……这是不能平静的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天晓。日本近日全国捕去了千多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更加高涨起来，压不下去的。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者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长荣深深地意识到，要想拯救千千万万个母亲，必须首先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因此，追求国家与民族解放的愿望，促使他发奋图强，百折不挠。

一九二八年五月，日军枪杀我济南军民五千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到东京，留日学生和旅日华侨义愤填膺。长荣等领导爱国志士组织“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他们一面向日本反动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一面联合日本的各种进步力量，争取国际友人的声援。同时，组织“留日学生归国团”，准备沿途进行

---

<sup>①</sup>存安徽省博物馆、安徽省民政厅。



宣传鼓动，呼吁国人团结对敌。这些斗争行动，使中国和日本反动当局十分震惊与恼怒。中国反动政府取消了长荣等人的留学公费，妄图以经济制裁手段迫使他屈服。日本反动当局则采取法西斯手段，把他逮捕关进监狱，严刑逼供。长荣坚贞不屈，保守党的机密，并鼓励狱中战友坚持斗争。日本反动当局毫无所获，只好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把他驱逐出境。

### (三)

一九二八年秋，长荣离日回国。当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蒋介石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形势暂时转入低潮。长荣按照党的指示，不避艰险，活动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比较森严的上海、南京、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进行恢复组织、争取群众的工作，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他在上海组织“反帝大同盟”，以公开的组织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横眉冷对敌人的血腥屠杀政策，坚信“劳农的反抗”是绝对“压不下去的”，对革命事业充满胜利的信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从各地汇集上海，他们为了继续战斗，陆续组织了一些社团，并在一九三〇年三月组成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从它成立的那天开始，就同国民党反动派以及文化艺术方面的各种反动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据夏衍回忆<sup>①</sup>，童长荣那时担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他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写过一些散文、短篇小说和诗

---

<sup>①</sup>夏衍：《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人民日报》1980年4月18日。访夏衍记录。

歌，用笔名发表在太阳社的刊物上。后来他参加了“左联”的发起工作，由于他担负着党的秘密工作，所以没有列入发起人的名单。

“左联”成立不久，因为革命工作需要，他离开上海，奉党的调配，到河南工作，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这时期，正当李立三主持党中央工作。长荣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提高党的战斗力，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因盲目地组织群众参加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切实际地要求组织全省暴动，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此期间，他与省委其他领导人陈原道、许兰芝等发生意见分歧。后来陈原道、许兰芝受到了党内处分。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陈原道得到了王明的信赖，取消了以前中央对河南问题的处理决定，撤消了对陈原道等的处分，要求河南全体同志“团结在国际路线之下进行革命工作”，推行更“左”的冒险主义。长荣因此被调离河南。

一九三一年三月，长荣接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

大连，当年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一个殖民地港口城市，是日寇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据点；同时，也是我党在东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比较早、影响比较大的城市之一。长荣在大连工作期间，为了便于活动，曾化名张树华。他不惧风险，深入到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出没于群众之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组织赤色工会、罢工委员会、反日会、工人纠察队等革命群众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在他的领导下，中共大连市委曾发动三泰油坊和三菱油坊的工人罢工斗争，组织“五一”、“五卅”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革命活动，激发和鼓舞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共满洲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号召全党要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组织民众，抗日救国。满洲省委指派长荣到斗争比较尖锐、环境比较艰苦的东满地区担任东满特委书记，领导东满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当时，长荣身患严重肺病，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毫不顾及个人的一切，坚决服从党的调遣，欣然奔赴东满，投入新的战斗。

东满地区，包括延吉、珲春、和龙、汪清等县（今吉林省延边地区），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有我党的活动，到一九三一年，党员人数发展到一千多人。东满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风起云涌。一九三〇年举行了“五卅暴动”。当年十二月，为纪念广州起义三周年和反对日本增兵东满，举行了一千五百多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一九三一年秋，东满地区各县农民，在中共东满特委领导下，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争取实现“四、六”或“三、七”减租法的秋收斗争。特别是延吉县，农民运动开展得最为激烈。当时敌人的《间岛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延吉县农民参加反对剥削压迫的减租减息斗争总人数达万人以上。革命的群众运动，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群众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在这种形势之下，童长荣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来到了东满，接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 （四）

“九·一八”事变后，东满同整个东北地区一样，曾掀起

民众抗日救国斗争的热潮。但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祖国东北大好河山迅速沦陷，东北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广泛发动民众，掀起抗日救国斗争的新高潮，长荣到东满不久，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便在延吉县拥声砬子（现在安图县明月沟山区），召开了东满各县党团员积极分子会议，参加的有四十多人。会议进行了十天，主要讨论如何在东满地区加强党的领导，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运用各种形式，利用各种武器，武装民众，建立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等问题。这次会议，使东满党团积极分子振奋了精神，坚定了信心。这次会议，为我党在东满地区创建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掀起抗日救国斗争新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二年初，中共中央出版的《红旗》报上发表了周恩来以“伍豪”笔名写的文章《用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要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兼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认真贯彻这一精神，指示东北各地党组织创建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红色抗日游击队。

为了贯彻党的指示，进一步发动群众，长荣和东满特委其他同志深入基层，在秋收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于一九三二年春，开展了更大规模的反春荒斗争。这次斗争在延吉县的依兰地区首先发动。依兰地区各村四千多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手持棍棒长矛，高呼革命口号，撒传单，贴标语，浩浩荡荡闯进恶霸地主大院，打开粮仓，把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捣毁日寇走狗特务机关，没收日本走狗财物，斗争恶霸地主。革命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东满各县。东满特委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激发群

众的政治觉悟，在斗争中提出了“向地主借粮度荒”、“反对日军出兵东北”、“夺取敌人武器，开展武装斗争”等政治口号，把农民运动引向深入。经过这次斗争，人民群众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出现了民众自卫武装组织，为东满地区建立抗日游击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长荣虽然身患重病，但是为革命的大好形势所鼓舞，仍经常奔走在延吉、和龙、琿春、汪清等县，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整建地方革命组织；一方面着手组建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这样，“赤卫队”、“别动队”、“突击队”等半军事性的民众武装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纷纷建立。在此基础上，东满地区四县相继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

建立抗日游击队，单凭手里的棍棒和大刀长矛是对付不了装备着现代武器的敌人的，部队需要拥有钢枪和弹药。武器从哪里来？长荣和东满特委其他负责人深入各县，召开党团员和民众积极分子会议，贯彻拥声砬子会议精神，具体落实夺枪计划。于是，东满各县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想尽各种办法，从敌伪手里，从恶霸地主手里夺取武器。此外，还通过募捐、购买和自己动手制作武器弹药。当时有名的“延吉炸弹”，就是当地民众自己研究制作成功的。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九三三年一月，东满特委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整编了延、琿、和、汪四县的抗日游击队，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满游击队，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武装。

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的建设和发展，威胁了日伪的统治。敌人为消除“心腹之患”，于一九三三年春季，向各游击区进行了“大讨伐”。游击区军民在东满特委领导下，团结各族人

民，联合各抗日武装，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抗日游击队同日伪战斗达六十多次。仅在汪清一地就歼敌三百多名，缴获长短枪二百五十多支。此外，在延吉、琿春、和龙等县的游击队，也都获得了反“讨伐”斗争的胜利。东满各县游击队和游击区在战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到一九三三年底，东满各县游击队发展到七百多人，游击区域也发展到东满四县的广大农村和山区。这时，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有：延吉县的湾湾沟、八道沟、老头沟、依兰沟；汪清县的荒沟、大小汪清、大甸子、嘎呀河；琿春县的荒沟、烟筒砬子；和龙县的渔浪区等。游击根据地的总人口约有两万。游击区和根据地人民在东满特委领导下，成立了“反帝同盟”、“农民协会”、“互济会”等革命群众团体，并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后改为人民革命政府）。游击区和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的蓬勃发展，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援了抗日游击队，东满游击队有了比较牢靠的依托。

在长荣和东满特委领导下，东满抗日游击队以抗日救国、民族解放为宗旨，军纪严明，作战英勇，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东满抗日游击队成了东满各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东满游击根据地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白山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保证党对游击队的领导，长荣和东满特委非常重视游击队中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发展党团员，不断壮大党的队伍。在游击队中，党团员人数占有很大比重。游击大队设有党委会，中队设有党支部，小队有党小组。这就使党的组织在游击队中能够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保证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各项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

为了提高党团员的阶级觉悟，发挥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长荣经常深入到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当中，与他们亲切交谈，作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他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撰写文稿，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宣传革命道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他曾针对东满党内出现的一些不良作风（如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等现象），在中共东满特委机关刊物《两条战线》上发表评论，他指出：“‘亡命者’<sup>①</sup>这是东满特殊的名词。这是党脱离群众的明显的事实（记号）。‘亡命者’所到之处，不仅白白的吃着饭，说着空话，甚至用互济的名义，从群众中拿出粮食来，养活自己的家人……。在党内存在‘亡命者’，不可能团结群众。我们一定要根除‘亡命者’这种现象。每个党员投入到生产中去，参加劳动，……随时随地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置于群众之中。要熟悉群众的一切情况，熟悉群众的痛苦和情绪，要把群众团结起来，并学会领导群众……。”<sup>②</sup>他还经常在《两条战线》上发表一些有关思想建设的文章，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如他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出版的第十五期《两条战线》上，发表了题为《中国革命性质及前途，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文章，提出：“无产阶级是以现实的革命斗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空想作为出发点。……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是同农民结成同盟军，首先要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夺取领导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不必再搞第二次革命……。”这些文章，在当时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

①‘亡命者’原意是指当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朝鲜，因不满其殖民统治而跑到中国东北到处流浪的人而说的。

②见《两条路线》第16期，1933年8月10日出版。

## （五）

东满是我国朝鲜族人民聚居的地区，东满抗日游击队大部分指战员是朝鲜族同志。为了便于工作，长荣认真学习朝鲜族语言，尊重朝鲜族风俗习惯，同朝鲜族战友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受到朝鲜族民众的爱戴与拥护。

据当年东北抗联老战士回忆，他经常给苏区农村夜校讲革命斗争道理，讲政治，讲军事，讲文化，提高苏区农民的政治文化水平。有时同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一起玩乐，给他们讲革命斗争故事，教他们识字、唱歌、跳舞，给战士们表演文娱节目等，游击队的战士们和苏区的孩子们，都很尊敬他，喜欢他。

他虽然身体不好，但还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和战斗。每到宿营地，战友们都休息了，而他仍是忙得不可开交，或者与战友们促膝谈心，讨论安排工作，布置战斗任务；或者阅读文件，思考撰写文稿。有时他守着一盏小油灯或者一盆炭火，一坐就是大半夜，甚至彻夜不眠。有时他太疲劳了，就轻轻地走到外面，与哨兵唠几句，问寒问暖，或者抓把雪擦擦脸，回到屋内继续工作。有时他剧烈的咳嗽声惊醒了睡入梦乡的战友，见他把身披的大衣盖在体弱生病的战友身上，战友们感动地含着眼泪说：“老张（他在东满工作时化名张长荣），你怎么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体呀！”<sup>①</sup>

据当年与长荣并肩战斗的一位革命老战士回忆，长荣经常讲：共产党人要时刻想着百姓，想着工人、农民、士兵、学生，

---

<sup>①</sup>王中山回忆录（未刊稿）。



想他们住的穿的，连他们娶妻生子、吃盐烧柴的事，也要想到，然后才能想到我们自己。他还经常讲：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不死，革命工作就不算完；死了之后，也要给后代留下一条往前走的路<sup>①</sup>。

身患重病的长荣，为了党的事业，战斗在风雪严寒的东满山区，呕心沥血，艰苦奋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

据东北抗联一位领导人李延禄回忆<sup>②</sup>，凡是同长荣熟悉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虽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作家，但是没有一点架子，非常平易近人。他政策水平很高，党性很强，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体质很弱，但能同士兵和群众同甘共苦。他对瓦解敌伪军的工作，很有一套办法。在抗联建立的初期，我们做一些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当时写在墙上的大标语有“彻底歼灭法西斯日寇”这样的口号，长荣同志看了，同大家商量说，应该把法西斯政府与被迫出来打仗的日本士兵区别开来。于是他亲自用日文写了许多颜色不同的纸条，上面写着：“你记得离家的时候你母亲的眼泪吗？”“你记得在车站和码头送别的时候你妻子的眼泪吗？”

“你们的母亲和孩子天天在家盼望你们活着回去！”“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日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阀财阀！”这些日文传单，由苏区少先队员、妇女抗日宣传队员和自卫队员贴在日军进出必由之路的电线杆子上、树木上，有的用石块压在路口上。长荣常说，一般的日本士兵多半是从农民、工人中征集来的，他们都是受迫

---

①王中山回忆录（未刊稿）。

②骆宾基：《过去的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害者，对他们要讲政策，光是谩骂没有用，反而会激起他们的反感。他给部队规定了一条纪律，那就是只要敌人缴枪，我们就优待。他这样作，对瓦解敌军士气起到了良好作用。

正当东满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发展壮大的时期，年轻的长荣同志与东满特委，在斗争比较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也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些政策。他们忽略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事实，提出了“反对一切地主资产阶级，没收其一切财产”等“左”的口号，没有重视搞好抗日游击队同其他抗日武装队伍的关系；甚至还提出了反对“反动群众”、“两面群众”等错误口号，放弃了对白区群众的争取，没有注意搞好统战工作。尤其是在肃清奸细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东满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给满洲各级党组织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于一九三三年春传达到东满。“一·二六”指示信分析了满洲当时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满洲的斗争任务，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信中指出：“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民族压迫，及广大群众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恶化，于是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为它是他们的利益的竞争者。正因此，日本帝国主义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还未能造下坚固的靠山。而且，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组织十分薄弱，但满洲的游击运动，却逐渐更多带着群众的性质”<sup>①</sup>。这就指出了在满洲建立广泛的抗日

---

<sup>①</sup>《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43页。

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指示信中提出党在满洲现阶段的总的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sup>①</sup>。“一·二六”指示信还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总结了经验教训。为了扭转满洲党组织的“左”的倾向，提出了满洲党目前的总口号，“不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是没收日本及一切卖国贼的财产，不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建立选举的人民政府，不是创造红军，而是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在将来革命进到更高阶段时，根本取消没收地主土地，创立苏维埃和创造红军的任务，恰恰相反，我们这样做才不是脱离群众的空喊，而是真正准备将来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sup>②</sup>

长荣领导东满特委认真学习领会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相继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一九三三年四月初，东满特委召开了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首先由长荣传达党中央指示信精神，而后进行讨论。与会同志发表了不同见解，有的强调党政军成员的阶级成分，搞统一战线时注意阶级斗争，坚持发展苏维埃政权；有的主张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有时是动摇的力量，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54页。

② 《满洲省委致各级党部全体同志的信》（1933年9月10日）。

及其走狗作斗争。最后，长荣作了总结发言，他根据党中央指示信精神，衡量、检查、总结前阶段工作，首先肯定了成绩，他指出，我们过去没有武装队伍，没有游击区，现在有了。我们粉碎了敌人的大“讨伐”，使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得到发展。这都是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共同打击敌人的结果。当然，我们没有经验，也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左”的口号，没有重视进一步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以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将取得更大胜利。至于会上大家争论的问题，我们暂时不作结论，将报告满洲省委和党中央，由上级党去解决。

接着，长荣和东满特委其他负责同志深入所属各县，召开党的领导干部会议，具体贯彻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后来，特委决定把苏维埃政府改称为人民革命政府，用“没收日寇走狗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的政策，代替“没收一切地主资产阶级财产”的政策，改善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同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

此外，长荣还在《两条战线》上亲自撰写文章，宣传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阐明党的政策，总结经验教训，为扭转错误倾向进行思想工作。如他在《两条战线》第十四期（一九三三年五月编印）发表的《对地主资产阶级的策略》一文中写道：“关于对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策略问题，决不是让我们同地主、资产阶级妥协，而是要求我们……在他们不反对群众运动自由发展的条件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同他们在暂时的反日战线上可以联合，……共产党在反日运动中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欺骗性的领导，争取无产阶级独立性的领导权。这是决定反日运动胜败的钥匙。”

他还在《两条战线》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编印）撰文批判了关于反对“反动群众”、“两面群众”的错误口号，他阐明：“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收买全部工人、农民”，即使“少数被欺骗收买的群众，也不可能长期忍受苛捐杂税、高利贷及一切殖民剥削”。他概括反动阶级的思想状况是：“盼明天日本来讨伐，才能保护自己财产”。而农民想的是：“什么时候革命成功，早成功，我们才能早解放。”他指出，这是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面貌。给群众戴上“反动”、“两面派”、“落后”等大帽子，实质是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分裂群众，脱离群众，不做群众工作的表现。

长荣还在《两条战线》第十三期上（一九三三年五月编印）发表文章，对当时在肃清奸细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出现扩大化的倾向，进行了比较严肃认真的批判。同时，阐明了党的政策，并注意到在实际斗争中予以纠正。

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治理论宣传工作，东满党组织的政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各方面的工作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

## （六）

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长荣在一九三三年春天，曾亲自率领部队来到汪清县马村。正当他在主持召开军民会议时，突然发现日军“讨伐队”包围上来，情况非常危急。他沉着机智果敢地指挥部队给敌人以迎头痛击，随即率领军民迅速转移。敌人进村后扑了个空，于是气急败坏地放火烧毁了全村的房屋。长荣在率队掩护军民转移的战斗中，胳膊受了伤，鲜血染红了衣服。当敌人撤退后，同志们都劝他回密林营地休养治疗。

长荣却遥望燃烧着的村舍沉重地说：“群众的房屋被敌人烧毁了，群众是为了支援游击队，为了抗日而落得无家可归的，我们如果丢下不管，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今后还会有谁能够相信我们呢？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又怎能生存和斗争下去呢？”<sup>①</sup>说完，他立即率领部队回到村里，安慰群众，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日本侵略者为了割断我抗日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置抗日军队于绝境，曾实施恶毒的“归屯并户”、“集团部落”政策。因此，我抗日武装部队不得不转入深山密林之中。为了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为了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长荣等在进入密林以后，仍经常率领小部队打回游击区，以鼓舞群众的斗争精神。

在艰苦的战斗环境里，长荣的疾病长期得不到医治和休养，身体日渐衰弱。他常常由于过度劳累，有时大口吐血，昏迷不醒。由于病情不断恶化，造成局部神经障碍，时而出现半身不遂症状。同志们见他这样，都心如刀割，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他却总是亲切地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口气，就要坚持斗争，直到最后胜利。”<sup>②</sup>

一九三三年夏天，长荣支撑着病弱的身体，顶风冒雨，跋山涉水，跨越道道险关，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来到汪清县草帽顶子附近的托盘沟，召集基层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党的指示，讨论部署新的任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当会议快结束时，遭到敌人突然袭击。长荣冒着枪林弹雨，率众冲出包围，他再次负了伤。为了尽快把党的指示深入贯彻下去，他忍着剧

---

<sup>①②</sup>王中山回忆录（未刊稿）。

烈伤痛，坚持奔向另一村落，去参加预定的会议。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敌人又开始了大“讨伐”，长荣率领部分战士和群众转移到汪清县十里坪一带。途中见一妇女生了小孩没有包布，他便脱下自己的上衣送给这位产妇。由于敌人跟踪追击，部队连续作战和转移得不到休息，长荣身患重病，又接连负伤，身体非常虚弱。同志们特意为他煮了一碗蘑菇汤，劝他趁热喝下，提提精神。他接到手中，但又转送给了那位产妇。那位产妇顿时热泪盈眶，周围的战士和群众也都深受感动。

就在这天，敌人又拉网搜山。长荣率部转移到十里坪庙沟山区，又被敌人包围。长荣由于身体极度衰弱，虚汗淋漓，面色苍白，战士们见他就要昏倒，赶忙上前搀扶。他咬紧牙关，凭着最后一点气力，命令部队立即突围。在与敌人奋战中，他又一次负了重伤，终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长眠于长白山下。

####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何佛清（长荣妻）、童承璞（长荣养子）给夏衍的信。
2. 《关于童长荣同志的家庭情况和青少年时期的活动》——中共柘阳县委办公室给安徽省民政厅的复信。
3. 《童长荣的青少年时代活动情况》——摘自《青春闪光》一文草稿。
4. 《童长荣烈士青少年时代的革命活动》——访方启坤记录（未刊稿）。
5. 《关于童长荣同志在学生时代的革命活动情况》和《有关童长荣烈士事迹几个问题的核实》——访江完白记录（未刊稿）。
6. 刘惠之：《童长荣同志在日本》（未刊稿）。
7. 黄鼎臣、陈曼云：《童长荣烈士在日本学习期间的革命活动》（未刊稿）。

8. 艾志诚：《回忆童长荣同志在旅日期间的革命活动》（未刊稿）。
9. 王亚纶：《东北抗日烈士传》，大众书店印行。
10. 何成湘：《回忆在东满特委工作时的童长荣同志》（未刊稿）。
11. 王中山：《战友、老师、先烈——回忆原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同志》（未刊稿）。
12. 中共吉林省委地方党史编委会：《童长荣传略》（未刊稿）。
13. 安徽省民政厅：《童长荣传略》（未刊稿）。
14. 骆宾基：《过去的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5. 夏衍：《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怀念“左联”发起人之一童长荣同志》，《人民日报》1980年4月18日第8版。
16. 罗章龙：《关于东北建党的回忆》，《北方论丛》1981年第4期。
17. 延边地区抗联老战士座谈会录音（吕英俊等谈童长荣在东满的活动情况）。
18. 安徽省民政厅、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大连市委党校、延边博物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等有关童长荣烈士的档案资料和陈列展览资料。



封面设计：王艺光

统一书号：11094·101

---

定 价： 1.00 元